



《焦点访谈》

《实话实说》

《新闻调查》

实话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最想
说不敢
说
就在这里
说

随书赠送电
脑VCD盘

文化艺术出版社

——《焦点访谈》 《实话实说》 《新闻调查》

实 话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话/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8

ISBN 7-5039-2069-6

I. 实… II. 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355 号

实 话

著 者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责任编辑 董 耘

封面设计 弘泰武仕

版式设计 白士弘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7-5039-2069-6/I·906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实 话》

编委会

梁建增	孙 杰	陈 虻
关海鹰	翟树杰	柏 杨
叶小林	张步兵	崔永元
赛 纳	杨继红	刘小燕
白岩松	张 洁	王 卓
魏驱虎	孙金岭	

主 编

梁建增	孙 杰
-----	-----

执行主编

杨继红	孙金岭
-----	-----



序 言

梁建增

《实话》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周刊,创刊于新世纪元年的元月,每周三上午部例会上,她准时出现在大家的手里。

《实话》筹办时,就像准爸爸、妈妈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一样,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既要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又能寄托希望和追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最后,锁定为《实话》。

名正则言顺。

《实话》周刊的封面上这样诠释“实话”:想说,不敢说,就在这里说。

想说。新闻本身就是天天“尝鲜”的工作,新近发生的事件、令人关注的人物,记者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最近距离地接触,并通过媒体传播给受众。作为占据制高点,并挟强势媒体优势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的编导、记者的触及面更为广阔和迅捷。限于媒体的特点和节目需要,他们看到的、想到的只有一部分通过节目传播给广大观众,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出现在荧屏上。一个职业的记者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传播欲,最为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把最有趣、最有价值的东西烂在肚子里,于是,《实话》成了大家的另一个舞台,幕前幕后的故事化作文字“与民同乐”。

不敢说。不管怎样,面对面地批评,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这是国情也是人性,新闻评论部的人也不能免俗。有一些话,如对节目的批评、对部门工作的建议、对领导的意见,不适合“面对面”的逆耳之言,我们不想让它们憋在大家心里,鼓励大家写成“背靠背”的文字说在《实话》上,解除了“不敢”的余悸和尴尬。笔下生文胆,直言不讳,实话实说。同时,这种批评的意见和合理的建议,也不应局限于一对一的单向传播上,应该通过“大众传播”广而告之,产生兼听则明、举一反三的效益。《实话》是广开言路的一条途径,这些实话对部门、对节目、对个人都是宝贵的财富,字字是金、句句为宝。

《实话》周刊每期只有薄薄的三十多页,装帧也只是用书钉简单地钉了一下,有的同志建议把她装帧得漂亮一些,我没有同意。真理是没有豪华和简陋之分的,真理是朴素的;实话也不会因为辞藻的华丽而增加可信度,实话是朴实的。恰恰是《实话》朴素的外表,反而使大家不为形式所累,不被“豪装”吓倒,能够放松脑子,放开手笔,这些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文字形成了文化。因此,《实话》成为构筑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文化、传承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传统的重要载体。

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秉承的理念。

今天,大家的文章变成了厚厚的一本书,由内部读物变成了公开出版物,《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的记者、编导、主持人和大家的沟通除了屏幕之外,又多了一条渠道。

我们希望《实话》这本书有品味、有滋味、讲实话,不知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目 录

第一部分

我问你答

以人为本 以屏为根

——新闻评论部主任、总制片人梁建增访谈录 / 孙金岭

3

“对于我们这些视电视为理想追求的人来说，做节目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的快乐无疑是与栏目的进步同行的；能与评论部这么多能人、高人、好人在一起合作，共筑一番事业，我的快乐是与同伴们一起共享的。”

听崔永元实话实说 / 孙金岭

26

“我希望有更好的主持人来做这件事情。做一个欣赏者、一个旁观者，心态也许会更好。如果说从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角度来讲，那会更为舒服。说句心里话，我是一直盼着赶紧从这个岗位上下去，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睡不好，吃不好，没有正常的生活。”

与白岩松倾心漫谈 / 孙金岭

55

“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主持人，他应该是一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他会更加客观、冷静，但是穿透力极强；他思想更加成熟，并且具有极大的悲悯之心；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把激情藏在心里，而状态却很平和，且每句话里都能让人感受到背后的激情汹涌澎湃。”



怀揣一颗平常心

——《焦点访谈》制片人、主持人柏杨访谈录 / 孙金岭

72

“主持人会有很多种。在一个传媒如此发达的现今社会,在中国观众对电视如此迷恋的环境下,让大家记住你,混个脸熟,的确不是难事。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观众对你的要求很高,则另当别论。因为你不能靠小聪明,更多的是要靠你对新闻事件独特的理解与判断。”

制片人就是经营者

——《焦点访谈》制片人叶小林访谈录 / 孙金岭

86

“年轻时,很多人可能拼的是体力,靠的是敢打敢拼,快速反应,而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时,他可能考虑的问题会更深一点,进而技巧性的、智慧性的东西便会凸现出来,包括做人的一些技巧。无论是谁,只要做《焦点访谈》这个栏目,就是在丰富自己,积累财富,就有一种空间。如果让别人感觉你有价值、有生机,那么这种发展的空间也就广阔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

——《焦点访谈》编导再军访谈录 / 孙金岭

97

“我一直认为,电视业是一种具有很强偶然性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要努力做的事,就是把这种偶然因素通过自己的设计和追求,通过深入的调查与追踪,把它捕捉到,并使它能够尽量地去展现必然。机会是偶然的,它只钟情于有心人。”





跟着感觉走

——《焦点访谈》编导黄洁访谈录 / 孙金岭

112

“得到的太多了。至少我学会了怎么去应对一些事情，这是原来在学校写论文时得不到的，也是我在社会中没有实践过的事情。现在做节目压力那么大，要求你百分之一千的准确，真的很害怕出错。这逼着你要做研究，做到心里有数，学会应对任何事情。这一点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很宝贵。”

第二部分

画外有话

与张君面对面 / 聂一军

125

在狱中，张君——这位曾经横行于渝、湘、鄂几省市的杀人、抢劫团伙的首犯对记者说：“我不神，但应该算是初步的智能化犯罪。像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抓到了，中国警察还是有能力破案的。”

攻关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 刘义长

129

2001年3月16日凌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爆炸案，这篇文章记述了编导、记者从受命采访到节目播出的全过程。



疑难案其实并不难 / 范本吉

133

因打击私屠乱宰,福州市的执法干部郑依清被歹徒殴打致死。按理说,这个案件暴力抗法,伤人致死,有主谋策划的,有通风报信的,有动手殴打的,应该并不难断,但是,它却拖了一年又九个月。

生命的代价 / 陈新红

137

人生的游戏规则必须遵守,否则你将付出代价。《逃亡日记》中的赵军,因贪污罪被判死缓;《扫黑》中的黑帮头目叶成坚因杀人、抢劫罪被判死刑,他们付出了青春或生命的代价。

打进内部 / 张林刚

142

“重拳出击搞严打”、“警民联合除邪恶!”看到这些标语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在打击犯罪分子,错!这是河南省濮阳市候乡镇为让农民交公粮而组织的一场运动。

暗访的尴尬 / 肖 津

145

拍摄一个打着会议旗号进行公款旅游的节目,如果不是暗访,观众不会听到像“公款旅游贵也合适,国家报销就合适”及“和旅行社出国不得自己花钱吗?会议就可以国家掏钱”,这样的虽是错误的,但却是那些人真心所想的真话。



保持距离 / 再 军 149

通过对河南假棉的报道,记者再军感受到了这样的启示,暗访虽可以让片中的人物生动,让情节鲜活,但却缺东西——距离,剪接者与素材、素材与背景之间的距离。

有关注水肉 / 姚宇军 152

为拍摄《触目惊心注水肉》一片,为给观众展示真实的注水镜头,本片编导、记者、摄像,不惜作践自己的外形,深入“敌后”并与屠夫为伍,真正体验了一把“江湖险恶”的境遇。

心惊肉跳的暗访 / 刘 涛 156

《谁给私盐开绿灯》一片播出后,河北省黄骅市盐政人员与私盐贩子内外勾结,导致私盐泛滥的内幕被揭露,一批盐政人员和两级盐务局的领导倒了下来,并就此引发了全国盐业系统大规模的围剿清查行动。

《工商忙收费 粮贩忙收粮》拍摄过程 / 黄 洁 159

在河北省邯郸市商城镇、漳河店镇、长巷乡,经编导、记者的周密部署,一场“地下斗争”开始了。随着斗争的深入,当地工商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利用职权乱收费,为粮贩充当保护伞的行为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思想统一了 事情才好办 / 喻晓轩 161

陈国庆真够冤的,好端端地到北海探亲,结果却被带到了派出所,接着被不明不白地关了几个钟头,还不明不白地订了一年的《广西政法报》;更冤的是,他在北海呆了几个月还没有看到一份《广西政法报》。

重复的暗访 / 喻晓轩 164

“我把部里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司机(出租车),又检查了一下证件和介绍信,这才硬着头皮走进了种子公司。当时的情形颇有点‘悲壮’的味道。”《专卖还是专横》一片的编导讲述了她的两次“历险记”。

讨教一二 / 郭 峰 167

“采访花沟镇的‘四万工程’时,看到打瞌睡者有之,抓进牢里者有之,扒了房子住在桥洞者有之。见了记者,他们如见救星,不是嚎啕大哭,就是跪地求助。”

我是刘思影的阿姨 / 申宇红 170

《残害儿童 罪不容诛》播出后不久,刘思影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再也不能听到她叫我阿姨,再也不能兑现去医院看她的承诺……每次走进办公室一眼看到放在柜子上的大布娃娃,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奈的痛苦。”编导申宇红为我们讲述了她和小思影的故事。





把握住热点 经营好选题 / 再 军 175

发生在云南省昭通地区永善县的一起顶风违纪、用公款吃喝玩乐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为《局长醉死歌舞厅》一片提供了丰富的新闻素材。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 刘 宁 180

许杰，贵阳市财政局的一个公务员，通过信息台的交友热线，结识了一位自称是香港黑社会龙氏家族的长子——龙彪，从此许杰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她的白马王子从财政局的账上弄出了七千多万元。

与艾滋病无关 / 罗芳华 187

余梅芳在一次普通的因腰椎间盘突出而进行的血清检测之后，被疑诊为 HIV 阳性，即艾滋病。从此，她的身边充满了“合情合理”的冷漠、怠慢、伤害，最终她在名誉的底线上无路可走，将对自己做出艾滋病诊断的山西省忻州地区医院和附有连带责任的市防疫站推上了被告席。

关于摇头丸 / 刘庆生 192

“我是属于那种一听说诸如犯罪、暴力、抓捕等字眼儿就特兴奋的人，拍这类题材是我的最爱。当领导说要派我去做‘摇头丸’的选题时，我马上就满心欢喜地接下了任务。”

行走在真相边缘 / 徐 慨

195

广西南丹县大厂镇鸿图选矿厂发生尾砂坝坍塌事故,造成二十八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新闻调查》连续接到当地群众举报,称当地政府隐瞒死亡人数,而且,由于广西的一些“人物”在当地的私人矿井中有股份。于是,事不宜迟,编导、记者连夜赶赴南丹县,探寻事实真相。

事实与神话之间 / 何 勇

203

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判处六年徒刑、但已过七年还没有被执行的罪犯。这个神奇而近乎荒诞的故事,吸引的不仅仅是编导、记者,当然还有观众。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 孟 克

207

“在采访中,有时候就在你觉得差不多又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事情也许真就不一样了。”

《新世纪 新生活》月记·周记·日记 / 张虎迪 210

因为《实话实说》新世纪特别节目的选题,愁坏了节目组的男女老少。当百岁老人隆老太太一家如同天上掉馅饼般“从天而降”时,崔永元大喜,放出话,京城馆子任你们挑。





放 茅 / 汪 东 升

216

“放茅,意思是上厕所,是监狱里的专用词语。监狱里每天生活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监狱干警的那声‘放茅’。在监狱拍片的几天里,‘放茅’这个词语似乎总是能出现在周围单调的声音中,并在记忆中反反复复、无休止地回荡。”

《暴风雪过后》拍摄日记 / 王 忠 新

219

在世纪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时间,灾情成为全国各界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新闻调查》的编导、记者、摄像一行六人,在远离亲人的茫茫雪原上度过了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

天鹅,一路走好 / 宋 薇

227

在吉林省大安地区有一伙人滥杀天鹅等国家级保护动物,编导、记者在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之后,终于拍摄到了偷猎、贩卖的真实镜头。

大熊猫的故事 / 黄 璞

230

“在大熊猫家乡四川采访,我们不仅可以非常近距离地站在大熊猫的身边,对于那些刚刚出生不久的熊猫幼崽,甚至还能轻轻地把它们像小孩儿一样抱在怀里。几天时间的朝夕相处,也从大熊猫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大熊猫的故事。”



羊泉村纪事 / 张 洁 陈新红

235

2000年4月,记者董倩来到山西省盂县,对五十年前遭受侵华日军性暴力侵害的万爱花、刘面换、赵润梅三位老人进行了实地采访。这是一段对受害者来说是难以启齿的经历,而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不能忘记的屈辱的历史。

“飘” / 张天贺

238

对每一个吸毒者来说,吸毒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而戒毒过程往往也是充满了痛苦的反复。宋玉生——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向观众讲述了他从1998年初染上海洛因之后,历经吸毒——戒毒——复吸——再戒毒的艰难之路。

出 走 / 董 倩

242

1999年初,安徽省凤阳县莲塘村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刚刚举行过婚礼的新娘吉开桃,在婚礼后的第七天逃离了新房,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状告新郎李本武强奸了她。报案十一个月后,新郎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并于2000年6月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不仅仅同情弱者 / 谭 芸 庄永志

249

1996年,四岁的杨易被诊断患了“神经母细胞瘤”,并于同年11月26日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做了腹部肿瘤切除术。1999年8月,杨易因身体不适再次来到“省二院”就诊,在做腹部B超检查时,被告知孩子的左肾区肾脏没有了。杨易的左肾到底哪儿去了呢?



第三部分

有话直说

暗访时代已经到来 / 曲长缨	259
向往一种生活 / 法 展	264
暗访 ABC / 姚宇军	268
“两会”的记者证 / 吕少波	271
“退居”二线 / 白河山	274
另类心情 / 张 洁	278
赵一工,揪住你的小辫子 / 孙金岭	280
还是叫我虎子吧 / 魏驱虎	283
站直了 别趴下 / 翟树杰	286
明年我们还会领先吗? / 宣明栋	290
缺氧的故事 / 林凤安	293





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 杨继红 297

感动自己 / 孙金岭 301

你说越累越出汗才越是真正的生活 / 杨树勋 304

法律,悬在电视记者头上的利剑 / 崔立新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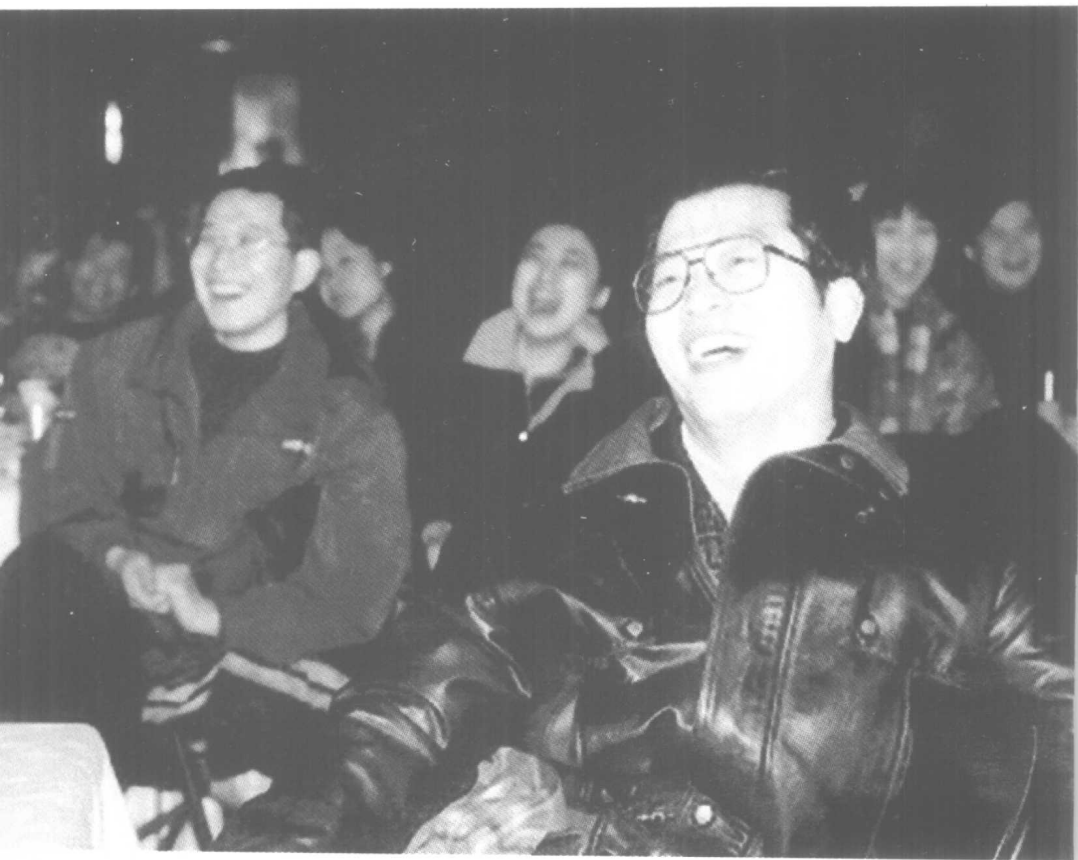
走进新世纪 313



第一部分

我问你答





梁建增：“我的快乐是与同伴们一起共享的。”



以人为本 以屏为根

——新闻评论部主任、总制片人梁建增访谈录

孙金岭

对于我们这些视电视为理想追求的人来说，做节目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的快乐无疑是与栏目的进步同行的；能与评论部这么多能人、高人、好人在一起合作，共筑一番事业，我的快乐是与同伴们一起共享的

孙金岭：梁主任，你在评论部工作多少年了？

梁建增：七年了吧。1993年年底新闻评论部一成立，我就从《观察与思考》栏目过来创办《焦点访谈》了。

孙金岭：当时的《观察与思考》是个什么栏目呢？

梁建增：它是中国最早的新闻评论性栏目。《观察与思考》通过从一些事件入手，进而对事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带有一定的评论色彩，一周一次。

孙金岭：你当初为什么要来评论部呢？

梁建增：当初台里决定成立新闻评论部时，新闻评论部要办两个栏目，一个是在此之前推出的《东方时空》，还有一个是即将创办的《焦点访谈》，每天播出一期。但是，人从何处来呢？一部分由《观察与思考》以整编制的形式来到新闻评论部，一部分来自《今日世界》，还有一部分是《东方时空》的《焦



点时刻》，这三批人马组成了《焦点访谈》的雏形。随着《焦点访谈》的诞生，新闻评论部也诞生了。

孙金岭：你还记得初来乍到时的心情吗？

梁建增：当然记得。我记得是在台里的咖啡厅，由负责新闻评论部的孙玉胜主任找我谈话，说台里决定要正式成立评论部了，《观察与思考》组要加入评论部，创办《焦点访谈》。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消息。虽然《观察与思考》是评论性栏目，但是，我们感觉它有自身的局限性，比较呆板，不是一个符合新闻传播和电视特性的评论性栏目。我们有时候说：要是把《观察与思考》整理成文字的话，它是一篇中规中矩、论证严谨的论文。而正因为它过于严谨，过于周全，就使得《观察与思考》显得四平八稳，毫无生气。我们也在一直思考着怎样来改革。这个时候，传来台里要在黄金时间创办一个每天播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性栏目的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一声春雷。栏目不仅是在黄金时间，而且还是一个日刊，这让我们有了发展的契机，去尝试一个符合电视传播规律和具有个性的栏目的挑战，那种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孙金岭：那个时候你多大？

梁建增：三十岁吧。

孙金岭：正是而立之年啊！那你来之前在《观察与思考》做什么？

梁建增：当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副制片人。

孙金岭：那来了之后肯定是提拔当制片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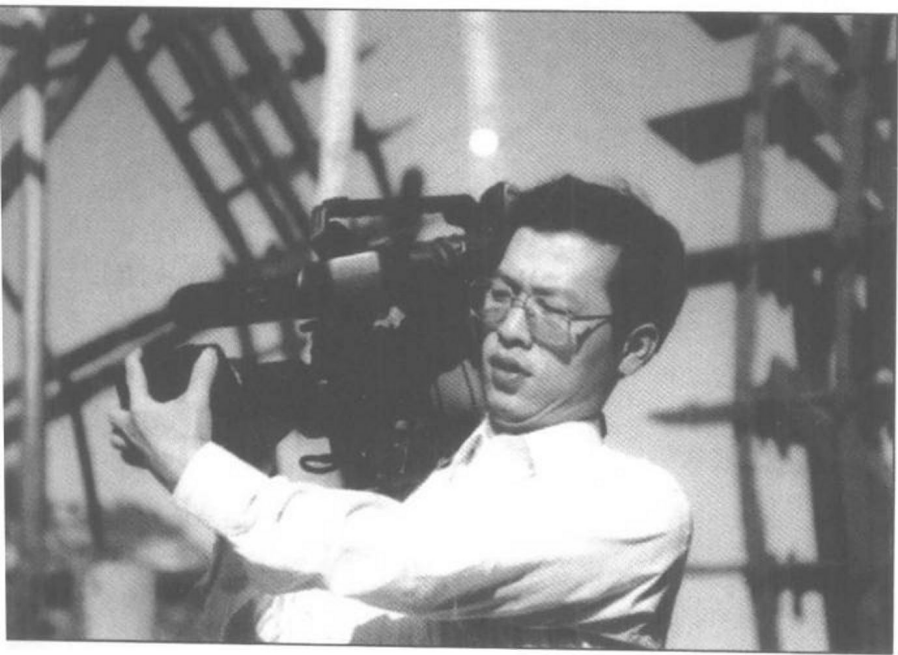
梁建增：开始是在《焦点访谈》记者二组当制片人；一年后，在《焦点访谈》记者四组当了四年制片人；后来在《焦点访谈》中心组干了半年的制片人；最后到评论部做主管《焦点访谈》的副主任，也就是总制片人吧，前后有七年时间。

孙金岭：如果把这七年比作人生中的一首歌的话，你觉得最重的一段是在什么时候？也就是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

梁建增：当然是初创时期！今天我们在一起回忆七年前创建《焦点访谈》时的情景，那真是一种幸福的回首和感慨。

《焦点访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目样式，创办时大家显然心里没底。我们虽有一些定位，也有一些理念，但是，新闻电视评论毕竟是一种新的节目样式，电视又是一种形象化的媒体，什么时候有了样片，能够眼见为实了，心里才会踏实。

那时候，我在《焦点访谈》记者二组承担着做样片的任务。我们做的第一批样片，就是三个有关舆论监督的片子。现



就像战士离不开武器一样，梁建增从骨子里喜欢摄像机，喜欢触摸它的那份感觉……



在都记得很清楚，一个是《北京郊区有一座坟茔》，说的是北京顺义高丽营乡侵占良田，乱建墓地的事情；还有一期叫《吹牛皮也要上税》，采访的是上海一家化妆品企业做虚假广告宣传，最后被处罚的事；再一个是《游戏机游戏着什么》，是反映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电子游戏厅，对青少年身心造成影响的节目。这三期节目，从制作样式来说，我们注重了用调查的方式讲故事，也就是用事实来说话。实践证明，这些都是今天形成《焦点访谈》这种电视评论样式和形态的要素。

那时，台里没房子，我们就在中国工运学院的图书馆里租了一个大会议室。房子大概有四百平米，几十个人在里面既编片子，又写稿子；既是办公室，同时又是宿舍。尽管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人介意。为了创业，为了创名牌，大家一起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走过了那段难忘的开端！这一段历程，至今想来，都让人心情激动，难以忘怀。

孙金岭：七年来，你的心情是不是特别愉快？

梁建增：在评论部工作，我想是快乐常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部里自己制定的工作手册上就有一句话，叫“工作是快乐的”，它真实地体现了新闻评论部的氛围。我想，这几年我自己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这种快乐的状态首先是表现在节目上，对于我们这些视电视为理想追求的人来说，做节目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现在《焦点访谈》成为中国著名的电视栏目之一，受到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认可，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的快乐无疑是与栏目的进步同行的；能与评论部这么多能人、高人、好人在一起合作，共筑一番事业，我的快乐是与同伴们一起共享的。

孙金岭：这种快乐是不是也因为与你自己七年来一直往高处走、提拔比较顺利有关呢？



梁建增：自己进步了，总是让人快乐的，但不能说完全跟我往高处走有关系。因为，我的快乐是与新闻评论部和《焦点访谈》整体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栏目办得好，对我们这些从业人员来说，就是一种荣誉；而栏目办得差，那肯定也不会有如此饱满和旺盛的精神状态的。



图片拍摄于2001年7月2日凌晨，现场为十八小时直播节目——《旗帜》的总指挥室。从右至左分别为：中央电视台评论部主任梁建增、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制片人张步兵。图片中梁建增的神态逼真地展现了他当时的状态：直播成功的喜悦洋溢在疲倦的脸上，但眼睛却闭上了——太累了，整整二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

孙金岭：如果让你自己来评价，你是千里马吗？

梁建增：我呀——自负地说吧，在领导眼里，我应该是一

匹千里马；同时，我还当制片人，手下还有一拨儿人，在这个层次里，我觉得我又是在做一个伯乐。对于身处这种中间状态的人来说，我具有双重的角色。

孙金岭：既然你自认为是匹千里马，那么，你有伯乐吗？

梁建增：有啊！一个是孙玉胜，他当时是新闻评论部的主任。我在《观察与思考》栏目当副组长时，才三十岁，年龄不算太大，而在此之前，孙玉胜主任对我不是很了解，也不相识，但在成立《焦点访谈》栏目组的时候，他决定让我担任制片人，我感觉他的决定对我来说就是一次人生的选择。后来让我去《焦点访谈》记者四组当制片人，而记者四组又是一个大组，一方面它承担着《焦点访谈》三分之一的节目量，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完整的《时空报道》栏目，其地位举足轻重。当时这个组遇到了一些麻烦，孙玉胜主任经过权衡，让我去当制片人。开始我也有些畏惧，坦率地说，当时也不太愿意去，因为我在记者二组工作比较顺利，局面也很好。我当时说，如果这是组织上决定的，那么我去；如果让我个人选择，我还是喜欢留在记者二组。孙玉胜主任说，没有别人了，只能你去。这次选择对我同样是一次重要的锻炼。

孙金岭：人生有一伯乐足矣！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梁建增：对，是这样。但我想说的是，我还有一位伯乐，那就是袁正明主任。袁正明是新闻评论部的第二任主任，我给他当副手，我们的合作一直比较默契。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好的做法和方法，尤其是在部门的管理上获益匪浅。

孙金岭：在《焦点访谈》、在新闻评论部这样一个高手云集、人才辈出的地方，当伯乐是不是很容易成功？

梁建增：我以为恰恰相反。在层次分明的环境里，人才的



脱颖而出会显得特别明显,伯乐的判断相对会容易一些;如果大家旗鼓相当,那么好中选优,对于伯乐而言,绝非易事。不错,在评论部云集了中国新闻界最优秀的一群电视人,各种性格、各方技能的人应有尽有,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根据伯乐自己的好恶来选择人,而是应该根据他是否适应栏目和节目来选择人,也就是说以栏目的需求去寻找千里马。

孙金岭:你作为伯乐,寻找千里马的标准是什么?

梁建增:我有一条用人的标准,就是“注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用其所长”,一定要懂得“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无完人”的道理。我们是想要用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人,但是,这种人精、人尖子比较难找,而大部分人只是在某些方面有长处,因此,要用一技之长的千里马,若干的“一技”之合出现的场面就是万马奔腾。

孙金岭:能否具体地说一下?比如说,你发现的千里马是怎样的呢?

梁建增:当时在《焦点访谈》记者四组有个记者,名叫王利芬,她是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十分热爱电视事业,但是来到评论部时,对电视、对新闻还比较陌生,工作上难免有种很不得心应手的感觉。当时有人就认为,电视业不需要这么高文凭的人,知识越多,动手能力可能就越差。但是,通过了解,我觉得她身上有种巨大的潜力。第一,她毕竟是一个博士,而博士可不是说是个人就能考上的;第二,她有一种严谨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在一些理性很强的节目里,绝对是一种优势;第三,她有激情。作为一个女同志,对电视充满着深深的热爱,十分难得。我想只要是给她时间和机会,用我们所从事的电视经验去充实她,她一定是有后劲的。事实证明,她干

得真的很出色。

孙金岭：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机会给谁谁都会成功，都会成为千里马？

梁建增：话不是这样说的。在评论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才云集，而这些人才又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或者携妻牵子，或者形单影只，怀着一腔热血扔掉了金饭碗、银饭碗，端起了泥饭碗、瓷饭碗，比起端着铁饭碗的人来，他们处于一种极不稳定而又非常脆弱的地位，而地位的脆弱也必将产生心理的脆弱。这时，制片人如果能给大家更多的关怀，这种关怀就会成为他们前进的“添加剂”，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我的眼里，没有不合格的千里马，只有不合格的伯乐。

孙金岭：既然全是合格的千里马了，那伯乐还有自豪感吗？

梁建增：伯乐的自豪就在于知人善任，让每匹马都能深挖潜质，各尽其才！比如记者再军，他曾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应聘来到中央电视台后，有一段时间比较郁闷，做节目很一般，他自己也有点灰心，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干电视。我觉得他是学国民经济管理的，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宏观的视野；同时，他是蒙古人，性情爽快，血液中有一种疾恶如仇的品格，做舆论监督节目的时候，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正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所应必备的条件之一。后来，我跟他侃了一次。那时，我正好接到了309国道乱收费的新闻线索，就派他去了，结果《罚要依法》的节目一炮打响，他也一鸣惊人，节目以满票荣获中国新闻一等奖，并成为舆论监督节目的典范之作。

孙金岭：说到这里，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你的性格里是不是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



梁建增：兼容并蓄，用其所长，我用人的原则。至于我的性格，可能是属于外柔内刚、外圆内方的那种，还有点内向。但是，我绝对不会按照我的性格和好恶去看待人、使用人，而这又是我做人的原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制片人以人为本，人为万物之灵；以屏为根，节目为万事之魂。”今天，面对你的采访，我还想重复这句话。

其实，我们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所要表明的是，在评论部这个特殊的团队里，它之所以推出一些有影响的栏目，就在于它有一套完整而正规的用人机制和运作体系。人是任何事情成败的第一因素，而这种机制不会因人而异，也不会因时而变。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在享受它给每一个人带来的巨大益处的同时，也在尽心维护着它和自觉遵守着它，为它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这是评论部走向成功的关键，是多年来无数评论部人用心凝聚的精神财富。

在评论部，我们就是要给人才提供足够支撑他们去寻求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平台

孙金岭：2001年1月1日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你走马上任，担当了评论部的“第三代领导人”。今天，评论部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三个栏目，可谓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你当了主任，要带领这帮优秀的人才往前走，有压力吗？

梁建增：目前，新闻评论部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三个栏目，虽然说是如雷贯耳，但是能不能够保持发展，则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刚才我说过，我整体的工作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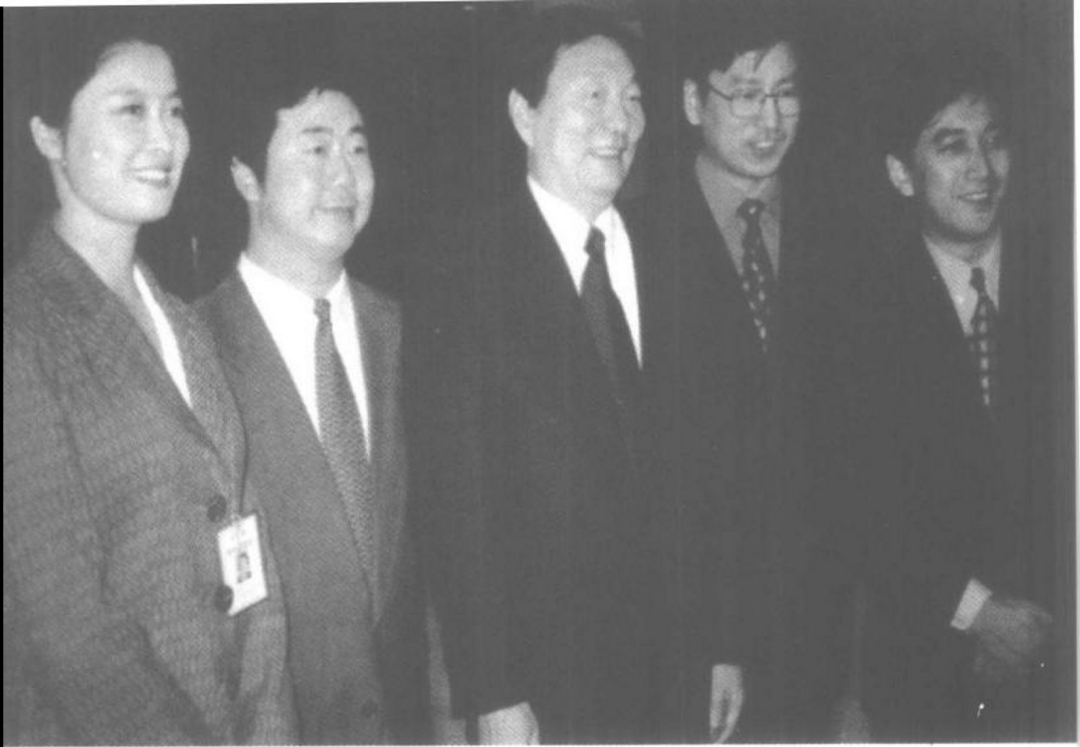


态是快乐的,但决不等于没有忧患或者说担忧意识。不错,这三个栏目都是知名品牌,大家的认知度也比较高,但是,现在电视新闻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手也越来越多,面对如此残酷的态势,如何能够让一个栏目始终保持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处于领先的地位,且具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力,这对于我这个第三任主任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一个栏目初创时,虽然有难处,但也容易一炮打响。但当它进入成熟期或者说它必然要进入一个平台期之后,再求更高层次的进步无疑更难。就像我们跑步,它肯定有一段时间是平台期,不可能一直百米冲刺。这个平台期,如果我们很好地走过去,那么,它可能将是我们跃上一个新境界和新阶段的支点;假如这个平台期掌握不好,也可能会成为走上另一个方向的拐点。对此我自知任重道远。Intel 公司前总裁安迪·葛鲁夫说过:“不好的公司被危机解决,好的公司度过危机,伟大的公司通过危机提高自己。”公司是这样,栏目也同理。不好的栏目在平台期停滞,好的栏目走过平台期,优秀的栏目加速跑过平台期。

孙金岭:栏目发展处于平台期时最稳定,但也是最让人迷惑的,对此你能否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栏目和节目存在的问题呢?

梁建增:俗话说,“当局者迷”,作为管理者、领航人不能迷,而我的思考也一直不曾停止。《焦点访谈》在 1995 年的时候,电视圈里就有过一个说法:一个栏目走过三年之后便会走向夕阳,然后再去创办一个新栏目了。我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变革或创新的意识,但同时也反映了栏目的不成熟——对观众、对市场把握得不成熟。正常情况下,栏目应该始终处于不断的微调状态,而不是一下子就灭掉。



1998年4月《焦点访谈》创办五周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平台期,收视率下降。《焦点访谈》的几个节目组当时是各自为战,每周各组向部里交货。这种做法发挥了栏目效率高的优势,但同时也不利于栏目质量的整体提高和内容的纵深把握。于是,部里决定成立中心组,让我担任制片人,就是想加强《焦点访谈》的整体策划和统筹,加强节目质量的深度和广度,加强舆论监督的锐气和力度。中心组成立后,找准了《焦点访谈》当时薄弱的环节,然后对症下药,结果,这一年,马上在屏幕上见到了效果。1998年成为了《焦点访谈》收视率最高的一年,跃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也就是在这一年,朱镕基总理来《焦点访谈》座谈。为什么总理不早不晚而是在这一年来呢?显然与这一年的节目和质量有关系。可以说,找准了栏目的薄弱

环节并及时对症下药,那会对一个栏目的提高大有裨益。

《新闻调查》经过五年的探索,今年终于迎来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从平时常常受到冲击的、播出时间不确定的周五晚上,挪到了周六,在播出时间上相对得到了保障。从2000年以来,《新闻调查》在新闻定位上也更加清晰和准确了,这就是探寻事实真相,对一些事件进行深入的投资。从而收视率有明显的提高,增长了零点五到一个百分点,在晚九点时段,始终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但是,如何将清晰的定位变成实实在在的节目,并最终让观众认可,还须继续努力。

《实话实说》是目前中国谈话类节目的龙头老大。在2001年第一季度的栏目调查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分获前三位,号称“三驾马车”,其优势和地方台、中央台别的栏目比较起来非常明显。《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周刊栏目,能跻身三强,十分不易,运作确实是比较成功的。原来在早晨播出,可以说是一花独秀、一强众弱,很容易吸引观众。但是,现在谈话类节目风起云涌,竞争也很厉害,特别是进入晚间以后,对手越来越多了。现在到了周六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这块时段历来是虎狼之地。从这个态势看,我以为《实话实说》的竞争才真正开始了,没有过硬的本领,没有超前的理念,没有良性的运作,很难有立足之地。

孙金岭:而要想求得发展,没有思路和措施是不行的。作为主任,你肯定有你的办法,对此我很想听听你是如何思考的。

梁建增:顺利地通过这个平台期,带领大家跃向一个新的台阶,靠什么?我也多次问自己。只有两条办法可行:

一方面靠理念。当中国电视新闻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我们的观念和理念将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想到,才能够做到,



或者说要比别人在观念上、理念上领先一步,才能在行动上乘风破浪。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创办改变了中国电视新闻没有深度报道的格局,提升了电视在媒介中的地位,也促进了新闻改革的步伐,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电视新闻本体的内涵与媒介所负载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电视新闻的理念永远处于变革状态,永无止境。因此,我们对于电视的认识,对于电视新闻的认识,也就不能停止,要始终敏感地来组织、判断,从而做出决断,把我们的理念落实在节目的实践之中。

另一方面靠管理。新闻评论部的三个栏目,已经在节目的运作上摸索出了很多好的、初步性的认识,一些管理的措施也很规范。这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是我们的软件。硬件可以用钱买到,软件不是说一朝一夕用钱就能买来的。所谓“一夜之间,可以培养一个百万富翁,但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宝藏如何能够深入我们的心灵,隐藏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变成一个可供新闻评论部共享的现实财富,则需要再上一层楼。所以,现在部里正在制定一些办法、规定,不仅仅是管理方面的,还包括一些节目制作手段、岗位运作方法,等等。

孙金岭:能不能具体谈一下你的理念呢?

梁建增:在社会对电视深度报道需求走旺的大背景下,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批评曝光,进行舆论监督,是现阶段电视评论节目最大的热点。可以说,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特有属性,它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因此,今后《焦点访谈》要在舆论监督方面继续加强的同时,力争有新的突破。2001年我给《焦点访谈》提出了四个原则,那就是“选题要有力度,开掘要有深度,把握要有精度,反应要有速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现在《焦点访谈》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高层的注意,对事实的把握,有的领导同志提出来要百分之一千的准确,所以,我们把握事实不仅要有精度,而且一定要精益求精。

2001年,《焦点访谈》的一个大动作就是成立了机动组。《焦点访谈》这一两年来,在常规的报道上做得不错,但是对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反应上则显得有点迟钝。反映迟钝,一方面是因为记者的敏感性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机制方面存在缺陷,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在考虑这种事情。现在机动组的成立,就可以使一部分人天天处于二十四小时倚马可待的准备状态,一旦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样就使“四个原则”的实现有了可靠的机制保障。

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新闻评论深度报道栏目,我想,2001年的《新闻调查》,主要应在选题的关注度上投入更大的精力。因为,四十分钟时长的节目,你去揭露真相,选题不精道,如何能牢牢地抓住电视观众呢?在此基础上,力求制作的精良,以便更能吸引人,让观众老惦记着你。因此,《新闻调查》栏目鲜明特点的树立至关重要。

晚上看节目的观众量非常宽,基数也很大。如果节目好,就能够从这块黄金大蛋糕里切下大的份额,否则就有可能被别人切走。因此,对于《实话实说》来说,它应该加强选题的大众化,增强大众的参与感,以选题取胜。由于《实话实说》刚进入晚间,而人们也有一个收视习惯,因此,培养观众对《实话实说》的收视期待,可谓当务之急。我希望《实话实说》能够在2001年上半年站稳脚跟,然后在下半年大步前行。

孙金岭:理念固然重要,管理更是关键。而在一个管理制度相对成熟、运作机制相对完善的部门,寻求更大程度的突破,想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愿闻其详。



梁建增：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目的是成就事业，而事业是靠人来完成的，只有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筑就恢宏的事业。电视不仅是一个资金密集、投入较高的行业，也是一个人才密集的行业，许多事情要靠一些高人、能人和好人来完成。评论部这些年积累了一批人才，我想在目前的状况下，一方面把现有的人才用足，为他们提供一个舞台，把他们所有的潜能都发挥出来，同时，不断地从社会上吸纳人才，补充新鲜血液，这些将是我们加强管理的最主要的原则。

孙金岭：那么，尊重人才，发挥才能的标准是什么？

梁建增：给人才提供足够支撑他们去寻求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平台！具体来讲，我的标准就是：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让大家在评论部做到名利双收。也就是说，你能干，多干，干好，就理所应当得到价优质优的回报。而你做了好节目，你会成为名记者、名主持人、名摄像、名策划，我们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你这个名誉，鼓励出名，鼓励通过出名来获利。在评论部，我很少空讲“奉献”，因为我想，在一个良性运作的部门里，不应该存在着不等价和不对等的交流。干得好，我们就要用工资和薪酬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

作为评论部的负责人，我更希望能把这个部门做到极致，使它成为中国电视界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门。为此我会孜孜以求，不敢懈怠。

孙金岭：我想，听了你刚才的一番话，相信评论部的兄弟姐妹们会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我更想知道具体做起来，你有信心吗？

梁建增：一个字：有！

孙金岭：这信心来自何处？

梁建增：我们有一套完善的新闻运作机制作基础，我们有一批出色的电视新闻人才作保障，我们有中央电视台各级领导强有力的支持作后盾，怎么会没有信心呢？何况我还有一个相知相识、肝胆相照的合作伙伴！我与陈虬、关海鹰三个人的合作非常好，也很默契。陈虬以前是《生活空间》的制片人，关海鹰是《焦点访谈》记者一组的制片人，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为人有目共睹。过去我们就熟知相处，现在他们对我真诚相助，有一句话说得好“团结也是生产力”。我们这个班子非常团结，那么底下的同志看了，工作也会非常顺畅，从而产生积极的效益，共同为集体的事业献计献策，团结就是生产力。否则，



新闻评论部的“三套车”：左为厚道沉稳的关海鹰、中为谦逊平实的梁建增、右为才情横溢的陈虬。

“黄牛打架，田螺遭殃”，班子不团结，肯定会影响底下的工作，让大伙儿无所适从，分心分力，那样又怎么走向事业的成功呢？

孙金岭：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这一点实现起来会很不容易，比如会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大量说情者。作为主任，一个握有权力的总制片人，你对这种事情怎么看？

梁建增：社会上有“性骚扰”一词，我想在评论部，特别是在《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我们所受到的是一种“情骚扰”。而这种“情骚扰”，不仅来自舆论监督方面，也有正面报道，只不过来自舆论监督方面的“情骚扰”力度和压力更大一些。既然说情，肯定是能够说到情这个份上来，起码存在一定情的成分，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亲属，或者是同事，或者是熟人，才能够跟你说上话。而说情的目的也很简单：不播或者播，但是让人处理起来却绝非易事。你这个问题其实提得很尖锐，问题处理好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栏目都有益处，否则反之。坦率地讲，既然说情，就离不开诱惑，离不开金钱与物质，离不开人情世故。而面对诱惑如何把握？实在是考验一个人的重要依据，它不仅仅在直面一个人的品格德行、党性原则，而且也决定着一个人在未来的道路上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对此认识，作为一个有些权力的总制片人，我不敢糊涂。

孙金岭：那么，你对这些事处理起来会有原则吗？

梁建增：我有三个原则：对事实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在这三条原则面前，一视同仁。一般来说，如果是违法的，且是事实，节目该播就播；如果说我们事实有出入，而人家的反映是对的，节目就不要播了。对于一般的说情人，我还是能够力所能及地坚持亲自听一听另一方的意见。听的过程就是核实事实、把握事实、准确监督的过程。如



果听了感觉没出入,反而会更坚定播出的信心。而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就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我首先要做人。至于要对当事人负责,同样重要。我们采访了当事人,人家接受了采访,特别是一些受到冤屈的普通百姓,从目前中国国情来说,节目播出后,往往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如果节目没有播出,被一些人利用之后,可能当事者会遭到打击报复,可能他的境遇比我们采访前还要更加悲惨。所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为他们负责。我大话不想说,这三个负责,让我得罪了不少人。因为节目的播出,就意味着你驳了人家的面子,意味着不够朋友,不够朋友以后也就甭打交道了呗。毫无办法,因为工作该得罪也就得罪了。

孙金岭:这种“情骚扰”是不是会成为你的负担?

梁建增:负担肯定是负担了,但是,我们不能拿原则、拿良知作交易。既然干了这份工作,那就得罪人。由于几乎每天都碰到这些事情,倒也有经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热情接待,谦虚倾听,然后原则把握。

孙金岭:在评论部的发展过程中,创新一直是其一大特点。创新让评论部始终站在新闻改革的最前沿,创新让评论部充满活力和生机,创新也让评论部赢得了更多的机遇与空间。刚才你说的理念与管理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度过平台期的思考和行动,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寻找到其他的兴奋点和增长点?

梁建增:如何度过发展的平台期,这本身就极其重要,决不可等闲视之。当然,一个部门的发展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扩展视野,解放思路,大胆探索,果断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夜》的构想与策划无疑将是新闻评论部进行栏目改革,向着新闻传播的纵深领域开掘的前沿阵地和突



破点。

孙金岭：《子夜》究竟是一档什么样的栏目呢？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个栏目？

梁建增：简而言之，《子夜》是一个夜间新闻深度报道栏目。作为一个夜间节目，它将对当日或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筛选、过滤，选择其中受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件事，予以详尽报道。而创办这个栏目的最初设想，来自于美国 ABC 的《夜线》栏目。那一年我在美国广播公司考察的时候，发现有一档节目非常有影响，这就是《夜线》，它的主持人是卡帕。于是，我联想到在中国整体电视新闻栏目的布局有一个空白点，而这个空白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晚十一点以后，中央电视台没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电视新闻栏目来感召和呼唤电视观众，这是栏目上的空白点。第二，在电视样式上，也存在一个空白点。我们现在已有了一种新闻集纳式的栏目，比如《新闻调查》、《现在播报》；另外还有一种调查性的节目，比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那么，还应该有一种主持人对当日或近日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新闻事件，进行比较深入的、立体的、统领式的分析。我们创办《子夜》，在晚间十一点推出新闻深度分析的栏目，不仅会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栏目总体更加合理，黄金时间有可能延续到晚十二点，而且从节目样式上，也多了一个新模式、新探索。

当然，如果这个栏目能够在 2001 年顺利推出的话，对新闻评论部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这样评论部的栏目布局会更加完整和合理。两个日播节目《焦点访谈》和《子夜》，两个周播节目《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将形成新闻内容渐次递进、栏目运作相互关联、播出时间密切策动的一种新格局。

孙金岭：关于《子夜》栏目的创办，你有何新的理念呢？

梁建增：关于《子夜》的新理念肯定有，但我以为它更多的是凝聚了评论部全体同志的智慧。《子夜》既然是一个晚间的新闻深度报道栏目，那么，它就不能同于现在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东方时空》，以及《中国报道》等栏目的新闻理念。这些栏目的报道方式，都是对某一既定的新闻事实，由记者做从外向内的剖析和解读，做从发散到聚集的归纳和总结，注重对事件的宏观结论。这种传播模式，总体上是对新闻事件的全貌进行“外观性”的新闻调查和分析。《子夜》则运用全新的传播理念：News Inside(新闻内核)，它是对新闻事件做自内而外的发散，从单极到多极的扩张。这种报道模式



梁建增：“我有一群患难相知、肝胆相照的兄弟姐妹，为何不自信！”

是围绕新闻事件中一个最具牵动力的兴趣点，由事件的参与者从新闻事件的内部（而不是由记者从外部）完成事件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内观性”报道。与“外观性”报道不同，这种模式的被采访对象，不再是一个由多方面组成的、从外部对某一事件或既定结论的证实群体，而是来自事件内部的第一讲述人。

News Inside 的理念，更易于表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发挥报道的现场感染力，而《子夜》栏目的创办将是这种新理论在中国电视新闻界的



最好实践。因此,我们会像企盼婴儿的诞生一样,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大胆的探索之后,看到《子夜》“点亮夜色的精彩”!

孙金岭:有如此清晰的理念,有如此准确的目标,相信《子夜》一定会横空出世,走向辉煌。在我们之间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你的自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字里行间无处不见。你为何这样自信呢?

梁建增:我有一群患难相知、肝胆相照的兄弟姐妹,为何不自信!不仅如此,这些兄弟姐妹个个性格迥异,身怀绝技,我更没有理由不自信!有些人觉得个性太强不利于管理,可我一直认为,人才中有不同的个性,会给一个部门带来活力,而且个性越多,越有活力。而我怕的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那这个部门的活力、创造力也就没有了;怕的是你不会容忍别人的缺点,调动不了别人的特长。当然在自身的业务方面,我同样比较自信。

孙金岭:也就是说,目前的电视新闻业务对你来讲轻车熟路?

梁建增:电视新闻业务,没有止境,所谓“学海无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喜欢这一行,并且愿意为之追求与探索不息。1984年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我在1985年做了一个专题片,叫《一个盲姑娘的追求》,没有想到竟然获得了第八届全国好新闻特等奖,也就是中国新闻奖的前身。当时全国只有三个特等奖,我是其中之一,获奖时才二十二岁。那个年龄就站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最高峰,当时的确很激动,觉得热血沸腾:我从没有感到我是那样的热爱电视新闻工作。来到中央电视台后,我参加了《焦点访谈》的创办,作为栏目的主管,我就喜欢把事做到极致,把一个栏目做成中国最好的栏目,“要做就做好”。后来负责香港回归报道的现场直播,负责《相逢2000年》、《新世纪》,包括《旗

帜》这些重要报道，还有一些系列片，比如《中国之路》、《亲历》，这些在业内受到很大反响的节目，反而更加增强了我对电视新闻的热爱与探索，也许我这一辈子离不开电视了。今天，作为评论部的负责人，我更希望能把这个部门做到极致，使它成为中国电视界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门。为此我会孜孜以求，不敢懈怠。

孙金岭：那你为自己设计过未来吗？

梁建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人肯定不能够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和走向，势必会被工作环境和时代所影响。我热爱电视事业，何况人都三十多岁了，估计再从事新的行当，也不太可能了。你看现在招聘的广告，都是要三十五岁以下的，对我来讲，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新行业供选择，还是继续干电视新闻吧！

孙金岭：面对如此繁杂的工作量，你的业余时间还会很多吗？

梁建增：几乎是没有业余时间了。只要栏目在正常播出着，就意味着你三百六十五天天不得消停；只要新闻在每天发生着，就意味着你二十四小时处于一种倚马可待的状态。新闻事件的发生，不为你的作息时间所左右，所以，我们的生物钟，只能适应新闻事件，适应这种工作。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没有泾渭分明。

孙金岭：那你有业余爱好吗？

梁建增：就是看看书，喜欢看书。我所理想的休息境界就是在阳台上，有杯清茶（因为我烟酒不嗜，就是爱喝茶），躺在摇椅上，拿本闲书，听点音乐，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孙金岭：这种机会多吗？

梁建增：晚上可以，有时候睡得晚，可以有一个小时这样的状态。







听崔永元实话实说

孙金岭

关于幽默：我身上惟有这件事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

孙金岭：小崔，你的幽默是天生的吗？

崔永元：我身上惟有这件事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吧。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对自己做过详细的记录，所以不知道那时候是个什么性格。这事说不清楚。

孙金岭：幽默与快乐是你生活的一种本色吗？

崔永元：我觉得反差很大。在节目现场，我要保持一种很乐天的那种性格，而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我还是比较消沉的。

孙金岭：你父母也很幽默吗？

崔永元：不幽默，我父母一点也不幽默，基本上不开玩笑。

孙金岭：这就奇怪了，人们不是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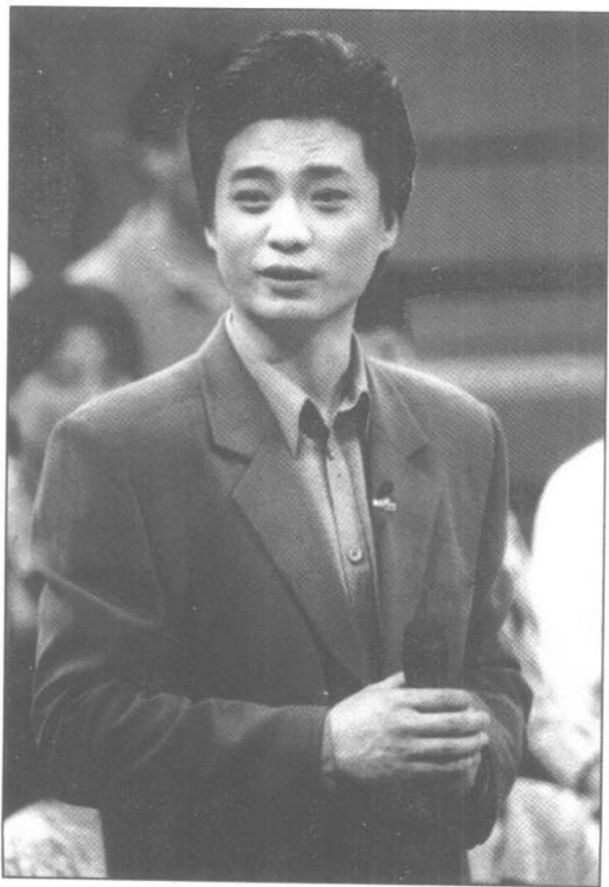
崔永元：是非常奇怪。我的父母虽然不幽默，但是，他们为人很善良，有时候愿意约束自己而让别人满意。从小我就能感觉到这一点，对我影响特别大。直到现在，我的哥哥和姐姐基



本上还都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可能是我内心有着这样一种力量的驱使,觉得大家活得都不容易,都很沉重,都希望快乐,所以我要奉献一些快乐。正是内心有这种感觉驱动着,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就可能是一种乐天的形象,从而具有了一种能够感染别人的幽默习惯。

孙金岭:你是不是从小特顽皮?

崔永元:不顽皮。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孩子。有的时候犯一点坏,也都是那种应该坏的事。比如



觉得高谁一等。」

崔永元:「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普通人,从来没有

说，我们在养蟋蟀的时候，院儿里有一个孩子，从山西讨来了一个红头蟋蟀王，非常厉害，在那个院儿里所向披靡。我觉得他动摇了我在孩子群里老大的位置，想了半天就想出了一招：用蚰蚰探子，把它沾上敌敌畏，在阳光底下晒干后，我随便拿了一个蟋蟀，去跟他的红头蟋蟀王挑战。我用舌头舔一下，这时候那个蚰蚰探子就湿润了，我就开始拼命地往红头蟋蟀王的牙上抹去，最后把它抹得人仰马翻。然后，大家的蟋蟀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我基本上干的是这种事，而且干得比较多。

孙金岭：你认为你幽默的特点是什么？

崔永元：其实好的幽默应该是善解人意的。因为，如果幽默没有了分寸，就会拿别人开心。拿别人开心可能也会赢得笑声，但是会对被幽默的人造成伤害，甚至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如果想要幽默，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孙金岭：自我牺牲的精神？

崔永元：对，就是说拿自己开涮，端出自己的缺陷或者缺点，让大家觉得可笑、滑稽。

孙金岭：拿自己开涮，这样子好玩吗？

崔永元：过了，其实也不好。比如，过去我研究了一段相声，老的相声艺人在舞台上表演，不论什么灾难，都移植到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头上，说很难听的话，他们把这叫“洒狗血”。侯宝林先生净化相声的时候，也就是把相声从地摊上搬到舞台上的时候，他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扫除“洒狗血”。比如说：“他妈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妈才是什么什么东西呢！”这样观众也会笑，但是格调不高，就属于“洒狗血”。自嘲要有分寸，尤其嘲笑别人就更需要分寸了。

孙金岭：你是如何在节目中把握这种分寸的呢？





崔永元：幽默看起来海阔天空，其实它只是一条小径，过犹不及，过了，别人会说你滑稽、搞笑、圆滑，甚至贫嘴。幽默没有分寸，就成了粗俗、低下。掌握这一点，我觉得后天培养特别重要，要有文化知识的积累，而这种文化知识的积累会给人贯穿一种人文精神，让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别人，它的分寸在哪儿。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说一句心里话，我对现在的相声大部分都看不上，总觉得他们在分寸把握上很差，只是靠自己懂得一点相声“抖包袱”的技巧，勉强充门面。我倒是比较喜欢梁左的相声。梁左跟姜昆认识以后，知道了一些相声的技巧，但更重要的是他熟悉民间的智慧，加之他有非常强的中国文字和文化的功底，这一切造就了梁左这样一个特殊的幽默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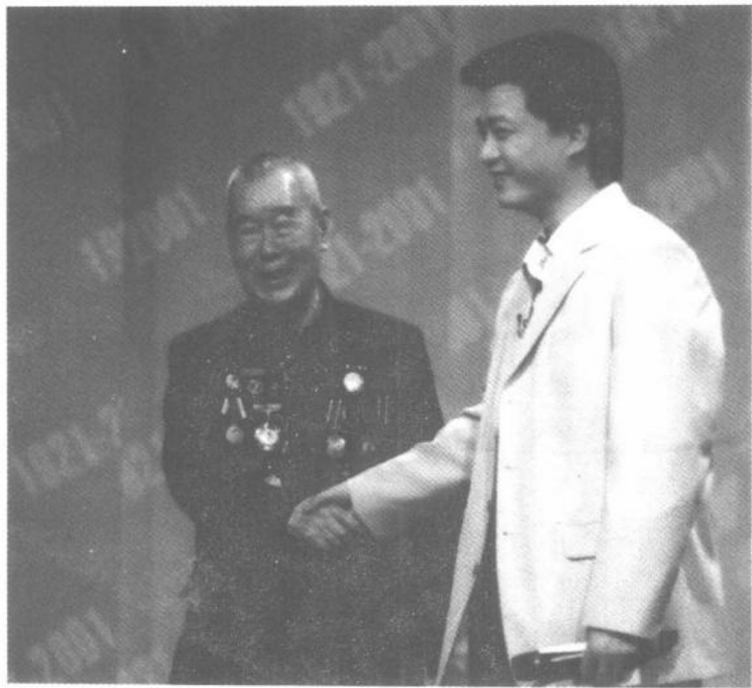
孙金岭：那么，在后天培养中，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吗？

崔永元：要善于观察。我从1985年开始作记者的时候，跑了十几年，几乎跑遍了全中国，接触了很多平民百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独特的待己、待人的方式，有些就很幽默。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它，或者你关注这样的一些事情，它就会很深刻地记在你的脑子里。

1987年我去延安，去参观当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旧址，那是一座空窑洞，只有一个老汉在场。当年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时候，组织上让他守住这个电台室，实际上就是守着一个空窑洞，他就一直守到现在。现在每当发现有人往那个地方走，他就会跟过来，他说往那儿走的人都是跟电台有关系的人。我们去的时候，他也跟了过来，然后一听说是中央台的，他就兴奋地说：“哦，中央又来人了！”把我们请到他家，坐在炕上自豪地说：“每次中央来人都是我接待的。”然后他就拿出一摞子名片放在那儿让我看，我看了看一个中央的也没有，全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这些小情节有的人可能会忽略，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这种幽默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笑，但又会感觉到一丝苦涩、一缕沉重，因为它背负着的是一个人生的大背景，决不是那种轻飘的幽默，而是最高境界的幽默。而拿别人



的长相、衣装、服饰、发型取个笑，如果是在别人可以承受、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有的可能算是个幽默，但是，这种幽默不能算是上品，只能算是个中品吧。

关于主持人：找一个我这样的主持人还真是很难，太难了

孙金岭：小崔，你是什么时候当上主持人的？

崔永元：当主持人是从 1996 年 3 月正式开始的。

孙金岭：怎么会让你主持《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呢？

崔永元：我与当时《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是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片子、谈生活。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发现我有一些天赋。因为我经常是一个话题的策动者，又是一个话题的参与者，还是一个现场即兴谈话的组织者，常常不经意间客串了主持人的角色，这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在寻找脱口秀的主持人，寻找了很久，但是未果，他就决定让我去试一试。就是他偶然的一个想法，给我创造了一个偶然的

机会。

孙金岭：你第一次当主持人的时候，有没有喝彩的掌声？

崔永元：有，但当时是我们策动的掌声，要求大家鼓掌，那不是发自内心的。

孙金岭：你当时紧张吗？

崔永元：非常紧张。好在第一次不让带稿子，要求主持人现场即兴地说，所以我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把自己准备的几段词也忘掉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紧张状态的时候，更会让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现，而恰恰这个本来面目符合《实话实说》节目的要求。

孙金岭：那是一期什么节目？你还记得吗？

崔永元：叫《拾金不昧该不该回报》。

孙金岭：是这一期节目决定了你当主持人的信心吗？

崔永元：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当时中国电视几乎没有我这样的主持人，还都是些浓眉大眼、字正腔圆的那种。我只是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在帮同学一个忙，帮制片人时间开创一个栏目，把前几期顶住，一旦有好的、合适的、能够胜任



的主持人,我就会主动退出。

孙金岭:为什么要主动退出呢?当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因为,我对做一线记者更有热心,而且,当时我还在电视台的其他节目做幕后策划,我对策划也挺有兴趣的,觉得很有意思,适合自己做。

孙金岭:小崔,你的缺乏信心是因为自己长得不够标准吗?

崔永元:没错,我的长相起码不合乎当时的那种规矩吧。而且,当时谈话类节目在中国很少,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数,谁也说不清楚。我看不到前景,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要是当时就知道能走成今天这个样,我当时会很有信心的。

孙金岭:在《实话实说》干了有五年了吧?你觉得现在是你主持的巅峰吗?

崔永元:我觉得在走下坡路。我喜欢白岩松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太成熟、太熟练的时候,经验和技巧就会代替真情。”这话说得很对。现在,我基本上已经熟练掌握了谈话类节目的现场操作了,但是技巧太熟练了,就会使很多真情不出来,让很多东西程式化了。这对节目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谈话类节目和其他节目不一样,它没有事先的彩排和演练,大家完全是即兴谈自己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想法的,应该每期都是鲜活的,不应该有套路、有模式在里面。

孙金岭:那你说现在自己在走下坡路,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崔永元:我在现场很多时候激动不起来。节目似曾相识,观众不冲动,我在现场的投入也不够,自己看了节目经常不满意,没有追求和想象的那么好。

孙金岭:你不激动,是不是因为缺少竞争呢?



崔永元：其实竞争还是挺残酷的。现在全国的电视台有一百多个谈话类节目，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间段播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不敢大意。

孙金岭：那是外部的挑战。如果《实话实说》再有一个主持人跟你一起进行轮流主持，是不是会让你更兴奋一些？

崔永元：我这个人是很谦虚，但是经过这些年寻找主持人的过程，我倒真有点自负了，找一个我这样的主持人还真很难，太难了。起码目前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发现值得我去竞争的对手。

孙金岭：那么，你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寻找主持人，还是更多地用你自己的眼光审视未来的搭档？

崔永元：我肯定是在用我的眼光和要求在审视他们。也许在观众看来，主持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有很多都比较优秀，但是，我对谈话类节目有自己的理解。谈话类节目它更多的是谈话而不是节目，节目的色彩非常淡。在节目的现场，在完成的节目里，你是可以通过节目主持人，以及他背后的群体看到他们强调的是什，他们对人的尊重，他们具有的社会责任，以及他们追求的道义，等等，这些东西是应该在节目里体现出来的，而这种体现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而不是主持人做作出来的，也不是表演出来的，更不是硬装出来的。我想，这是最具差异的地方。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时下的主持人，我就觉得他们根本不够格，不称职。

孙金岭：如果反过来讲，就像你第一次当主持人那样，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是不是会给人们一个惊喜呢？

崔永元：我们给过很多人、很多次机会。就中央台而言，可以和我一起做这个工作，而且完全可以胜任的，我看上两个人，一个是《半边天》栏目的张越，另一个是《环球》栏目的王雪



纯。这两个人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反应能力上,应该都在我之上,我诚恳地邀请过她们,但是,她们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不知道是没有兴趣做这个节目,还是没有兴趣和我合作,反正我五次三番地要求,都被拒绝了,让我有点灰心。其他的我不觉得谁还能做这个事。

孙金岭:经过多年的实践,你觉得作为一个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崔永元:首先,这个主持人应该是一个能倾听并善于倾听的人。他在现场,更多的时候是怎么能鼓动起请来的客人、嘉宾和观众,让他们畅所欲言,看到你就想说话,有说不完的话,让他们觉得不说真话对不起你,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装假。而这些完全是要靠主持人营造的,而且他会要求他的工





主持节目，崔永元很从容，那是因为观众很捧场；踢球，崔永元也很从容，那是因为对手很捧场。在为“希望工程”募捐的足球比赛上，崔永元作为评论部的一员，仅上场踢了二十分钟，但却获得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因为观众纳闷：崔永元也会踢球？



我问你答

作人员和他一起配合，把摄影棚完全虚拟的环境改造成一个真实的谈话场所。这是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在现场最重要的作用。当营造出这个环境以后，主持人的倾听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所有的谈话者都会要求他的谈话对手给予尊重。观众现在认为一些主持人不行，我觉得毛病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听，他在问第一个问题时，想着的是自己的第二个问题怎么说，我称这种采访叫物理采访。

孙金岭：你是说他们的采访太死板、机械吗？

崔永元：对。我觉得好的采访应该是化学采访，就是你先抛出你的试剂，等着嘉宾的试剂，然后产生化学反应，而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个反应过程中陆续出现，这才是好的采访。谈话类节目要求的就是这样的采访，在倾听中寻找亮点。





其次,个人的表述也很重要。我重视的是表述,而不是个人的提问。作为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表达个人想法的任务,在他身上不应该体现得那么严重,用不着把它当回事,它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该体现的时候就体现了,而且更多的时候是让别人体现,体现出多种声音,体现出不同的想法,这才是你要干的事。如果你仔细地去看看我主持的节目,你会发现并不都是问话。我有很多种方式,会有问句,也会有肯定的应答,而对于一些偏激的观点,我也用否定句。因为,我知道对方对我的否定、肯定要再做否定的,那么,否定以后,他就要讲出真实的情况了,这也是一种表述方式,通常这种方式还会使现场活跃。还有我会起一个头,让他接着说,或者让他开始说,我去附和他,也就是我当他话语之间的粘合剂。总之,要根据嘉宾不同的谈话风格,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孙金岭:对待不同的嘉宾谈话方式,你有何心得呢?

崔永元:像东北的嘉宾,他们就喜欢你倾听,你干脆不要打断他。他们一般有自己的思路和自己的语言逻辑,不需要别人参与。如果要打断他,他有时候都有点不知所措而接不上话了。北京、天津的嘉宾,就希望你和他一起唱对手戏,上海行话叫“给肩膀”,你给他一个肩膀,让他能顺着你的肩膀侃上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南方的嘉宾表述有时候会比较烦琐,他希望面面俱到,这时,你需要把他最重要的内容摘出来,让他把最重要的部分表述清楚。

孙金岭:作为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除了需要具备你刚讲的会倾听和表述外,还有别的吗?

崔永元:第三点,我觉得应该善解人意。因为,他来和你谈话,有的还是主动要求和谈话,最差的也是你请来的,你要完全尊重他。这种尊重不光体现在迎来送往,其实也体现



在每一个细节上。比如,我们的现场非常挤,有时候观众坐得特别满,我在采访观众的时候,我不可能跟每一个观众都站到一排,当然跟他站到一排的时候就无所谓了,而碰到我站的地方比他高一排时,我就会高出他很多,这时候谈话会对他心理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每当这时,我都是弯着腰举着话筒,让他心里能平静下来。再比如,遇到残疾人在现场的时候,尤其是下身残疾的人,他们站不起来,而现场的观众都是站起来发言的。这个时候如果他发言,我会走到他旁边,以最快的速度,蹲着给他举话筒,但是,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说“您不用站起来了”,因为,这话里就带有歧视,好像我们对他丧失了这个功能很在意。而在跟孩子说话时,我从来都是单腿跪在地上,另一只手要扶着孩子的肩膀。

孙金岭:这些动作是你事先设计出来的吗?

崔永元: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做这样的事,应该有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如果,你知道应该尊重别人,或者说你内心确实尊重别人的话,其实你不用设计,你知道该怎么做。第二种就是我常说的,你做不到,你又不是发自内心的,你装也装不出来。我基本上是属于发自内心的,不需要设计。

孙金岭:你感觉现在的谈话类节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崔永元:最大的问题就是假。一个是表现的方式假,他们看上去也像是即兴的,而实际上事先都写好了台词,都背好了台词,甚至还对了一遍,但是一到真实的谈话就完了。我还是要求所有的谈话都是真实的谈话,文艺表演都是假的照样有生命力,但是,文艺表演从来都说是文艺表演,没有骗人说是真的。现在你是一个谈话类节目,你却在造假,这既违反了新



闻的操作规则，也是对所有参与者，包括对所有受众的不尊重，或者说不够尊重，不够真诚。这里面还有人人为的设计，等等，我接受不了那种设计。

孙金岭：能具体讲一下吗？

崔永元：比如，类似那种亲情什么的节目，找失散多少年的朋友或者亲戚。为了有戏剧冲突和效果，把他们关在不同的地方，让他们在现场相聚，然后大家抱在一起哭，这在视觉上是很有冲击力的，观众也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他们离散那么多年了，那么思念，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早点见面





呢?为什么要像两个困兽一样憋着他们呢?为了达到那么一个效果,就不顾他们真实的心理感受,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节目的好看,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吗?

我觉得节目编导非常弱智。这种为了那么一点点的戏剧效果而弱智、压制人性、不顾别人内心感受的节目,只能造就这样的电视主持人——带着一些细节不去追究,每个人都做得粗枝大叶;这样的节目只能培养观众对什么都冷漠无情,熟视无睹。

孙金岭:你在主持时难道没有设计吗?你是怎么做到真实

点:没有夸张,没有喧闹,一如涓涓清泉从心里流出……
笑意挂在《实话实说》栏目组人员的脸上,也显得有些特



的呢？

崔永元：嘉宾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策划事先调查完成的，然后形成策划方案，这是节目内容上的设计，决不是作假的设计。而我和嘉宾之间，就更没有什么设计了。比如，他们来了，我去看看他们，或者录像之前我们握握手、聊聊天，但是，我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进行这一切的，我要尽量回避节目将涉及的话题，可以谈别的，天气、物价、生活水平什么的都可以，就是不能谈节目。

孙金岭：碰到憋不住的嘉宾主动跟你提，你怎么办？

崔永元：我会用一个很礼貌的方式暂时离开。比如说，我现在去化妆、梳头、换衣服，或者还有一些什么事要忙，请他在这里喝水休息一下。这样有礼貌的处理，嘉宾是能够接受的。

孙金岭：你是怕他提前把激情抒发了，现场没有了？

崔永元：这倒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他说一遍之后，现场再来一遍，这就叫排练。我们的群众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他们没有演出技巧，所以他们是三流、四流、五流演员的表演水平，但是，如果他们真实地表达自我，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表现自己的大师！

孙金岭：小崔，你觉得自己的主持风格是什么？

崔永元：这个最好让别人去研究。因为，我把主持人当做一个具体的工作，从来没有研究过我的主持风格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主持风格分几种，以前从未学过主持人这门专业！

孙金岭：在你心里，理想的主持人有没有？

崔永元：我比较喜欢《半边天》栏目的张越。我在没有做主持人的时候，就看她的节目。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分寸，而张越不管是调侃，还是玩笑都很节制，有分寸，能容忍，能克制，能大度。我当时就很欣赏，而且对我后来自





的主持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孙金岭：你会在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这个岗位上一直走下去吗？

崔永元：我希望有更好的主持人来做这件事情。做一个欣赏者、一个旁观者，心态也许会更好。如果说从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角度来讲，那会是更舒服。说句心里话，我是一直盼着赶紧从这个岗位上下去，因为它给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睡不好，吃不好，没有正常的生活。

当然，我也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想干《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的话，我现在一松手，就会有很多人上来，说句心里话，我还怕他们把这个节目弄砸了！那么多人呕心沥血浇灌出来的品牌，我们不希望被别人一朝一夕损坏掉。所以，第一，我不愿意再坚持了；第二，在未来接替我的阵容中，我还要仔细地、慎重地观察，确认他可以胜任，才可以松手。寻找主持人的工作，我一直没有停。

关于制片人：所有的人板起脸来都是挺吓人的

孙金岭：你是什么时候当《实话实说》制片人的？

崔永元：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1998年。

孙金岭：当制片人，可是一个栏目的人、财、物大权集于一身，而像你平时那么幽默，或者说是平和，在部门里边还有权威感吗？

崔永元：所有的人板起脸来都是挺吓人的。但是，我们栏目人少，一直是十几个人，大家一起干那么多年了，特别熟悉，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那里更像是一个手工作坊。在组里，我推行的是人情化管理，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规



章制度,就是希望大家自觉自律,多起点作用。这是我推崇的一种管理方式。我们的目标是既做节目又做人,如果你连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节目呢?所以,我很排斥那些做人不好的人来和我们一起合作,这也是我选择人的标准。

孙金岭:那万一你走眼了呢?

崔永元:请他离开。

孙金岭:请人离开会很伤害人的呀!

崔永元:是,但没有办法。是他先伤害了这个集体,伤害了这个节目的。

孙金岭:能力和品行,你会更看重哪一个?

崔永元:品行。没能力可以慢慢培养,没品行就什么都完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能力很强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品行,所以他的能力根本施展不出来,或者说该他施展的时候他不好好施展,大家一起精心培育的栏目,成了他家的实验田,高兴了就好好做一期,不高兴了,就给你凑合,这样节目的品行也会受他的影响而上下不定,那怎么能行呢?

孙金岭:你现在既做主持人,又当制片人,精力顾得过来吗?

崔永元:精力能跟得上,我也准备这样跟。管理也许我不是内行,不会管,主要靠大家自觉自律。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都这岁数了,还谁管谁呀?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如果你三十多岁快四十了还管不住自己,老出问题,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怎么跟你合作?

孙金岭:这一套人情化的管理办法,在《实话实说》栏目组有效吗?

崔永元:有效。这个集体非常好,我们连续两年都被评为



中央电视台精神文明先进集体；我们还资助了很多失学的孩子，大家都尽心尽力地做公益事情还有环保的风气，遇事大家商量，不太计较名利，想的是创新。我曾走过几个集体，这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集体。

孙金岭：光靠这种模糊的、自觉自律的管理，而没有一个明确的规矩，这在今天行得通吗？

崔永元：河北正定有一个作坊生产马家鸡，我差不多全国各地的烧鸡都吃过，但是这个马家鸡，虽没有名气，如果以我的口味为准的话，它是中国最好的。直到目前为止，这个厂子的规模也不扩大，就坚持手工作坊。业主的想法就是一扩大成工厂化生产，马家鸡就变了味，不行了。他一直坚持手工作坊，所以，他的马家鸡一直好吃。我觉得《实话实说》现在有点像马家鸡，它就是个手工作坊。这套管理方式，在手工作坊里就是行。如果我们想集团化生产，想批量化生产，或者说把我们这种办法推行到评论部，推行到中央电视台，推行到全国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那非失败不可。因为，它肯定不是一个科学的管理方法。

孙金岭：《实话实说》的人员流动大吗？

崔永元：很大，非常大。因为，我们想不断充实新鲜的血液，让组里有活力。

孙金岭：每一次打发人走，你心里平静吗？

崔永元：我特别痛苦。因为，我不是一个下得了狠手的人。经过三个月审慎的观察，发现新人不行了的时候，我最难过，我觉得张不开嘴。来人中有的原本没有工作，有的人是辞掉了原工作来的，我们张开嘴让他离开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没有工作了，从今天开始吃饭就成了问题了，一想这些就非常伤心，非常难办，能说服自己的就是没办法。因为，这个地方不是



慈善机构,它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宣传部门,我们得齐心协力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我们不光养不了别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从保住更多人的饭碗这个角度来讲,辞退人、淘汰人尽管很残酷,但也是必须的。

关于节目:面对一大批克隆的《实话实说》,有危机感的不是我,应该是他们

孙金岭:《实话实说》栏目现在已经走过了五年,你认为它最辉煌的是什么时期?

崔永元:是1999年。那个时期,节目整体收视率特别高,我们自己满意的节目也很多,差不多个个精彩,观众评价也比较好。而那个时候还是在早间播出,收视率比现在还要高。

孙金岭:现在移到星期天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难道不是更好吗?

崔永元:移到晚间的黄金时段播出是一件好事,这时候看电视的人也多,但是,它不稳定。就像谈恋爱,我们找一个不太漂亮的姑娘做自己的妻子,从男人虚荣心这个角度来讲不是特满意。虽然她不够漂亮,但她却踏踏实实地跟你过日子,天天都在家里守着,这就是早间的《实话实说》。现在到晚间了,我们找的这个女人尽管有倾国倾城之貌,非常漂亮,然而却经常夜不归宿,不知她的去向,尽管她很漂亮,观众也不会像早间那么投入地看你了。

孙金岭:你是在说节目移至晚间后,播出时间无法保证正常吗?

崔永元: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不光是随意推迟,还随意取消,而且不打招呼。我说的“夜不归宿”就是这一点。这是对电

视机前观众的一种藐视和不尊重,观众回应你的就是不看。如果我们真正尊重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应该把每一个变化都告诉大家,告诉大家《实话实说》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多长时间出现,等等。总得交待一下,怎么能说没影就没影了呢?

孙金岭:这种情况很普遍吗?

崔永元:自从改晚间播出之后,就太不正常。一个周播的栏目,在播出这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飘忽不定,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就是把斯皮尔伯格请来也不行。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把大伙儿的心情和观众的想法,写成文字报告给我的上级领导。我们做一个节目非常难,不像人们想得那么简单,以为有一个小



《不过如此》出版了,崔永元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和他奋战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过,这怪怪的笑容原本以为只面对观众,现在看来,尽显男儿本色。



崔上去罗嗦罗嗦这节目就成了。我们前期策划要做大量辛苦的工作,比如到农村下乡,跟农民在炕上开座谈会,身上被毒虫子咬得生了疮。大家什么苦都受过,节目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地啃出来的,就这样还不能保证节目的完美。像《直面唐金》那期节目,我们六个人两天两夜都不睡觉,愣是把它做出来了。我觉得台里这样随意推迟或者取消播出,对我们不够尊重,而我们和台里加起来就构成对观众不够尊重。

孙金岭:那么再改回早间播出如何呢?

崔永元:栏目移到晚间,本来是一个好事,早上睡眠惺忪,条件不好,日子很难过。只要能让它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过日子”,这日子一定会比早上好得多。

孙金岭:除了播出时间不正常之外,会不会与节目质量下降也有关系?

崔永元:客观地来看,我们倒没觉得节目质量有下降,但是,节目质量不稳定,有时好,有时一般,有时差一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

当然,努力寻找差距只会让人前进。在话题的选择上,我想应该更宽泛些,以满足不同阶层的观众。进入晚间以后,因为面对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观众,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微调。比如,我们过去非常重视话题的深度,现在我们可以注重一下话题的时效感,离受众的生活感觉近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提高我个人的能力问题。有些话题我还掌握不住,没办法进行流利的交流。有些话题在眼皮前走过,我们没有注意到,过了很久才发现那是个值得一做的话题。至于现场操作,那我的失误就更多了。好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

孙金岭:现在谈话类节目受《实话实说》开办成功的影

响,克隆了一大批,你对此有危机感吗?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危机感。

孙金岭:为什么呢?

崔永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跟我们学的,我们做起来都步履蹒跚,如果他们不探索新路,还是原样学的话,也只学了个表面的形式,他们的危机感应该更重。

孙金岭:那你认为《实话实说》将向何处发展才是方向?

崔永元:我是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人,我一直认为《实话实说》进入晚间以后,只要按照我们原有的理念去追求、去实践,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栏目发展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自己的理念,我们不能轻易改变,也不能听别人怎么说而左右。

孙金岭:那么你对栏目的发展充满信心了?

崔永元:我们没有什么很强的责任感,也没有担负什么重要的担子,我们现在就只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来做。当自己能力可以企及的时候,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去做,如果我们觉得做不了了,或者说觉得做它没有什么意义,跟一开始的追求有很大反差了,我们可能也会放弃不做。

关于名人:名人出的书太多了,也该咱老百姓出一本了

孙金岭:小崔,你是不是从小就特别渴望成名?

崔永元:没有,在我小的时候,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那时候,我所知道的名人都是一些英雄,远的像雷锋、王杰,近的有胡业桃,他是在防空洞里施工时为了救战友,用手挑起了电线被电死的一个战士。他牺牲的那个地方,离我上学和生活的大院儿大概不到十公里,这应该说是离我最近的一个英雄,但谁也没有见过他。想想他们的事,有很多都是以献出生命作代价

的。如果内心想成为这样的名人、英雄,是很需要勇气的,跟现在渴望成名的感觉不一样,而现在大家一想名人,就是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玩好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孙金岭:现在你没有以生命作代价就成了名人,是不是感觉特别好?

崔永元: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可能演艺圈的名人感觉会好一些,吃香的、喝辣的,当然那也不是白吃的,也会受苦。但是,我做的这个事,基本上没有这些出风头的事。你知道,做一个节目有多难,做好一期节目有多累。我干的这件事,基本上还是职业生活、职业记者、职业编辑,跟通常意义上的演艺界名人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天壤之别。

孙金岭:你认为《实话实说》栏目是因为你而红,还是你因为栏目而火?

崔永元:不管是我的成功,还是这个栏目的成功,都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规范和科学的运作,有那么多人为它付出了努力,而且是一些很有名的文化学者、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直到现在,节目组里,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策划班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就是这样一些人造就了整个栏目和我个人的成功。

孙金岭:出了名,应酬是不是特别多?

崔永元: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大家都这样说。是不是应酬多了?是不是好处多了?是不是参加的活动多了?是不是结交的朋友多了?就是在我出名之前,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但是,真的到自己出了名以后,我反而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是个人的感受。如果你愿意应酬,那永远也应酬不完,如果你不愿意,你谁都可以不应酬,因为,没有人逼着你非得去应酬不可。其实,我应酬最多的反倒是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





爬山时，才知自己身体不行，但是，身背氧气袋的崔永元嘴上永不服输，大手一指：“弟兄们，给我上！”

的时候。那时候时间可能比较充足，也清闲，事情不多，就大量的请吃、吃请地应酬，现在则根本没有。如果有一点时间，我宁愿自己去休闲放松一下。

孙金岭：现在有人说社会很浮躁，人们渴望成名的意识也比较浓，对此你如何看？

崔永元：我给名人简单分一分，它应该有两类，一类是给社会造成很大麻烦的，一类是对社会多少有点好处的。如果大家想当名人，我建议就去当后者。如果有了想为这个社会做点



事的想法了,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你就会不那么着急,不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不择手段。

孙金岭:今天,如果把你变成个普通人,你的心态还会如此平衡吗?

崔永元: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从来没有觉得高谁一等。说句不客气的话,中央电视台有那么多主持人,每一个人都是名人,但是,我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绝对算是一个随和的人,一个比较亲切的人,一个没什么架子的





我问你答

5
1

「痛，并快乐着」的身影。

每年评论部开联欢会，总少不了崔永元和白岩松



人，一个好打交道的人。

孙金岭：这是大家对你的真心评价呢，还是当面的奉承话呢？

崔永元：大家用各种方式评价我，然后我把它收集起来得出了这些结论。

孙金岭：当了名人，钱是不是也挣了不少？

崔永元：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肯定比过去当记者的时候要富裕一点，但还不是大款。温饱解决了，也

算达到小康了。

孙金岭：名人都会走出书的路，你是不是也会走这条路？

崔永元：很快就要出来了，但这不算名人出书。我想说的是：名人出的书太多了，也该咱老百姓出一本了！

关于男人：从男人这个概念来看，我觉得我还行

孙金岭：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让人敬佩？

崔永元：男人应该讲义气，说话算话，说了就要去做，要负责任，遇事不能推托，这才够做个男人的资格。

孙金岭：生活中的你，也是这样做的吗？

崔永元：家里没有什么大事，家里那点事，谁都可以承担。

孙金岭：就是说你妻子也可以承担，你可以大撒把？

崔永元：对。但是，她做不了的肯定是我挺身而出，这毫无疑问。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家里总是没有什么大事。

孙金岭：你的妻子对你是不是很放心？

崔永元：我们有一个默契，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从来不跟媒体讲家里的事。家里那点事总要跟着自己的视线一起往外抖，成为公众的一个谈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必要，那属于个人的隐私，没必要让别人非得关心不可。尤其是我的女儿，她很小，不应该生活在别人目光的关注之下，这可能对她的身心发育没什么好处。

孙金岭：现在有些媒体把你划为“丑男人、丑星”之列，你听了是不是特别恼火？

崔永元：我根本就不理这些，都是那些无聊小报的划分。一般像这样的报纸，我都首先把它划到无聊里面去，不跟他们





打交道，自然也就不会在乎他们说什么。

孙金岭：那么也有一些女观众，把你当成她们心中幽默而智慧的男人，你听了是不是特高兴？

崔永元：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孙金岭：为什么？

崔永元：因为，我很明白现在所做的事不是想讨大家好，也不是逗大家乐。我们做这个节目可谓呕心沥血，并且得到了很多外界的无私支持，追求的目的绝对不是这些事，所以我不会在意。

孙金岭：从男人这个概念出发，你是如何评价自己的？

崔永元：我觉得我还行。

孙金岭：行在哪里呢？

崔永元：行在我对朋友特别够意思。像我多年结交下的朋友，有事来找我，发现我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我整天还帮着他们跑孩子上学，帮着换房，我什么都帮他们弄。

孙金岭：哎，小崔，你既当主持人又当制片人，还帮着朋友跑上学、跑房子，你哪儿有那么多时间，莫非长了三头六臂？

崔永元：你把应酬的时间拿出来不就行了？你要是不应酬，实际上挺轻松的。去陪人家吃饭，在桌子上说那些不咸不淡的话，是人生最累的一个活儿。

孙金岭：你在这方面是不是活动特别少？

崔永元：很少。我喜欢自己呆着，喜欢过自己的生活，干自己想干的事。偶尔也和过去的老朋友坐下来聊聊天，吃一顿饭，感觉特别好。

孙金岭：那这种吃饭算不算应酬呢？

崔永元：那不是应酬。因为你跟老朋友在一起可以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不用说那些不咸不淡的话；你可以吃饱了先走，也可以走到半路告诉他你有事不想去了，没有人怪罪你。但是，你要真正地应酬了，就非得去不可。

孙金岭：难道他们与你吃饭仅仅是聊天而已？

崔永元：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我不答应。我跟他吃饭可以，他要我跟他的朋友，或者跟他的生意伙伴，或者跟他的上级领导，或者跟他的孩子学校的老师去吃饭，那我不愿意了。这是我做事的分寸和原则，也是我的底线，一般我是轻易不愿意打破它的。

☺ 崔永元做嘉宾前往上海参加一现场直播的谈话节目。期间，主持人请观众发言。一位教授当仁不让，率先开炮：“崔先生主持的节目，没意思，照我们上海人讲就是小儿科，我从来不看。”场面顿陷尴尬。主持人转身请崔永元回答，崔永元接过话筒，坏坏一笑：“巧了，我们中央电视台调查收视率从来也没有找过这位先生。”节目结束，那位教授依旧不饶：“如果《实话实说》不改变，我还是不看，永远不看。”崔永元马上在一旁鼓劲加油：“坚持、坚持、再坚持，千万别心动！”

☺ 崔永元因常头痛难忍，遂决定去三〇一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医生为他照了一张脑造影照片，然后放到观片机前对周围一群实习生很认真地讲解：“这是一例典型的六十岁的脑血管硬化症状。”一旁的小崔闻言不满地说道：“你怎么把这东西都让我这个病人知道了？”医生回头怪怪一笑：“按规定对病人有保密制度，但对你，只能实话实说。”





与白岩松倾心漫谈

孙金岭

我理想中的主持人,就是十年后的我自己

孙金岭:主持人工作很让人羡慕,岩松,你也很喜欢电视主持人这份工作吗?

白岩松:对此我想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一方面,它调动了我个人的责任感,让我很喜欢;另一方面,走上这条路时,我并不知道其他路两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我走的这条路两边的风景蛮不错,让我心旷神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其他路是我不喜欢的,只是因为我还没走过,怎么知道呢!

孙金岭:你刚才说调动了你的责任感,那你的责任感表现在哪儿呢?

白岩松:我是AB型血,有时候总爱拿血型来说事。我的性格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像任何人一样去考虑自己的东西,比如,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家人,以及个人的前途和事业观等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想我们的国家、想这个民族、想一种很哲学的等等大问题的情结,我的责任感就包容在这种思考中。我一直愿意把自己定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本身就包藏了一种不仅仅考虑自己的内涵。很多人都是如此,只不过有的人说了,有的人不说而已。

孙金岭:这种态度是不是始终贯穿在你来中央电视台的



前前后后？

白岩松：我觉得应该是，而且会越来越是。刚开始的时候，考虑个人的东西更多一点，比如，电视这一行过去从没有做过，也许会感到很风光，甚至会有虚荣心等等成分存在，那时心里蕴藏着的责任感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强。自然换了一个新岗位，也就意味着开始了一种新挑战。好多事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当然是在“近朱”。每天接触的事，时间一长就会逼着你的很多思维方式发生改变，你必须从一件又一件的就事论事中跳出来，去想很多可能更长远、更大一点的问题。

孙金岭：你还能记起初上屏幕时的情景吗？

白岩松：当然能了！初上屏幕的时候，是做《东方之子》。我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因为我原来在《东方之子》当策划，也就是收集材料、替主持人设计问题之类的工作。突然，有一天，制片人时间订了火车票，告诉我马上去山东采访。去了之后，我不懂电视，举手无措，结果时间就告诉我：就按你原来在报社采访的路数做。那次采访的是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他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节目要在“五一”节播。采访时，我根本不知道摄像机在哪儿，完全是按我过去那种报人采访的方式去做的，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年少，才二十多岁，一切都是蛮幼稚的，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考虑——“我”，想的都是“我”应该有一种新的什么道路去走，“我”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怎么做。今天这种“我”的东西慢慢淡化了，但是，“我们”的意识却越来越强了。

孙金岭：你说的“我们”是指让你成名的《东方时空》栏目吗？

白岩松：不仅仅是《东方时空》。这个栏目其实是构成整个中国在往前走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电





视新闻改革的“排头兵”。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处在一种燃烧、一种很激情、很流动的状态。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投奔到这里，每天都有新人进来，都有旧人离去，尽管他们朝气蓬勃，豪情万丈，尽管有很多幼稚的东西，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技术上，大家的的确确是在用燃烧、用激情去创造一个很好的开始。

而今，更多的时候，仅有激情是靠不住的。别人也总在问我：你怎么能长时间保持激情呢？我说激情想长时间保持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时候是要靠责任感去支撑，还要有一种很大的惯性。也许时间长了，在技术、思想方面会更加成熟，大家从表面上看不到了那种燃烧的状态，但是，那种燃烧可能已经深入到骨子里。它由开始时的爆炒转换成温火慢炖，进而考虑的事情就有可能不仅仅是自己的了，更多的是我们做的这件事与



改革进程、与新闻走势等等之间的关系了。

孙金岭：你在评论部工作多长时间了？

白岩松：我是 1993 年 2 月底来的，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孙金岭：在八年这个不短的时间里，你说的那种由“我”到“我们”的思考与转变是否对你个人的主持风格有影响？

白岩松：其实我一直谈不上有什么主持风格。什么是风格？风格是别人说的事，哪有自己说的！我不是一个设计了风格然后去塑造它、表演它的人，而是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我变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会随着自己的成长而体现出我每一段落时的状态。思想在成熟，人在长大，角色在变化，我也由过去一个单身青年变成为人夫，然后为人父等等，从这些方面看，可以说我变了，因为我在成长。除此之外，我没有变，我一直是我自己。

孙金岭：你不认为自己有主持风格，但是不是应该承认你的主持经历在成长变化中会有阶段呢？

白岩松：很难说，而且这个阶段对我而言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就像人很难说出自己生活、成长的每个阶段一样，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细划出来的东西，而我才仅仅八年。

孙金岭：你在新闻评论部这个大集体里生活得愉快吗？

白岩松：我很庆幸自己在过去的这段岁月里，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拥有了一次非常好的起步，乘上了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班车。我记住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也记住了我，所以我觉得非常愉快。我不会去想做了什么事，而是想和哪些人一起做的事。很多我喜欢和喜欢我的人，大家裹挟在一起，走过了多年风雨，度过了整个青春，做着共同的事业。在商业大潮的快速席卷和冲击下，我依然能和一些理想主义者在一起，这种感觉很好，常常让人回味无穷。





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把新闻评论部称为电视界的深圳。一个年轻人一接触电视就在特区里,你说这种感情和幸运,能用语言来表达吗?没有这个集体,没有这个特区,不会有我的今天;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我们这样的一群人的共同努力,才使特区展现出独特的风貌,没有每一位同事的奉献与勤勉,不会有特区的辉煌。

孙金岭: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理想化的主持人?

白岩松:有,那就是十年后的我自己。这不仅仅是在开玩笑。现在大家都在路上,起步不久,我很难说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或者不喜欢周围的人,因为你不能拒绝自己成长,也不能拒绝别人成长,也许我们的将来都会更好。

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主持人,他应该是一个年过四十岁的男人,他会更加客观、冷静,但是穿透力极强;他思想更加成熟,并且具有极大的悲悯之心;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把激情藏在心里,而状态却很平和,且每句话里都能让人感受到背后的激情汹涌澎湃。我喜欢这样的主持人,我希望十年后的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孙金岭:如何评价如今已取得成功的你自己呢?

白岩松:谈不上什么成功,聊聊几点感想吧。

首先,我走到今天,如果说获得了别人的掌声,那完全是因为我的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尤如在一片荒地里头大家看到了一片植物,便给了很多的掌声。其实这个世界原本就应该是郁郁葱葱的,有更多漂亮的植物,有更多鲜艳的花。但是,因为过去是荒地,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更鲜艳的花,头一次看到了绿色,看到一些长得七扭八歪的植物,于是就给了很多的掌声。我们就属于那些长得比较七扭八歪的植物。我们占了一个便宜,在一片荒地上成了头一个被大家看到的绿色植物。我说的绿色植物,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做的

很多事情可以验证两点：一个是幸运，另一个就是中国电视业在进步。过去像我、崔永元、方宏进这种长相的人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将来的屏幕上必定是郁郁葱葱的景色，会让观众眼花缭乱，更加喜欢。

第二，我们都不是科班出生，这说明电视正在把门打开，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做。

第三，我们再也不可能是“花瓶”的概念了，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带着自己的个性特点，带着自己对社会的认知走来的。今天的传媒已经能够给你表达的空间，而且越来越尊重个人说话的权利，越来越尊重你的个性表现，不再是千人一面。

我们的成功无疑是幸运的，我们能够出现的本身就意味着电视前进的脚步是多么的激越、有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



决不代表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而只不过是头几眼的绿色植物罢了。人总要向前的，将来一定会更好。



一个男人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

孙金岭：作为著名的主持人，观众是不是给你的来信特别多？

白岩松：不仅如此，还有登门拜访的，很多很多。

孙金岭：受到观众如此关注，什么感觉？

白岩松：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觉得平常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是“负人”。不怕人负我，就怕我负人。负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怕个人的负人，就是朋友、亲人之间，这是让我很难过的事情，我会尽量避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做了主持人、做了一个新闻记者，是不是也负了观众？比如说，走到电视台大门口，就有人喊：“哎呀，这不是白岩松吗？”一下子就过来了，给你状纸，甚至跪下。我搀扶起他们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深的内疚感。虽然，这种内疚感不应该是由个人来承担的，但个人应该有。这种感触对我影响更深，为什么呢？

《焦点访谈》一年共播出三百多期节目，如果说批评性报道占二百多起的话，满打满算也就能解决二百多个具体的事，可能，评论部每天接到投诉、反映情况的信件都超过了一千件，《焦点访谈》一年播出的节目都解决不了一天的投诉，这还不包括电话。所以，有的时候会感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进行舆论监督其实不是解决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事，去呼吁、督促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

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会有很多满怀希望的人找你解决问

题,觉得这件事你出面准行。很多个人的事,写信者会觉得这是天大的事,但其实它不具有典型意义,节目没法做。那么你除了安慰,还能给他们什么呢?每当告别他们的时候,都有一种负了人的感觉,滋味很不好受。

孙金岭:平时对于观众来信、来电,你是怎么处理的?

白岩松:来信、来电大致可分成三种。第一是给我个人的,就是聊天或者评价节目的事;第二是虽直接写给我的,但是里面都是状子、材料等等;第三是向我求助、咨询的。比如,昨天播了一个医生,他的地址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电话?等等。第一类信转给我后都会看;第二类信看完后,转给评论部里的有关部门,由他们根据情况再回执到有关的部门,或做成节目等等;第三类求助的信件或电话,我们都有义务去告诉他们,我也不例外。

孙金岭:对于观众,你有最难忘的事吗?

白岩松:其实难忘的事很多。比如,有个观众邮来了一笔钱,连地址都没有写,那意思就是拒绝你回绝他,然后附一份材料,反映他们村子里不法的事,希望我们去报道,这一千块钱就是路费。而那事不是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我们转给了有关部门。但是,这笔钱怎么办?至今钱一直放在组里的财会那里,成为压在我们很多人心头一个很沉的东西。这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孙金岭:会有求爱信吗?

白岩松:有。我觉得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想法都很正常,而且,好像作为主持人都有这样的待遇。对此,我的态度首先是尊重写信的这些人,其次是收藏这份感谢就可以了,还能怎么样?有时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孙金岭:这么说,你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

白岩松:非常强。



主持完悉尼奥运会直播之后，不知疲倦的白岩松在回来的专机上仍旧勤勉工作，继续采访奥运冠军们。评论部负责人之一的陈虹曾感慨万千地说：“岩松这种高度的责任心和对评论部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写实。”

孙金岭：是真的吗？

白岩松：难道还会有假？我觉得生活是要快乐的。一个在生活中寻找不到快乐、寻找不到幸福的人，你能想象他的节目能做得很好吗？一个男人是要承担很多责任的，说大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说小了是你要承担做丈夫的责任、做爸爸的责任、做儿子的责任。我这个人希望做什么事就得把它做好，虽然有时会觉得比较累，但是累也要担当起来，它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你为所爱的人去尽责任，而且努力去把它做好，这是一种幸福啊！人不是都在找寻幸福吗？正因为你感受到了生活

中的幸福，并且在找寻幸福，你才觉得这个国家应该更好，应该让更多的人幸福。这是相辅相成的，决不是大话和空话。

孙金岭：你爱人怎么评价你？

白岩松：我爱人跟我恋爱的时候，我还没来电视台，并且遭受了很多挫折，而她面对挫折依然在我身边。今天，我可能被别人认识了，但对她来说心里没有太多的变化。她喜欢的还是白岩松，而不是主持人白岩松。至于她对我的评价也主要是工作上的，她经常说我缺点，不提优点。

孙金岭：在她眼中你的缺点是什么？

白岩松：缺点嘛？比如，她会说，你昨天太严肃了，哪里有点磕巴，直播的时候，怎么怎么啦。我觉得跟所有人的家人一样，没啥特殊的区别。

孙金岭：她是你忠实的观众吗？

白岩松：她是我生活舞台上的忠实观众，但并不一定是我电视舞台上的忠实观众。

孙金岭：现在，人一旦出名都要写书，名利双收，你写《痛并快乐着》是不是也在走这条路？

白岩松：名、钱、权都是一个中性词，看你怎么用。这些如果掌握在一个只为自己谋利益的人的手里，绝对是坏东西，但如果掌握在一个有梦想、能给身边和社会上的很多人带来改变、带来好处，并使之感受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人的手里，它们就是好东西。对我而言，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很大的压力，就是被人知道了，你说的话有可能对很多人的影响要比过去大，这跟我做报纸记者时不一样，那时候我的一篇评论文章可能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传阅，但是，现在一个电视栏目会有更多的人在看，我每天在想，我能不能对得起这帮人。

写书，就是我对关心、爱护我的观众的一种表达，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使这种表达更宽泛了，它反映了我对社会很多



事情的看法。你说这本书有没有给个人带来了利益？坦率地讲，带来了，但它毕竟不是我的第一追求。如果是第一追求的话，我不会这么累，不会以如此沉重的话题作为我写作的主題。我追求的是尊重和表达，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无论别人出过多少本书，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的首部作品，白岩松的第一本。

孙金岭：写作对你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吗？是不是也请了“枪手”捉刀？

白岩松：这种快乐的事，我几乎每天都在做。来电视台之前，一直做报人，笔头从未闲过，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无需烦劳“枪手”。何况这么快乐的事，干吗让一个与你不相干的人瞎掺和！

孙金岭：业余时间除了写作，还干什么？

白岩松：生活。比如看书，听音乐，跟家人出去吃饭，跟朋友一起聚会，陪着孩子玩，踢球，等等。

孙金岭：应酬很多吗？

白岩松：很少，基本拒绝。我每天晚上几乎都回家吃饭。

孙金岭：这可能吗？

白岩松：非常可能。只要你最后想通了，说“不”不是一件太为难的事，怕就怕在你想不通。你去任何地方，每天都有饭局，不过是一个锦上添花和众声喧哗而已，但是如果拒绝了，回家会有另外的幸福，我愿意呆在家里。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方宏进、敬大姐不都是这样吗？

孙金岭：是不是也包括拒绝“走穴”？

白岩松：对于“走穴”，我的态度更是“不”字。这个，相信各地的观众都能检阅出来。我觉得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在那些场合特麻烦，很尴尬，它不属于我的舞台。但有时台领导批准了的事，比如说，北京见义勇为颁奖晚会等等，我想不去都

不行。

孙金岭: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很尴尬?

白岩松:话不能这样讲,有些公益的事也该做。

请用更快的速度超越我们

孙金岭: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改版早已拉开了帷幕,对此,你心情如何?

白岩松:2000年9月1日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东方时空》整个改版了,从那天开始《东方时空》就将换一盘新带子去放,以一个新方式出现了,过去的栏目不再存在。那天我们组的同事们聚会,突然感觉每个人面对告别的时候都有一种伤感。大家看了很多过去的节目,当看到过去七八年里我们一



当手举“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奖杯时,白岩松依旧一副“痛,并快乐着”的神情。



起做的很多事，包括过去生活的片断，组里的组歌等等，又感觉我们是幸福的。我说：“昨天，历史被定格了，当然是我们这些人伴随着《东方之子》成长的历史被定格了。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尽管幸福里可能会有眼泪……”

巧的是那天早晨，送儿子第一天上幼儿园，他哭闹着不让我离开，但我狠狠心，还是转身走了。路上我突然感觉每个人都要学着自己长大，孩子也是如此。作为孩子的父亲，我和我周围很多同事的昨天已经定格了，而现在自己又要开始学着长大了，都要往前走。每次定格应该是一个起点，是站在一个新平台上的起点，2000年9月1日的出发点跟1993年5月1日已经大不一样了，它意味着中国电视正在继续前行，意味着我们应该攀上一个高坡，这是一种挑战。

孙金岭：你对《东方时空》的改版怎么看？

白岩松：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改版究竟是为了什么？中国电视的改版应该是为了将来的不改版。总在改版说明我们还成熟，但是改着改着将来就会陆续诞生很多不用再改版的节目，只要每天变化你的内容就可以了。比如说，美国的名牌栏目《60分钟》，多少年了，节目还是那样子，但是每一期的内容却是新东西，样式和形式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而内容变成了根本。所以，我们现在翻来覆去到处都在改版，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我希望将来《东方时空》改版的频率能小一些。

孙金岭：你有没有从《东方时空》的改版看到中国电视，尤其是中国电视新闻的变化？

白岩松：这一点我感触很深。首先，我认为电视新闻将走向真正的客观，也就是说，我们将越来越用事实说话。大家可能早已注意到《焦点访谈》的广告词变成了“用事实说话”，从





字面上看仿佛是广告词的变化，其实这是一个重大理念的变化。我们只提供事实，因为观众比我们还聪明，他们会想出他们更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中国电视将由过去的那种人声鼎沸和直接表达意见然后让你去接受，变成我们共同在事实面前说话。

第二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会给新闻界带来一种很大的挑战，不仅包括人员机制、电视运作在内的诸多方面会受其影响，将来垄断会不会被打破等等，都值得思考。

第三个变化就是，高收视率的节目将越来越少，但是满足特定受众群的栏目会越来越多，栏目必将走向多元化。如果，我们长期就看一两个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只能说明我们的优秀产品太少了，高收视率是只可以当做目标去追求的。如果，未来有一批高水平的栏目，各自吸引着各自的受众群，那就意味着中国电视走向了成熟。

第四个变化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将回归到舆论监督。一段时间以来，有人觉得记者是法官，电视台、报纸、电台是法院，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我认为，记者就是记者，新闻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就是舆论监督，它只是这个社会上空永远拉响着的警报。新闻不能觉得自己权大，甚至要大于法，这是严重的越位。这个社会上没有比法律更大的事情了。当然，在社会还不太健康、制度不太健全的情况下，会有各式各样偏离了事实原则、违背了法律精神的做法和看法，但是，新闻不能因此就做太多越位的事情。我们的目标不就是想让社会一步一步发展，制度一步一步健全吗？有时观众会问：节目播出了，问题没人解决怎么办？你说能怎么办？观众的意思就是你们继续播，甚至给领导打电话，让哪个上级领导把问题一定解决掉，这是人治而不法治。我们新闻界应该有法律的概念，舆论监督就是发出这种法律警醒的声音，然后让社会在一种比较良性



面对入关在即,白岩松采访中国入关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

的、法制的规范下向前走,这才是新闻的本体。监督固然非常重要,但不能越位。足球场上最无效的进攻不是稀里马哈的配合,而是越位。不错,现在法制不健全,但千万不要忘了新闻建设也还是不健全的,我们还都在路上走。

孙金岭:我从好多媒体上看到,关于《东方时空》改版后你的去向问题,大家议论纷纷,炒得很热闹,你对此持何看法?

白岩松: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回想八年来,我是伴随着国家的脉搏一起向前走的,这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财富。复关谈判、第一次申奥,这些过去的大事就发生在1993年



我刚接触电视的时候；香港回归我在现场，三峡大江截流我是现场节目主持人，“两会”换届、朱镕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江泽民总书记与克林顿总统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和在北大的演讲、国庆五十周年、澳门回归、迎接新千年、悉尼奥运会，包括綦江虹桥垮塌案的庭审，等等，我都是直播的主持人。在历史的背景下，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亲历如此多的重大事情，这是一个主持人最大的荣光、最大的幸运，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1994年复关谈判时，我才二十六岁，做香港回归报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然而我的长辈、我的领导、我周围的同事敢于把这样重的担子交到年轻人那还不太成熟的肩膀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所以，我一直有一种不辱使命的感觉，机会给你了，你要还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事实。

但是，个人、集体、事业总要往前走的，总会有变化。现在我就遇到了一个变化的时候，这种新的变化不会是像有的媒体说的那样退居幕后，或者是不适应这个栏目啦，等等，我会带着割舍不下的东西继续前行的。一段时间之后，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个新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新的位置。

孙金岭：这个新位置、新目标，是自己的真爱吗？

白岩松：1995年的时候，我写过的一篇论文中提到：我能做的和我们能做的就是力争在电视的屏幕上开垦出一片思想的空间来。为此，我一直在实践着。电视栏目应该有一种从事情中更加直接奔核心去的穿透力。社会的需求是丰富的，不能总是想电视观众都是浮躁的。电视只是一个筐，装进什么，取决于电视人怎么样去考虑社会的需求。我们新的栏目将从多元化的角度去考虑，在思想性、穿透性上具备更深厚的内涵，为观众提供一个更高平台上的产品，满足原本已经对这个平台有所关注的那部分观众的特殊需求。



孙金岭：能详细透露你今后的具体走向吗？

白岩松：现在不能，因为还正在运作，处在保密期。过几个月之后，就会有一定的眉目，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但是，请相信它还是一个新闻类节目，会是个好栏目。

孙金岭：新栏目对你无疑是一种挑战，成败都还很难预料，你的信心足吗？

白岩松：它不仅是对过去工作的挑战，也是对迈上一个新台阶的挑战。新节目的操作难度会很大，要求你的思想深度、你的穿透力和洞察力更强，惟有超越自我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我会跌跌绊绊，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的的确确已经上路了，并且实实在在的要去做，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就是了。对此信心很足，我希望新创建的节目是一个可以做十年，甚至做二十年的栏目。

我是一个比较敏感，但有责任感的男人，并且在男人的性格特征里，具有很多文人的东西，喜欢憧憬目标，希望将来能更“悲天悯人”。我将永远关注人，并在立足于人的基础上去关注新闻。

孙金岭：随着中国电视界的空前繁荣，一大批新人正脱颖而出，面对于此，你怕他们超过自己吗？

白岩松：不怕！我反而高兴于对手越来越多。因为，人是需要对手才会被激活的，尤其是高水平的对手。在过去的几年里，非常庆幸的事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身边有一群高素质的主持人。你想想水均益、敬一丹、崔永元、方宏进，我们五个人虽有竞争，但更重要的是一个互动的群体。你不能停下脚步，因为旁边的人素质很高，他们正脚步匆匆。对于新的或更新的主持人，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请用更快的速度超越我们。”



怀揣一颗平常心

——《焦点访谈》制片人、主持人柏杨访谈录

孙金岭

初来乍到,试试自己的想法很浓

孙金岭:古人有句话:“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从探究人的隐私是人之常情来讲,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你来《焦点访谈》之前是做什么的?

柏 杨:但问无妨。我来《焦点访谈》之前,虽然也是在电视台工作,但没接触绝对意义上的电视,没有动过编辑机,没有编辑过片子,自然也就没有真正参与到节目的创作当中,算是一种比较游离的状态。当时在辽河油田电视台工作。

孙金岭:为什么会到辽河油田电视台工作呢?

柏 杨:这说起来很复杂。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的。毕业之前将近半年的时间,曾经在《北京日报》科教部实习过,协助一些老记者跑科教口的新闻。能去《北京日报》实习,对我来讲,机会很难得。当时《北京日报》只要一个实习记者,而我当时在同学中还算比较优秀,所以热情挺高。那时实习的目的性很强,就是想留在北京的新闻单位。但是,后来没有实现目的,我就回去了,分到了辽河油田电视台。

孙金岭: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离开辽河油田电视台的



念头？

柏 杨：念头早有了。在北京读书期间，一些机会使得自己的视野比较开阔，关注社会问题的兴趣逐渐加深，加之在《北京日报》的半年锻炼，我意识到我将会选择这一行。当然分配到地方上，我认为也不一定不好，在一个基层广阔的天地里也许更有作为。但是，我们这样专

业的人，到了石油企业，总是边缘人。因为你不懂石油业务，你进入不了它的核心领域，一句话：不对口。因此我想到了离开。

孙金岭：你一跳槽就来中央电视台了吗？

柏 杨：是，那是1994年7月份。

孙金岭：刚来时，在哪个部门工作？

柏 杨：在《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

孙金岭：从一个很基层的电视台一下子到了中国最高层次的电视台，且来之前又没有太深的电视新闻理论与实践，你能适应吗？

柏 杨：不适应是肯定的。我是从一个门外汉开始起步的。我刚来时，去的是记者四组。那个时候《焦点时刻》最火，收视率极高，记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也非常高，大家在业务上也很精到，而《焦点访谈》才刚刚开播，名气也远不如《焦点时刻》。我就是怀着一种仰视的感觉走进《焦点时刻》的。我印象



最深的事情就是,来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做一些杂务,包括去拿报纸、收发信、接待来客、接电话、打扫卫生,做一些辅助性、服务性的事情,而在三个月里做这些事是不用适应的,适应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即只做这些事,不做其他。

孙金岭:你当时心理有没有不平衡?是不是感到很痛苦?

柏 杨:当时痛苦不?已经记不起来了。至于心理怎样,我相信每一个来评论部的人都有同感,那就是来之前都进行过一番斗争,大家考虑更多的不是自己要怎么样,而是我能怎么样?是不是会适应这个陌生的集体?我能为这个向往的单位做些什么?对此大家心理准备一般比较充分,无论干什么都能承受。

孙金岭:三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干杂活儿,而我相信别人当时都在紧张而充满激情地工作着,两相对比,你心里难道仅仅是承受而不是难受?

柏 杨:今天再回头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很有必要。刚来时肯定很着急,想上手,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看到你未来即将与之合作的同伴们是那样的优秀,那样的执著,那样的勤勉,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一定很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难受也好,亦或是痛苦也罢,都不算什么,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急,一种渴望挑战的心态。这不是说干那些辅助性、服务性的事情不重要,相反它对于你尽快地熟悉这个集体的精神,及早地融入这个团队的氛围,简捷地了解这个栏目的运作,大有裨益,有过这段经历,你才会更加扎实。所以我心里还是比较坦然的。

孙金岭:难道你就没有压力,一开始就很自信?

柏 杨:说自己没压力,那是假话。但我的压力不是来自



心理上的,而主要是业务上的。业务上很生疏,显得很有距离,这没法不形成压力。所以,当时自己就不停地摸索,编辑器反正也不会用,不会用 record,就只知道用预演那个钮,那好我就来回反复用预演,不断地琢磨直到懂了为止。如果说有些自信的话,那完全是因为自己年轻,精力充沛,干劲足而已。

初次上手,展现自我的心态很淡

孙金岭:你上手做的第一个片子是什么?

柏 杨: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关于抽水马桶漏水的问题。在当时《焦点时刻》那样一个收视率极高、人气很旺的栏目里,这种选题实际上是不入流的,或者说不是主流选题。它的主流选题全是硬焦点,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曝光的东西,是批评暴露的内容,而电视受众心态也要求如此。但我的选题完全是软焦点,并不怎么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做这个节目费了很大的劲,也走了不少弯路,因为我没有做过电视,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这个片子算是我从事电视工作的处女作吧。我一直觉得它对我作用不小:第一,节目历经艰难最终播出后,反映还算不错,这无疑增强了我的信心;第二,尽管一开始起步是艰难的,但是当它成为一种积淀时,对于我后面的进步则很有益处,继续往前走时,步子可能会迈得更扎实一些。到现在我对这件事都记忆犹新。

孙金岭:那你什么时候到《焦点访谈》的?

柏 杨:其实那个时候记者四组也做《焦点访谈》的节目。我真正到记者一组做《焦点访谈》节目,应该是1998年4月份。

孙金岭:我好像以前见过你做《焦点访谈》的演播室出镜



记者,是吗?

柏 杨:出镜?那是好早的事情了。有一阵子,评论部在《焦点访谈》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多被认可的记者都在演播室出镜,只是后来感觉不是太好,才应运而生了总主持人的角色,先是敬一丹,后是水均益,其他人则全部偃旗息鼓下岗了。从2001年1月份开始,我才又做主持人,基本上是以主持《焦点访谈》记者一组的节目为主。

孙金岭:是不是当主持人感觉特别棒?

柏 杨:那有什么可棒的?!

孙金岭:出镜当主持人,既能出名,还少压力,往那儿一坐,全国人民、几亿观众都看着你说,那种心情与感觉难道不棒?否则为什么人们都羡慕主持人且愿意当主持人呢?

柏 杨:不管别人如何,我没有那种感觉。主持人的职业还没有对我形成惯性心理,也没有在心理和感觉上造成冲击。当你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观众的赏识,面对着热切扑面的期待,接受着人们的点评,享受着赞誉的热潮时,你可能会有某种心理上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既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人对我说过什么,所以真的没有特别棒的感觉,只是感到特别累。

孙金岭:累,在评论部是正常的事情,但我还真的很少听哪个主持人说自己累的。何况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大台,在《焦点访谈》这样极有影响的栏目,让观众认识你,并且给予些许的赞誉,难道不容易吗?

柏 杨:主持人会有很多种。在一个传媒如此发达的现今社会,在中国观众对电视如此迷恋的环境下,让大家记住你,混个脸熟,的确不是难事。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观众对你的要求很高,则另当别论。因为你不能靠小聪



明,更多的是要靠你对新闻事件独特的理解与判断。而且现在做新闻评论部的节目主持人,所有头尾的解说评论词,都要自己写,难度很大,加上我还担任《焦点访谈》记者一组的制片人,要做的事情很多,你说累不累?每天做节目、审节目、改节目,真的让人没有时间去品味什么心理上的快乐与慰藉。

孙金岭:主持人和制片人,你更喜欢哪一个?

柏 杨:现在这种状态下的主持人,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他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参与节目,就是说没有离开节目、离开业务。主持人和节目结合得如此紧密,就使得我有了展现自己的良好机会,再加上我当制片人要审片,对节目比较了解,甚至有时候比编辑更了解,这样在写头尾的评论时,就能把我对节目的想法提炼、揣摩出来。假设没有这样一种状态而完全是另外一种纯粹形式的主持人,我不太喜欢。

初当制片人,向往平等的思路很清

孙金岭:在《焦点访谈》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栏目当制片人,我以为没有理念是不行的。能谈谈你的理念吗?也就是说,你想给一组的兄弟姐妹们灌输什么样的新闻评论理念呢?

柏 杨:坦率地讲,我没有什么理念。我觉得现在每一个《焦点访谈》的创作人员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并发展这个老名牌栏目,怎样增加或者活跃它的新生元素,使得这个栏目有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我所有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大题目下思考的,而从一个编导一下子接手制片人的重任,让我谈什么理念并灌输给大家,我现在做不到;能做到的仅仅是如何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和政局的平稳过渡”这个眼前问题。





孙金岭：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眼前目标呢？

柏 杨：《焦点访谈》记者一组是个优秀的集体，我能接手这样的团队，真的感到很荣幸，对此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此，作为一个制片人，如何做到不让大家的心气掉下来，不让一组的成绩掉下来，不让它优秀的传统丢失掉，这很重要。而要做到这些，对我来讲，第一步就是平稳过渡，顺利交接，之后再深入探讨问题。

孙金岭：那么，到现在为止，第一步迈得如何呢？

柏 杨：还行吧。一个电视台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一个部门应该有自己的氛围，一个栏目组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对于《焦点访谈》记者一组，我一直在想，它的风格在哪里呢？它的风格就是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颗平常心，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没有一种很怪的或者很俗的思想左右着大家，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同志，大家的精神状态特别平和，尤其是心理状态很好。这是一种传统，它早已深深地沁入了每个人的血液里而挥之不去。这个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很难得的传统，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长期以来每个人共同构成集体氛围的心血凝结的，它属于过去的每一段都值得大家怀念的时光，也属于今天大伙儿正在度过的日子，还将属于我们憧憬的将来。我为自己能 and 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一起前行而庆幸，当然更自豪。

孙金岭：一组同事们这种良好的平常心和素养，我们大家有目共睹。但是，我想问的是除此之外，一组还拥有一群优秀的女编导们，而女性相对好管理些，是否因此你的第一步便从容度过？

柏 杨：你的意思是说记者一组阴盛阳衰吗？的确，在这个群体里，有的女编导显得比较优秀，但是一组的男编导也很

优秀啊！何况还有更多优秀的摄像呢！只不过在一个时段之内，一组的女编导显得很突出，几个好节目接连播出，甚至还获奖，给大家形成了一种表象。但请记住表象的东西总是不客观的。至少有一点，从现在的水平上看，无论男女人员，我还很难判断其水平高低，根本不存在阴盛阳衰的问题。正是一群各有性格但却不乏真本事、真性情的同伴，共同构成了一个优秀集体的全部。他们给予这个集体的荣誉让我骄傲，他们给予这个集体的付出让我钦佩，他们给予我这个新手的支持让我感动。

至于说到管理，我倒记得古人有句话，说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而不是“三个男人一台戏”。其实好管与不好管的根



采访澳门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铨先生。



本原因不在这里。

孙金岭：那好管与不好管的根本原因会是什么呢？

柏 杨：在这个集体里，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协作和一种责任，不存在管和被管的关系。我仅仅是代表这个集体对部里负责，而大家肯定是要对我负责，大家靠的是一种责任心和协作精神作为纽带来衔接，当然责任心之外还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手段，这一点毋庸置疑。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真心呵护着协作的纽带，用本领实践着事业的追求。

孙金岭：制片人与大家可能有协作的成分，但仅仅是如此吗？你是不是在用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淡化这种管与被管的关系？

柏 杨：不是淡化，恰恰相反的是在强化这种协作关系。制片人应该是个什么位置呢？我的理解是夹在领导和编导中间的一个角色，制片人要对领导负责，也要对编导负责。对于上级领导，他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对于组内同事，他是一个实干的带头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环境有别于其他的任何一个部门，尤其不像行政机关，有特别严格的隶属关系，完全按级别来划分，副局长就不能叫局长，而电视本身是一个对合作要求极高的职业。同时，一群电视新闻人，怀着一腔热血，带着满心的信念，来到《焦点访谈》这个中国电视新闻的最前沿，为的是寻找一方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绿洲，实践自己的新闻理念，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为什么非要强调什么管理与被管理呢？那么优秀的人还需要和优秀的人才水平差不多的人去管吗？制片人的水平就一定比记者水平高多少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只不过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需要考虑问题可能更全面、站得更高一些、想得更多一点而已。

孙金岭：难道你当编导时在一种协作关系之外就没有被



管理的感觉吗？

柏 杨：我觉得自己这方面的意识不是很强，被管理的感觉得不很突出，也没有更多的来自管理者给予的压力，还是很放松的。

初步思索，追求理念的激情很强

孙金岭：那你当时感到放松，会不会是因为你很自信、很优秀？

柏 杨：也不是，和我同在一个组的人全这样。大家在一起很和善，不论有什么问题，都一起出谋划策，无论指定谁做一个节目的牵头人，都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这活儿是整个集体的荣誉与任务，每一个老编导、优秀编导，甚或是一般记者，更是会主动担当默默无闻的角色，无怨无悔。这种风气真是靠长期以来大家以诚相待地相处，平静、平等待人的精气神儿养成的。作为这个组的管理者，我反倒觉得应该强调的是人文关怀的东西，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和谐而真诚的面。我仅仅需要做的是给同志们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宽松氛围，使得每个人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劲。

孙金岭：太宽松了以后会不会没什么规矩了？

柏 杨：宽松不是放纵。制片人是为大家的生活和生存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环境不仅仅包括工作方面的，还包括人文、自然的，在这样的氛围下，对每个人的成长、创作，只有利而没有弊。

孙金岭：如此说来，你刚才的所言，既是一组的风格，也是它的优势了？

柏 杨:没错。在这个风格的基础上,我想一组首先要形成做系列节目的优势。做系列节目就是要做大策划、大组合、大包装、大影响的节目,我认为这可能是《焦点访谈》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寻求突破的一个点。对此,一组有这个能力的储备,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我们做了《中国生态系列报道》,反响不错。

其次,一组要发挥快的优势。我们要做的是新闻节目,而不是专题节目。我们有些时候经常对一些选题,或者一些新闻事件,感到很漠视,甚至有些东西觉得离我们很远,这是不对的。只要是新闻,我们就应该冲上去,成与不成另当别论,至少它可以锻炼队伍,增强新闻意识。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我们在政策允许的第一时间里就派人上去了,坚守十八天,任务完成得还行。再比如沙尘暴、网吧等等,我们都做了努力,而且每一次都专门临时任命一个同事作为队长,牵头来做,保证落在实处。

孙金岭:我相信,你所言的这两点,也是评论部所期待的一种理想追求。那么,你又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呢?

柏 杨: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并使之超常发挥。如何拥有人才,如何用好人才,其实很重要,决不能说《焦点访谈》人才济济,随便怎样都会出彩,相反弄不好会出大娄子的。

对此,我想可以采取三点现实的办法:第一,力争平等。尽管绝对的平等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在人格上做到平等以待,在创作上营造平等空间,在生活上提供平等的服务,从而形成融洽、温暖的工作与人文的氛围。第二,努力创新。不断具有创造力,不断具有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以及具有追逐这种好奇的能力。如果大家对一些新名词瞠目结舌了,对街上的流行



色、衣服的款式、汽车的型号等等麻木不仁、一无所知了,那就表明他已经开始下滑了,已经有了老态的某种痕迹了。创新并保持一种创造力,对一个集体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要力争创造平等的环境,或者说是融洽的环境,就是为了保持大家的创新能力。第三,保持稳健。《焦点访谈》的记者,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栏目的创造,因此它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政治上的成熟,责任心要强,同时为人处事要老到。我们长期接触的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现在江湖险恶,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保持稳健是像《焦点访谈》记者一组这样的集体继续前行的条件之一。

孙金岭:大凡有才的人,可能做不到老到,因为,如果他既有才又老到,那离圣人也就不太远了。因此,作为一个制片人,当手下的人无法做到老到时,你将持何心态?



禅坐床典礼报道。
参加藏传佛教第十一世班

柏 杨：他不可能做到稳健的时候，那么，他至少可以做到政治上成熟吧？否则只能说明你不适合做电视人，或者说不适合做《焦点访谈》的记者。

孙金岭：如此听来，你的思路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并且经过了深思熟虑。看来，刚才你说还正处在“权力的交接和政局的平稳过渡”时期，是一种谦虚了？

柏 杨：不是。的确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交接工作、了解事务的平稳过渡的时候，但是，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孙金岭：你是说自己很适合干这份主持人与制片人兼而有之的工作吗？

柏 杨：我现在不能评论自己是不是适合干什么，我该干什么。做制片人，既靠能力又靠为人。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制片人是怎么出“笼”的，他是经过了业务上的考察，经过了为人的考察，也就是说既走了群众路线，同时也要上级部门考察才出来的，两者缺一不可。而我刚刚开始起步，有好多地方需要潜下心来认真学习。大家也都看到了，我每天沉浸在节目中间，因为必须要保持一个相当的工作量，保持大家的工作状态不能掉下来。上任三个月了，才腾出手来过问一下组里的财务事情怎么弄。而这实在是因为涉及到签字、报批等等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你不管不行了。好在做得还可以，至少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同时又做了一些有亮点的节目，从业务考核上应该说没问题。我对自己的信心肯定是有的，没有信心，你将来怎么干？！

但是，有信心不等于没压力。做制片人，考虑更多的不能是自己，而应该是全组人的利益，是整个《焦点访谈》的利益。一组的成绩怎么体现，怎么发展，怎么保障大伙儿的权益和收入，怎样使得大家生活得更好，而业务在短期之内能有迅速地





提升和突破,等等,等等。这些考虑起来压力非常大,所以头发掉得也比较多。我开玩笑说:我把我的肚子送给了一组,我把我的头发也送给了一组,去年年底还是两尺五寸的腰,现在是两尺三寸了,可怕吧?每天从台里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台里,从屋里到屋外,接电话、看片子,每天走的路挺多的,这倒也好,不用在外边锻炼身体了。

孙金岭:这样辛苦,你觉得值吗?

柏 杨:我经常说,大家到这儿来干不容易。首先你要付出,要付出才会有所得,学会付出你才能有所得;同时还要学会抛弃,要抛弃很多东西之后,才会得到补偿。否则鱼和熊掌兼而得之是不可能的。我是个挺重感情的人,很珍惜与合作者共同走过的经历,这是我引以自豪的东西。实际上,你想想,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会有多大的能力去支撑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呀!怎么办?毫无办法,大伙儿既然在这儿干,就要靠你。那么,你靠什么呢?你还不是靠大家在一起干吗?!对此,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踏踏实实地干,把自己该干的事干明白!



☺ 白岩松近日收到北京市青联秘书处的信函,要为各位委员及其家属进行全面体检。岩松甚喜,显示于妻子,并让妻按要求填写回执后复函。晚上回家,妻子告之:“体检回执就不用写了,人家寄信日期是2000年9月4日。”

☺ 《焦点访谈》的热线电话68510707设立后,铃声狂震,令人应接不暇。其中一电话:“这是《焦点访谈》吗?”记者曲长缨:“是,有什么事吗?”对方回答:“别激动,不是找你们,我找《今日说法》。”

制片人就是经营者

——《焦点访谈》制片人叶小林访谈录

孙金岭

孙金岭：作为制片人，几个月过来你觉得自己适合干这个工作吗？

叶小林：还可以吧。

孙金岭：你觉得优势在什么地方？

叶小林：我的优势嘛，经验比较多一些。在记者二组这样一个生产集体里和大家相处，怎么能把大家调动起来，同时让大家能够形成一种比较宽松、团结的气氛，我觉得自己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能力。

孙金岭：那你的弱势是什么？

叶小林：弱势是自己可能有点儿人文主义，比较强调民生吧！

孙金岭：人文主义，这可是一个优势啊，怎么会是弱势呢？

叶小林：《焦点访谈》是高度介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的一个栏目，很多地方不能从感情色彩方面考虑，它要求非常严格，要强调纪律，强调在很多利害关系上从大处着眼，一切为了大局，这一点一定要坚定，不能动摇。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不得已……

孙金岭：这是现实，不是你的弱点呀！



叶小林：制片人不仅需要有对大家温和的一面，同时仍然要树立他的纪律、权威，以大局为重。在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地方就会欠火候。因为过去我是副制片人，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包括在制片人和编导、摄像之间进行磨合、调整，很有效。现在要做第一把手的时候，那就要在原则性方面完成角色转换，包括坚持原则，甚至要大胆地触及矛盾。

孙金岭：这个角色转换只要给予你时间，不会成问题的，也不会成为弱势的，因为你对此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叶小林：如果还要说弱势的话，我喜欢跟一些事情保持距离，这样也可以理解为自己比较冷静，要是做那种智囊团包括做参谋班子什么的，我会做得很好。帮别人把握分寸，考虑问题更周全些，这是我的长处。现在做了制片人之后，尤其在《焦点访谈》这样天天播出的情况下，节奏非常快，很多事情的是非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当机立断地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回答。这个对我自己将是一个调整，不能过分具有“小资情调”，太浪漫不行，太温情也不行。

孙金岭：这个“小资情调”，就是你刚才说的人文主义吗？

叶小林：有的时候人文主义是表现在“小资情调”上的，比如，常有人说叶小林考虑问题还挺浪漫的。这是性格，很难改变。

孙金岭：你一直强调人文的东西，这跟现实会时有冲突的。对此你痛苦吗？

叶小林：痛苦。

孙金岭：这种痛苦体现在哪些方面？

叶小林：比如说，《焦点访谈》要处理好多级化的目标问题，要兼顾不同的社会集团，或者是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利益，

包括我们自己的追求和理念。而这些在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是需要不断地调整的。但是,让人困惑的是你很难说这里面有一个固定的章程。

具体讲,我要求记者前期采访时要调查,做到把事实百分之一千的准确,而且舆论监督节目既要非常锐利,又要考虑深层次,还要不断地拓展这个栏目的空间和内涵,发展这个栏目。评论部要做强做大,一个栏目也要做强做大,不考虑将来的发展、不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是不行的。那么,你要求或者说鼓励记者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是,当努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所占有的空间、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你在几年前所不能意料的程度,你的一举一动都会造成地动山摇的动静,常常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和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社会的震荡、震撼,这时你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你还有时间和心情讲究“小资情调”吗?

孙金岭:看来这“村长”不好当啊!

叶小林:“村长”?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长实际上是一种民选人物,在一个自然村落他会有点部落和部落酋长的感觉,他更多的是在维护那个部落或者是那个自然村的利益。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评论部,各组制片人应该是评论部的派出机构里的派驻代表。

孙金岭:哈哈,你好像不喜欢“村长”这个称呼。

叶小林:叫“村长”是没有错的。但“村长”算是一个一级行政组织吗?不应该算吧?而制片人应该对评论部负责,对新闻中心、台主管新闻的台长负责。如果当大的利益跟小的团组、团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制片人肯定应该站在大的团体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必须适当做出牺牲和让步。所以,我觉得





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养成了叶小林采访中的从容不迫。与被采访对象的平和交流,常常让人难以忘怀。

“村长”这个说法,至少是不全面。

孙金岭:是不是嫌它官太小了,体现不出制片人自身的价值?别见外,开个玩笑。

叶小林:当然不见外。不过把一个组里团结的气氛、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建立起来,制定组规民约,讲究诚信,拓展发展空间,还是很重要的。

孙金岭:你所说的“拓展发展空间”具体是指什么?相信大家对此会很感兴趣的。

叶小林:这个空间既包括栏目本身的发展,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只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支点,找到发挥长处的舞台,那每个人就会有信心地往前走很远很远。

孙金岭:能具体谈一谈吗?



叶小林：年轻时，很多人可能拼的是体力，靠的是敢打敢拼，快速反应，而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时，他可能考虑的问题会更深一点，进而技巧性的、智慧性的东西便会凸现出来，包括做人的一些技巧。无论是谁，只要做《焦点访谈》这个栏目，就是在丰富自己，积累财富，就有一种空间。如果让别人感觉你有价值、有生机，那么这种发展的空间也就广阔了。即使有一天离开了评论部，他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孙金岭：还是不具体。这样吧叶老，你知道你的下属们现在想些什么吗？

叶小林：常跟大家交流，应该知道吧。任何一个管理者时间做长了以后，都很难避免一些人性的弱点，包括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什么的。制片人握有很大的权力，比如他掌握指派做节目的人选，管理大家运作的经费，要对大家奖励或惩罚，用人的初选也由他来把关，等等，权力是比较大。那么，如何使权力在制约的前提下得到公正、公开、公平的使用与发挥，我想大家是比较关心的。

我也是一个自然的人，没有办法把别人犯过的错误完全避免不去犯。但是，可以自信地说，我接手制片人后，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机和新的想法，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的。当然，时间长了，自己保守沉闷了，或者是做得不利索了，相信大家也会建议我去换个地方的。

孙金岭：下属们的想法就这些？还有吗？

叶小林：他们当然希望我做好服务工作了。比如，从他们个人角度来讲，希望通过我的手给的选题操作性很强；节目做完之后，经过我的第一关修正后，拿到主任、台长那儿，不需要大折腾就能够播出，成为他们的劳动成果；然后用这样

的劳动成果,换取一定报酬。

孙金岭:假如你在组里碰到你不喜欢的下属,怎么办呢?

叶小林:有些东西不是自己能够做出判断的,更多的时候是环境改造人,不是人改造环境。

孙金岭:那么,更多的时候是你改造他们,还是他们来改造你呢?

叶小林:按照唯物的观点,应该说更多的时候是客观环境改造人。我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寻找生产力,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这支队伍是我当制片人的客观基础,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对待这支队伍,我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量才使用、用其所长,但会尽量做到公平的。

孙金岭:你对下属发火吗?发完火记仇吗?

叶小林:我是一个感情比较直露的人,说话坦率,有发火的时候,也有沮丧的时候,但发火从不记仇。我在中央台工作了那么多年,可能唯一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电视工作经历、做评论性报道的时间比别人长。按照一些人的生活轨迹,我可能应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但做了这么多年,好像在原来的位置上的变化反倒不大,可是我仍然找到了一份乐趣。我接触了很多事情,仍然觉得它们有新意,内心充满着朝气。当然,这跟我善于忘掉,忘掉一些东西有关系。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的饭总是香的。说实在的,我自己的事都忘记了,还记别人那么多事干什么?!

孙金岭:你说你从事电视的时间比较长,最早是什么时候呢?

叶小林:触及电视实际上是在1976年,那时在农村插队。真正动手编节目则是在1979年。可以讲,中国电视的主



要发展阶段都让我赶上了,或者说是经历了。

孙金岭:如何看待中国电视的主要发展阶段?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也算给我补课吧!

叶小林:咱们共同探讨吧。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电视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到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开始逐步研究社会问题,比如1987年我那时做《观察与思考》,可能更注重对一些生活印象、事实的分析与透视,中国电视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过程。评论部成立以后,做《焦点访谈》时,给我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电视更重于或者说更具有了生产经营的色彩,它从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产业了,把一些原来在经济领域运作的经验和常识,用在了评论部的运作上,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过去做新闻或者做专题,是一种依附在社会上的感觉,好像老是给大家吹喇叭,不计成本。这种运作实际上非常有害,是很扭曲的。评论部给中央电视台提供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它作为经济运行,是计算成本、讲究效益的。它的栏目,包括经费、体制的保障,已不完全是靠政府、吃政策饭,它有自己的运作方式。现在作为一个制片人,他考虑的问题已不仅仅是要推出好的节目,建立一个非常可靠的保障体制,还包括本栏目的经济成本合算。也就是说不光考虑到要靠很好的政策,还需要体现队伍的生产能力。而这个生产能力不光是要靠人本身的素质,同时还要借助于器材、经费这样的一种市场要素。

孙金岭:按照成本的原理,以极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获是它追求的最高目标。那么叶老,当成本和业绩不成比例的时候,你最先会从什么地方动手?



叶小林：业绩跟成本不成比例，就意味着投入很高而产出很少，这是我一直想的事情。这个问题不妨把它说开去，说开去是逃避你再提尖锐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我接替制片人后，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家的工资收入应该高进，只能上涨不能跌，否则就是我的无能。这个观念



摄像朱邦录和叶小林(中)在三峡工地上采访。

很有点计划经济的说法。过去在五六十年代，一个人参加工作后，只能先从学徒工干起，二十几、三十几块钱，最后大家可能做到七级工、八级工，那工资肯定是上涨的趋势。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中央电视台具有政府宣传机构的色彩，又有新闻机构运作的特点，是两种性质的特征融在一起的。有些方面是靠广告收入来运作的，既然受广告收入影响，它就必然受市场的制约，也就会出现经济上的危机，有起有伏，这都是非常正常



的。所以,现在评论部的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有危机意识。从梁建增主任他们到我们制片人,大家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在竞争对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通过努力,把事业做大,扩展评论部的空间,使之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作为每一个人来说,也应该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方式。

孙金岭:但是,不管是在一种什么状况下,作为一个制片人让大家收入提高,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叶小林:说句实在话,评论部的制片人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员工高收入的。我是这样想的,赛纳、柏杨、崔永元他们也一样,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但是,他们也得搞经营合算,讲究效益观念,每个人都在算这个账,每一个节目都要算这个账。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这个经费如何花得既经济,同时又产生效益,保证节目能够播出,那是一种操作上的技巧了,与个人有关而与原则无关。

孙金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更喜欢选用只干不说的人呢?

叶小林: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栏目的要求上讲更贴切一些。《焦点访谈》对人的要求是一方面能打能拼,再一个做出的节目有一定厚度和深度。自然选人与用人的标准也是根据节目的生产标准来进行的,让节目去适应个人是不可能的,只能人去适应栏目的需要。

孙金岭:其实这个问题对于众多的人来说,不考虑是不可能的。在生活与工作中常常会有一些人,工作能力很强,但人缘不太好,包括你自己很不喜欢,对此你能够做到理性成分多一点,人性方面要相对少一点吗?



叶小林：你这个问题很尖锐。在工作生活中，在咱们周围，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评论部的很多人，用一般的社会公德去衡量的话，他肯定有很多欠缺，起码他肯定不是一个在有序的生活里一板一眼地做事的人。如果在原来那个地方能够找到他的人生价值，或者他事业越做越辉煌、越做越灿烂的话，相信他的选择不会是到评论部来。很多人就是厌倦了或者是不适应了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生活节奏，才来评论部找他的一份空间、一份乐趣的。而评论部也一定有这种空间和乐趣，使他能够容忍很多委屈，容忍很多挫折，容忍很多不公和压力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聚集在这里，为评论部的事业竭尽心血，为评论部的遗憾献计献策，为评论部的未来欢欣鼓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目是硬道理，性格是软道理。

至于评价到每个人的话，作为制片人，我认为就是要发挥他们的长处，然后把他们的一些不利因素和个性压抑住，不能在节目里、在团队里体现和张扬，那些东西只能在他的私生活中间去施展。

孙金岭：听你这么一说，感觉你挺会过日子的。

叶小林：我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村长”了，不是要代表这个村的村民向有关方面去讨说法，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怎么样合理种植、不要浮夸、争取让自己村的妇女多生几个娃的问题了。制片人不是像“村长”一样在过日子，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经营者。

《焦点访谈》的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常态的电视节目了，它承担了很多其他的社会功能，并且达到了一种非常强的社会效果。它要求你在不同的规格变化中，都能

维持住生产能力,并且提高你的设计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你还必须考虑到一个成本和产出的问题。这样还不是个经营者吗?你生产不出产品,你没有经营水平,没有推销技巧,其他问题你还能考虑什么?再大的情绪和牢骚还有你发的地方吗?制片人就是经营者,栏目办不好,就是经营者的失职。



9
6

☺《焦点访谈》记者康平端着空茶杯进了中心组要茶叶,摄像姬雨赶紧递上一袋名贵茉莉花茶,康老放了一大把,然后送还姬雨。姬雨说:“送给康老了。”康老闻言,后悔不迭:“我要知道送给我了,就不放那么多了!”

☺《新闻调查》栏目的姚志萍打电话找敬一丹,《直播中国》的魏安泰接电话说:“不在。”姚志萍:“我怎么听着旁边说话的人像是敬大姐?”大魏十分认真地说:“你又不是观众,骗你干吗?”

实
话





衣带渐宽终不悔

——《焦点访谈》编导再军访谈录

孙金岭

机会是偶然的,它只钟情于有心人

孙金岭:再军,你制作的反映 309 国道乱收费的《罚要依法》节目一炮走红中国电视新闻界,当时感觉是不是特别兴奋?

再 军:节目播出以后的确有些兴奋,但是,对于后来的获奖,却不觉得有什么。

孙金岭:为什么呢?我知道在 1998 年,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试卷中有一道题,就是分析《罚要依法》节目的结构特色,包括后来很多电视界的学者都以这个节目为范例,写了好多学术文章,难道你对此没有丝毫的成就感?

再 军:节目中打出的字幕,编辑是我,摄像是我的同事白河山,但实际上它跟《焦点访谈》的其他节目一样,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它的成功已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了,而是承载了《焦点访谈》很多从业者的某种期望。

孙金岭:这种期望是什么呢?

再 军:那就是如何凭着我们的良心和职业操守,经营好这个栏目,从而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感。



孙金岭：这期节目是反映公安部门的执法者不依法办事的问题，应该说是很尖锐、极敏感的话题，当时播出有困难吗？

再 军：我清楚地记得，节目制作完成后，在正式送给李东生副台长审看之前，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提出要预审节目，这是正常审片没有的程序，很特别。孙玉胜主任看了以后，既没有表态，也没有觉得兴奋，更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而是一言不发地走了。后来我听说，当得知李东生副台长审批通过时，孙玉胜主任还是一言不发，只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一拍大腿。

前不久，在已经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的孙玉胜的率领



2000年7月，在宁夏中卫县采访“采挖发菜对生态的破坏”话题。节目播出后，设在这个县的全国最大的发菜交易市场关闭。



下,我们做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其间我跟他聊起这件事,问他当时为什么一言不发。孙总编说,你那个节目当时太有分量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言不发就是对这个节目最大的肯定。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新闻把关者,当时他面临的压力该有多大。

孙金岭:那么,你自己是如何评价这个节目的呢?

再 军:在此前,《焦点访谈》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评论类节目,学术界有争议,电视界的专家也有不同说法。《罚要依法》播出后,节目拿去参加中国新闻奖评奖,当年曾是评委的副台长李东生回来后说,这个节目所有评委全票通过,专家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个节目就是评论类节目的一种样式。对节目的肯定,我觉得就是对《焦点访谈》一直追求的“独立思考、客观评判”风格的认可。

记得当时正是1997年底,运行了三年的《焦点访谈》,到了一个需要提高一步、登上新台阶的时候,而此时承载了许多人期待和追求的《罚要依法》应运而生了。

孙金岭:《罚要依法》的横空出世,对你个人而言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呢?

再 军:它的突然出现,是一种必然。任何一个作品,无论是电视作品还是其他类型的作品,很难说偶然的和必然的哪个比例大。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一样。比如,那个戴着大墨镜的警察说“二十、四十”的经典节目镜头,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能拍摄到,这里面就有相当程度的偶然因素。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我们连续三天五次往返于那条路上,想尽办法,提前进行一种必然的安排,或者说一种设计,那么即使出现了精彩的镜头也可能不会被捕捉到。按照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偶然性和必然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直认为,电视业是一种具有很强偶然性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要努力做的事,就是把这种偶然因素通过自己的设计和追求,通过深入的调查与追踪,把它捕捉到,并使它能够尽量地去展现必然。机会是偶然的,它只钟情于有心人。

孙金岭:如此看来,做电视新闻节目,制作前确定选题和准备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了?

再 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更看重的是现场和后期的提炼。有些选题出发前大家心里已经有数,觉得它应该出彩,这类选题比较好办。但大部分是常规选题、平常内容,是大家一致不看好的、常常会流于平淡或者流产的节目,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课题。其实接拍《罚要依法》时,我们对这个选题一点都不觉得新奇。

孙金岭:为什么呢?这类典型的“三乱”选题还不够刺激吗?

再 军:“三乱”现象在九十年代初期最猖獗,而此类现象越猖獗,你的被采访对象就越牛气,同时记者的采访也就越容易出彩。被采访对象调动出了你的情绪,你的采访有了冲动,捕捉起素材来就会很敏感、很有创意,而这些丰富的素材一定会为节目后期的剪辑留下很大的、比较精彩的空间和基础。但是,1997年的时候,这类选题对《焦点访谈》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对观众来说也司空见惯了。对观众、对记者、大家都不觉新鲜的东西,那还会有太多的冲动吗?所以,当制片人梁建增把选题交给我时,我是怀揣着一颗平常心拽上我的老搭档白河山上路采访的。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现场的东西太精彩了,它超出了出发前的所有预计和想象,给予了我异常丰富的收获。至今,我养成了不挑选题的习惯,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把握选题上。



孙金岭：挑选选题和把握选题矛盾吗？

再 军：不矛盾。但是，如果专挑自己擅长的或者喜欢的选题，我认为反而会失去许多开拓新领域的尝试。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理应成为一个多面手。所以，有的时候关心我的人，包括观众和同行都说，你看上去应该是做一些硬节目的人。所谓“硬节目”就是刀光剑影、锋芒对峙、唇枪舌战的场景。不错，那是我的强项，有强项应该是好事，但绝不能排斥其他，甚至应该主动去做一些非强项的节目，否则会把自已的眼光限制住。何况做所谓的非强项节目，并不会弱化强项啊！所以《罚要依法》节目播出之后，我就不选择选题了，给我报道“心连心”的选题，我照样会去想方设法拍得更好一点；给我采访成克杰这样的机会，我也一定会跟他平等对话。

我的自豪感里更多的是一种压力，一种责任

孙金岭：可不可以说，《罚要依法》的成功，树立了你的自信心？

再 军：是。时至今日，我基本上已能够胜任《焦点访谈》的所有类型的节目。比如现场感强的直播节目，我参与了澳门回归等大型报道；比如说突发事件，像 1998 年的抗洪，到目前为止，《焦点访谈》还没有遇到过超越 1998 年抗洪那么样的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我和当时评论部的记者王亚峰，作为《焦点访谈》在九江决口地驻守人员，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比如重点报道，包括建党八十周年特别节目，我也积极参与制作。至于常规的节目，那就不用说了。当然我不能说做得都很精彩，但确实是已经能够胜任所有的选题了。

孙金岭：如果说你什么都能胜任的话，会不会什么都不精呢？

再 军：胜任和有主攻方向是两回事。胜任是能够完成好这个工作，出不出彩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对我来说就像考试一样，七科考试成绩都能够在七十分以上，数学、外语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不会出现一个二十分，一个九十分这么大的差别。

孙金岭：那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强项的？



2000年8月，再军在浙江温州采访。

再 军：我喜欢对突发事件的现场捕捉，《罚要依法》可以佐证这一点。我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但在访谈过程中，我比较注重访的成分，注意和对方交流。纵观《焦点访谈》的精彩部分，基本上对突发事件的现场捕捉，都是完整而成段落的，都是有回合的，现场感的氛围会很浓，问答也有完整的过程。它带给观众的直接印象就是用事实说话。当然，电





视是一门剪辑的艺术,我们难免回来要动剪刀,但最好剪刀动得很少,这是对事实本身的尊重。我喜欢这种采访,也努力追求这种状态。

《焦点访谈》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访的成分少,谈的东西多了。记者的行为、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交流的过程太短、太少了,看不见记者,不知道记者在哪儿。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话筒,听到的更多的是被采访对象的声音。当然,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内容,留给你的采访对象,你不能够自我张扬、自我表现,但绝不能是为谈而访,应该是访中谈。这种倾向应该引起我们从业者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能擅长访。

孙金岭:你的这种优势,在《焦点访谈》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吗?

再 军:《焦点访谈》早期的节目,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过瘾的心态,就是啐得很过瘾;批评很过瘾;揭露阴暗面很过瘾;把谁“干掉”了很过瘾,甚至把谁通过我们的节目“杀”了很过瘾……我对突发事件现场捕捉的优势,其实就是栏目早期特色的一种体现。

走到一定程度,觉得这个瘾过完以后,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反而是沉重的思考,以及思考后的沉重——因为,我们跟《焦点访谈》一块儿成长了。我们已经能够冷静地看待发生的一切,能够平静地看待眼前的变化。最初大伙儿那种浅层次上的成就感与虚荣心的满足,已经回归到对记者本职责任和媒体作用的深刻探索上了。也许棱角已不像最初那般尖刺,所反映的话题也在一直重复,但却更加客观了,更加冷静了,也更加成熟了。我注重访的过程的意识,其实早已融进了《焦点访谈》那永不停止的、前行的脚步声里了。我曾作为《新闻调查》的出



镜记者进行过采访,《新闻调查》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在从容状态下进行平等对话的氛围。我把这种方式运用到了《焦点访谈》的采访中,我觉得那种访的感觉可能更像是成熟期的《焦点访谈》。

任何一个栏目,到一定阶段以后总会由上升趋于平稳,平稳了就会感觉不过瘾了,而不过瘾就在于节目的结构过于程式化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创新,寻找新的角度来提高,以改变节目中不能够适应观众需求的内容。这个阶段真有点像到了青藏高原,海拔四五千米,够高了,但在世界屋脊上,你想再攀登一步都很难,因为它缺氧。因此,我们要练习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的地方进行攀登的一些技巧,你光有体力,带着氧气,但没有技巧,包括一些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不行的。《焦点访谈》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而我的进步、我的思考,以及我的困惑与之息息相关,不可分开。

孙金岭:我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你很爱你所从事的工作和栏目。

再 军:套用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一句台词,就是我已经融化到了《焦点访谈》的蓝天中了,两者互为影响,不可分割。作为《焦点访谈》的记者,无疑是一件自豪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客观地理解这种自豪感。

孙金岭:为什么这么说?你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再 军:我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或者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经常说现在我们如履薄冰。实际上《焦点访谈》承载了很多社会的职责和负担,尽管它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有不正常的成分。由于法制本身不够健全,监督的渠道不够畅通,观众有点事就想到《焦点访谈》,把《焦点访谈》当成了包青天。其实,《焦点访谈》说透了,它仅仅是个新闻栏目,它不能够替代也不允许替代公、检、法部门,它也不可能更多地扮



演政府决策机构的角色。人们关心《焦点访谈》，喜欢看《焦点访谈》，对从业者来说这是个很高兴的事，但正因为这种关注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重要，就更要求我们格外地谨小慎微，包括前期的沟通联络，中期的访谈，后期的编辑等等，都决不能含糊，不能有闪失。而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所采访的事实，即用事实说话本身，决不能含糊；二是对事实的选择和把握，不能有闪失。所以，对于记者来说，他的责任心增强了，难度自然也会增大，而他的自豪感里更多的已经是一种压力，一种责任了。这样能不如履薄冰吗？

孙金岭：既然压力如此之大，那还有激情吗？

再 军：肯定有，但燃烧的已经是理性的激情了。面对这种状态，评论部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挖掘潜力，寻求一种突破。我以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不断寻求蜕变，在保持原有节目态势的同时，吸纳新人，补充新鲜血液，带来新的思考、新的锋芒，以青春的气息激活栏目的活力，从而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力和必要的杀伤力。

第二，寻求栏目样式上的变化。以前做节目更多的是对错非常分明的事情，然后我们把它电视化地表现出来。比如，河南交警张金柱撞人事件，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令人愤慨。而今再关注这一类的事件，我们可能会更趋于一种深层次的思考。我还做过一期节目，叫《搏击暴风雪》，是对内蒙古今年遭受雪灾的报道，我在节目中暗含的思考是：为什么去冬今春的暴风雪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造成的灾害却最大？这个话题，我准备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再去回访，做进一步深化地挖掘。

第三，《焦点访谈》开始注重了整体节目的反馈，这是完善自己的有效举措。作为一个电视栏目，它必须考虑观众的收视心态，考虑观众直观后的感触，因此，《焦点访谈》加强节目的

反馈,无疑是保持冲击力的有效方式。

人们可能觉得《焦点访谈》不如前几年过瘾了,但从电视长久发展看这不是个坏事。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把激情和锋芒融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

孙金岭:那么,你在这方面是如何把握的呢?

再一军:我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些惶惑。怎么把这种锋芒在“短、平、快”的交锋中与相对有距离的理性思考结合得更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这方面我有过痛苦的经历。1997年,我和摄像凌泉龙,接到很多观众的反映后,去河北廊坊采访一个农村基金会的事件。一伙儿人打着基金会的名义,以高于国家公布的银行利率非法揽储,然后卷款逃匿,或者赖账不还,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当地的治安混乱。在一个镇的一条大概三百米长的街上,就有四十几家这样的基金会,十分泛滥。在采访的时候,我不是特冷静,对方当然也很是无赖。回来一看素材,我不像在采访,像在训斥人家,像在压迫人家承认什么。由于暗访被识破、由于天太热、由于对方太狡猾、由于事情本身过于复杂,我的情绪太激烈了,以至于控制不住。

那次采访,感触很深,引起了我的思考。我们与被采访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吗?正是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上,我给自己提出了采访中的“三平原则”,就是平等、平实、平静。平等,是指在人格上双方对等;平实,是指在事实上朴素真实;平静,是指在采访中平和心静。

之后,我去山西做的《罚要依法》节目,我们除了在公路上使用暗访之外,始终是在进行公开采访。当他们知道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后,要抢机器、抢带子,甚至是砸机器的时候,我都没有发火,只是在保护。如果说这两次采访的次序颠倒一下,先去的山西,后到的河北廊坊,我想可能就没有《罚要依





1996年秋,在四川某军用机场,采访我航天部门收回返回式卫星。
法》那种平等、平实、平静的心态了。这个“三平原则”,我现在仍在恪守着,尽管做起来很难。

孙金岭:我们在采访中,常常碰到被人用手掌捂镜头的情况,并且许多编辑也把这些画面用在了节目里。你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再 军:从《罚要依法》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不强行采访,他也就没有机会捂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记者有采访的自由,被采访对象也有拒绝采访的自由。你不能用记者的采访自由去限制或剥夺对方的拒绝采访的自由,不接受采访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者有他的难言之隐,不能强行。所以,采访中对方即便去捂镜头了,我也尽可能不用。

孙金岭:可是在现实中,如果你这样中规中矩地做了,会不会采访不到所需的内容呢?

再 军:不会的,两者决不矛盾。比如去年冬天,我去云南永善县做《局长醉死歌舞厅》一片,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



事。局长醉死本身就已很令人吃惊了,因为醉死不是一种很好的死法,不光彩;而这个局长不仅醉死了,而且醉死在了歌舞厅,按照老百姓的话讲,是死在了一个不该死的地方。题材本身的张力十分过瘾,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正因为如此,采访起来一定困难重重,但是我只用了一天半就拍完了。一定很奇怪吧?因为我截取了事件的一个层面,并由此进入,以点带面,展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我们不是小报记者,为了寻求某一期的卖点,而写些耸人听闻的东西。如果我们就盯着歌舞厅,盯着三陪小姐,奔着这些热点去,利用节目本身的画面冲击力,利用我们现场的所谓沟通采访,再加上某种意义上不负责任的煽情,那得出的结果可能极其轰动,就是做两期《焦点访谈》都有富余。如果我们这样去做了,不仅难以采访好,更主



要的是过于低俗了。我们既然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就要做出《焦点访谈》的大气。



作为《焦点访谈》的记者,威胁生命的事情司空见惯

孙金岭:作为一名《焦点访谈》的记者,责任心太重,是不是会使自己很痛苦?

再 军:痛苦是一定的,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但我更欣赏这样一种说法: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焦点访谈》在记录着历史,在关注着国家一定阶段内发生的大事,在反映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社会的责任感不言而喻。由此我想起了1995年10月来中央电视台招聘考试时的情景。招聘的领导是原评论部的副主任张海潮同志,他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焦点访谈》?”这个问题,至今我仍经常想起。《焦点访谈》给了我一种释放的机会,而我释放的是一种期待,一种对正义的期待。我的性格里喜欢疾恶如仇,而《焦点访谈》所展现出来的正义及对于丑陋事物的批判意识,是我的所爱。既然是你的所爱,那么即使有痛,也是快乐的,并且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生命。这不是大话,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

孙金岭:采访中,威胁到生命的事情经常发生吗?

再 军:这种事情对于《焦点访谈》的记者来讲,司空见惯。就在半个月前,我为制作《焦点访谈》建党八十周年特别节目去广东采访,差点遭到绑架,真悬哪!

孙金岭:这种后怕的事情是不是很多?

再 军:如果说可怕的话,我觉得在路上的危险对于我们生命的威胁更严重。像绑架那种面对面、硬碰硬的事情,我们可以有很多自我保护的方式,或者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防范,

但是在路上,那是没法保护的。比如,《局长醉死歌舞厅》播出后,中央领导做了批示,当地也很重视,遂派调查组去永善。然而调查组在取证途中车翻到了沟里面,牺牲了两位同志。如果说当时我们在车上,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都把新闻采访叫跑新闻,《焦点访谈》就是靠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字更适合于我们,尽管那种跑不是徒步,但是实际上这种跑中的危险始终潜伏在我们的身边。

孙金岭:你碰到像车祸一类的危险事情多吗?

再 军:在《焦点访谈》这几年,我自己就出过三次车祸。现在能够平安,浑身不缺零件,那真是一种幸运。

孙金岭:最严重的一次车祸发生在什么时候?

再 军:那是1998年初,跟《罚要依法》有关系。节目播出后,被处理的一些警察心怀不满,结果他们把气撒在了配合我们采访的车队上,把人家的车无端地查扣了。查扣以后,车主只好找我们。当时我正在郑州采访张金柱撞人事件,听了以后,觉得有义务去纠正警察的错误。然后经过请示,部里说可以做一期后续报道,我马不停蹄就出发了。返回途中,车在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上,坡很陡,地上又有冰,刹车失灵。危急关头,司机还算机灵,沉着地把车撞向了山体,才没有掉进万丈深渊,防止了一起车毁人亡的惨剧发生。大家被撞得头破血流,我也满脸是血,但侥幸没有大事,只是车彻底毁了。

孙金岭:既然付出了这么大、这么多的代价,你觉得值得吗?

再 军:这种付出,我感觉挺好。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工作,我还能做什么。能在这个充满竞争、充满前卫、充满活力的环境里工作,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个很幸运的人了,我的付出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够不够的问题。前段时间,中央决定西



部大开发，我跟部里提出过申请，我说我学的专业刚好是发展经济学，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它的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西部开发很适合我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去做点尝试，我愿意去研究这件事。同时，我认为电视不容易出学者。电视是一种很容易满足人们虚荣心的传媒，电视人浮躁的心态是一种通病，不论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焦点访谈》又是个很被人瞩目的栏目，我们出去以后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带着耀眼的光环，实际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成为新闻人，但同时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在不影响其他任务的同时，有所侧重，这不是坏事，也是我的理想追求。



☺《实话实说》策划丛鹏去武夷山出差，当地阴冷潮湿，丛鹏五天没洗澡，头发蓬松，裤脚沾泥，随行人员笑他像丐帮帮主，丛鹏满脸的不服：“我起码像个香客吧！”谁知一出门，旁边房间的客人冲他喊：“去，收拾房间，把吃剩的东西拿去给门口要饭的。”

☺孙金岭整理评论部本周生人时，无限感慨地说：“我竟然跟崔永元一般大，你看看人家！”一旁的责任编辑李长胜闻言，嘴一撇说道：“那有啥？我还跟克林顿同岁呢，都没说呢！”中心组制片人孙杰顺嘴就来了句：“基里连科比我还小呢！”



跟着感觉走

——《焦点访谈》编导黄洁访谈录

孙金岭

孙金岭：你都喜欢什么运动？

黄 洁：主要是动的就行，像唱歌、跳舞、打球啦，羽毛球、保龄球、网球，什么都打。

孙金岭：这种好动的性格是不是对你做节目有帮助？

黄 洁：我倒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动，只是觉得生命在于运动，没事可干的时候，应该动起来，包括做节目。时间总得过吧，你得把它打发掉。

孙金岭：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黄 洁：原来在深圳电视台，也是记者，做的都是一分钟的新闻，像《新闻联播》里的。

孙金岭：来《焦点访谈》有多长时间了？

黄 洁：从 1999 年 3 月份开始，经过三个月的试用后，到 6 月份开始正式调过来的。

孙金岭：也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你觉得水平是提高了还是踏步不前？

黄 洁：我不想谈这个。《焦点访谈》的每一个选题都需要研究、考虑、分析，这跟我在深圳那会儿感觉不一样，它需要研究的东西有很多。





孙金岭:但是,总觉得你做片子,做一个火一个,这肯定跟个人的天赋有关。

黄 洁:没有关系。

孙金岭:那就是跟制片人关海鹰给你的帮助有关?

黄 洁:你是说关老师?我不知道关老师怎么带别人的,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入门前我真不知道这个《焦点访谈》应该怎么做,特别是那么个时长的一个专题该去怎么构造。我在学校学的是搞报纸新闻的那种,到了电视台也是做一分钟新闻,一个专题片怎么做心里没底。刚开始时,我说这个题目可以去做,关老师会让你先列一个提纲,然后向他汇报,跟他谈你想怎么做。他会向你了解诸如你问什么、你要问谁、这个片子你自己怎么构想等等十分具体的细节。当时觉得很理解,老觉得他刁难你。后来到了现场才知道他想到了比你更深层的东西。其实我最开始的一两个片子如果没有这种锤炼的话,是做不出来的。

孙金岭:你还记得做第一个片子时你用了多长时间?

黄 洁:是指播出的还是没播的?

孙金岭:当然是制作的第一个了。

黄 洁:我现在没有太多的印象了,只记得来回可能改过好几次,最后还是没有播出。

孙金岭:为什么?

黄 洁:不知道,我也没有搞明白什么原因。反正拿到台长那儿审的,后来关老师告诉我不播了。

孙金岭:我们都知道关海鹰一向对人要求很严格,第一次做片子被毙了,他没开了你?

黄 洁:没有。我们几个一批来的,郭峰、包军昊、包括小轩,包军昊被毙过好几个呢!我倒觉得关老师对男同志比对我



2000年5月拍《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时,黄洁与摄像凌泉龙在重庆市巫山县官阳区。

还要宽容,对他们挺信任的。当时我做的第二个,还是被毙了,他就不客气地说:“不行你就打道回府。”那时比现在要紧张很多呢。做完第三个时,还是毙了,但关老师对我说了一句:“也许你会成为一个优秀记者的。”这话,我一直记着。这也可能是他没让我走的原因吧。

孙金岭:做到今天,你觉得组里氛围怎么样?

黄 洁:要是没有组里这样的氛围,可能我也不会待得这么久。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有些微的区别,前辈会说坐在这儿是一份工作,而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兴趣,我是觉得有兴趣才坐在这儿的。

孙金岭: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兴趣重要,环境好坏无所谓?





黄 洁：不是，反倒是因为环境好。说实话，我们都是自己跑出来的，毕竟不像在家里那么快乐。因此，有一个家的氛围，对大家其实很重要。至少我觉得可以适合它，至少现在我们把办公室当成家了。如果太复杂了，我可能受不了。我们办公室，我一来就感觉气氛很好。

孙金岭：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黄 洁：各位老师都特别亲切。到现在我依然感觉没有距离，也不害怕，坐在里面挺高兴的。

孙金岭：说好听的很容易。那有什么不好呢？

黄 洁：不好的？实话实说，突然让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感觉不出来。

孙金岭：那就是说十全十美了？

黄 洁：是不是十全十美，我不知道。但非要让我说不好……就是头儿看着我们闲着不情愿，老盯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儿呆着干吗？还不赶快找题去！像个周扒皮似的。

孙金岭：你讨厌他们这种做法吗？

黄 洁：我一直感觉你去打球、跳舞，去玩也好，去工作也好，其实都是消磨时间的状态，二十四小时总得过。我没有太把工作当成是一种工作，觉得它跟玩、跟说话，都是一样的状态。

孙金岭：来了两年了，你的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比例是多少？

黄 洁：关键就在这儿！为什么有人老说你怎么做了那么多片子？我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只好消耗时间了。领导可能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了，就觉得你这个节目完了，得赶紧找题。我觉得我的状态可能与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有时



间,还经常运动消磨时间呢!

孙金岭:业余时间你打什么球?

黄 洁:什么球都打。

孙金岭:保龄球可是高档消费品呀?

黄 洁:孙老师不经常运动吧?保龄球现在一个小时六十元钱,你不要赶贵的时候去,找那个便宜的二十元钱一局的你。

孙金岭:什么时候便宜?

黄 洁:白天。

孙金岭:白天:你有时间吗?

黄 洁:怎么会没有时间呢?其实在北京有很多空闲时间。你想想,做一个片子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长度,我一个月做两个片子,而片和片子之间有多少空闲时间?两个片子总共加起来大概花个十几天,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都没有事做,就是玩的。我做片子时是没有白天黑夜可言,但是一旦做完了活儿,空闲时间天天是礼拜天,玩的时候也比较开心。

孙金岭:咱俩的聊天中,你一直在用“感觉”这个词,你相信感觉吗?

黄 洁:可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惯用的思维方式吧。我不知道别的,就是凭感觉。

孙金岭:那你做节目也是凭感觉吗?

黄 洁:做节目一般来说是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才去,这大多都不需要我做太多的判断。但在采访时,我特别怕跟采访对象事前有交流,一旦交流了我就觉得我下不了手了。因为,什么事情他都会有他的说法,会有他的一点点道理,哪怕是不对,他也有他的一点点道理,一旦他跟你解释了,跟你做交流了,我就很难去采访他,至少心理上已经感觉这个人其



实也不一定坏到什么程度。这种感觉我真的无法表达。

孙金岭：你做了这么多舆论监督的节目，有人找过你，吃过饭吗？

黄 洁：我最怕有人找。因为我觉得让我特别不开心，也失去了成就感。在《饼干吃出工业油》的节目里，河南那个卫生局的工作其实不错，其他地儿都查不出来问题，就那个地方的卫生局查出来了，她查出来倒好像是反面典型了。当时局长是个女的，节目播出后她打电话给我说：“你真是害了我，我们都是女人，我也五十岁了，我做的工作不坏，可现在全部都来找我，压力很大，我看我也干不成了……”我听了真的无言以对。但是，如果你不拍她，她要是不查那么，现在整个河南该有多少这种丧天良的事情存在呀！还有一个是贵阳某地方砍伐天然林节目里的老人，当时他真把我当学生了，讲了他砍林的情景。片子播出后我又去了他家，我到时他已经进监牢了。他跟门口的看守说：“你们不要抓我，那个小女孩儿会来救我的。”那个看守说：“就是那个小女孩儿害的你！”他看见我后说：“我也理解你们，没事，小姑娘，我就是要求严惩其他也这样做的人。”面对他那么的宽宏大量，你真的是觉得……当时我站在那儿根本说不出话……

孙金岭：是不是节目把握的尺度不好？

黄 洁：应该说他们确实也是不对，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还是属于善良的一种……

孙金岭：这种事固然是一个遗憾，不过可能更多的是机制上出现了问题，与你无关，大可不必难过不安。

黄 洁：但让人在感情上非常不平衡。所以，我现在形成一种习惯，不愿见采访对象，也不喜欢在采访地逗留。去了就走，反正我也不来了，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眼不见心不烦，



就更别说吃饭了。

孙金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这种善良的面孔在暗访中迷惑了善良的采访对象？

黄 洁：暗访时，可能我会比其他人的优势都要多一点。



青春的灿烂，是一幅画，而青春的工作，就是那画魂。每当工作起来，黄洁总显得兴奋异常，同时也感染着自己的同伴。

因为，对方不会想到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感觉倒像小孩子那种。所以，采访起来，顺利一些。

孙金岭：那你跟摄像有交流吗？

黄 洁：不管跟谁搭档，我感觉每次出去工作都很愉快。

孙金岭：他们是不是都挺牛的？

黄 洁：在我看来，这些摄像都是挺优秀的。真的，他们就





像大哥哥一样,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我出去不太认路,有时还做挺危险的事,特别是有时晚上我一个女孩子对住在陌生的地方特害怕……他们就像大哥哥一样宽慰你,让你有种安全感。

孙金岭:他们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遗憾的地方?

黄 洁: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肯定要说我不肯说实话,我真的说不清楚有什么让我不满意的。至少跟我合作过的,我没有碰到过不愉快的事。

孙金岭:你在过去的两年做了几部片子?

黄 洁:没具体统计过,好像有二十多部。

孙金岭:做了这么多的片子,并且反响很大的也不少,是不是钱也挣了不少?

黄 洁:有人感觉《焦点访谈》的记者应该拿很高很高的工资,其实跟别人想象的不一样,不过我拿的工资够我花的。

孙金岭:多拿一些难道不更好吗?

黄 洁:那在心理上也许是一种平衡。管它多或不多,反正都是这回事,能拿更好,拿不多也照样活着。

孙金岭:现在有不干的打算吗?

黄 洁:现在倒没有。因为我一直是借调的,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孙金岭:那你对将来怎样打算?

黄 洁:没想过。走一步算一步,逼急了再想。无非是要不然回去,要不然辞职在这里干下去。真到那一步,我可能得认真想一下了。

孙金岭:假如说留在这儿,你希望这里给你什么条件你就可以满足了?



黄 洁：工作环境，工作本身硬件再好一点。比如，每个桌上有一个电话。在深圳的新闻媒体，这些硬件设施是不错的，他们有时过来看我，都奇怪：怎么《焦点访谈》会这样办公？现在办公室那么多记者在等着用长途电话，只有一部。

孙金岭：这些小问题，肯定不是你留下的先决条件吧？

黄 洁：从工作的角度讲，谁都愿意留在这儿。但是，从生活的角度看，我觉得深圳比较好。如果让我选择工作，我会选择这儿；如果要选择生活，选择深圳也许更好一些。当然，在北京如有一个感觉特别不错的人相伴，可能就又不一样了。

孙金岭：做了两年节目之后，你得到了什么？

黄 洁：得到的太多了。至少我学会了怎么去应对一些事情。这是原来在学校写论文时得不到的，也是我在社会中没有实践过的事情。现在做节目压力那么大，要求你百分之一千的准确，真的很害怕出错。这逼着你要做研究，做到心里有数，学会应对任何事情。这一点对我这个年龄很宝贵。

孙金岭：那么你失去了什么？

黄 洁：没失去什么东西。在学校是这样的状态，在深圳也是这样的状态，在这儿还是这样的状态，差不多。

孙金岭：那你缺什么？

黄 洁：缺房子住。

孙金岭：不缺钱？

黄 洁：肯定缺钱，有钱就可以买房、买车了。

孙金岭：那这样说来，你的钱肯定不够花了？

黄 洁：我觉得人可能都有个目标，比如，我有了太多的钱了，什么都能买了，什么都能干了，也就没什么欲望了，没什么意思了。现在就拿这么多钱，我就会有一个目标，今天干

什么,明天干什么,好像有一个奔头了。

孙金岭:你一个小姑娘,出门在外,父母担心吗?

黄 洁:我爸爸、妈妈老是警告我要小心。他们特别不支持我做这些事,老觉得在《焦点访谈》特别危险,加上我做舆论监督的节目多了些,我有时候想起来挺后怕的,特怕有人会报复。有时感觉也很矛盾。

孙金岭:你觉得付出跟所得成正比吗?

黄 洁:没觉得我付出了多少。做一个《焦点访谈》的记者感觉挺好的,我喜欢这份工作。



☺—观众来信全文照登:

敬一丹、方宏进同志:您们好。

公民有没有喂养小京巴狗的权利?我养了一只小京巴,一年多来陪伴我,给我晚年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更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小京巴听话,叫敬礼就敬礼,叫作揖就作揖。一天,下大雨没法出门,又没上厕所,就在大门内尿了,我拿起鞭子打它,没想到它竟连连作揖,我心疼的不得了……可现在市里规定要办养犬证,费用三千元,还有一千元年审费(是人办身份证的两百倍),办证手续及证件共十项(比外国人人中国国籍还多),否则小京巴狗就要被捕杀,这不和我的孙子出外摔死一样吗?杀的是狗,刺伤的是我的心、我的精神啊!

请你们献一片爱心,救救小京巴狗吧!

徐州一高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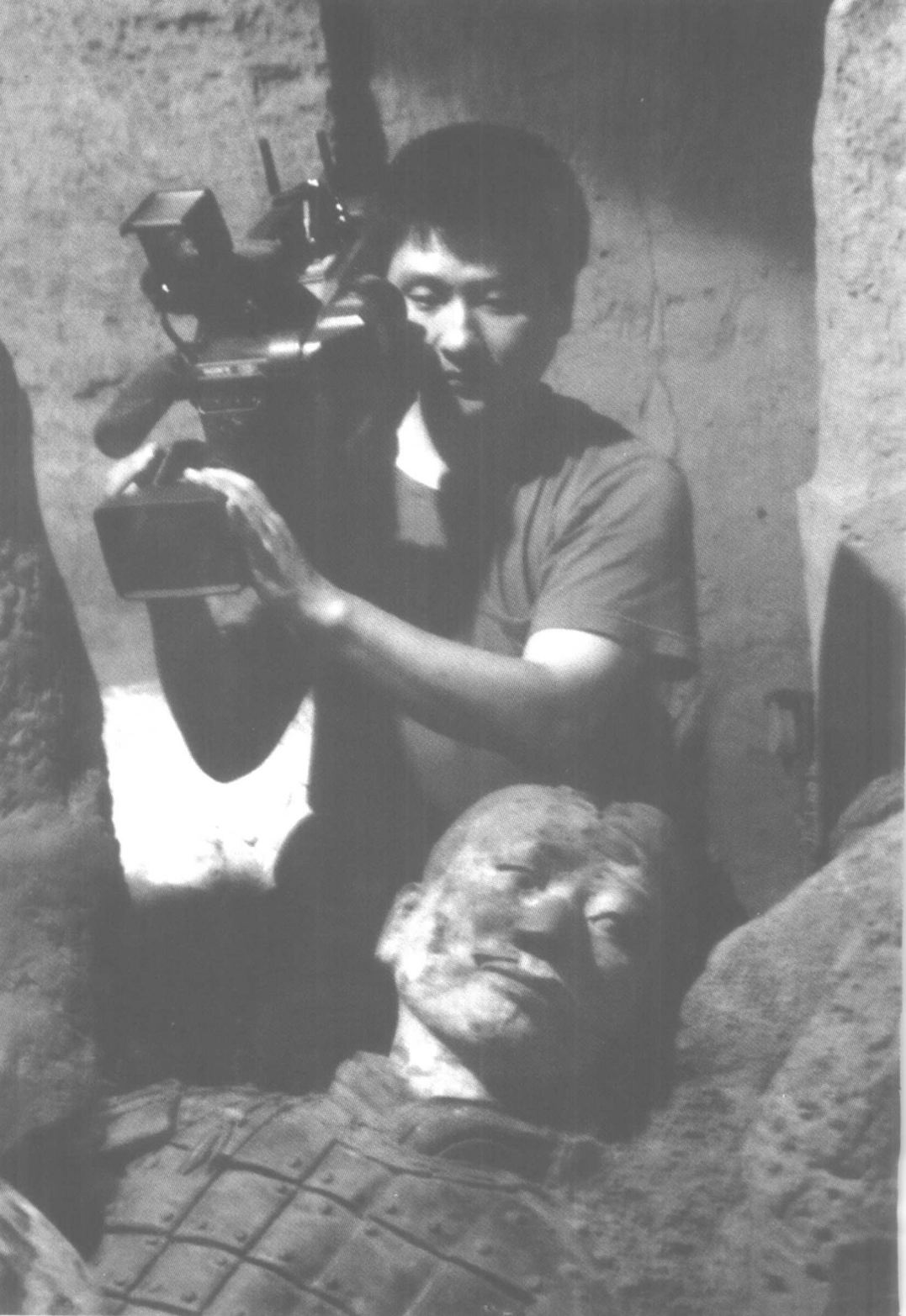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画外有话







与张君面对面

再 军

如果有人问我,最难“访谈”的是哪一类人,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犯罪嫌疑人。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在与记者见面之前,已具备了一定的“反提问”能力——几天几夜的不让睡觉,各种方式的循循善诱,压力巨大的心理暗示……等等,早已见过。面对不温不火的记者,出于渴望减刑的本能,他一般不会比在警察面前“发挥”得更好。张君,这位以武力和跳跃的方式横行渝、湘、鄂几省市的抢劫团伙的首犯,也是这样的一位犯罪嫌疑人。

三十四岁的张君,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三至五岁。最初坐在离他不到两尺的对面,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防着他伸手过来掐住我的脖子,而把我当做人质。好在重庆看守所早已重兵守卫,我采访时,他的周围或站或坐有五六个武警。在坐定后的半分钟,我初步打消了这种恐惧。我发现,他很少与我对视,不知道是“邪不压正”,还是我当时的面孔比张君看上去还吓人。

采访犯罪嫌疑人,一个要命的尺度是尽量避免让他在话筒前、镜头前趾高气扬,张君尤其如此。他的凶狠残暴、他的杀人如麻早已被各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重庆警方起初对我们的采访一概回绝,但经过我们耐心工作,使我最终与张君



面对面。

“我知道你不怕死。”张君显然没想到我会用这样一句开场白，他半晌无语。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从哪里来？不告诉我，我当然拒绝回答你的问题。”我也显然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回应。从这点上



穷凶恶恶的张君终被押上了审讯台。

说，他比我们采访过的很多贪官污吏更会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从北京来，想给你一个说清楚自己的机会。”为了不燃起他更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我故意收起了台标，让他搞不懂我们的身份。

“我肚子疼，送我回监号！”他显然在耍赖。

“你不是凡事都敢作敢当吗？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怎么什么都还没开始，就装起熊来了？！”这种激将或许是最后一





招儿。

沉默。

“我知道你不怕死，我知道你不怕枪口，我也知道你并不怕警察，但是，我知道你怕一样东西……”

“是什么？”张君有些吃惊。

“想知道吗？”我说，“你怕别人对你好”。

沉默。

“你给自己女儿起的名字挺好听的，叫旋如。怎么想到这两个字？”我故意提到了他和涪陵的情妇生的那个小女孩儿。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见到你在湖南的两个儿子了？”挺俗的问题，但是，张君也绝非不俗之人，几句话下来，他已经习惯回答我的这些问题了。

于是，他谈到了“陈乐（常德的一位坐台小姐，为张君藏了至少十几支各种枪）是我喜欢的女人，她对我那么好”。

于是，他谈到了“我对不起在老家的妻子，她为我养了两个儿子”。

于是，他谈到了“我不神，但应该算是初步的智能化犯罪”。

于是，他还谈到了“像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抓到了，中国警察还是有能力破案的”。

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多小时。

在谈到对不起这对不起那的时候，张君竟然还使劲抽了自己两个耳光——至此，我觉得他无论如何不会掐我了，感觉上他好像要扑到我怀里大哭一场似的。

“同志，当然我现在没资格叫你同志，不过，我还想向你提个要求。”刘庆生已经开始收拾设备，张君突然又对我说。

“什么事儿？谈吧。”

“能不能让我再跟陈乐说几句话，你们带给她。”

于是，又是一番痛心疾首的儿女情长。



在与张君同时有关系的十来位情妇、小蜜中，陈乐是他最愿提起的，光跟我，他就说了半盘带子，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在那期访谈节目中没让用。

采访结束时，我想起了张金柱。几年前，我和杨明泽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让怀抱氧气袋、鼻插氧气管儿的犯罪嫌疑人张金柱在镜头前开口。而比他凶残得多的张君，却没能逃过我们的俗套。重庆警察就是厉害，即使都是犯罪嫌疑人，尽管都姓张，警察也棋高一筹。

采访过张君的几天后，我特地到常德看守所“采访”了陈乐。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让张君临死都“痴心不改”的女子，似乎很面熟。哦，对了，她简直是评论部的谁谁——嘘，想知道答案吗？到我这儿来看素材吧！



张君的情妇陈乐(右)。从这张秀丽的脸上，人们很难看出罪恶的影子早已覆盖了她的灵魂。



攻关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刘义长

2001年3月16日凌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特大爆炸案,共导致一〇八人死亡,三十八人受伤。一时间,全国震惊,世界瞩目。

3月23日晚,紧急通知,明天出差,前往石家庄市采制“3·16”特大爆炸案。我心中一阵窃喜,为自己能有幸一睹石家庄特大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靳如超的庐山真面目,为能亲身经历这难得的历史一瞬,也为刚成立的机动组能承蒙各位领导及同仁的厚爱,用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机动”一把,小试牛刀。

是信任,也是挑战,机动组每个成员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上网查资料,收集线索,部署作战计划;联系采访事宜,一切紧张有序,有条不紊。3月24日清晨,机动组以制片人翟树杰带队,包括我和摄像玉虎,火速赶往石家庄;小崔、摄像张予北赶往广西、云南,其余人等在家镇守。

中午十二点,石家庄白楼宾馆一房间内,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拉开序幕。对阵双方,一边是《焦点访谈》机动组制片人翟树杰等,一边是以河北省省委领导带队的一干人,其中包括河北省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士儒。一番唇枪舌剑,霎时“硝烟四起”。很少近烟的制片人翟树杰不停地抽烟,脸上的笑容渐趋僵硬,我的心也一点点往下沉,满心的希望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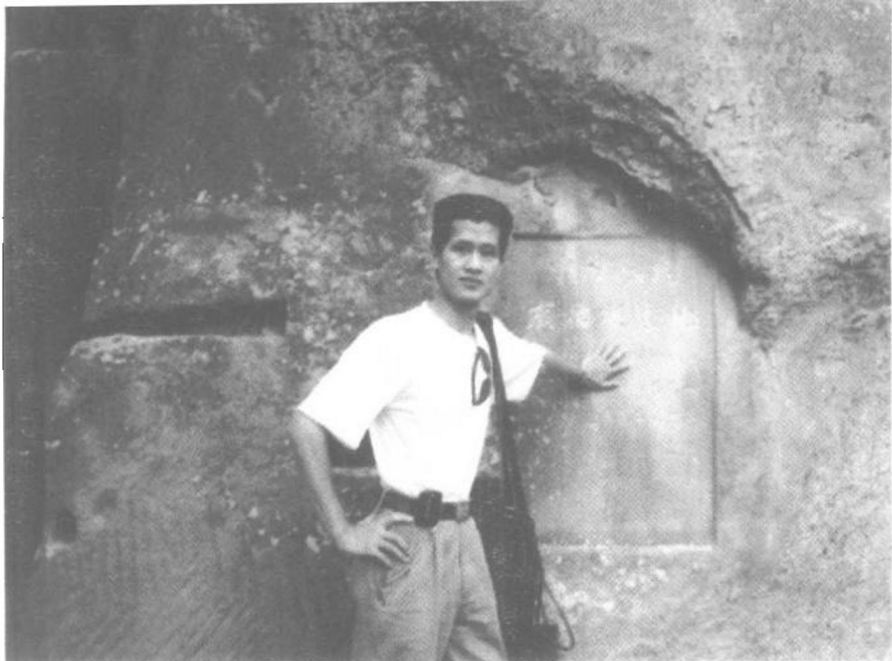


能变成彻底的失望，难道就这样打道回府？

“现在受伤人员和死亡人员家属的安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太多，矛盾太多，我们担心现在报道会引起群众和政府的对立，导致社会动荡。最好能选取一个好的角度，避开这一点，或者干脆等法院宣判以后再报道。这一次我们也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河北省某地的村民自治搞得不错，你们就把这采一采吧！”河北省省委领导临走前丢下这样一句话，意图很明确，只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没有把话说死而已。

怎么办？是放弃，还是坚持？翟制片人一边与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交流看法，寻找对策，一边在笔记本上飞速地记录着。突然，他毅然地掐灭了烟。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既然领导没把话完全说死，我们何不从重大刑事案件告事破入手，表现全国警方通力合作、英勇无畏的正面形象，不涉及敏感问题，这样鱼翅和熊掌二者可兼得。又是一番唇枪舌剑，又是一阵硝烟弥漫，两全之策渐露端倪。于是，写出书面报告，当面呈送河北省委领导。





刘义长手摸“中国人民广播诞生地”的石刻，想起了加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之前的日子。

坐在宾馆的房间里，我们忐忑不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翟制片人依然不见踪影。晚上六点左右，在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士儒的陪同下，翟树杰面带微笑地出现在房间里。OK，我们禁不住一阵欢呼！

恰在这时，河北省公安厅传来消息，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靳如超已在3月24日下午被押解回石家庄。于是，我们连夜赶赴看守所采访靳如超。首家重大新闻到手，我们吃下了定心丸。第二天上午，采访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金国等。有意无意中，我们拓宽了采访领域，进一步丰富了节目的内容。

3月25日晚六点，我们赶回北京。此时，云南、广西的素材带也传了回来。一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制作，粗编完毕。3月

26日上午,小申采访公安部有关领导。下午四点,审片一次通过。

躺在地下室制作机房的沙发上,彻夜加班加点的疲劳开始波涛汹涌,一天没吃饭的肚子也发起了最后的猛攻。晚七点三十八分,《天网恢恢罪难逃——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侦破纪实》如期播出。霎时,一股甘甜的清泉流遍全身,所有的苦和累都化作了泡影。

看完片子,刚回办公室,梁建增主任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节目播出当晚,热线电话不断,好评如潮。一位名叫陈家伟的先生来电话说:“节目做得非常好,播出及时。以前从网上看到一些消息,都不全面,而且有的报道疑点重重,有人怀疑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和法轮功有关。《焦点访谈》的节目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

😊 策划孙金岭的名字常被人顺口叫为“孙经理”。新来《新闻调查》的吴海蔓闻之,若有所思。偶与广东旧同事通电话,对方问她对北京印象如何?海蔓想想深沉地说:“这儿不愧为中央,改革的力度真大,称呼人都叫‘经理’啦!”

😊 《子夜》筹备组的李成,初来乍到,用词很有个性。有一天,他与郑蔓茜合片,把开机称之为:“你给我弄着了。”把画面定格叫:“就要一大片的。”把拍摄喊成:“你给我照个影。”





疑难案其实并不难

范本吉

发生在 1998 年 11 月 27 日的执法干部郑依清被歹徒殴打致死的案件,在福州被称为“11·27”案件,因为它是由打击私屠乱宰引起的,所以又称“猪案”。在福州一提“猪案”,无人不晓。

当我们知道这个线索时,只是觉得在公、检、法部门常碰到的疑难案件里,这事“难”得有点邪乎。暴力抗法,伤人致死,有主谋策划的,有通风报信的,有动手殴打的,还有什么可难的呢?但就这么個案子,一拖就是一年又九个月。有难点,也就有戏了。

对于我们每一个做节目的编辑来说,确定选题后碰到的第一关就是采访关。如何能在采访的短短几天里克服重重障碍(人家故意给你设置的),把要采访的材料拿到手,这里面的艰难曲折、斗智斗勇、甜酸苦辣,相信每一个做《焦点访谈》的同仁们都有切身体验。正所谓,顺利的节目都是相似的,不顺的节目各有各的不顺。长途奔袭,咱是两个人外加机器一台,人家是公、检、法再靠上人大——执法部门、审判机关加立法机构。在这里,细说采访艰辛,显得没啥味道——大伙儿全是这么过来的。

一句话,采访拿下来就是胜利;另一句话,拿不下来决不要轻易回去。这是 1998 年我和摄像康锐大战江西抚州时留下





的规矩。

就这个节目而言,除了采访的艰辛之外,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片子的结构和素材的取舍。我们节目的主角叫刘用莺,乃当地首富,人称“猪霸”。他的叔叔是福州市的一位领导。这个“猪霸”称得上是有钱又有势。采访中我们发现,公、检、法外加大,每个环节上都有人护着他。为做这个节目,我们拍摄的素材比平常几乎超出一倍。最后编辑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该说,又不能什么都说。

《焦点访谈》只有十一分钟的时间,十一分钟要求说故事,十一分钟要求说大事,十一分钟还要求说层次(有一定深度)。所以,编好一个片子可以说是十一分钟的难题。过去我们传统的习惯是就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件事层层剥茧式的挖下



再难啃的节目,没有难住过范本吉(右)。看他采访时的劲头,你就明白了这话不过头。



去,这样的片子比较好看。在这个片子里我所面对的这些材料和所要表达的主题,显然不能这么处理。编辑的时候,试着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就是在公、检、法、人大每个环节上选取一个典型的情节,结构上形成明暗两条线索:明线就是沿着侦察、审查、起诉、审判一系列环节,走到哪儿都碰上一个“难”字;暗线就是在这几个环节上,走到哪儿都有人保护他了。这一点相信大家在看片子时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

新闻作品不是文学作品,但典型的情节、典型的细节都是具有同样的表现力的。我们回头看一下,当刑警队长被问到为什么不按规定监管刘用莺时,他说“这个我不好讲”,随即露出意味深长的一笑;人大主任对自己无视法律的做法说“我只能解释成疏忽”时,那苦瓜似的表情;检察院的起诉科长被突然问了句谁是主谋时,那无言以对的满脸茫然……这些细节不都是非常发人深思的吗!如果说这个片子还有些感染力的话,当首推这些细节的选取。

最后说说这个片子的结尾。我们过去制作节目,常常为了体现“权威性”,而在结尾时请一位大头头出来发言。这次我们没有这样做,希望采取一个更加电视化的结尾方式。节目的开头是由“猪霸”入场开始的,结尾又呼应了一下。当“猪霸”刘用莺挺胸腆肚、大摇大摆步入法庭时,这时的形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在这段画面上还压了一句解说:“这是犯罪嫌疑人吗?”这句话是在我转录资料带时,一边旁观的敬一丹大姐看着“猪霸”的骄横脱口而出的,权作敬一丹大姐的场外评论吧。

我想,这也代表的是百姓、是观众的心声。

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在福州尤甚。当地电视台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第二天中午又转播了一遍。我想,我们决不是什么“焦青天”,只不过是凭着勇气、毅力,靠着中央台这棵大

树才能说出点亲快仇痛的东西来。这个片子里所反映的执法人员被猪贩子打死固然令人愤慨，而事后各个环节上对“猪霸”的百般庇护更加令人义愤难平。就像一位哲人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还要严重。我们《焦点访谈》做过的此类节目的意义，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摄像王守成“就这样照吧，怕什么？谁让屋里没空调！想想英雄飞行员王伟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咱这点苦算什么呀！”





生命的代价

陈新红

最近，碰巧做了两个节目都涉及到罪犯，说来更巧的是两个罪犯都在逃亡，被抓时都是因为他们的女人。

《逃亡日记》中的赵军，拎着一箱子钱踏上不归的逃亡之路，最终因为想见自己的前女友一面，冒险约会而被捕；《扫黑》中的黑帮头目叶成坚狡猾沉稳，抢劫案事发后从澳门潜回内地，逃窜大半个中国，横跨十几个城市，公安没把他逮住，最后因约见自己刚生孩子十几天的老婆被抓捕。从两个人被抓捕的过程可见，情义在他们的心里所占据的位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们身上善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他们同样都走上了自绝之路，因为，在他们的性格里，人性恶的一面得到了放大，扩张的贪欲超出了自我能力实现的极限，最后只能通过犯罪来实现所企求的一切。

人的一辈子有很多的欲望需要去实现，关键是怎么去实现。人生的游戏规则必须遵守，否则你将付出代价。赵军因贪污罪被判死缓；叶成坚因杀人、抢劫罪被判死刑，他们付出了青春或生命的代价。赵军现年二十五岁，叶成坚三十八岁，青春的浓缩，生命的停息，是否早了一点？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赵军是否会在他经理的位置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奋斗，最终实现自己的爱情梦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叶成坚会不会金盆洗手，把他的聪慧用于其他行当，同



样也能出人头地，荣华富贵？现实是没有这些如果。赵军一夜之间拥有了一百多万，想去迅速圆女朋友曾说过的实际生活，那是一百万、一栋房、一辆车的梦想。叶成坚为了称霸江湖，无视黑、白两道之规则，管他是谁，想杀就杀，想抢就抢，一年四季穿着防弹衣，拎着脑袋搏杀，最后落得黑、白两道人人喊打。

我们处在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欲望过剩的时代。小鸡可



以电孵加速生长，蔬菜可以在温室里速成反季节上市，不过到头来是鸡没鸡味，菜没菜味。人呢？一夜之间由贫民变成富翁，几年、数月甚至几天，尽享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美事是否来得太容易？人们常说好事来得早必定是个套儿，一不留神你掉进了套儿里，就不得不用一生作为代价。

人活一世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图名、图利、图享受，你要的越多，付出的就越多。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平实的生活态度是否更重要？怀揣理想，努力生活，生活会不会更真切？



采访《逃亡日记》中的赵军和《扫黑》中的叶成坚之后，给我们留下一些经验。

和罪犯打交道，首先要摆正的是我们的位置。我们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审判官，要让半辈子将在监狱中度过或面临死亡的人和你吐露心声，你必须明确采访者与被采访者是在进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谈。尽管他是罪犯，但也有人权，他可以拒绝和你交谈，即使他不得不和你交谈，他也完全可以敷衍几句。《逃亡日记》开拍前，编导和记者先期到了赵军服刑的河南省第一监狱。当管教干部领着赵军来见我们时，赵军见了陌生人显得特别拘谨，为了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请管教干部回避一下。跟赵军说明我们的来意，并告诉他我们愿意像朋友一样和他聊天，倾听他的叙述。赵军听我们这么一说，有些惊异，僵直的表情马上松弛下来，连声说谢谢。他明显感到我们对他的尊重，表示很愿意和我们聊一聊。他说由于自己性格比较内向，很久以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朋友说话，内心的孤独、苦闷无法排解，好在平时有爱记日记的习惯，由此来宣泄自己郁闷的情绪。赵军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说能有这个机会把自己所经历的事说出来，让后来的人作为一种经验或从中吸取教训，这是他愿意做的事。坦诚的沟通为我们后来顺利采访赵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是罪犯，也有倾诉的欲望，只要有谈话的空间。这在我们采访《扫黑》中的叶成坚时感受更深一些。

在叶成坚案进行二审前，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匆忙赶赴珠海。因为听说一审叶成坚被判死刑，情绪很差，很多传媒要采访他都没有成功，而我们《扫黑》这个节目肯定特别想采访到叶成坚，如果也同样不能的话，那节目就很难成立。

距法庭审理只有半天时间了，我们采访叶成坚要办理很多手续，叶成坚虽被关在珠海，但珠海法院、看守所无权安排我们采访他，就连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开这个口。对叶成坚进行二审的时间很快就到了，眼看采访要放弃，好在广东省警方和我们通力合作，最后报告打到了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亲自签字才准许我们在二审以后进行十分钟的简短采访。十分钟怎么够呢？也不知叶成坚当时的情绪怎么样？如果采访不成功，节目怎么做？一系列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绕，后来一想就这十分钟也是特批的，只有我们能独家采访叶成坚已经是不错了。

二审时，叶成坚被维持死刑判决，我注意到他的情绪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落。他所有的团伙成员都像蔫了的茄子个个垂着头，只有叶成坚昂首挺胸，不时地用阴冷的眼光看一看对着他录像的摄像师陈威。我见叶成坚穿了件雪白的衬衣，头发一丝不乱，想来事先经过精心整理，在这一刻他也没忘了保持黑帮老大的形象。

二审后，我们赶紧对叶成坚进行了采访。叶成坚先是对传媒进行一番讽刺，然后又说要谢谢传媒。主持人王志问为什么要谢？叶成坚说在他的案件还没有审理时，就有报纸说他罪大恶极，没有按法律程序来办事。好在见多识广的王志以坦诚的态度，两三个问题就把叶成坚的戒备心理打掉，随后倒是叶成坚谈兴渐浓。只可惜十分钟的采访时间已到，叶成坚还意犹未尽。王志笑说希望以后还有时间再聊，叶成坚也很高兴，连声道谢。

看来叶成坚和记者的谈话比较投机，我们抓住机会希望下面努力找各方协调，争取在看守所里再对叶成坚进行采访。有关方面称困难挺大，不知叶成坚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因



为死刑已定，他的情绪可能不稳定。我们说跟叶成坚讲一讲，就说我们采访过他，还想同他进一步聊一聊。对方答应征求一下叶成坚的意见。接下来我们等着回音，两三天过去了，没有消息，我们想可能没有希望了，后来又经广东警方的努力，采访才得到准许。

采访叶成坚时，叶成坚的情绪很稳定，他和王志的谈话确实很投机，你问我答，很放松。正如广东警方官员称叶成坚是职业犯罪里的“佼佼者”，他的智商的确不低。采访中他不时抓住时机为自己辩解，涉及到作案的事实时，他强压内心的躁动，在不断的否认中眼里露出阴冷的凶光，和他的眼神对视，你会有一种颤栗的感觉。当然，他的目光偶尔也会很温和，这就是谈到他儿子、妻子时。当记者问他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约见澳门的老婆时，叶成坚说，他老婆刚生小孩儿十几天，生孩子时他不在，而且小孩儿又有先天的残疾，老婆约他见一面，商量给孩子看病的事情，如果这个要求都不答应她，还是一个人吗？原以为黑帮人员只凶残冷血，不料他也有儿女情长。可见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不然，在叶成坚几次受审时，他在澳门、香港、内地的几个老婆不会每次都聚集法庭，为他哭喊流泪。

叶成坚让我们手下留情，别像其他一些传媒把他几个老婆和儿女的事也做详细报道，他也不想谈及他的亲人，因为，他对她们的伤害已经太多了。叶成坚在黑道以凶残冷酷出名，在家里也不想让亲人与黑道有所牵连。他深知险恶，为此他让独生子远离自己在香港生活，而他则在澳门搏杀。他想的是有朝一日称霸江湖，出人头地，待捞取足够的钱财再退出江湖，移居他乡生活。没想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最后不仅落得一场空，还要赔上一条命。



打进内部

张林刚

2001年5月10日星期四，是我儿子奥伦打预防针的日子。早上八点三十分我和儿子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手机响了，是黄洁打来的，通知我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飞河南。

我一听去河南拍片，就气不打一处来。两个月内三个片子都折了，这次是否又会重蹈覆辙呢？“爸爸，爸爸——”儿子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小儿子奥伦才两岁零三个月，还没有意识到爸爸这次是带他去打针，他不停地问：“爸爸，我们是去看大鲨鱼还是去看长颈鹿？”听着儿子稚嫩的声音，我心里一直很愧疚。没有办法，谁让爸爸是一个被柏杨叔叔逼着干活儿的记者呢？

中午十点，我赶到了办公室。制片人柏杨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你们两人要认真配合，争取打个漂亮仗。”此时，我在心里仍嘀咕：去河南还能拍成片子？拍不成又不算工作量，唉，就当我去河南玩一趟吧！

下午两点，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郑州机场。租了辆车我们就往濮阳赶，司机告诉我们去濮阳需要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坐在车上望着一片片还没有成熟的麦地，突然感到这时候乡政府让农民交“公粮”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可做，一路上沮丧的心情似乎有些振作起来。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到了清风县城，黄洁找到了“线人”



老×。他告诉了我们这次政府下乡活动的具体路线。黄洁说：“我一定要打入‘敌人’内部，老×，你找几个老师带我们进入到收缴公粮的队伍中去。”老×说，这样可能不行，因为你们是外地人，乡领导肯定能认出你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只能拍老师们集合的情况，然后租车跟在缴公粮的车队后面。看样子也只能这样了。

11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左右，黄洁打来电话说她的房间进了小偷，我迅速拿了块大电池冲进黄洁的房间，结果小偷已经跑了。黄洁说：“满脑子都是怎样制作这个片子，加上三点就要起床，因此，也就没睡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安慰了她半天，又叫来保安，将窗子都关好。这时，我们又该出发了。

凌晨四点，我来到乡政府大院。小小的院子集合了有三百



摄像张林刚
与编导黄洁不仅是节目上的黄金搭档，而且在保龄球比赛中也配合默契，一举夺得《焦点访谈》记者一组的混合冠军，真是让人羡慕不已，而又百思不解：怎么两人干吗吗行呢？

多人。我在朦胧的光线下看到车子上的标语：“重拳出击搞严打”、“警民联合除邪恶！”突然，摄像灵感油然而生。跟着老师们吃完公粮饭，我就出去在外面转了转。这时，有一个领导用小喇叭通知：高堡乡××村的上九号车、八号车。我随着教师队伍也上了九号车。在车上干部看我像老师，老师看我像干部，所以也没人理我。我悄悄打开机器开始拍摄教师的谈话内容，既然上了车，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开机、关机数次，竟然没人发现。但我认为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这次拍摄，因为一紧张就把开机和关机弄反了，结果拍出来的全是不想要的。

黄洁此时坐在我们租来的车上，一看大车队出来了，也拿起大机器拍起来，结果机器没有调好，用的是一色片，虽然也拍了不少，但能用的不多。事后我为此一直内疚，我应当事先告诉她怎样拍摄。

车队一进村，缴公粮的人纷纷下车，乡干部个个斗志昂扬，简直像“文革”时期的打手；老师们则像受气包，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村里的农民最惨了，个个像即将被宰割的牛羊，哆哆嗦嗦不知怎么办。我拿着公文包夹在队伍中，老百姓大概觉得我是干部，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一个羚羊遇到了要吃它的狮子。此时，我真想说农民兄弟怎么这样苦啊！

一天半的时间里，拍了七个小时的素材，真是创了我历次拍《焦点访谈》节目的记录，黄洁也创了她睡觉时间最少的记录。片子拍完之后，柏杨一直同我们一起编辑、制作，待片子完成时，他那紧绷绷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当片子播出时，柏杨、黄洁和我也许只有一个想法，我们得回家好好睡上一觉。





暗访的尴尬

肖 津

2000年12月底接到任务，赴南宁拍摄一个打着会议的旗号进行公款旅游的节目。刚刚接到任务时还是欢天喜地，认为自己摊上了一个大大的馅饼——借打击公款旅游为名，行公款旅游之实，岂不美哉！然而，采访开始后才明白，扒开馅饼的糖衣之后，里面竟是一颗难以下咽的“铁疙瘩炮弹”。

并不轻松的“会议”

这次会议共历时八天，除了一头一尾是报到和返程外，只有一天的会议，剩下都是旅游，包括北海一天，越南四天。这样好的安排，却把我和摄像吕少波折腾得疲惫不堪。

首先，从下飞机开始就打开摄像机，出机场、接站，与会议主办者寒暄……均如实纪录。其间有几句处心积虑的话特意问来问去，真真累煞我也。

回到宾馆后，我们马不停蹄赶到会务组，交钱、开发票，工作人员点钱、入账……来参会的人很多，挤来挤去。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取得最佳的拍摄角度，我在财会人员旁边百般拖延，大约问了如下一些废话：会务费是多少？能便宜吗？不能呀？为什么不能？就是不能？为什么？没为什么？没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呢？要不您再问问？为什么不问？不问白不问？问了也白问？白问谁让问？问了也不能？……直到吕少波捅了我一下，暗示





拍摄完毕，我和财务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的会议当然也是拍摄的重点，我们特意选择了靠边的座位。四个多小时的讲座中，我们像老鼠一样东张西望，偷偷摸摸，趁人睡觉打盹儿之际，疯狂地推拉摇移。为了便于后期剪接，吕少波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蹿上讲台，拍了几个大全景。以至于后来有会议代表问我：“你们主任（我们号称是某艺术公司的主任和副主任）真逗，这会议有什么好拍的？”我陪着笑脸回答：“他这人就是这样，俗话说的‘烧包’，有个小摄像机就不知天高地厚，连我都烦。”而此时吕少波的目光差点将我瞪死。

随后就是最令人兴奋的旅游考察活动了。我们那小小的、可怜的私心，在此之前曾绽放得如花朵一般，可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才发现，花朵凋谢后结出的竟是一个大苦瓜。

唉……

并不快乐的“旅游”

为了扩大接触面，我和吕少波已经定下了自己的工作计
划：我要尽力做到，每上一次车就换一个同座，换一个同座就
采访一个同座；吕少波每天晚上换一个同屋，换一个同屋就采
访一个同屋……结果是，我们在这中间都承担了巨大的心理
负担。

我们暗访的对象，不是凶狠奸佞之徒，而是我们的旅游伙
伴。人在异乡为异客，此时最容易结下真挚的友谊。为了拍到
最鲜活的素材，我们必须和其他会议代表建立融洽的关系，结
果自然是双方产生了真挚的友谊。有了友情还怎么暗访？所
以，四五天的旅途中，我们一直徘徊在痛苦与快乐之间。

在节目中，观众看到的几个会议代表，他们说出令人可气



又可笑的话，但在生活中，他们也有可爱的一面。

代表一：赵××，女，某大学的教授，是我的同屋。片子中她说：“公款旅游贵也合适，国家报销就合适。”实际生活中她是个怎样的人呢？每天上车她都帮我占座；每到一家旅店她都帮我去取钥匙；旅途中主动给我照像；她还说我就

在昆明翠湖边上的留影，不会也是并不快乐的“旅游”吧。

像她的三女儿一样。她不明白我每天为什么都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最后一天非要给我按摩，被我婉言谢绝了。不是嫌她手劲大，而是怕自己的心灵太脆弱，一激动把真相坦白了。

最后一天她要走了，我帮她把行李从十二楼送到楼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她感动得要死，我知道她看完《焦点访谈》后就不会这么想了。

代表二：贺××，男，四川省某市政府办公室的秘书。片子中他说：“和旅行社出国不得自己花钱吗？会议就可以国家掏钱。所以，钱再多也值。”实际上，他能被我们抓着，是因为我上车时没有座，他把身边的座让出来给我，又和我聊了一



路的天,才说出的这些话。他在来之前就知道会务费是三千六百八十元,比跟旅行社旅游要高出两千多。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说了真话,那些话是错误的,但却是他们真心所想的。这些话,如果我们用大机器拍摄,他们肯定不会说,经过深思熟虑后也不会说,他们能对我们说,是因为他们把我们引为同道。

☺《焦点访谈》记者法展与杨明泽在云南采访,见街面摊点上卖一种状似草帽的东西,帽顶上还有一把儿。法展一时性起,把玩不已,高兴时顺手将草帽戴在头上,感觉良好。旁边的摊主笑得前仰后合。法展不解,扭头认真地问道:“笑什么?”一老汉回答:“那东西不是草帽,是锅盖!”

☺《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去山西采访非法印刷教材的某印刷厂厂长。一见面,他见老曲手里拿的台标问:“你们是中央台的?”答:“是的。”又问:“你们是啥栏目?”答:“评论部的。”厂长听后一脸轻松:“好,是评论部的就不怕,我就怕是《焦点访谈》的,你有啥随便问吧!”





保持距离

再 军

用事实说话的前提是获取事实；获取事实的路径是深入事件。

“讲故事”、“抓细节”已经成为《焦点访谈》的叙事风格、议论基础。因此,更多的时候,记者的视线和身影不断地在事例中游移,从东到西,从左到右,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物生动,让情节鲜活。

这次我们两下河南也是一样。追踪假货的通常做法是暗访。一般的暗访,“暗”的成分多,“访”的感觉少,更强调手段的隐蔽而不太敢置对方于“话筒前”,怕被识破。只要设备不出毛病(通常它们没这么娇气),大量的现场记录中,总有些鲜活可用的东西。这次到河南追踪假棉,逻辑线路非常简单——前半程为在湖北发现假棉并进行跟踪,这一阶段进展平稳;后半段去河南,提心吊胆。凡“暗”的东西总怕暴露,特别是去一个叫冯村的地方,有几个棉贩不停地问吕少波“这孩子为什么老戴着一副玻璃片(平光镜)”之后,更是心虚。而且,在从北京出发前,搞棉花打假的“中国纤维检验局”的官员叮嘱说:“河南曾因为查假棉而打死过人,就在尉氏县。当然,那是前几年的事……”此语一出,当夜无话。去河南提心吊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河南既是人口大省、新闻大省,更是说情强省。几年前,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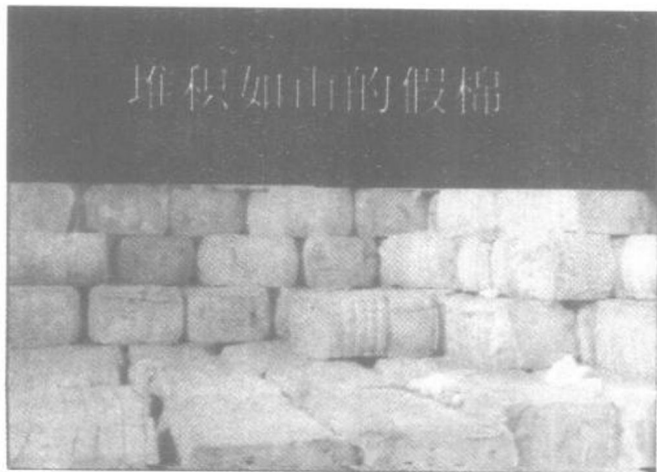
出“张金柱”时的闪转腾挪，与各种关系周旋时的情景依然在目，印象极深，不堪回首。但凡有一丝闪失，就会和很多节目一样——节目死了，人却活了。

解决这些担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两个字：准、快。下手要准，撤离要快。

果然，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整个暗访，也完成了后来节目的五分之三。吕少波的胆大心细，让素材多了很多鲜活，多了很多细节。

通常，暗访的节目是比较好剪辑的。事件的流程介绍清楚，再加些适度点评（权威人士采访），也就成了。于是，三下五除二，片子初剪完成。但却发现缺东西——距离：剪接者与素材、素材与背景之间的距离。

城里人对棉花的感觉并不准。毕竟凭票买棉线、买棉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但是，中国有很多人是靠棉花吃饭的，而且，棉花本身不可或缺。因此，通常棉花和粮食形影相随地同时被称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即便在人们异常热烈地讨论“拾金不昧者该得到多大比例的回报”、“做好人办好事也





可能有价格”的时候，棉花的整体经营依旧没有讨论的余地，照例由国家控制。而且棉花对与其相依托的纺织业，关乎生死。起初我注意到了这个层面，但没有拉开距离，留恋暗自得手之后的窃喜，注重流程本身的细节，对素材有距离地整理不充分。因此，第一版节目没有完全表现棉花“掺杂使假”（这四个字挺绕口，弄得主持人方宏进那两天经常口中念念有词，以防进演播室后嘴里拌蒜）与国企“改革攻坚”大背景的距离，节目显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薄。经过节目把关人的点拨，又设法找到了相关的权威背景，充实了现象分析，调整了前后导语，拉开了宏观主题与微观表现的距离，才有了节目后来的模样。

其实，细想起来，没有距离感，也经常在采访环节中出现。强调进入事实，缺乏审视背景，关注微观细节，忽视宏观把握，也许使我们丢了很多素材，有些甚至没法补救。

写在这儿，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日审片，主管台长连看了几个之后，忽然叫停，对着主任们说：“告诉你们记者，回来以后不要急急忙忙编片子，先到郊外钓钓鱼，放松两天，整理一下想法，然后再编。”领导的教诲显然没法实现，但在我看来，这是让我们要有这种“距离感”的最朴素而且充满领导关爱的表达。

无论如何，正如所谓“距离产生美”一样，距离同样会在我们多少有些躁动的心态中，产生些许理性的判断。

让我们保持距离。



有关注水肉

姚宇军

在记者一组实习的徐州电视台的老胡接到衡水举报,“线人”言称给指点迷津,保证能拍到猪肉注水的现场,让“焦点”满意而归。同组的汪力接题欲往,但“线人”临时有事耽搁下来,汪力遂又受命前往河南,之后受挫不提。一个星期后,“线人”又言称已返回衡水全力配合,而这时选题困难户姚某却候个正着,得了便宜开始卖乖。

据称,河北衡水当地曾多次打击私杀滥宰,而暴力抗法时有发生。后经了解,衡水市屠宰办的十几名执法人员大都被打、被砍过。此行要与屠夫为伍,心中没有成算。等暗访机器的几日内开始蓄须,成行之时已有几分鲁莽状。到衡水后,头不梳,脸不洗,不知怎样作践自己才能进入状态。踩点儿之后又在搜肠刮肚,苦思冥想。

首先,拿两张“百年好合”的横联贴住京牌汽车的前后,车牌便像是结婚用车;而后再找一个大桶,以备接猪血之用。凌晨四点直奔一杀猪点。(当时的)关制片人放心不下,将他本人、姚某、“线人”、台内的司机等人的手机号码相互串通以防不测。之后,姚某与摄像王守成定好套路,打着打火机,点上烟——烟壮“尻人”胆,提着接血桶,吊着半截心,开始演绎这“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猪题”。

“妈呀!这一脚屎!”摄像师王守成一声叹息,和着猪鸣狗



吠,向着磨刀霍霍,来到屠夫门外。一连串的盘问竟然对答如流,勉强被允许进入屠宰现场,似还未开张的饭店的“王”、“姚”二位老板,东扯西拉开始装了……女操刀手黑暗处死死盯住王守成腋下的小包,怎奈守成脸不变色心照跳,不时还拿起包指指点点,指点之处,开始给猪放血。接血之时,女屠问到:“灌血肠否?”答曰:“否。”问:“何干?”曰:“造‘大血蛋’。”并开始调侃。对方笑问:“何为‘大血蛋’?”答曰:“以猪之血灌猪之尿脬,其形其味胜血肠百倍,遂成本店之大菜也。”女屠兴致起,戒心全无。又问及水费何价?女屠叹曰:“水价之高今非昔比。”随即又自嘲:“什么时候水费涨得比猪肉还贵,俺就不注水了。”

首战告捷,沾沾自喜。一看回放,美中实在不足。猪被注水蹬腿全是中景、远景。即使垫解说,做慢动,上遮幅,也不能再现亲临现场之感受。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就有了第二次的野心。次日凌晨,再赴女屠处探望,不过,这次得仰拍,还得俯拍。

还真得感谢那位女屠。由于第一次在这儿接了四个猪的血,多给了她一块钱,这回接了两个猪的血又照顾了她一块钱,这回,女老板在守成的手包底下不仅演示了高超的注水技艺,还配了几句精彩的同期。据说事发后,女屠的公公心怀不满:“就你说自己技术好别人干不了,我技术这么好我都没吭气。”

接猪血、收尿脬、购大肠、买小肠,几天下来,已多了几分对行市的了解,从中也悟出了一个道理——买我的肉我就告诉你如何给猪肉注水。在市场上遇一卖肉者,听说是要买给老人吃,大发善心,但不注水的肉实在没有,只有看看水大水小。于是给找了块水小的,问曰:“这水怎么注?”答曰:“不知道。”姚某言道:“不告诉,不买你的肉。”卖肉者:“有活着灌的



死着灌的。”问曰：“活着怎么灌？死的怎么灌？”答曰：“买我的肉我就告诉你。”说好买两斤肉，他硬是切了三斤六两！付了钱，拿了肉，走出不足百米，啊呀！买了他的肉，他还没告诉我到底怎么注水呢？守成笑骂：“真笨！”无奈，又返此摊，言道：“我又回来了，还得买点熬汤的腿骨。”这回付钱的时候才又问：“给了你钱，你还没告诉我怎么注水呢？”摊主这才挽起袖子——道来……最后又补充一句：“不信，到肉联厂看看，那儿都这么干！”

有了上段末尾的转场，肉联厂那段就顺其自然了。怎奈刚到肉联厂不久，就好像被识破。屠宰车间主任用水管只在俺俩的脚下来回的冲：“走，走，今天的猪血卖完了。”话说着，水冲着，那边的死猪能蹬腿的蹬腿，能喷水的喷水，这边的白大褂该收钱的收钱，该出票的出票，就是没法直接对话。这回哥儿俩一块儿装吧。于是，不知是哪儿来的默契，在白大褂面前姚某大声道：“人家是动物检疫的。”守成不服：“不可能！这儿哪有‘动检’的？！”姚某急了：“人家就是动物检疫的！”王守成依旧执著（还装）：“不可能！”白大褂终于听不下去了，脱口而出：“那边两个穿白大褂的就是动物检疫的……”



回过头来再想想，以前没有这么阴损呀！怎么搞的，也许是“形势逼人”吧！

按照惯例，这时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该粉墨登场了，无非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作用力多大，反作用力就有多大，这样的事情惊动了官方，节目八成会被灭掉。经请示，领导谨慎斟酌：“隐蔽采访确保安全播出。”江湖险恶，摄完就撤。回京后时间上从容，心态上也从容，反正用不着去跟人家抢山头。

然而，说得容易，全暗访后期编起来可没那么简单，出现空镜怎么办？小事难不倒王守成，此兄早在衡水时就已拿起掌中宝，大摇大摆，半天时间，所有空镜全部搞定了。守成眼中无难事，看来还真是这样。

节目播出当晚，衡水市紧急行动，组织了两百多人的队伍，兵分十二路，奔赴二十五个个体杀猪点（明明是知情的嘛），成效显然地显著。



心惊肉跳的暗访

刘 涛

《谁给私盐开绿灯》和对这一问题的再次追踪报导共两期节目,揭露的是河北省黄骅市盐政人员与私盐贩子内外勾结、导致私盐泛滥的情况。节目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全国盐业系统大规模的围剿清查私盐行动。

说起来,河北省黄骅市的私盐泛滥确实惊人,每天成百上千吨的私盐大量地流入到河北、山东、天津、北京等地,以至于这些地方的私盐最高的销售量居然达到食盐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人们谁也离不开的食盐,近一半都是无碘的私盐!这些私盐从外观上、包装上很难发现纰漏。当然,也不是全没办法查证,其中一招就是在切开的土豆上放一撮盐,正常的碘盐会马上引起土豆变色,否则就是遭遇上了私盐。可谁买盐还拿着土豆去试呢?想想一日三餐缺不了的食盐,居然有那么多都是私盐,真令人后背发紧。

干私盐的基本上都是在当地很有些势力的黑道人物。如何能够揭露这些人的嘴脸,能否暗访成功就成了节目的关键。为此,摄像朱邦录和我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向“线人”学习黑道上盐贩子们的“切口”——私盐业的术语。暗访过程中,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且又能保证自身安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朱邦录与一个企图靠介绍生意拿回扣的当地人进到窝点,以买盐为名进行暗访;另一路是我和司机在附近观察动





静,随时准备策应进到窝点的邦录。为了安全,我们事先将双方的手机号码调到了随时可以发射的状态,还规定了定时联络时间。该想的措施全想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唯一难以控制的就是紧张的心情。用朱邦录的话来说:“违法的盐贩子成了光明正大的,当记者的我们全跟做贼似的。”还别说,最后一次暗访时,朱邦录险些就露出了马脚。头天,朱邦录与一名盐贩子谈妥了运盐路线上买道(花钱买通执法管理人员)的大体价格,但当我们通知了盐务管理局要来采访的消息后,第三天一早,朱邦录在第一个窝点,拿到了《焦点访谈》要来的消息后,兴奋地转到了第二家,谁料,这位黑道上的盐贩子口风大变,反反复复追问朱邦录的来历,吓得朱邦录连连后退,所有谈话都是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地方进行的。当他安全地回到约会地点时,还惊魂未定的一再嚷“悬”。事后邦录袒露了心迹:“当时如果那小子要是发现了摄像机,我就只能跟他做交易了,保证不使用他的图像,不然小命真的难保。”

暗访虽然成功了,但与当地盐务管理局接洽时,会不会露

馅,这也是片子能不能顺利播出的关键问题。河北离北京太近了,说情的大军一踩油门就可以杀奔过来。因此,我们时刻如履薄冰,在与当地盐政人员见面前,又设计了几套将朱邦录隐蔽起来的方案,事实上还都见到了效果。刚到当地盐务局,朱邦录隔着车窗就发现一名见过的私盐贩子大模大样地走进了盐务局,于是,朱邦录的“胃病”马上就犯了,不管谁来请、不管问吃什么药,都一概回绝,只要是不离开车,不露面就觉得舒服。到了中午吃饭时,让人代吃是不能的了,他只好左顾右盼地露脸了,这时的朱邦录全没了往日的派头,穿着司机牛师傅的棉衣,头畏畏缩缩地沉在衣领里,低眉鼠目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暗访过程中,我们是住在离盐务局不远的一家宾馆内,到了盐务局后,当地盐政人员又要把我们带到这家宾馆住,吓得大家顿时脸色发白。幸亏当时灵机一动,以这家宾馆的名字与本人相克,命中犯“泰”字为由,进行了百般地搪塞,才避免了与宾馆服务人员再次见面的尴尬。不住这家宾馆,我们提出要住的另一家宾馆却倒了霉,这家平日间歌舞升平、生意火爆的地方,一时间冷冷清清。宾馆的老总一再追问我们怎么知道他这家宾馆名字的,热情微笑的面部表情隐隐地透出不安。好在我们只住了一夜,没有过多地影响宾馆娱乐场所的生意,老板还不至于急到恨不得“扁了”我们的地步。

片子播出后,盐政人员与盐贩子勾结的内幕揭出来了,一批盐政人员和两级盐务局的领导倒下了,想想也有些干得不忍,但一日三餐的咸味感到纯净了很多,也就无所谓了。





《工商忙收费 粮贩忙收粮》拍摄过程

黄 洁

上个世纪最后的一个 28 号，我和张予北坐上了去河北邯郸的火车，准备去“倒卖一次玉米”。

1998 年，出于种种原因，国家出台《粮食收购条例》，其中明确指出个体粮贩禁止向农民直接收购粮食。但是，现在邯郸市成安县许多人向《焦点访谈》询问是不是国家的政策变了。在一些人的咨询中，我们感觉到这里的粮食收购有与国家政策不符的地方。问题究竟在哪里？只有亲自去买一次玉米才能知道。

拐弯抹角找到了朋友的战友，让他帮忙买一大批玉米。战友是粮站的，他讲外面收购点太多，粮站没有收到足够的玉米。在我们到达的 28 号下午，他带我们去其他收购点买玉米。战友的普通话一流，我们以为当地人都这样，一交流傻了眼，一句听不懂。加上予北架上眼镜的怪样儿，让人老是警惕地看着他。那天下午买玉米的过程让我看不到本职工作的前途和光明。

29 号早晨，经过集训，我们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地方语感；予北穿上了绿色长大衣，有了一些坏样儿；我则利用我的长头发，戴上眼镜，样子不算太怪。

我们又开始出发“买玉米”。

这里玉米收购点很多，总有警惕性不强的，我们先后走了长巷乡、商城镇、漳河店镇等地方，了解到这里收购点大多是



由个体办的、工商部门认可的。一上午,粮贩子的事拍得差不多了,该直接找工商部门说说话了。

中午在长巷工商所里吃饭,有两个人看到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我们也感觉他们在哪里见到过我们。

下午出师不利。我们先后去了长巷工商所和商城工商所,都是大门紧闭。掉转车头到漳河店工商所,好在所长室有人,我们冲了进去,表示“想办个玉米收购点”。这里的人的回答让我们极为诧异:“我们早上去上面开会了,《焦点访谈》要来采访此事,迟两天再来办手续吧,被他们堵住了咱们都有麻烦。”我开始理解为什么许多工商所大门紧闭;也开始理解,中午吃饭时两个工商所的人见到我们脸色苍白的原因了。但那两个人怎么能知道我们就是《焦点访谈》的呢?不过,不论当地人怎么知道的《焦点访谈》要来,歪打正着,百分之九十九是那个穿着工商制服的所长的人对着我的眼睛(眼镜)说出上述动听的话。喜上心头!

不过好景不长,出了漳河店工商所,在我们再打算去一次长巷工商所的时候,战友的领导给他打来电话,问他带的人是什么人,说是会有人沿路堵车抢胶卷。看来我们上午、下午的暗访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成功,已经被他们察觉了,只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用什么东西拍了什么。我们立刻向家里汇报,得到指令:保证安全,停止拍摄,立刻打道回府。

29号晚上,我们赶到了邯郸,买到了回北京的火车票。在等火车的时候,我们急切地翻着拍的带子,怕没录上。让人惊喜的事发生了,画面上居然出现了中午吃饭时遇到的那两位长巷工商所的人,他们穿着工商制服在向我们推销玉米,并且当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姓名和电话。

原来这里的工商部门为了赚点钱,违反国家规定,利用职权乱收费,为个体粮贩做保护伞。于是,这里的一些工商部门职工也穿着工商制服谋着个人私利。



思想统一了 事情才好办

喻晓轩

陈国庆真够冤的，好端端地到北海探亲，结果却被带到了派出所，接着被不明不白地关了几个钟头，还不明不白地订了一年的《广西政法报》；更冤的是，他在北海呆了几个月他还没有看到一份《广西政法报》。

临出发前，制片人柏杨面授机宜：“到了北海，你和老张没事就去派出所门口转转，要是他们把你俩给抓进去订报纸，就太好了。”说话间，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说者有心，听者有气，当时我恶狠狠地回答：“你可真黑。”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没说：这要是扫黄的节目，那还不得让我等献身！别以为我们都是包老师（包军昊），俺不是那种人，把领导的意思向摄像老张一转达，老张“嘿嘿”直乐，问我：“你说我们俩要一起给抓进去了，警察问起来，那我们俩算什么关系呀？”嘿，貌似忠厚！我当即正义凛然地答道：“同志关系。”话是这么说，海东派出所是不能不去。一边忙着给陈国庆煽风，一边没忘了给老张点火：要是派出所这么这么说，你就这么这么问；要是派出所那么那么说，你就那么那么问。万一，小陈你盯不上，没事，有老张呢，他经验丰富。派出所太小，三个人进去惹眼，我就在门口给你们做接应。放心吧，没事。说话间，也是笑容可掬。其实心里想的是，万一不幸，身陷派出所，那也得让老张先陷，我可不能再陷了（在江西于都已经陷过一回）。思想统一了，事情就

好办了。

眼见着他俩进去了，我在出租车内很逍遥。最好派出所里的人发火，抓老张，让老张订报，一年，不不，两年！我才不管呢，让他在所里多呆一会儿。什么关系？我和你没关系。哈哈。我这边还没乐完，那边他俩出来了。心里有点紧张，没戏了？！不对，老张有反应。只见老张一步跨进车内，激动得已面部扭曲：“全承认了，全说了。”那还等什么，抄家伙上。于是，海东派出所的所长就出现在了镜头中。

所长表现很好，好得都出乎我们的意料。不少人看完片子后，都问我：“那个派出所的所长是不是傻子？怎么问什么说什么？”其实他倒不傻，他是觉得冤，比陈国庆还冤。反反复



暗访无人知晓，但公开采访就大不一样了。瞧，喻晓轩在采访时，当地的新闻同行们也紧随其后，记录下《焦点访谈》记者采访时的情景，在他们的画面里，喻晓轩无疑是主角。



复，他就强调一句话：“给你一份报纸，相对你得利，我派出所还没得利。”越这么想，他就越觉得理直气壮。所长觉得冤，他就有话说。问：“不得利，为什么要做？”答：“因为上级有任务。”又问：“哪个上级？布置多少任务？”答：“市政法委、区政法委、公安局都是上级。我所里二十多个人，要订四种、共计一百多份报纸刊物。”再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订报？”答：“加强法律学习。”问着问着，也觉得这个所长挺倒霉。所里年年都有订报的任务，年年还加码。其他派出所其实也这么干，只是他让我们碰上了。而且，这种订报的方式是上级暗示的，也不是他们首创。他只是想不通，这事怎么闹得那么大？所长好像有点替罪羊的意思。问题是，你不能把你们的倒霉事摊派到老百姓身上，就因为你有点权力？！你冤，别人就得跟着冤？！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促使我问了这么个问题：“要是你们完不成任务，会怎么样？”原以为，所长这么卖力，应该有难言的苦衷。谁知他回答：“不会怎么样，只是上级布置的任务，我们就要完成，这是我们的责任。”整个是为讨好上级，牺牲别人的基本权利嘛。看来，还是陈国庆冤。思想统一了，事情就好办了，正确，正确。

后来我听到了节目的反馈：海东派出所的上级部门进驻，表示要对此事严肃处理。参与处理的上级部门当中就包括给派出所下达订报任务的人。其实，所长也挺冤的。这个问题不能再想了，真的不能再想了，思想统一了，事情才好办——一切记，切记。





重复的暗访

喻晓轩

我不太爱吃土豆,但没想到,偏偏要做一期有关土豆的节目。不到迫不得已,我并不太愿意采取暗访的方式,可是这个有关土豆的节目,又偏偏让我经历了一次重复的暗访。

节目播出后,不少人问我:“那个种子公司的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撕条,又怎么会如此蛮横?”其实,这个场景是给柏杨“逼”出来的。说起来,还真有不少故事。

赤峰市岗子乡和河北省围场县毗邻,围场县的薯种质量一向优于岗子乡,两地有串换薯种的习惯。据农民私下调查,过去乡里给他们采购的薯种就是从围场县的一家种子公司的,而且他们还从那家种子公司的拿到了副乡长任歧峰购买种子的凭证——一张盖着财务章的字条。农民自己去取的凭证当然不能作为我们的证据,我们决定自己去核实。听农民说,买种子的副乡长任歧峰和卖种子的公司关系好像不一般,如果明查,人家不一定会说实话,所以我们决定暗访。当时我们商量,出租车司机是赤峰人,又是农民形象,让他当托儿,张雪峰和他一块儿进去,装作买种子,讨价还价,看能不能问出这家公司过去卖给岗子乡的种子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暗访意味着必须一次成功。有很多东西,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我目送着张雪峰和司机进去,心里想着,如果不成功该怎么办?

二十多分钟后,他们回来了,基本上是不成功。他们进去



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当事人进行促膝谈心式的采访,常常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最拿手的好戏。

不久,就被人家识破,几乎是被赶出来的,并且得到警告:别再说这事,再说就没意思了。雪峰说,岗子乡的农民去过几次,人家早有警惕了,对他们什么也不说。而且那天,几个工作人员不知在哪儿喝得脸红脖子粗,因此更是豪气冲天,推推搡搡的,差点动手。局势看样子很紧张。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雪峰被当成是和农民一伙儿的律师,我们没暴露。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再进去试一把,确实需要勇气,而且什么也拿不到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想干脆真刀实枪,抄大机器上算了。犹豫中,我给柏杨打电话,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反对。理由是:明拍,人家不理你,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暗访,还有回旋余地。同时,他提醒我们把那张关键的字条拍上,以防进去后被人撕毁。字条在赤峰的时候就拍好了,不过拍的时候真没想到有人会撕。当时是矛盾重重,考虑再三,觉

❧

1
6
5



得柏杨的意见确实有他的道理,好歹再试一把吧。我把部里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司机,又检查了一下证件和介绍信,这才硬着头皮走进了种子公司,当时的情形颇有点“悲壮”的味道。我想身后的雪峰可能比我的压力更大,他毕竟是在短时间内二进种子公司,而且已经领教过那些醉鬼的蛮横。重复暗访,更不容易。我们再次进去,他们会怎么样?

种子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认识我,但对雪峰肯定印象深刻。看看我们俩一块儿又来了,脸上的表情很有意思。谁也不搭理你,但又不能不注意你,不时瞟上几眼,冷冷的。我想,此时他们的心理活动一定比我们还要剧烈,而且明显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很不友好的分子在空气中弥漫。果然,我们拿出字条一问种子的事儿,那个工作人员就坐不住了。后来的情况就像大家所看到的,他不仅撕了字条,还有梗着脖子、斜着眼睛的“上佳表现”。看着字条在他手里被撕得粉碎,心里真是庆幸,幸亏听了柏杨的话,不然,岂不可惜

我跟土豆打了十多天的交道。这期间,看土豆、谈土豆、想土豆、编土豆,还真有点魂牵梦绕,不过,要牵挂到爱吃的程度,还需要时间。这次有关土豆的重复暗访,让我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话,最好不要再有这样的重复。





讨教一二

郭 峰

根本没想到,《花沟镇的花架子》最终还能播出。

自打从安徽拍回来之后,就不断有各色人等前来打探说情,有认识的,有素不相识的;有找台领导的,也有找评论部同仁的,反正是上上下下找了个遍

节目审罢入库已一个多月,一直未见安排,说是上面有话。时间一长,眼看着播出遥遥无期,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全当挣一工分。那一日,正在陕甘宁边区采访,突被告知此片正在播出,着实吃了一惊。屈指算来,从采访到播出已近三个月了。

看到此,估计有看客对此颇为不屑。《焦点访谈》只要是批评报道,定有人“骚扰”,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这已成“真理”,大可不必为此大发感慨。确实,这也是实情,诸位同仁没有不曾遭遇的,不过凭我的感觉,此种状况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谓是来势凶猛,前赴后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吾辈却甚为被动,对此根本无能为力,至于破解之招,除了尽人事、听天命之外,似乎只剩下自己安慰自己。

一年多来,本人做了不少有关形式主义题材的片子,中心组的黑板上也曾先后出现过湖北形式主义、陕西形式主义、安徽形式主义三个以形式主义冠名的片子。除了机缘巧合之外,确有偏好此道的原因。



原因有二，一是形式主义多为政府行为，大多为骗取政绩，为升官，此为老百姓最恨之。做这样的片子，打这样的官，不仅老百姓喜欢看，而且打之有声，颇为过瘾。

再者，形式主义必定弄虚作假，加上各级政府聪明才智之人颇多，奇招怪招频出，趣味性、故事性颇强，有些还颇具黑色幽默。若一一展示，十分好看。如果再是个现在进行时，采访时有劲，编辑时有趣，播出时有彩，岂不快哉！

可是，此类题材做得多了，也不快哉了，尤其是这次去安徽。不知是各地江郎才尽，还是懒得再动心思，反正现在弄虚作假越来越没创意了，鲜有独到之处，抄袭、剽窃者居多。

不动脑子倒也罢了，最主要的是先前这类片子的那种趣味性、幽默感荡然无存。以前搞“形式主义”的在给自己争官的





同时，偶尔也会给老百姓带点实惠，大不了口惠而实不至，整个景，骗把人。而现在目的更直接，做法更简单粗暴，根本不用掩饰，动不动就铲地、扒房子，直接坑农、伤农，毫无顾忌，农民若有不服，打人、抓人、关人，无不用其极。

采访花沟镇的“四万工程”时，看到打瞌睡者有之，抓进牢里者有之，扒了房子住在桥洞者有之。见了记者，他们如见救星，不是嚎啕大哭，就是跪地求助。当着记者的面与乡镇干部相见时，他们如见仇人，几十个农民大声斥责乡镇干部，声色俱厉。

这些拍下来容易，回来还没法编。要是不用，于心不忍；要用吧，不是太过激烈，就是哭哭啼啼，影响不好。此情此景，搞得再也没有了以前做这类节目时的乐趣。



作为编导，郭峰向分管自己的顶头上司、评论部副主任关海鹰讨教时，就显得态度谦和了许多——给领导当助编，累的是他，惬意的是我！



我是刘思影的阿姨

申宇红

小思影走了,再也不能听到她叫我阿姨,再也不能兑现去医院看她的承诺。而小思影那“阿姨——阿姨——”的一声声呼唤总是一次次回荡在耳边。特别是每次走进办公室一眼看到放在柜子上面的大布娃娃,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奈的痛苦。

大年三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法轮功痴迷者的集体自焚事件,使全世界人民更清醒地认识到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采访刘思影时,她刚刚做完第三次植皮手术。一进病房就看到刘思影浑身裹着白纱布——她的整个身体包括头部都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形状已经不是很规则的嘴巴和两只烧成炭灰一样结着黑痂的手臂,且不能自持地颤抖着。见到这一切,我的心也随之猛烈地震颤着,这种直接的视觉冲击会使任何有心理准备的人都无法躲闪。令我们十分吃惊的是,小思影的聪明、倔强真的是十分超常的。尽管她的眼睛蒙着,尽管我没有暴露身份,且小心地从聊天开始介入采访,但她仍可以从周围气场的变化敏感地辨别出我的身份。“我不想说。”我刚刚问了几个问题后,她就拖着哭腔开始拒绝我。“阿姨,是不是有镜头对着我呀,我不想让镜头对着我,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她越说越伤心:“我想妈妈。”陪同我的公安人员、大夫、护士和我都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这样的采访该不该进



行下去。

在我进退两难时，思影又开始呼唤我：“阿姨，阿姨，我要阿姨，阿姨你走了吗？阿姨你在哪儿？”我的眼睛湿润了：“阿姨在这儿，阿姨在这儿，阿姨就在你身边。”周围顿时变得安安静静，所有的人都沉默了。“阿姨咱俩聊天不让别人听到好吗？你让他们都出去。”就这样我和思影重新进入了一种谈话的氛围。

“阿姨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申，同事们都叫我弯弯，你就叫我弯弯阿姨吧。”

“是申弯弯阿姨吧？阿姨，你摸着我的手，两个手都摸着。”

“阿姨怕你疼。”

“我不疼，我好热，你的手好凉，刚好给我降降温。”她说着扭了扭身子，似乎想挣脱浑身缠绕着她的纱布和缠绕着她的这些她不能解开的问题。

大夫替我拿着话筒，我用两只手轻轻触着思影的手臂。我逐渐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和思影聊起天来。她一会儿快乐



地告诉我有一个叔叔送了她一个小熊，请我拿来看一看；一会儿又哭着说好多天没有见到妈妈了，想妈妈。思影还不知道她的妈妈已经当场烧死，她说妈妈在另外一个医院。对母亲的情感依赖，使她似乎忘记了是妈妈带领着她点燃自己的。她没有任何恨，似乎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思影，你不知道点燃自己会疼吗？”

“我想一烧就一了之了，就去天堂世界了。”

那个永远都不可能存在天堂世界，逗引着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走向毁灭。据刘思影的主治大夫介绍，刘思影全身烧伤达百分之八十，深度烧伤达百分之四十，双手功能完全丧失，会阴部严重损坏，今后将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思影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她今后将要面临的这一切。她说话非常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头脑反应特别快，还有一种与这场惨剧不相称的乐观和坚强。听医院里的大夫说，刘思影躺在病床上还会唱歌，音乐一响她就用脚打拍子。但她总怕我离开她，她一次次地问我：“阿姨你能天天来看我吗？”

“阿姨工作特别忙，不过我会抽时间来看你的。”在我的意识中也总认为我还是有机会再来看一次思影的。“思影你想要什么礼物，阿姨买给你。下次阿姨给你买布娃娃好吗？”

“我想要粒粒橙。那天(大概指自焚当天)，我和陈果姐姐就是喝的粒粒橙，咕咚咕咚喝得可开心了。”

“好的，下次阿姨给你买粒粒橙。”思影不拿我当外人，我特别开心。

“阿姨你买多少？”

“阿姨买好多好多，一大箱好吗？”

“好的，阿姨我可喜欢喝粒粒橙了。”

告别了思影，我就进入了紧张的后期制作，没日没夜地





忙着节目。再去看思影、给她买布娃娃和粒粒橙的事，只是静静地放在心头。原本还能有一次去看思影的机会，那天翟老师布置我和刘义长做一期反映四个自焚未遂者现状的片子，可是，由于我手头有别的工作，只好由义长代我去采访了，同去的还有“反法斗士”李玉强。义长回来后跟我说，刘思影说想你了；义长还拿拍回来的素材给我看，小思影躺在病床上，双眼仍然蒙着，“你是申弯弯阿姨吗？”她这样问我的同事。小思影仍然惦记着我，我心头有一种甜蜜和悲哀相交织的感情。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我和这个孩子之间有一种暗暗的牵连，或者说我隐隐地感到我们身上还有一种潜在的相似。一样的聪明伶俐，一样的倔强，一样的特立独行，一样的在小小的年龄经历着种种磨难。只是我相对于思影来说更理性一些，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所有的孩子都那么理性地去选择未来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难、挫折、打击，成人尚不能面对，更何况孩子！

我总觉得我能够帮思影医好心灵的伤。我跟义长说如果我收养这个孩子，我会使她逐渐恢复灵魂上的健康。义长当然不同意我的感情用事，我自己也很清楚，说这个话是不理智的，如果只是说说而已又似乎伪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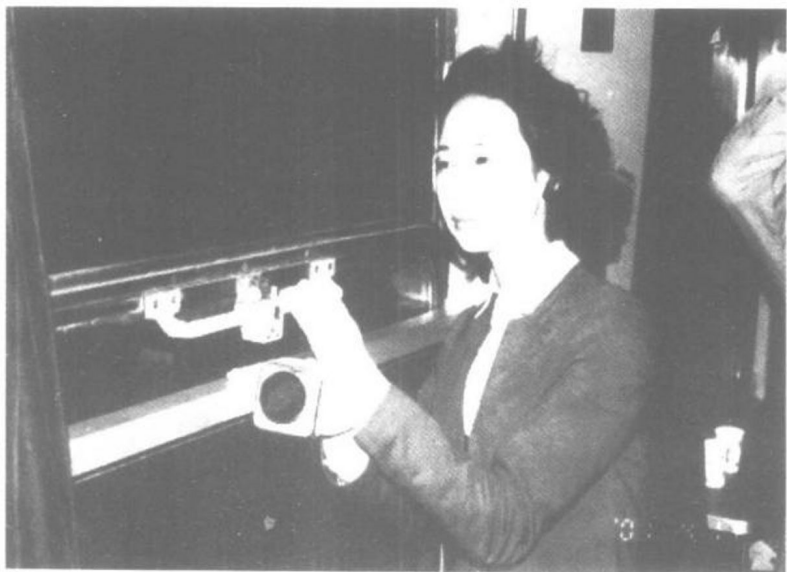
一开始忙片子，这一切的胡思乱想都被抛在脑后。2001年3月1日，《残害儿童 罪不容诛》顺利播出后，我又领受了新的任务，内容同样是关于法轮功的。在武汉女子监狱，我接触到原法轮功练习者张珂。她起初对采访很不屑，因为入狱后，她接受的此类采访太多了。当她感觉到我能明白她执迷不悟背后的种种生活上的不幸和挫折时，她变得滔滔不绝，并泪流满面。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她说那些天自己完全像死过一次。当她得知我曾采访过刘思影，显得十分激动：“刘思影太可怜了，李洪志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实在太残



忍了；更残忍的是不承认他们是练法轮功的。”张珂为自己悲哀，更为思影心痛。分别时，她委托干警买一个“最大最漂亮的布娃娃”让我一定捎给小思影，她还写了一封信，落款是“阿姨妈妈”。

从武汉带回这个布娃娃时，我想等这个片子制作完，我一定去看一次思影，给她买玩具，买粒粒橙，并把张珂买的布娃娃捎给她。到时候思影看到有这么多阿姨关心她，一定很开心。可是，就是在这期节目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从出租车的广播里听到了小思影的死讯！

那天，我哭了。



小思影走了，从申弯弯阿姨那略带忧郁的眼神中不难看出，她已将小思影深藏于心中。





把握住热点 经营好选题

再 军

“社会热点透视”是《焦点访谈》的栏目特点之一,也是《焦点访谈》一贯选题的采编标准,即“选准热点,深入分析”。

应该说,新闻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对事件“新鲜”、“奇特”等要素的天然追逐。但是,定位不同、运作有别的媒体之间,对事件“新”、“奇”特征的选择标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把注意力不放在事件的表象上,而是通过记者的调查、总结、分析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是《焦点访谈》栏目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2000年11月18日,《焦点访谈》播出的《局长醉死歌舞厅》一片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采编的。

就选题而言,一位政府的局长,喝酒之后醉死在了歌舞厅,这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新鲜感和奇特性。但是,热点需要把握,把握也要有分寸。拿到选题之后,我把两个关键词进行了分析:局长——国家级贫困县的局长——一天之内连喝三顿饭而醉死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局长——在全县“三讲”回头看总结会议结束后,利用公款一天之内连喝三顿饭而醉死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局长;歌舞厅——有“三陪”小姐的歌舞厅——国家级贫困县里的局长们往常出入的有“三陪”小姐的歌舞厅——全县“三讲”回头看总结会议结束之后,有九位正副局长级干部利用公款消费且有一位局长醉死在此的歌舞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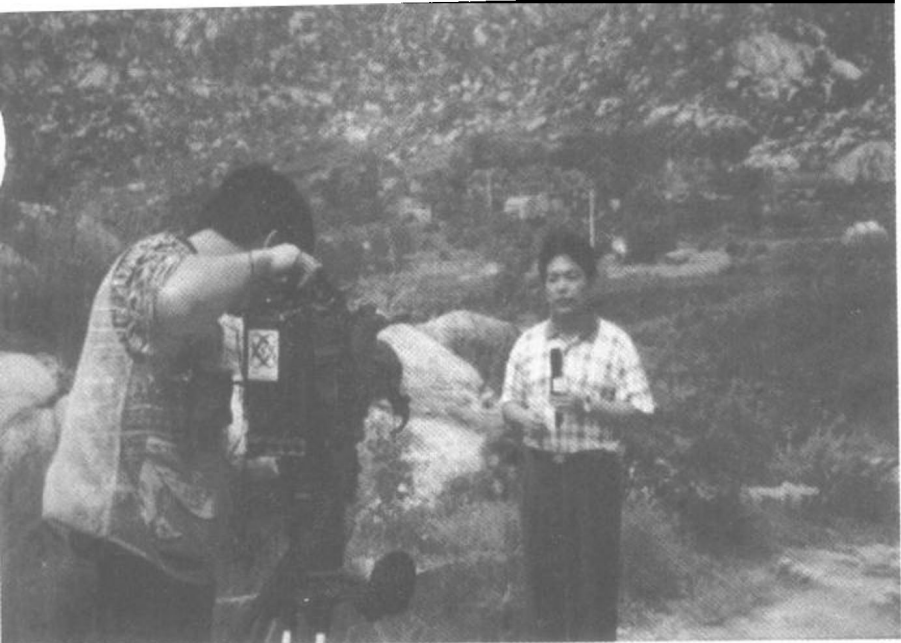
画
外
有
话



1
7
5

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明确之后，整个节目的事实部分的主体脉络顿显清晰。调查基调也严格定位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对事不对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调查方向沿着“局长”和“歌舞厅”两个关键词进行理性的逻辑延展，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陷入”——陷入过于具体的细枝末节之中，特别是对事件的主体人物——云南省永善县乡镇企业局局长杜明祥，围绕这样一位死者的调查更应该理性些而不仅仅是猎奇。

应该承认，一位基层干部，即便“由于不光彩的原因死在了不该死的地方”，但他以往的经历也不都是“漆黑一团”。据了解，杜明祥作为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永善县的乡镇企业局局长，对县里的经济发展是出过力的，是有过一定贡献的，但他毕竟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酒桌上争强斗胜是他的“习惯”，把工作经常放置一旁，兴致所至一天连喝几顿是他的“风格”……面对这样一个采访对象，我们用不着同情，但对于一个“意外死亡”的人，也不必“鞭尸”。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明祥也是受害者，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受害者。本着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先后采访了杜明祥的家人、同事、邻居、战友（杜曾当过兵），特别是在2000年7月11日晚与他一同喝酒、一同去杏花村歌舞厅的其余几位基层干部。在采访时，把分析的对象定格在造成杜明祥死亡的内在、外在原因方面，把焦点对准造成这样一种不良社会影响的社会基础和不良风气上。通过调查采访，让更多的干部体会到自我约束的必要和党纪国法的尊严。在所采访的永善县党员干部中间，有两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辛永富，永善县原经贸委主任，2000年7月11日与死者杜明祥“连续作战”喝了三顿酒的干部，见到我们的第一面是要求转达他对县委的意见，大意是：虽然杜明祥他们在全县“三讲”回头看总结会后用公款喝了酒，出了事儿，但是，这是偶然事件，与“党风廉政建设”没什么关系，请组织上为他们继



再举：“把注意力不放在事件的表象上，而是通过记者的调查、总结，分析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是《焦点访谈》栏目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续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辛永富的这种想法，其实也是许多基层干部的想法，即所谓“吃喝无害”论，甚至有些人视“吃吃喝喝是拉动内需”，即使用公款也属人之常情。采访中，除了讲述当天的事发经过外，辛永富重点讲明他的两个观点：第一，他先离开杏花村歌舞厅，没有理会已经烂醉如泥的杜明祥并非不负责任，而是“杜明祥通常酒量很大，经常睡在外面，没啥子事”，因此不必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第二，整个事情纯属意外，根本原因是他们这些人“不走运”，“我吃喝多年也没出什么事”。将这样的内容采编到节目中，更加突出了节目的主题。

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名叫杨平，时任永善县糖业烟酒公司总经理。他说：“是公款，但不是吃喝。”意思是，九

位参与当天“喝连杯酒”的干部，花费的确是公款，但由于认为花钱不多（总共一千五百元左右），因而谈不上“吃喝”，最多算是个“宵夜”，因此，不论党委、政府还是新闻传媒都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我始终认为，人物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节目的特色。与杜明祥共进“最后的晚餐”的一些基层干部，在事发后三个多月（我们是10月中旬到永善进行的采访）还持有这样的一些看法，这正说明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性和开展“三讲”的必要性。

尽管这样一个选题的新闻要素很丰富，故事情节很曲折（杏花村歌舞厅的老板娘吴利春事后被杜家逼迫自杀身亡），但我们采访、调查、编辑节目的基点始终是将热点事件进行必要的理性上的冷却处理，从而突出节目的主题，集中反映社会不良风气的危害，也能够把握好分寸，而不使舆论导向发生偏差。

选题的基调调整完成之后，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经营好选题”，这里的“经营”是指设计好采访的内容、采访的次序，也包括采访的环境，调动电视语言的形象要素，构架好节目的框架，使其服务于主题，服务于节目内容。

很多观众看完节目后反映，一些片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较深，比如，杜明祥和其他基层党员们当天喝最后一顿酒的川红饭店“打嗝也来劲”的横幅，巧妙地讽刺了公款吃喝、不顾后果的个别干部的丑陋的嘴脸；又比如，杏花村老板娘吴利春生前的那张彩色照片，与个别党员干部的形象形成反差，同时也让人为她感到惋惜；同样死在歌舞厅，但吴利春的形象和杜明祥的形象形成的对比、产生出的冲击，印证了节目主题；再比如，永善县干部群众在议论杜明祥之死时的那句话：“他确实死在不该死的地方，让我们觉得党风廉政建设



任重而道远。”这是群众心声的流露,这是百姓好恶的真心表白。这样一些细节的发现和捕捉,没有一定的设计、没有相应的调动,仅仅靠程式、纯自然主义的记录是不能够很好地为主题服务的。“经营”决不是要“导演”,要“摆拍”,而是珍惜选题,调度场景,让细节发言,用事实说话。



几天几夜不睡觉、连续工作是电视人的家常便饭。制片人、主持人翟树杰正在连夜编辑白天采访的素材。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刘 宁

为拍摄《国库是如何变成私囊的?》一片,我们在贵阳市采访时,不论是在市财政局,还是在检察院,或者是在公安局,凡是遇到过许杰的人,就会听到这样的议论:如果许杰长得不这样,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开始我们以为许杰长得特漂亮,是爱慕虚荣,贪图享受而蜕化变质的,后来才知道,人们这样讲是因为许杰长得丑:“太丑了,嫁不出去。”有人这样讲。

也许是见许杰之前,这样的议论听得太多,我和刘文充分地想象她的“丑”。等真的见到了许杰,我们一致认为,并不像人们说的,丑到了“嫁不出去”的程度。倒是杜建生,一副无赖流氓的样子,让我们看不出他究竟有什么魅力,能使许杰这个原本这样老实、机灵、能干的公务员,一下子变得贼胆包天,不顾一切地为他大把大把地从国库往出偷钱。

实际上,许杰爱的本来就不是杜建生,而是龙彪。也许大家看到这里有些糊涂,在片子中,我明明“交待”犯罪嫌疑人许杰、杜建生通过信息台交友热线相识……内外勾结……窃取国家财政资金云云,怎么会跑出来一个龙彪呢?

好,许杰的故事开始了。

许杰,贵州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贵阳市财政局工作。

大约在她二十六七岁的这段时间,她有过一次短暂的没



有实质性内容的婚姻。听说那位小伙子是个教师,出于门第观念,许杰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来了个棒打鸳鸯。虽然两人已注册登记,但迫于家庭的压力,还未等洞房花烛,便又悄悄地去领了离婚证。

许杰特喜欢读琼瑶的言情小说。书中男女主人公浪漫的邂逅,奇异的恋情,无不令她向往。遗憾的是,她本人社会交往面太窄,交友范围有限,只能望书兴叹。

转眼间许杰已三十出头,眼看着周围的姐妹都为人妻、为人母,而她依然是形单影只,不免有些着急。

1997年的一个仲夏之夜,许杰寂寞的生活开始有了色彩。她通过贵阳市的一个信息台的交友热线,与一个香港人相识。这个人自报家名“龙彪”,是香港黑社会龙氏家庭的长子。因不久前参与绑架香港富商龚如心而遭香港警方追捕,目前正在贵阳避难。

这位龙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强烈地吸引了许杰,并激起了她如同古代小说中富家女舍命搭救落难公子一般的侠肝义胆,铁血柔肠。所以当这位龙彪先生提出让身为出纳兼会计的许杰从国债账户中弄点钞票用以摆平警方追杀一时时,许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很快将两万五千元人民币送到了龙彪的手中。

在许杰眼里,龙彪是个理想的恋人,那是香港老板,又很温柔体贴。唯一遗憾的是龙彪太忙了,他几乎不和许杰见面,都是电话联系。每次他给许杰打电话不是在纽约,就是在伦敦,要不就是在巴黎,甚至在以色列……总之天南海北,世界各地,到处周游。这一切都让许杰即好奇又得意。

龙彪说,他患有严重的肾衰竭,每天用于治疗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因此,龙彪给许杰打电话,大部分是让许杰弄钱。有

一次,他深夜给许杰打电话,说他正在新加坡,生命垂危,准备乘直升飞机到法国巴黎换肾,急需一大笔钱。第二天,许杰就从贵阳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专户转给龙彪五百万元。两年半间,许杰提现金或转账支票给龙彪弄到资金七千多万元。龙彪告诉她说,这些钱一部分用于治疗,另一部分存起来,以便将来两人在国外开创新生活。

许杰对龙彪的话深信不疑,并殷切地盼望着龙彪的肾快点康复,好早一点接她出国。

许杰没有等到这一天。2000年2月25日,在她妹妹的家中,几位检察院反贪局的侦察员把她带走了。在看守所,她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是龙彪不是什么香港人,他就是杜建生,



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而宁静地飞翔……

生活中的刘宁,向往着一片清纯的蓝天。蓝天下她





认识许杰前只是一个看大门的夜班工人,并且有妻有女。他一直在欺骗许杰。

即便如此,许杰依然一往情深。审讯时,说起她与龙彪(即杜建生)的三次会面,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大谈幸福,却很少谈实质问题。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了这样一份笔录(大意):

问:杜建生,你爱许杰吗?

杜:我爱她?笑话!她一个丑八怪,我怎么会爱她?我的女人哪个不比她漂亮。

问:既然你不爱她,为什么要与她交往?

杜:(哈哈大笑)这是我一生的杰作。

问:许杰为你做那么多,你就一点没有怜惜之情吗(大意)?

答:她活该!

.....

据检察院办案的人员讲,许杰看后,半天没有出一口气,而后嚎啕大哭。案发后,许杰哭过几次,但这次哭得最伤心。

几天后,许杰开始真正地交待罪行。我们去看看守所拍她的那天,她托反贪局的人给她父母捎封信,信里表示她要振作起来,与杜建生斗争到底。

许杰终于觉醒,她的这场风花雪月的事也该画上句号了。但是,在结束这个故事之前,我还想讲这样一件事。据说,许杰曾向龙彪(即杜建生)要过五十美元。她对杜建生说:“我从来没见过美元,能不能给我点儿美元,让我也开开眼界。”杜建生说:“可以,你拿人民币换吧。”于是,许杰按外汇牌价,用人民币从杜建生手中换得五十美元。

难怪刘文在从贵阳返京的飞机上不停地唠叨:“杜建生太

坏；许杰真冤，比窦娥还冤！”

故事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你说，杜建生认识许杰后，他明明天在贵阳转来转去，却骗许杰说他在国外不见许杰，贵阳也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就从来没碰上过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一定都有着同一个善良的想法：假如许杰和杜建生在贵阳街头来了个“冤家路窄”，假如生活能给许杰这样一次机会，也许许杰就会早一点“如梦方醒”，至少不至于让杜建生骗得这样惨吧。

我是这样想，如果今天我不讲许杰和阿B的故事，如果我不再把许杰的旧事重提，多少年以后，某位作家在拿许杰做原型写一本畅销小说时，保不准会循着大家的想法，设计出一个诸如许杰、杜建生在贵阳街头“失之交臂”或低头未见抬头也未见的阴差阳错的情节来，以证明主人公的“命中注定”。

而实际上，许杰没那么“背”，生活着实给了她一次机会，就在贵阳，她和杜建生真就有过一次“冤家路窄”。

话说有一次，许杰到贵阳机场送一位朋友。就在她与朋友挥手告别欲转身离开时，忽然，她在北京至贵阳航班的出港人流里发现了龙彪。

据龙彪提供给许杰的行踪，此时，他应该刚刚做完换肾手术，正躺在巴黎某家世界一流医院的病床上。他怎么会从北京来呢？莫非他已痊愈？许杰的心中一阵狂喜。

“龙彪！”她高喊一声。

那位被许杰喊做龙彪的人见到许杰，一愣，而后面色赤红，似有些惊慌。他加快了脚步，并把脸扭向别处。

许杰一把拉住他的胳膊：“龙彪，我是许杰，你不认识我了？”

此时，被喊做龙彪的人已镇静下来，他一把握住许杰的手：“啊，你是嫂子吧？”





“嫂子？什么嫂子？你不是龙彪吗？”

此时，那个人已完全镇静下来。他爽朗地一笑说：“哈哈，你认错人了，嫂子，我是龙彪的孪生弟弟，我叫阿B呀。”

这回轮到许杰发愣了。她左看右看，怎么看怎么是龙彪，她心里还嘀咕，世界上竟有如此相像的孪生兄弟。

没容许杰多想，阿B便匆匆告别。“嫂子，我还有事，抽时间我请你吃饭。”转眼便消失在人群当中不见了。

许杰有点发懵。就在她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的时候，手机响了。

“喂，许杰吗？”原来是龙彪。“刚才你是不是见到阿B了？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是遇见你了。以后关于资金的事，你就交给阿B办吧，他是我的全权代表。”

啊，果真如此，果然是龙彪的双胞胎弟弟。许杰打消了疑虑。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阿B约许杰见面了。他一见许杰就对许杰表示好感，并提出要把目前他与许杰的叔嫂关系发展成为许杰与他孪生哥哥龙彪一样的关系。许杰说那可不行，我对龙彪可是忠贞不二。阿B说没关系龙彪不会反对的。许杰说我要征求龙彪的意见。然后两人就分手了。

刚分手没几分钟，许杰的手机响了，是龙彪。

龙彪在电话里声音怨苦，他说他在巴黎治病一时半时不能痊愈，许杰一人在贵阳实在寂寞、实在不公平。即使他的肾好了也不能马上就给许杰幸福。阿B是他孪生弟弟，见到阿B就如见到他龙彪。如果许杰与阿B发展为许杰与龙彪的关系，他不仅不怪许杰，还举双手赞成云云。

许杰对龙彪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不久，许杰和阿B真的就把叔嫂关系发展成许杰与龙彪一样的关系了。

某日，许杰与阿B在床上缱绻时，许杰发现，阿B的肚子上有一条与龙彪肚子上一模一样的伤疤。她顿生疑窦，这双胞

胎双得怎么跟一个人似的，连疤痕长得都一模一样。她忍不住问阿B。

阿B眼睛往右一转，不慌不忙地道出原委。他说，龙彪被香港警方追捕后，是他阿B掩护龙彪逃离香港的。他假扮龙彪吸引警方注意，为了掩警察耳目，他忍痛特意在肚子上割了一刀，留下一个与龙彪肚子上一样的伤疤来验明正身。

没想到肚子上的疤里还埋藏着一个“血浓于水”的故事，许杰感动极了。就在她责备自己太多虑时，她又发现阿B的后腰上还有一个与龙彪后腰上的疤无论位置还是模样长得也像孪生似的，一模一样。她又问阿B。

此时，阿B的眼睛又往左转了一转，娓娓地又道出一个故事。他说他和龙彪生出来的时候是个连体婴儿。当时他们家花重金到美国请最好的医生做的分体手术，难兄难弟才得以存活。只是他和龙彪的后腰上留下一个一模一样的疤。

许杰听后又是一番唏嘘。从那以后，她便放心地把从财政局账户上转出的钱交给阿B，再由阿B转给龙彪。阿B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各大银行取钱和回家数钱。

没错，阿B就是龙彪，龙彪就是杜建生，根据数学中的等量代换原理，阿B就是杜建生。可惜许杰知道这一等量关系并不比我们早多少，她是进了看守所后才了解这一切的，不是靠她的大脑，是反贪局的侦察员告诉她的。

据说杜建生落网后，一位警察好奇地问：“你为什么弄了七千多万还不跑呢？”

杜建生说，他的目标是实现一个亿。原因很简单，许杰好骗，财政局的钱好拿，不弄它一个亿岂不是太无能了吗！

（以上所述非本人杜撰，所有事实均是贵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率其办案人员、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率其办案人员提供。）





与艾滋病无关

罗芳华

第一次对艾滋病有一些形象的了解，是在1987年的荷兰摄影作品展上，艾滋病病人满身带血的疮孔，令人不寒而栗。

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推出专辑《危险》，其中一首《飘逸》又让我目睹了一位花季少年在感染了艾滋病毒之后，如何迅速地形容枯槁，生命“像流星划过夜空，像彩虹消逝在天边”一样，来不及灿烂就已经转瞬即逝。那一年，全世界已有三百万儿童成为艾滋病患者。

从那以后，我对艾滋病的认识就锁定为“吞噬人类健康的恶魔”。然而，在我接手《与艾滋病无关》这个片子的时候，手头的大量资料却告诉我，“艾滋病”这三个字并没有对我们调查的主人公——余梅芳造成直接有形的身体伤害。余梅芳在一次普通的因腰椎间盘突出而进行的血清检测之后，被疑诊为HIV阳性，也就是人们通常观念中的艾滋病。从此，她的身边充满了“合情合理”的冷漠、怠慢、伤害，最终使余梅芳在名誉的底线上无路可走，将对自己做出艾滋病诊断的山西省忻州地区医院和附有连带责任的市防疫站推上了被告席。

为了不被忻州市法院的公开审理所左右，我们《新闻调查》摄制组于开庭审理前来到忻州，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首先面对我们镜头的是本案的中心人物余梅芳，她身着旗袍，高挽着发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悲者模样。毕竟，



她在生意场上有过二十年的摔打，四年前又经历了丧夫之痛，生活已经把她磨炼得就算是身处逆境也仍显得洗练而坚韧。这不由得让我对她那四十七万元的高额精神赔偿诉讼请求产生了疑虑。

作为被告，忻州地区医院是当地最具权威的医疗单位，忻州市防疫站则肩负着当地五十万人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是什么力量让余梅芳这样一个外来的女商人与当地这样两个极具实力的单位对簿公堂的呢？用余梅芳自己的话来说，最初“我并不知道艾滋病的事不能宣传出去，我只考虑到赶紧查清楚，赶紧证明自己没有就行了”。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就在她从省防疫站拿到 HIV 阴性确诊报告时，她患艾滋病的消息早已传遍忻州。继而单位让她搬出原来的住处，并停租她的柜台，造成她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六万元。面对自己的生存压力，余梅芳想到的是“生意再怎么不行，也要撑下去”，自己的事就自己扛吧！直到艾滋病的事开始伤及无辜，伤及她的亲人，她才感到愤怒，才想到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

2000 年 3 月，与余梅芳同时在忻州购物中心做生意的妹夫，申请续包柜台，明明一万五千元就能包下来的柜台，购物中心却要三万五千元，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2000 年“五·一”节前，远在浙江老家的儿子要来忻州看望妈妈，余梅芳狠心拒绝了。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假如儿子一想我妈妈那么坏，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这两件事，深深刺激了余梅芳。只要带着艾滋病这个不洁之身，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她的愤怒、她的申诉完全基于一种母性的力量，一种亲情的责任，这一点完全消除了我对她诉讼动机的疑虑。她是一个“我本善良”的女人！

余梅芳的 HIV 阳性血清在提交确认之前，地区医院规定





知情人仅限于五位。我们首先采访了她的主治大夫翟先胜。一见面，翟主任就对目前不少病人“要想富，先做手术再起诉”的做法表示了极端的愤慨。同时，他也感到非常郁闷，为什么没有一个记者亲自采访他？而他的事却在“堂而皇之地到处宣传”。我们开始耐心倾听事情的原委。作为医生，翟主任和徐晋兵大夫从概念上都深知“未经确认的 HIV 阳性结果，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是规矩”。同时，他们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行为传播。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紧张，但他们还是制定了医院隔离病人、戴手套护理、销毁器械等一系列措施。正是这种草木皆兵的行为，刺激了病人的敏感神经。面对病人的“不耻下问”，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出了实情。到现在，我非常愿意相信，医院泄密并非出于恶意，但有时候，一件看似合情合理的事情，它最终却是不合法的。或许，余梅芳患艾滋病的消息的广为传播并不是医院真心希望看到的，但它毕竟是谣言的端口。在一个还有些谈“艾”色变的社会，在一些对小道消息仍然津津乐道的人的嘴里，艾滋病的肮脏程度无异于性病。这样势必造成余梅芳参加社会活动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进而直接构成对余梅芳名誉权的侵害。

在采访当中，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作为第二被告的忻州市防疫站，坚持认为自己的随访调查是在国家赋予的职责范围之内行使的。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范围是艾滋病病人（有症状，并确诊为 HIV 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症状，但确诊为 HIV 阳性）、疑似艾滋病病人（有症状，尚待确诊为 HIV 阳性）。而余梅芳不属于这三种情形里的任何一种，对此，市防疫站原本应该不作为的。

余梅芳名誉侵权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因为牵涉到四

十七万元的精神赔偿，而我国目前又没有一部关于精神赔偿的具体法案，忻州市人民法院正在以非常审慎的态度处理此案。据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凌燕博士介绍，目前，我国的精神赔偿额主要依据侵害人过错的情节程度、后果和经济承受力来裁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且地区不同，数额也不等。比如，广东下限为五万元；上海上限为五万元。虽然关于数额问题众说不一，但能对精神损害实行赔偿就反映了一个社会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同时，中国人大法学院院长王利明告诉我们：人的名誉是无价的，赔偿只是起到慰藉和惩罚的作用，虽然赔礼道歉有时也能化解受害人心中的愤懑与不平。新疆铁路中心医院就曾对被他们误诊为 HIV 阳性的一位病人马上赔礼道歉，并辅之以三千元人民币的赔偿，及时地化干戈为玉帛。于是我们想，如果医院能坚持不说出实情，如果在省防疫站的确认结果下来时，医院能及时地更正自己的诊断，并在已经波及的范围内肃清影响，事情或许会是另外一番结局





——当然,这只是后话。

就在我们结束拍摄的时候,各大媒体纷纷披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迅猛增长,而我国艾滋病人的数目有可能达到六十至一百万人。无情的现实再一次警示: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的医疗部门、我们的卫生防疫部门,甚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该如何应对?

(此案山西省忻州市人民法院已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忻州地区人民医院赔偿原告——浙江女老板余梅芳精神损失费两万元、经济损失九百零五元;被告忻州市卫生防疫站赔偿余梅芳精神损失费六千元。)



😊 —观众来信仅寥寥数语:“提供新闻线索是否要缴押金?如果需要请告诉我多少就够了,并告诉账号和开户银行。另外,是否给开押金收据?”

😊 中心组肖静勇敢地怀孕了!其河南籍的丈夫忙前忙后,乐不可支。一日,其丈夫回来后,满脸狐疑道:“听别人讲,怀孕时女人反应很厉害,怎么你跟没事人一样?不会是诈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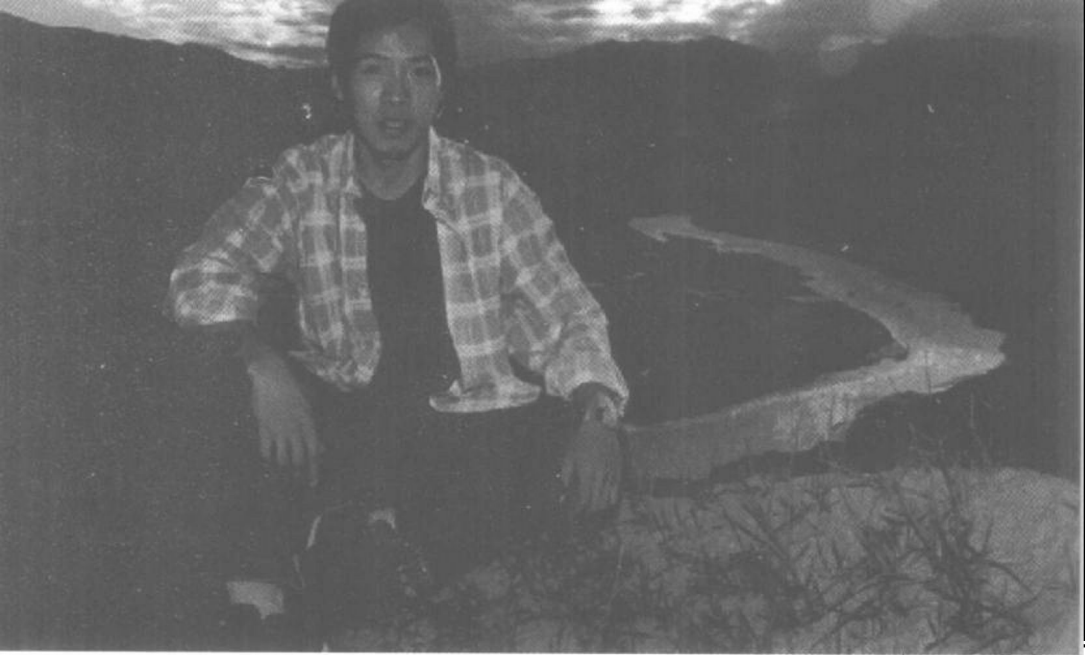
关于摇头丸

刘庆生

我是属于那种一听说诸如犯罪、暴力、抓捕等字眼儿就特兴奋的人，拍这类题材是我的最爱。当领导说要派我去做“摇头丸”的选题时，我马上就满心欢喜地接下了任务。摇头丸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但知道它是一种毒品，目前在各地的酒吧里不少人在吃这种东西。

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毒品，它是甲基苯丙胺（冰毒）的一种衍生物，是一种精神类毒品。

早些年摇头丸主要是靠进口。1997年在上海发现全国首例吸食摇头丸案时，当时的市价是一颗五百至六百元人民币，产地为港台和柬埔寨、缅甸，也有美国产的精品，据说一颗要一千六百多元。短短几年时间，现在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由于麻黄碱在国内并不难找，而麻黄碱用很简单的方法去掉一个氧就可以得到去氧麻黄碱，就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据说这个过程在家里用高压锅就可以完成，因此当冰毒开始兴起之后，不少境外毒枭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趁着警方还不太了解这种东西，他们要么带着资金和设备，以投资建制药厂、化工厂的名义在东南沿海建厂生产冰毒、摇头丸；要么找几个人租下几间房，买上几个煤气炉和几口锅，就可以开张了。目前，在福建、广东每颗摇头丸的售价为二十五元左右，在北京以及各省会城市，摇头丸的批发价为每颗五十



从湖北电视台投奔到中央电视台，隔着千山万水，但在刘庆生的心里，依旧眷恋着那片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

元左右，零售价为每颗八十至一百二十元左右，视品种、货色而定。

想拍到摇头丸交易是我一开始的设想，可真正开拍了才知道是如此不容易。据警方介绍，买摇头丸现在都这样：一个人带着货根本不进场子，另一个人负责收钱，收了钱就走，第三个人负责送货。货要么放在啤酒里给你端上来，要么走到你身边把药往你嘴里一拍。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是只卖熟面孔，不卖生面孔。我原来设想在相对安静的包房里找服务员买，声音也可以录下来，可人家根本不上你这当，几经努力都未获成功。后来别人告诉我，你要想买到其实也不难。你每天都去同一个场子里泡着，什么也别干就是消费、玩，花钱花得越多越好。这样，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个把月你不主动买，都自然有人来向你推销的。一听说这个我立马傻眼。





摇头丸的危害是节目的一个重要内容，节目中已讲得非常详细。但是，拍完这个片子我发现，这些危害不仅那帮傻乎乎的去吃摇头丸的人不懂，甚至很多警察也不懂。一位搞禁毒工作的老兄是这样给我解释摇头丸的成瘾性的：“抽烟的人一天不抽烟就会受不了，吃摇头丸的人别说一天，就是几天不吃摇头丸他也不会受不了。”连如此重要的部门的警官都只有如此浅薄的认识，看来摇头丸的泛滥是有它认识上的原因的。听说，现在有不少人把摇头丸当减肥药吃，真是找死。

此次拍摄让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不要妄想在有摇头丸的酒吧、迪厅里录下除了迪士高以外的其他任何声音。在舞厅内拍摄的那几天里，我们每天晚上九点以后进入舞厅，在震撼心肺的音乐声中一直坚持拍摄到深夜三点左右。为了不至于太引人注目，我们必须一边拍一边还得装出一副陶醉于音乐当中的样子，且随着鼓点不停扭动。可怜我一个从不愿意进迪厅的人，每天回到房间耳朵便嗡嗡响，小心脏怦怦跳，根本无法入睡。在后期编辑的时候，只要一放在舞厅里拍的那段素材，我就会随着音乐嘴里乱叫，肩膀瞎扭，基本实现了不吃摇头丸而达到吃摇头丸的效果。

拍完这个片子，看到了不少内部资料，我才知道我国的毒情有多严重，才知道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毒贩子们对我国渗透得有多厉害。每年我国缴获的海洛因的数量为六吨多，按国际上公认的一种算法，实际的消费量是缴获量的十倍，即六十多吨。仅2000年，全国就新增吸毒人员十万六千人。多可怕！

行走在真相边缘



徐 慨

2000年10月18日,就在《新闻调查》刚刚亮出“探寻事实真相”的旗号没几天,广西南丹县大厂镇鸿图选矿厂发生尾砂坝坍塌事故,造成二十八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10月22日和23日,《新闻调查》连续接到当地群众举报,称当地政府隐瞒死亡人数,而且,由于广西的一些“人物”在当地的私人矿井中有股份,当地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记者采访报道这一起事故。为了核实情况,我们在第一时间与当地报社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自称事发后一直坚守在事故现场进行秘密采访,已取得的大量文字和图像资料可以证明当地政府企图掩盖事故真相。他还说,为了销毁证据,当地政府在没查清楚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就匆忙清理事故现场,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很可能什么都拍不到了。

事不宜迟,制片人特事特办,当即派一个六人摄制组赶赴南丹县“探寻真相”。在出发前的小组会上,“老特务”陈强以他惯有的怀疑一切的阴沉语调对大伙儿说:“这事儿,我觉着,得多准备几套方案。”这“多准备几套方案”是什么意思?是想方设法把死亡人数弄清楚?还是在死亡人数有可能弄不清楚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另辟蹊径?“老特务”当时没说,我也没听明白。反正大伙儿谁也没有答理他。

10月25日晚八点,摄制组到达南宁机场。与北京清冷的空气带来的感觉相反,南宁湿热的空气让人觉得像是闷在澡





堂子里，混混沌沌。一千人马马不停蹄，一下飞机就钻进了一辆事先租好的面包车里，直奔离南宁有十个小时车程的南丹县，大家希望在明天九点钟——当地政府组织清理事故现场之前赶到事发地点。深夜里，面包车孤独地在似乎无止无尽的崎岖山路上颠簸，汽车底盘擦过石块儿的声音不时响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山里起了大雾，车灯所及之处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司机是通过什么参照物来识别一个接一个的弯道的，只觉得那层层穿不透的迷雾不是一个好兆头。患有小资产阶级综合症的我，不由自主地琢磨起这离奇山雾的象征意味，还没等我琢磨清楚，睡意袭来，我的头不折不扣地靠在了王忠新宽厚的肩膀上，完全把“家中领导”刚刚发出的“乘夜车走山路不许睡觉”的最新指示抛在脑后。

第二天(10月26日)早上七点，天刚蒙蒙亮，我们赶到了南丹县大厂镇，与报社记者取得了联系。这位矮矮胖胖、白白净净、眯缝眼、戴着一副宽边金丝眼镜的记者一出现，立即神秘地把编导罗陈和我拉到一边，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问：“你们用的是哪里的车？司机可靠吗？”把气氛弄得比地下党接头还紧张。我看了看周围，一个敌人也没有，但也不敢怠慢，压低了嗓音答道：“是自己人，靠得住！”对完暗号之后，他像终于找到了组织似地说：“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们已经在事故现场守了三天三夜了！”这位报社记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会儿说我们必须换车，因为外地车辆无法进入事故现场；一会儿说为了不被人发现，摄像机不能带，只能带照相机进去；一会儿又说必须马上去现场，赶在关卡的守卫人员上班之前，赶在当地政府清理现场之前。

我们给弄得摸不着头脑。在去现场的车上，众人都准备好了各自的工作器材，虽然大家一言不发，但那股严肃劲儿告诉



我每个人都在作最坏的打算。报社记者称自己因为出来得早，没有带自己的采访相机，不由分说地把王忠新的宝贝疙瘩尼康 F3 挎在了自己的身上。同我们从广西来的司机问他去事故现场的路该怎么走，他反过来一个劲儿地问其他的人。这人不是说事发后一直守在出事现场采访吗，为什么连去事故现场的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当我们的车子经过事发现场，报社记者称如果我们就这样下去拍摄，恐怕会受到当地警察的干涉，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他请国营华锡集团铜坑矿区的矿长带几个公安处的同志陪我们一起去采访，这样会比较好。尽管我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任何被举报人和他一再提及的“关卡”，也没有在现场周围见到任何警察，但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兜兜转转，折腾到了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到达尾砂坝坍塌现场。虽然事故已经发生一周了，从十多米高的尾砂库里倾泻而下的泥水仍然淤积在街道上，时刻提醒着人们它在事发当天的威力；街道旁是被泥水、废砂和石块冲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被黑色的泥水浸泡着的砖瓦、门板、被褥、鞋子、动物尸体等随处可见，废墟堆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满头大汗、肩挑着被子和锅碗瓢盆的民工、怀抱婴儿的妇人，在崎岖不平的废墟堆上行色匆匆，嘴里念叨的都只有一句意：“回去，我们回家去，这里太怕人了！”

接受采访的现场群众对事发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描述起当时的惨状来仍心有余悸。但是，当被问及到底有多少人在此事故中丧生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有数十人，有的说有一百多人，有的说有几百人，简直就没有谱。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在场的群众没有一个人相信当地政府对外公布的死亡二十八人的数字，虽然拿不出证据，但都说死亡人数比二

十八人要多得多。据说有这样的规定：如果一次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人，国家有关部委就要派专案组下来检查了。因此，当地政府为了不让上面来人检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人。为了核实情况，我们在现场采访完之后，当天下午就来到主要承担这次事故抢救任务的华锡集团大厂工人医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地政府及大厂工人医院在事发后采取了非常积极、有效的抢救措施，五十多位受伤人员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但是，对死亡人数的调查仍然是毫无进展。

我们在事故现场的采访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采访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来清理现场“企图毁掉证据”，这些都与举报人及报社记者的说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当我们要求报社记者



徐慨：“对于一心要探寻真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揭穿假相带来的快乐更令人满足呢！”



拿出所谓的他“偷拍”到的当地政府偷偷处理尸体的照片，以及他从公安局拿到的超过二十八人的死亡名单时，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而拿不出这些证据。至此，我们终于探寻到了真相的第一层含义——用“老特务”的话说，我觉着，我们被耍了。

也许世事就是这样不可理喻：我们被别人蒙在鼓里的时候，并不妨碍我们保持亢奋的心理状态，而当我们知道自己被别人愚弄了，我们却一下子失去了支撑点。依靠举报人来获取事实真相显然是不可能了，依靠我们自己，就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吗？

10月27日上午，在坍塌的尾砂坝前，南丹县常务副县长杨永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杨永溪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一名围观的群众突然对记者说：“他（指杨副县长）在说谎！”摄制组众人人为之一振，忙把镜头对准此人，以为他会说出什么“真相”。其实，他只是对政府在登记完死者遗体后要求立即处理尸体的做法有不满；对政府给每个死者两万元的抚恤金嫌少而已。杨副县长介绍说，此次死亡的二十八人中只有一名学生是本地人，其余都是外地来这里矿区打工的民工，政府曾三番五次地要求他们撤离尾砂坝周围的危险区域，甚至还强行拆除了民工们搭建的工棚和其他违章建筑，但是，前脚政府拆完，后脚民工又把房子盖在了尾砂坝下。而且，这些民工来矿区打工，既无固定居所，也无相应的登记管理，到底有多少人、又是哪些人住在尾砂坝下，政府都无从查起。因此，在没有人报告失踪的情况下，政府只能以现场发现的尸体来确定死亡人数，这就是“二十八人死亡”的由来。虽然，杨副县长的解释并不能成为政府推托责任的借口，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纠缠在“具体死亡人数到底有

多少”的问题上,我们就显得“没有心理依据了”(杨春语录)。
后来,我们在大厂镇民政局查阅到的死亡人员名单,以及领取抚恤金的家属名单,与我们在事故现场了解到的死亡人员情况都是吻合的。

在鸿图选矿厂尾砂坝采访时,我们巧遇了广西冶金设计院二所总工程师伍炳源,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尾砂坝在设计、建造,以及使用上有非常明显的、也是致命的一些错误。如果当时这个厂请冶金设计院的工程师来看一看,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次事故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伍工程师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他说,据他所知,大厂镇上百家选矿厂、上百座尾砂坝早已建成投产,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才请他所在的广西冶金设计院前来勘察的。伍工程师的话与杨副县长介绍的“每一座尾砂坝都请冶金设计专家来勘察过”是明显矛盾的。杨副县长说,尾砂坝的日常安全检查是由大厂镇的环保站承担的。但是,我们在采访大厂镇环保站的站长唐毓飞时,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环保站只管尾砂库的排污是否达到环保标准,不可能管尾砂坝的安全问题。谁说不是啊!

对于一心要探寻真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揭穿假相”带来的快乐更令人满足呢!设想一下,假如举报人说的都是真的:当地政府果真一路上设卡放哨,他们连夜清理事故现场,他们千方百计阻止记者采访,他们在我们拿出的铁证(比如偷拍到有人趁黑夜偷偷处理尸体的照片;比如医院、公安局和民政局的死亡人员名单对不上号;比如鸿图选矿厂的注册登记档案一下子失踪了等等)面前百般狡辩,那么,对方就会一步步陷入我们的圈套,我们就一定会获得扎紧口袋时的无穷欢乐。但是,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对手的



战斗,甚至连战斗都不是,根本就是游戏。我感觉自己行走在真相的边缘,离原先设想的“真相”越来越远。怎么会是这样的局面呢?摄制组的每个人都心有不甘,但每个人都得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真相在哪里?我们能弄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吗?如果能弄清楚,死亡人数就是事情的真相吗?如果弄不清楚,我们还能了解这件事的真相吗?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只有唯一的答案吗?如果不是,到底哪一个答案更接近真相呢?

10月27日傍晚,我们从大厂镇赶到南丹县政府所在地。县委书记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从北京出发的飞机一起飞,我就得到消息说你们到南丹来了;你们不用问我我的消息是从哪得来的,总之你们有你们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唉呀,你们来了,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0月28日上午,我们采访了在押的鸿图选矿厂的法人代表和分管安全的副厂长,发现日常的安全生产检查确实是由环保部门来承担的,但他们检查时非常马虎,就在事发前一周,环保部门还根据县安全生产委员会的要求对尾砂坝进行安全检查,仍然没有发现问题;下午,我们分别采访了南丹县土地局、计划局、工商局,发现鸿图选矿厂在注册、登记、审批方面的手续是基本完备的。傍晚五点十分,在环保局,记者问道:“环保局是否也承担了大厂矿区尾砂坝日常安全生产检查的职能?”聪明绝顶的和升蛟副局长一连用了十几个“不”字来否认环保局在此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五点四十五分,南丹县劳动局局长、南丹县安委会主任莫玉军接受采访时,承认县政府曾经发文指定尾砂坝的安全问题由环保局及各级环保站来负责,这个决定是在没有任何环保部门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决定做出后,县政府和安委会也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环保部门的异议。

晚六点十分，莫玉军走出接受采访的房间。在最后一位采访对象进来之前，摄制组成员进行了对该节目的最后一次讨论。此次讨论是本节目在拍摄过程中历经的多次讨论中持续时间最短（约五分钟）、话语交锋最激烈、也是最见成效的一次。冤有头，债有主，究竟谁应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呢？如果这是一起没有责任人的事故，那么，事故为什么又偏偏就发生了呢？“老特务”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这事儿，我觉着，能做。”晚六点二十五分，南丹县县长唐毓盛走进房间接受采访。杨春一脸真诚地凝望着局促不安的唐县长，问道：“你认为环保部门有能力承担起检查尾砂坝安全状况的职责吗？”唐县长沉默半晌不语，最后说：“当时这样的决定可能是欠考虑的。”我真希望能看到县委书记也在场，不知他会不会有“依然的笑容”。

采访唐县长之前的最后一次小组争吵，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老特务”所说的“多准备几套方案”的含义了。能查清楚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当地政府是不是真的隐瞒了事故的真实情况，固然是“真相”。但是，在一套看似正常的运作体系下，一起严重的事故仍然不可避免的发生，所有相关的部门及其负责官员全都有各自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这种集体的无意识，难道不是导致此次事故的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原因吗？

在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不能忘记自己到《新闻调查》后参与的第一次采访。走出房间，外面已是夜上浓妆。





事实与神话之间

何 勇

反映事实似乎是电视新闻的必然职能，体现着一个新闻机构、新闻栏目或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和职业道德，但我们的新闻真的是事实吗？

生活本身是处在无序的、混沌的、多维的状态，我们长期形成的语言方式却是具有逻辑的、线性的表达。我们有明确的逻辑思维，明确的善恶，这种进而成为我们思维方式的语言方式，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与生俱来的好恶和直觉。因此，当我们开始接触事物，便不由自主地将其纳入一定的逻辑中；当我们的直线思维和多维的事实相对应，便会产生很多断点，使得我们必须将其补全，此时就需要编辑的功力和智慧了。当然，这种真实的虚假，往往不是由编辑的思维和逻辑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来决定的。清楚的思维会在传者和受者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甚至会产生愉悦之感，因此，是观众与新闻机构一起编制了种种真实的谎言，最终造就了一个比较分明和具有逻辑的社会，这就是“媒介描述的社会”。

《判决未被执行》便是媒介描述的神话。这条新闻从第一个接触它的记者开始就带有神话的特征。故事说的是一个罪犯被判处了六年徒刑，但七年了还没有执行。从事后看来，当第一个述说这个故事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便有意识地选择出

最具有戏剧性的部分，有意识地省略了比较枯燥而且多义的细节，并且为制造戏剧性虚构了部分素材，最终完成了整个神话的塑造。该故事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 李建民在 1992 年因贪污罪和非法拘禁罪被判处六年徒刑(罪行确切)；

2. 在判决当天，宣判结束后，执法者一个个离开现场，李建民四顾茫然，只好回家(噱头之一)；

3. 李建民在乡间自由生活，经常进城抛头露面，也无人理睬(噱头之二)；

4. 李建民还不安分，1999 年参加了村委会选举，高票胜出(噱头之三)；

5. 镇政府接到举报，严肃对待，终于在中国基层民主的重大事件——村委会选举中将其暴露，绳之以法(噱头之四)；

6. 公、检、法三机关互相推托，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噱头之五)。

如此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荒诞，戏剧冲突不断，并且可以探讨体制的漏洞，应是一条好新闻。但到了当地之后，发现事实出入很大。

我们所得到的判断的实际情况是：

1. 李建民只挪用了一万五千元。按照今天的法律，可能不会判那么重，但当时正好有些临时规定，比如，挪用公款到了三年，便可以判贪污罪；贪污公款达到一万元以上，应判五年以上徒刑。李建民正好撞在枪口上，判了六年，而这个枪口是如何撞的，至今还有些不清楚。

2. 当时到底宣判没宣判？至少在宣判当天，公诉人没有到场，只有法院的人在场。李建民自己说，法官对他说，只要你把钱还到法院，可以不服刑。但是，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在地区法院查阅案卷时,只有一份手写的判决书。有一点可以明确,如果真是如此(非常有可能),那么,之后的所有的噱头和戏剧性都不存在了。

3. 发现李建民没有服刑并不在选举之时。李建民的乡村生活时常被上门追债的法官所打断(有同村村民的证词为证),而不是在监狱之外优哉游哉。

4. 李建民的被捕是不是由于选举?据当地村干部说完全不是。李建民帮助村里和镇里打官司,镇里为了报复,才纠合了县里的有关部门,翻起了当年可能做过的判决,将李建民关起来,免得惹事。

5. 将李建民关起来需要理由。于是一个判了六年徒刑却逍遥法外的荒诞故事便诞生了。这自然引发了对法律漏洞的



背包的就是编导何勇。在现场,编导基本上都要干这活儿。

探讨和责任的争论。出乎有关始作俑者意料的是,这件事由于构思的巧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的注意。在新闻单位的轮番轰炸下,事实才露出并不完整的枝枝杈杈。

但问题在于,这些枝枝杈杈并不足以完成一个新闻故事。对于一个三十分钟的新闻节目来说,故事性和系统性是新闻报道成立的前提。这是后期编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在现场采访中,我们发现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止公、检、法三个单位,包括李建民在内,他们的证词的可信度都值得商榷,有些是明显说谎,有些却难以证伪。

如果能够像《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一样,一个乘客述说完了,马上有人跑出来说“他是凶手”或“他在撒谎”,那么节目可能很好看,可惜这个人找不到。我们缺少能够真实叙述事实并且为人们承认的人物。

最后做的是:

1. 保持神话的戏剧性,因为,这是吸引观众的唯一理由。

2. 安排谈论的议程,让各方自己表演,至于能看出多少来那就看观众的本事了。

3. 突出相关的事件,引导观众的注意力。如果观众最后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法院收的钱到哪儿去了?也就行了。

我不能保证我所说的和判断的都是事实,我所做的只是在神话和事实之间选择一个点,事实上,任何神话的出现都包含着歪曲事实的因素。这距离我们“新闻背后的新闻”的宗旨有很大差距。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揭示“新闻背后的事实”,之所以加上“背后”,是提醒事物的背后还有另一面。但是,我们很难发掘背面,之所以成为背面是因为人们不在意或不愿意在意。





坚持 坚持 再坚持

孟 克

“用事实说话”这是《焦点访谈》节目播出时人们看到的第一句话,由此可见,事实是否充分对于访谈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由于访谈节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采访中所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因此,记者在采访中探求事实的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

有很多时候记者在采访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事实已经差不多了,根据正常的逻辑推理,人们也都会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就是离最后完全砸死敲定这件事还差那么一点点。如果这时候稍微放松一下自己:差不多了,事情也就是这样。那么,很有可能最关键的东西就没有拿到。所以,在这种时候,如何再坚持一会儿,再努力一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久前,我在湖北赤壁采访教育乱收费节目中对这一点有了一些感受。

在湖北省赤壁农村采访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时,很多学生家长向我们出示了学校为保险公司代收学生保险费的收据。在当地,这种做法已经有好几年了。以前是学校强迫学生必须买保险,这次虽然没有强迫,但也是由老师亲自出面动员,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国家规定。对此,老师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明知故犯,不辞劳苦地积极向学生推销保险,这里面的经济利益人们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来。然而,光有这



种推断还不行,事实要靠证据。两天后,我们等来了国家计委价格司的同志,他们对当地一个教务组的账目进行了检查。由于账目太多、太杂,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而此时湖北的天气彻骨的寒冷,冻得大家哆哩哆嗦。就在检查组决定鸣锣收兵,我很失落地跟着人们往外走时,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又



照片上,编导拿个小板凳坐在了农民的面前,听她们述说心中的烦事。采访结束后,照片里的那位农民老大娘只说了一句话:“你像俺女哩!”

让我回到了那堆账册前。当我随手从十多本票据中拿出一本票据翻看时,就在我打开的这一页,上面粘贴着保险公司返还给学校那张百分之十回扣的保险代收费收据。

我们和计委价格司的同志来到的第二站是赤壁市杨家岭中学。根据当地规定,学校只能向学生收取杂费、代收费、搭伙费和住宿费(如果学生住宿的话)。在会计室,检查组查看了今年秋季学校收费的收据,并抽查计算了数名学生的收费情况,发现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都没有超出规定,一切看起来很正



常。检查完毕,大家朝大门口的车子走去,但此时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让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却又想不出问题在哪里。此时天已经快黑了,大伙儿忙碌了一天,都想回宾馆休息了,这时候再要坚持查些什么,好像有点儿没事非要找事的感觉。但是,最后我还是冒出了一句“咱们在校园里再转一转,让摄像再拍两个空镜头吧”。

就这样,我们在校园里又转了转,后来就转到了学生宿舍。就在我们经过空荡荡的宿舍时,一个问号突然掠过了脑子,我转身问校长:“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校长答:“一千两百多人。”“那你们宿舍有多少铺位?”“五百多张。”“那么根据你们的收费存根来看,你们向所有的学生都收取了搭伙费和住宿费,也就是说这一千两百多人都住到了学校里,那么这一千多人为什么只有五百多张床铺?”校长迟疑了一下回答道:“我们学校是两个学生睡一张床。”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每个学生的床铺上只有一套被褥,校长的回答显然无法让人信服。事实很明显,学校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向不住校的学生也收取了搭伙费和住宿费。

采访到了这里,事情似乎已经有了眉目,但是,如果没有对学生的采访,离敲定事实还差一步。由于是周末放假,在校园里找不到一名学生,而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转身又接着来到了附近的村庄。在查询了几户人家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名杨家岭中学的学生,这名学生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在学校吃过一顿饭,住过一天校,但是,学校却向他收取了这两笔费用,而像他这种情况在杨家岭中学还有很多。

在赤壁市的采访中,类似的事还有两三起。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么两句不太搭界的话:“坚持就是胜利”和“回头一看值千金”。的确,有时候就在你觉得差不多又差那么一点点的时M候,再坚持一下,事情也许真就不一样了。

《新世纪 新生活》月记·周记·日记

张虎迪

接拍《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新世纪 新生活》时就憋着一口气，为啥？一是因为这是本世纪《实话实说》最后一次录像，最后一次播出，而且用崔永元的话说，“特别节目一直是出力不少，花钱不少，结果不讨好”。二是梁建增主任的战前动员，土话译作煽呼：“一定要出新，创意要大胆想象，打破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那架势，那意思，就似《实话实说》现场搬月球上录一期也不为过，钱不成问题。

凭着这气，这财力，放开胆子招呼吧！六个男女老少，满北京折腾。找资料、看景点，整天大眼睛瞪睡眼般的熬夜，恨不得透过对方的眼珠子钻到他脑袋里看看他在想什么。就这么瞪了一个多月，创意文案到了第四稿，才博得崔永元一笑。立马组班子准备杀向全国，此时的日历是上个世纪的12月2日晚九时（请看官注意每次日期的提示）。大概是夜幕降临的原因，大家非常亢奋，我们要吹一个一百三十万元的超现实的美丽大泡泡！那夜无人入睡。

周一，丁戈汇总整理打印用款报告，请梁主任签字。估计梁头当时的表情像一句成语“什么公，什么龙”，用他那支笔像评委打分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又像小学老师教连减法把一百三十万减去一百万再减去十万，最后就剩下了二十万，一下将五色斑斓的大泡泡给戳破了。





听此“噩耗”，我和海啸、贾乐正在大连帮着台青少中心的老小孩儿们寻医问药，解决返童术问题，三个人都差点背过气去。当时日历显示的时间是上个世纪的12月10日，离规定录像时间只剩十四天。那段时间，真叫“最近有点烦”外加这事儿有点悬！烦在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悬在事儿没有，景没做。

此事经验：见兔子再撒鹰，不见钱，甬接活儿，不听“老人”言，吃亏在后面。

这时候，就剩我和海啸傻眼瞪傻眼了，两个“黔驴”每天在我们栏目组232房间转磨。那些日子海啸每天灵魂出窍的时间日趋严重，真担心再熬几天见了我会问：“你是谁？”每天午夜回家，我要出租车先送他回家，怕他走失。



岁老人的孙子。

在《新世纪
新生活》节目中，崔永元成了这位百



那些日子我能撑下来，有一半是来自八岁的女儿每天晚上的寻呼：

爸爸，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爸爸，我要睡觉了，晚安！

爸爸，回来晚，注意安全。

每一天变化内容，每一天为此感动。

烦着、熬着，直到了12月15日下午两点，才试着打最后一张底牌——找一个大家族来。

我马上动用全国的“线人”，用“地道战”里的话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第二天，从上海、辽宁、黑龙江、河南等地陆续传来坏消息，不是年龄太大（不能说话，不能走了），就是不符合标准（要求是几代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不同的职业，最好有近百人的组合）。河南一个百岁老人，有一百八十九个后代，只分布在郑州、新疆；鞍山有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四代人从事二十多个职业，但是人口只有三十多人。

最后只好将视线收回至北京。东、西城老户多，但百岁老人都让我们同行给折腾怕了，折腾病了。一打电话，听到的就是刚走一拨儿，下午还有一拨儿；要不就是老人住院了。没办法，只得向外城打探，海淀、朝阳、昌平、通县……海淀老龄协会的马小姐头一天没对此当回事，只是敷衍了一下。第二天我又急“追”，马小姐来了个马到成功，给了我一个绝处逢生：“军科有个老太太，刚过百岁，眼不花、耳不聋，能缝纫、听广播，具体事儿你自己去了解吧，我要下班了。”我大喜：“谢谢，周末愉快。”真正是我们的周末愉快！再通过居委会，再找到老太太能说会道的六闺女一了解，哇塞！老太太有五代人，分布在全国东、西、南、北、中，外加美、日、台，从事四十三个职业，头是一百岁老人，尾是龙年初一出生的一岁重孙女！天上掉下一



个“大馅饼”！

这时才觉肚子饿。崔永元大喜，放出话，京城馆子任你们挑。这回是没吃馅饼吃海鲜喽。

当晚打电话给六闺女，告诉我们的决定：“中央电视台正式邀请隆老太在国内的全部亲属到京，参加录制新世纪特别节目，要求是一个都不能少！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海外的我们采用科技手段进行实时传播。”

我们把“大馅饼”又送给了余家（隆老太的夫家姓余），六闺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吧？你不是骗子吧？开玩笑吧？”

这也难怪六闺女的警惕性高。隆老太在节目里都说：“现在什么都作假，门门都假……”从此，我和海啸一直以骗子的角色贯穿始终。这是五年来从事《实话实说》策划生涯中，对节目信任度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证明我们的身份与诚意，按崔永元的吩咐，备厚礼登门拜访，闯军科干休所。进门落座，上礼物，亮身份，聊情况。没五分钟，进来一个行伍出身的所长，估计是余家安排的，门外是否有人没敢看。反正要是骗子肯定来个“瓮中捉鳖”。没关系，头天晚上吃的也是鳖。

所长坐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可能觉得骗子的知识素养还行，说话也中听，便无趣地说了一句：“你们先聊着，我还有事先告辞了。”待我们把一切都落实且安排明确后，握手告别离开余家，没想到仍有两双警惕的眼睛一直跟踪着我们，看着我们钻进每公里一元二角的出租车，男眼睛与女眼睛对视了一下，心里又打起鼓来：“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策划，竟没有自己的车？肯定是……这段对话是六闺女和老伴儿（军科院军史研究员）在录完节目后告诉我们的。



第二天,他们采取了反侦察手段,命令我们必须在当天给四川的某某发邀请函,否则来不了(估计现刻公章是来不及了)。随着往各地亲友家派送“馅饼”,反馈的信息是愚人节是不是提前了?(由于飞机票、软卧票钱需自己先垫付)于是乎,通过七拐八弯的关系找到了台人事处,惊动了部里的刘大秘,把我们又政审了一回。说起来真有点冤!

人有了,找事吧。我和海啸兵分两路,分别从九十多人中筛选出能说会道、有想法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后怕,工作量差不多顶一年的采访人数。

贾乐负责计算机联网、现场直播。他愣从一个白帽子到后来变成了行家,真是一个假傻子,到节骨眼时一点儿也不傻(假傻子是《实话实说》初期赐的号)!

人、事在逐渐地丰富,而录制用景却是空白的。12月18日正式谈制景,要求六天内完成。这活儿打死也没人敢接。然而,穷则思变,凭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加上九十年代的酷词:“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还你一个惊喜。”——没一句是实话。我似老虎吃了豹子胆,竟然装了一回傻,充了一回愣:场景设计、制作一揽子全归了我。真是傻子冒傻气,凭着棒小伙子睡凉炕,不知冷热、不知深浅地到最后居然碰了个头彩。

真是应了现场挂满的如意结,录制一切顺利。海啸在现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下来还埋怨我不与他交流情况。他不知我守着氧气袋和急救药,一直盯着二十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表情。他们可都是熟透的瓜,万一这一激动、紧张,引发心梗、中风,不得了。亲属中虽有医学高手,但要没了这些东西也是无米之炊。与场上人的心跳不一样,他们是激动,我是担心!其实我是狗咬耗子瞎操心,后来才知道,老太太打麻将四个小

时不下来,您说她是人还是神?

节目录制的最后环节是余家五代人与我们冲着摄像机,在红彤彤的花球和我们几个菜色的脸的衬托下一起喊:“新世纪好!”我真想缀一句:“‘骗子’骗得不容易!”

节目播出后,有圈内人士评价小崔有点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殊不知,小崔给奶奶当孙子,一点儿不吃亏,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六十九岁的亲属要叫他爷爷!



与同事们一起看观众来信,常常是件令张虎迪(中)开心的事,以至来组里实习的外国留学生也乐得手舞足蹈。

放 茅

汪东升

放茅,意思是上厕所,是监狱里的专用词语。监狱里每天生活的开始和结束都伴随着监狱干警的那声“放茅”。在监狱拍片的几天里,“放茅”这个词语似乎总是能出现在周围单调的声音中,并在记忆中反反复复、无休止地回荡。

拍摄服刑犯人放假回家的那一天,天下起了雪,时大时小,偶尔太阳还会出来露上一面。由于前几天的拍摄太疲劳,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起床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十分钟,连厕所也没顾得上,拎着摄像机就跑了出去。按照前一天晚上的计划,三台摄像机各自到达指定的地点准备拍摄。从服刑犯人的家属来监狱接人,到通知服刑犯人换衣服,走出监狱,一切都十分顺利地被我们纪录下来。也许是拍摄到一个十一年没有离开监狱的服刑犯人踏出监狱大门的一刻,我们过于兴奋和专注,当服刑犯人和他的家人上了车后,我们并没有马上跟进车里,因为,大家都清楚远去的车应该是这个段落结束的镜头。车子像我们想象中一样,在监狱大门的背景下远去。几乎同时,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相互傻傻地看着对方,又看看远去的车,虽然没有人说话,但那眼神似乎都在问:“你为什么没在车上?”我们很清楚:失去了这一段服刑犯人在路上和回家的第一反应,片子就失去了很多光彩。

拍摄一个服刑犯人与拍摄一名英雄不同,特别是对于被拍摄者的家属来说。家属能否同意拍摄一直是我最担心





在拍摄现场，沉默寡言的汪东升(左)总是用一双眼睛说话。

的。为此，我们连续几次去服刑犯人家，终于征得了家属的同意。但现在，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我想这计划中最精彩的段落是没戏了。因为，对于服刑犯人和他的家属来说，无论哪种角度，我们的摄像机总是注视他们的一双眼睛，特别是对于一个失去了十几年自由的人来说，那绝对不是令他舒服的事。我本能地开始截车，在监狱长的帮助下，我挤上了另一辆服刑犯人家属的车，向通往北京城区那条白茫茫的高速路驶去。

在这样的天气里，高速路上的车很少，我在拥挤的车里焦急地呼着服刑犯人的家属，虽然，我知道回电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开阔的前方，并没有我寻找的那辆车，周围很静，我的脑子也像眼前的景色一样，一片空白。一直到下高速路的弯道，仍没有电话打进来。看着弯道下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车子，丧



失希望的我下了车，掏出手机，准备给监狱门口的同事打个电话。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服刑犯人家属的电话！那清脆的电话铃声至今仍响在我的耳边。对方告诉我，他们的车已经到了二环路，无法停车，只能慢慢地开，等我赶上来。我马上又打电话给在监狱门口等待的同事。很快，摄像师小蔡开车来了，我们顺着二环路又开始了追赶。

城区里的车多得几乎走不动，车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段古筝曲，时紧时慢。寻找着被拍摄服刑犯人家的车子，听着这样的音乐，我感到了一阵阵的憋尿。

终于，我们在距离被拍摄服刑犯人家还有五分钟路程的地方，追上了他们。我一头钻进他们的车子，拍摄着我想拍的镜头。

被拍摄服刑犯人家，一屋子的亲戚在等待着。从服刑犯人踏进他久违了的家门那一刻起，那种夹带着悲伤的喜悦和激动就笼罩着我们。生活的生动永远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从服刑犯人家出来时，已是下午。回监狱的路上，我和小蔡谁也没说话。许久，小蔡说：“得停一下车，撒尿。从追他们车的时候，我就想撒，特别是听着那古筝曲。”我惊奇地看着小蔡，并没有告诉他我同样的感受，只是说：“那就停车，放茅吧！”

这时，雪停了，阳光把一切照得很刺眼。面对着高速路旁广阔的、被白雪覆盖着的田地，小蔡吹起了口哨，真的很舒畅！





《暴风雪过后》拍摄日记

王忠新

在世纪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时间，灾情成为全国各界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作为全国最大的电视专题新闻栏目《新闻调查》，理应成为灾区报道的主力军。

据气象预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灾区将在元月23日（除夕）有一场大暴风雪。不知这场暴风雪将对已遭受了雪灾的牧民又是怎样的打击呢？为了能够真实地记录这次降雪给牧民带来的灾难，以及牧民们抵御暴风雪的能力和 spirit，《新闻调查》制片人赛纳立即抽调人马组成摄制组，并为了保证摄制组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顺利拍摄，从物质上作了充足的准备：包括租用超低温下用的海狮卫星电话；购置专为去南极定做的棉裤和七个千瓦的发电机。向这样武装一个摄制组，这在《新闻调查》还尚属首次。你再看看姚大姐和孙迅一趟趟那个忙劲儿，买了这个买那个，生怕我们到了灾区冻着、饿着，从寒痛乐到口香糖，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还有制片人那一个个与灾区各方的联系电话，足以看出对此次报道的重视程度。

元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由徐涛、董倩、陈强、李宏卫、张天贺、王忠新六人组成的摄制组，坐着由王浏祥老师开的金杯面包车起程了。由于春节即将来临，我们这些人无疑是将在远离亲人的茫茫雪原上过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了。这对于我和陈强来说，都是老同志，少在家过一个春节也习惯



了;对于董倩、徐涛、宏卫这些平时不是妻子守着丈夫,就是丈夫呵护着妻子的同志来说,春节期间临时离开几天也无所谓。但是,对于年轻的张天贺来讲就不同了,他同妻子平时就两地分居,而此时妻子好不容易从珠海专程来看他,可他又又要出征去内蒙古,这种以事业为重的精神的确令我们感动。

出发时,制片人赛纳、执行制片人张洁站在车门口亲自为我们送行。当我在关车门的那一瞬间,看到了那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目光,使我们更加感到此行的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

我们想象着:是我们寻找到至今仍被困的灾民,是我们将他们营救出来,并与灾民紧紧拥抱在一起。然而,当我们带着受灾的牧民突围时,又一场暴风雪席卷而来,于是我们也被围困在大雪之中,迷失了方向。一天一夜后,我们终于用海狮卫星电话与组织上取得联系,随后,一架直升飞机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而这一切都被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多么感人和生动啊。

虽然,我们是在放弃了除夕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奔赴内蒙古雪灾现场,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非常之饱满,斗志非常之昂扬。车刚刚驶入三环路时,坐在车中间的董倩忽然问大家:“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大家一听先是一愣,接着便是哈哈一场大笑,之后大家又同时对她说:“去内蒙古啊。”

我们的第一站是张家口,这里的气候和温度与北京没有太大差别。

元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早上七点,离开张家口时,我用温度计测了一下温度是零下十度。

车到张北后,透过车窗看出去,地面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雪,明显地感到了一丝寒意。进入内蒙古地界后,公路两旁已是白茫茫一片,我们的心里也多少有些激动,尽管那高高的太阳透过车窗照在大家的身上暖洋洋的,但毕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望无边的茫茫雪原,我们仿佛也看到了牧民和羊群在暴



风雪中抗争的场面。大家急于到达灾区的心情也更为迫切。

车又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昏昏沉沉的我们睁眼往车窗外一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雪非但没有想象中的越来越厚，相反，有许多地方是露着黄土和泥沙。看着这一切，宏卫有些失望了，大家也都在情绪上多少有些悲观，这样的情景离我们想象的实在是差得太远了。车进入锡林浩特市以后，干净的街道和平静的人们更无法让我们与雪灾联系到一起。

在锡林浩特市，宣传部的哈斯科长接待了我们。由于我们要去的东乌珠穆沁旗距这里还有二百多公里，为不影响工作，我们没有在此多停留。考虑到我们对路途的不熟悉，哈斯科长专门派了一辆三菱越野车为我们带路，我和宏卫坐在了这辆车上。在车上，宣传部给我们带路的那位同志对我们说：2000年12月31日刮白毛风那天，他正好在街上，当时相互之间什么都看不见；元月1日、2日、3日这几天温度下降到零下四十多度，真正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成冰的滋味。听着他的话，我的身子也在发凉。

在我们离开锡林浩特市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去东乌珠穆沁旗的这二百多公里路程，我们是在夜幕下度过的。虽然，我们无法感受车外那冰天雪地的情景，但车里温度计上的负数却越来越大。晚上八点多，我们终于在新世纪第一个除夕前到达了东乌珠穆沁旗，这时我看了一下温度计是零下三十度。

我们急于想知道灾情，急于想深入到灾区。在与当地有关部门的接触中感到他们对灾情已是很平静了。在晚饭的餐桌上，一位局长对我们说：“灾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也活下来了。”我一听顺便也说了一句：“我们来晚了。”此话一出同仁们都乐了，但从他们的表情上我可以感受到，脸上在笑，心里却很沉重。因为，我们最初的设想将成为泡影。尽管这样我们仍满怀信心，那就是气象台的预报：除夕将有中到大雪。晚上摄制组召开会议，大家就片子的思路和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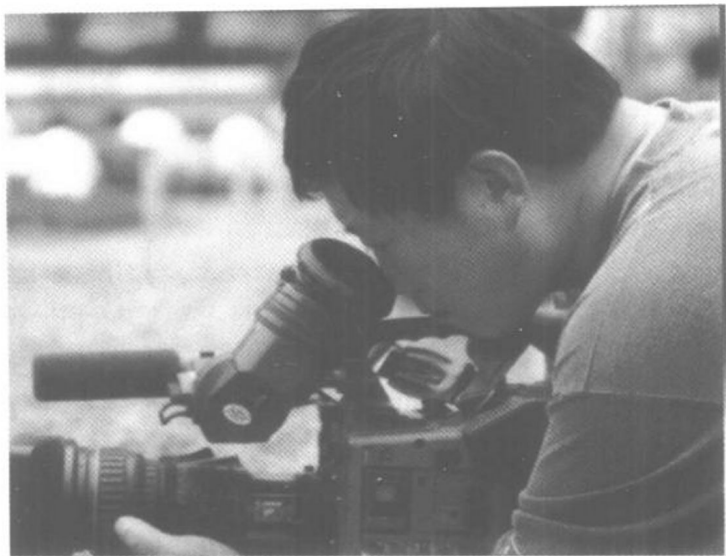
经过艰苦的采访，剧组全体人员完成了内蒙古之行的任务，暴风雪中，他们留下了这张合影。左起：录音李宏卫、主持人董倩、编导徐涛、摄像陈强，以及编导张天贺（右二）。由于是王忠新拍摄的这张合影，所以他没有入画。

重新进行了调整。

元月 23 日（除夕），这一天很冷，我们的面包车终于未能禁受严寒的考验而冻成了残废，无法再履行它的职责了。而当地有关部门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也未能给我们解决交通工具。这样一来，急得我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每个人的心情都很郁闷，直到把我们都熬得没有了脾气，还是未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当然，我们也没有因此而闲着，去气象局进行了采访。除夕的餐桌上，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好，几杯酒下肚就晕了。徐涛则为了明天能保证有车辆下去采访，比其他同志喝得更多一些。据陈强讲，徐涛刚放完鞭炮回到房子里就对他说，走，“老特务”，放鞭炮去。陈强一听他这

话,知道他喝醉了。没能在除夕夜之前下去,是我们摄制组最痛苦的事。尽管电视里的春节联欢节目很精彩,但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去看。好在这一夜并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雪,这多少让我们心里有了一丝丝安慰。

元月 24 日(大年初一),在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这一天,两辆日本三菱车载着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奔驰在茫茫雪原



对于搞摄像的人来说,手中的“武器”——摄像机就如同他的生命一样宝贵。

上。今天,我们是要去宝立格苏木寻找那两位曾在暴风雪中活下来的少年。说起来,宝立格苏木离东乌珠穆沁旗虽然只有几十公里路程,但由于路面全被大雪覆盖,很难辨别方向,于是我们不得不将宝立格的苏木长请来为我们当向导。我们坐在车里,看到车外雪白一片,没有任何方向感,任由汽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地来回折腾。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一户人家,我们心里的这个急劲就甬提了。而晕车的张天贺更是无法忍受汽车这样无方





向地转悠，独自下车将早餐全部倒了出来。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那两位蒙古少年，当时他们穿着崭新的蒙古袍骑着高头大马正在去拜年的路上。蒙古少年看上去很英俊，体格也非常健壮，如同大小伙子一样。在他们的蒙古包里，两位少年平静地向我们述说着在那天暴风雪突然降临时，他们如何用智慧与暴风雪抗争的动人故事。我们被少年娓娓道来的故事所牵动、感染，自然而然地忘却了时间。采访完之后，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但谁都不提吃饭、喝水的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中，平时很容易的大小便，在这里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摄制组中唯一的女性董倩就更不容易了，为了减少小便次数，她只好从早上就开始不喝水，一直到晚上工作完之后。

其实，冷点、饿点我们都能坚持和忍受，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为我们开车的师傅，在我们采访时，与好客的主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开了。照理说，大过年的喝酒也无可厚非，换句话说，要是真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走了，那也罢。然而，他是摇摇晃晃非要走。这一来，在回来的路上，可苦了坐在那辆车上的陈强、董倩和徐涛。本来路况就不好，车还一个劲往雪堆里开，车不是倾斜得很厉害，就是上下震动。极富有坐车经验的陈强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只有死死地抱住摄像机，生怕把摄像机撞坏了。就这样大家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这位师傅再一次将车开到雪窝里后，非要让陈强给他拍一段录像，陈强扛着摄像机绕着这位师傅转了几圈后，他还不甘心又将给我们开车的师傅（他的侄子）叫过去，让陈强又给他拍了一段后，这才算完事。好在我们安全地回到了驻地，然而，拍摄时的那种兴奋和激动却让这一路给折腾得无影无踪。

元月25日（大年初二），也许是昨天的事弄得大家心有余悸，也许是大家都再也经不起那样的折腾了，于是，我们提出了换车的要求，也正因这一要求，让当地政府为难了。车辆一



时调整不过来,我们只好在旗里采访赵生旗长。他虽然到这个旗才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他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却并不陌生。采访中他告诉我们,这场雪灾之所以严重是因为1999年在遭受了旱灾、蝗灾后又遇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它与1977年的那场雪灾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单纯的雪,而是风雪中夹着大量的黄沙。像这样的情况,在牧区生活了几十年的老牧民都未曾见过。同时,旗长还告诉我们,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牧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防灾的能力上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因此,虽然今年这场暴风雪来势凶猛,但牧民的损失却比1977年那场雪灾要小。之后,旗长还就造成草原环境恶化,以及对草原的治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尽管我们到东乌旗后这是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但他那精彩的谈话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位有智慧、有知识的旗长。从后来他给我们的名片上证实了我的判断,除了旗长的头衔外,他是博士。

元月26日(大年初三),早上天有点阴,还飘起了雪花,见此情景我们的心情有些激动,特别是据当地人讲,今天“白毛风”又要来了。于是,我们又精神大振,赶紧收拾好设备就出发了。我们的车在茫茫雪原上迎着不算大的“白毛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一户牧民家。这家的兄长告诉我们,在这场暴风雪中他家死了二百多只羊,他们为此很伤心。他告诉我们,暴风雪来的那一天他们并没有赶着羊群外出,只是因为羊圈太小,无法从容地让所有的羊都能得到保护,除了被冻死的以外,有许多是被相互挤压死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用摄像机记录了冻死在雪地上的那一堆堆羊的尸体。离开牧民家已是过了中午时间了,找到下一户牧民家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于是,徐涛说吃了饭再走吧。就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打开了速食米饭。这顿饭别人吃得怎么样我不敢说,我是吃得有滋有味。

午饭后，车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碰上了一位小伙子。他对我们讲，他是在赶着羊群走傲特尔时遇上了暴风雪，因当时毫无防寒措施，他的近百只羊全部冻死在了暴风雪里。他还将我们带到现场，把羊从几尺深的雪下挖出来给我们看。拖出来的羊一只只都被冻得硬邦邦的。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心情很沉重，并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那场暴风雪给牧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元月 27 日（大年初四），今天继续深入灾区采访，我们希望能去更远一点，且雪更厚的地方。的确，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雪的平均厚度都在五六十厘米，但当我们来到雪原上那一座孤零零的蒙古包时却看见了这样的情景——蒙古包内一位老奶奶怀里抱着两只小羊羔。主人告诉我们，小羊羔是昨天才出生的。当我们问及他们家受灾的情况时，主人说，一只羊都没有死。我们问他为什么呢？主人说，入冬以前就将大部分羊卖掉了，剩余的羊就有足够的饲料来满足其过冬，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损失。看到这一家老老少少在这寒冷季节里的那种和睦的氛围，我们想，如果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能这样做该多好啊！

元月 28 日（大年初五），采访结束了，在要离开时，这心里还真有点恋恋不舍的感觉，为此，我们摄制组全体成员还专门在乌里雅斯太宾馆前留了一张合影，因为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这里度过的。其实，我们是因为有暴风雪才到东乌珠穆沁旗来的。然而，从我们到达灾区到离开灾区，都未曾见过一天大风大雪的天气，因此无法拍到更精彩的画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遗憾。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来说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我们返回北京的途中，我们得知沙尘暴又要来了，心里不觉又沉重了许多，但愿草原上的牧民们能平平安安。





天鹅,一路走好

宋 薇

《天鹅之死》是在 2000 年 10 月底拍摄的。当接到让我准备一下和张林刚老师马上动身去吉林大安采访的通知后,说实话心里还是蛮紧张的。不知道到了那边以后情况会是什么样,我能不能把想要的东西采回来,心里没有一点儿底。黄洁给我的一份她们春天拍摄的节目提纲,匆忙之中还被我忘在了办公室。但是,当想到后方有关老师坐阵,前方的搭档又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摄(中国新闻一等奖获得者)时,我心里多少踏实了些许。

一到大安,我们就在几个沼泽泡子(小湖泊)里寻找天鹅的踪迹,但一无所获。

下午四点多钟,不死心的我们又到了位于铁北村附近的一个沼泽泡子。这个泡子非常大,我们的汽车就像行驶在沙漠之中,完全没有路。沼泽地面有的还没有完全冻实,发白的地方可以走,发暗的地方不能走,稍不留神一走错就有被陷进去的危险,吓得我在车上一动不敢动。多亏带我们采访的举报人比较有经验,司机在他的指挥下左拐右拐,倒也有惊无险。

突然,张林刚在望远镜里发现了白天鹅的踪影,大约一二百只!我们立刻兴奋起来,决定悄悄地靠近。天鹅离我们越来越近,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一切准备就绪!突然,我们的车身往下一沉,坏事了——由于司机看见天鹅也非常激动,竟然忘记躲闪还没有冻实的沼泽地,我们连人带车被陷了进去,刚



才的兴奋点全部降到了零。当即决定,大家分头想办法拖车。为了减轻汽车的负载量,我也下了车,低头一看,大吃一惊,车轮胎的三分之二已陷进沼泽地。

首先找到的是一辆马车,结果拉绳断了好几根,我们的车还是纹丝不动。天色暗下来时,又联系到了一辆日本三菱吉普。我听到司机用手机告诉他们顺着火化厂的方向走就能找到我们。本想这回可有救了,没想到更糟糕,由于拉绳太短,我们的车不但没被拖出,三菱吉普也陷了进去。

天越来越黑,气温也在骤然下降,虽然穿着棉衣、棉裤,可上牙与下牙早已不争气地打起了架。这时候,第三辆救援车快到了,我又听到了“朝着火化厂走就能找到”的这句话。于是忍不住问道:“怎么总说这句话?多恐怖。”他们说:“你不知道,前面就是火化厂,左边那块空地是法场,前几天才枪毙了几个人。”我被吓得“啊”出了声,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顺口说了句:“真是活见鬼了!”张林刚说:“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一,正是



信心与憧憬。
的第一张照片。那大大的眼睛里充满着对未来的
这是宋薇从山东烟台来到中央电视台后照



鬼节。”后经查证果真如此。

我和张林刚老师在大安市市场的第一次暗访，由于设备出现故障，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两人的心情都非常郁闷，不知道失去的机会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次暗访我们发现了新的情况，并看到了被毒杀的白鹤、大雁。为了掌握更多的证据，我们每天都到市场跟商贩“套磁”，为避免引起怀疑，张林刚总是穿那件蓝色大棉袄，我尽量少说话。一天，举报人跟我俩说，他在市场听到议论，说这几天，有一个老头儿还带着一个漂亮小蜜老在市场上转悠，总夹着一个包，好像很有钱，可能是个大户。我听后美滋滋的，转脸再看张林刚，他的五官早已错位，愤愤地说：“我像老头儿吗？”我连忙说：“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件破棉袄惹的祸。”

我们决定对市场进行第三次暗访。这一次的暗访是成功的，商贩毫无顾忌地拿出了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丹顶鹤、白天鹅，并和我一块儿扯起将近两米的大天鹅，就是大屏幕上的那个镜头。

天鹅长得非常美丽，长长的脖子、大大的身躯、洁白的羽毛油亮油亮的。在鸟类中，雌雄间结成终生伴侣的当属天鹅。它们在千里迢迢的迁徙中前后照应，从不分离；一旦有一只不幸死去，另一只宁肯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再另寻佳偶。

暗访中当看到被毒杀的白天鹅，心里非常难过痛惜，我情不自禁地说：“这么漂亮的大天鹅，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然后问商贩：“这么可爱的白天鹅被毒杀、被吃掉，你不觉得可惜吗？”他说：“做买卖有啥可惜不可惜的。”我说：“你不管可惜不可惜，只要挣到了钱就行了。”他说：“对。”

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有了，该拍的东西也都拍到了，结束暗访离开大安本应该高兴，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每当想起那只被毒杀的白天鹅，我就会陷入深深的痛惜之中而不能自拔。

大熊猫的故事

黄 瑛

临近岁末，我接到拍摄国宝大熊猫的任务，甚感欣喜，能有机会走近平时只能在动物园的铁栅栏前看一看的大熊猫，的确太难得了。

在大熊猫家乡四川采访的三四天里，我们不仅可以非常近距离地站在大熊猫的身边，对于那些刚刚出生不久的熊猫幼崽，甚至还能轻轻地把它们像小孩儿一样抱在怀里。几天时间的朝夕相处，也从大熊猫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大熊猫的故事。

大约三百万年以前就已存在的大熊猫，绝对是一个古老的动物物种。在亚太地区 and 它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兽类动物几乎都早已消失了，而大熊猫仍然生活在地球上，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专家们说这绝对是生活的奇迹。

我在采访中，不断从专家那里听到由于大熊猫繁育能力低下而导致它的种群数量较少的说法（当然也不排除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人为破坏等原因）。在了解了大熊猫的许多知识后，我又不免心生疑惑：既然大熊猫在繁育能力上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按道理来说，本该早已消失，可为什么这个古老的动物物种却又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当我把自己的这一疑惑向专家提出来的时候，专家们的话就更多了。但说来说去，哪个专家也没把原因说清楚。原来，直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能为学术界认同的说法，来解释大熊猫何以能生存





至今。

除了野生大熊猫以外，人工圈养的大熊猫主要有两大家族，一支属于国家林业局，另一支属于建设部。要说起这两大家族，还有着一番来历。大熊猫的栖息地是林业部门的管辖范围，栖息地范围内的大熊猫自然也是林业部门管理的对象；而建设部的大熊猫又从何而来呢？事情还得追溯到 1983 年前后，当时因四川邛崃地区的冷箭竹开花死亡，导致大熊猫觅食困难，有关方面要求紧急抢救因饥荒而体弱多病的大熊猫。这些大熊猫被抢救安置到了一些动物园，动物园是建设部的管理对象，因此，原来姓“林”的一部分大熊猫这时改姓了“建”。

“林”姓大熊猫在人工圈养的家园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了避免近亲繁殖，“家长”们还有着可以将野生大熊猫调拨过来进行“杂交”的优势。而姓“建”的大熊猫虽没有这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家长”们却自有办法。他们靠着当初林业部门给的几只大熊猫，使人工繁育大熊猫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也使得这一家族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如今的“建”姓大熊猫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家大业大。由于“建”姓大熊猫的家就在成都市，不少的内外宾客如果要去看看大熊猫往往就去这一家。而离成都市有着两个多小时车程的“林”姓大熊猫的家卧龙，人气上就弱多了。但“建”姓的大熊猫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困境：由于这里的大熊猫总是生活在一个近亲繁殖的环境下，而又没有新的种群介入，使得它们有可能发展不成优良的种群。这里的专家们盼望两家能够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我国大熊猫的科学研究。

从事大熊猫研究的有两类人员，一类是从高等院校相关

专业毕业的,另一类是从最早的大熊猫饲养员转化而来的。圈内将他们分别称为“洋专家”和“土专家”。拥有高学历及大量专业知识的“洋专家”,在这一领域自然拥有较高地位;相对而言,那些“土专家”则多凭经验办事,颇有些被“洋专家”看不起的意思。

但有一件事情却令“土专家”扬眉吐气一把。一次一只大熊猫贪嘴,进食过多,造成消化不良,腹内充满了气体,肚皮鼓胀得不行,眼见只有倒在地上出气的份儿了。这一下专家们大急,按照惯例,自然是“洋专家”先冲到一线,又是输液,又是喂药,大熊猫身上布满了各种导管,可想尽了办法,大熊猫的肚



皮生是瘪不下去。折腾到大半夜，累得筋疲力尽的“洋专家”们几乎放弃了希望，各自找地方休息去了。一直插不上手的“土专家”们留下看守，他们觉得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熊猫就这么被憋死呀，于是又开始想其他办法。一个人建议，反正大熊猫也快保不住了，不如往它胃里捅根导管试试。大家看没有其他办法，只得一试。于是，一根两指多粗的塑料管子生生从大熊猫的嘴里一直捅到胃里。谁料，这一土办法竟然奏效了，大熊猫腹内的气体渐渐排出，到天亮，浑身插满导管的大熊猫竟然站立起来，慢慢悠悠地溜达起来了。



慈祥的「熊猫妈妈」。

瞧，黄瑛抱着可爱的熊猫宝宝爱不释手，多像一位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土专家”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连“洋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偏方还真治大病。

大熊猫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大熊猫保护，目前的状况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外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国内。

其实重视与否，很大程度上还是和经济实力有关系。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保护基地，推出了普通百姓认养大熊猫的举措，这一方面增强了民众对大熊猫保护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弥补了资金方面的不足。

当然，这种认领不是把熊猫领回家，而是出一笔经费，就可以得到这只大熊猫日常生活的各种记录，并可以随时去探望。由于这笔经费一年高达五万元，一般百姓很难承受，所以举措推出后，应者寥寥。

而一次基地在接待一位“神秘来客”后，无意间竟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那次，从武汉来了一个美国人，自称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轻车简从，装束普通。见来了外宾，基地派出一位官员陪同。此人话语不多，在基地呆了三四天，每天只是不停地拍照，偶尔问问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及基地的情况。

直到临别之时，此人拿出一万美元现金，交给基地负责人，说有感于基地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精心照料大熊猫，此钱略表心意。在基地方面的追问下，他才暴露真实身份，原来他竟然是世界赫赫有名的股票大王巴菲特之子。回到美国之后，小巴菲特又汇来四万美元，并说，以后如果有机会，还要为保护大熊猫多做些事情。



羊泉村纪事

张 洁 陈新红

在羊泉村对面的山坡上,有一棵伤痕累累的千年古松。六十年前,这棵老树目睹了日本鬼子在羊泉村犯下的暴行,听到过羊泉村妇女被日军强暴时凄厉的哭喊声……六十年过去了,这棵老树依然挺立在这儿,默默地俯视着脚下这个沉默的没有多少变化的山村。

1992年12月,当年被日军强暴的羊泉村妇女万爱花打破了半个世纪的沉默,来到东京,参加日本战后首次日军性暴力国际听证会,用亲身经历控诉日军当年犯下的残暴罪行。

1998年9月,七十二岁的万爱花等十名受害中国妇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进行必要的经济赔偿。在万爱花的带领下,山西孟县共有十六名受害妇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起诉。

在这之前,万爱花等中国妇女的诉讼曾被归为“慰安妇”问题。根据她们的实际遭遇,我们接受了研究者的意见,将这些受害妇女定位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本片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过古稀的中国妇女“受害、创伤、起诉”的故事。我们从二十多名山西省孟县的受害妇女中,选择了三名作为我们片子里的主人公,她们是:七十一岁的万爱花,七十三岁的刘面换,七十六岁的赵润梅。

与以往的调查节目不同,本片更强调纪录色彩,出镜记者

不再是结构节目的主体,更多的是充当一名倾听者,她有限的提问能够起到将老人的回忆细节化和色彩化的作用,诸如:“那天的天气如何?日本鬼子长什么样?枪上有没有刺刀?嘴里说着什么?怎么打的你?”等等。出镜记者的外形符合端庄、公正、同情、善意等特点,年龄上与老人拉开距离,富有青春气息的脸与老人饱经沧桑的脸在视觉上形成反差。

我们将拍摄的主体环境依托于羊泉村,是因为羊泉村良好的外在造型能为摄影留下较大的创作空间。拍摄中应注意捕捉山、树、村、路、石洞、窑洞、受害人的家和容貌形态上的历史印迹,使这些历史印迹成为一种证据,一种历经劫难和岁月的冲刷而永不泯灭的证据。

老人的回忆及我们今天的纪录构成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



子蹂躏的中国妇女。

董倩在山西孟县羊泉村采访当年遭受日本鬼





点，出镜记者的眼睛、手中记录的笔、摄像机的镜头、照相机的闪光灯、录音话筒、旋转的磁带和指针，等等，都可以进行特写处理，加重纪录、举证的成分。我看到了，我感受到了，我纪录下来了。

这次对录音的要求较细。鉴于时空的跨度太大，镜头上不做再现模拟，而声音上则可以考虑这一追求，用虚拟的声音来传递久远的灾难，少女的惨叫、老人沉重的叹息、蹒跚的步履、伤痕的摩挲声……都应传递苦难的气息。

这段记忆对受害者来说，是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对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今天纪录这段历史，撕开这块伤疤，有一种警示的成分，一种不得不说的成分。



由张洁担任编导的《生命》一片，真实地记录下了母女换肾手术的整个过程。

“飘”

张天贺

我是“飘”着离开领导的审看间的。

眼前是特别可爱的金灿灿的冬日阳光，连门口的警卫们深刻冷峻的目光看上去也满含笑意。这一切都是因为审看单上闪闪发光的台领导签字，虽然也有一丝疑惑，准备好了遭受疾风暴雨的摧残却被领导大度的和风细雨抚慰得咩咩直叫。

不管怎么说，《戒毒者自由》——我的第一个节目，加入《新闻调查》后独立完成的第一个节目，就这样被——通——过——了——

心里面总感觉怪怪的，似乎无论从采访到拍摄到制作的哪个方面来说，这个节目都有点太顺利了。

我只说了一句话，就见到了宋玉生。

我说：“生子，你什么时候有空，见一面？”

他说：“今天晚上。”

语气里没有丝毫的躲闪和含糊。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但让《新闻调查》这样的央视重量级栏目对一个人和他家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作抽丝剥茧式的电视采访，并且这采访将使他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其中的压力还用说么？

就凭这一点，我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是一名吸毒者。





夜里九点,呼机忽然响了,生子如约而至。我把他引到《新闻调查》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厅里。灯光幽暗,四处无人,只有我们俩手上香烟的红光,一明一灭地此伏彼起。

于是,我开始了解一个我从来不曾真正感受过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着肉体折磨、心理摧残、灵魂被出卖、亲情被击碎,只有毒品才是天堂的扭曲的世界。

于是就有了《戒毒者自由》。

宋玉生,男,1972年生于北京。1996年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北京,干上了当时生意很红火的“面的”司机一行。由于宋玉生起早贪晚地苦干,很快,“面的”又换成了崭新的夏利。在这时,宋玉生对自己的自信也开始增加,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过分的自信就是自傲了。”兜里有了钱,又相对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可以支配,再加上年少气盛的自傲,宋玉生那一段的人生悲剧就由此开始了。

宋玉生所吸食的海洛因,是由罂粟所提取的鸦片膏,再经加工提纯而成的精神活性物质。海洛因对缓解身体痛楚有奇效,但同时也对人的大脑及身体器官产生极大危害,长期吸食可引致精神失常、器官衰竭的严重后果。吸食海洛因后,人会产生某种幻觉,这种幻觉吸毒的人称之为“飘”。这种“飘”的状态将在持续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后消失。在这之后,大脑会像受到重创一样一片空白。但随着身体抗药性的增加,达到“飘”的感觉会越来越难。这样,吸毒者会以吸入更大剂量的毒品来追求“飘”的效果;而随着吸入毒品剂量的增加,毒品对大脑及人体器官的损害程度也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导致人死亡。

一开始吸毒时,宋玉生仍然拒绝相信毒品会使人上瘾这种说法,他想证明给别人看自己的毅力,他并未把毒品,这一人们眼中的白色恶魔放在眼里。但事实是,在同学的怂恿下两



戒毒者宋玉生和妻子孙薇。

次尝试之后，宋玉生已无法自控，他第一次有了对毒品的渴望，身体上也出现了停用毒品后的“戒断反应”。

在 1998 年初到 2000 年 7 月，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宋玉生不断地欺骗妻子，欺骗家人。他说：“从前没干过的事全干了，从前不可能说的话全说了。”他偷走了家中最后一张存单去买毒品，每天用各种谎话欺骗家人。这样的日子令他痛苦不堪，2000 年 6 月，宋玉生想到了自杀。

是妻子孙薇，使宋玉生重新树起了对生活的信心。在宋玉生的三次戒毒经历中，她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支柱。宋玉生几次戒毒、几次复吸的失败，都没有使孙薇放弃努力。正是由于她，宋玉生才又第三次走进了戒毒所。

节目播出之后，接到一些吸毒者和吸毒者家人打来的电

话,电话里听得出他们对戒毒的渴望和疑惑。他们总是在问:宋玉生毒瘾发作,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怎么可能戒毒?说实话,我对吸毒没有体验,但我知道邪不压不正的道理。在采访时,宋玉生对此深有体会:“吸毒时总是害怕阳光,要拉上窗帘,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回过头想想,毒品就是个邪恶的东西,它就是害怕正义。至于什么是你心里的正义的东西,你自己去琢磨,自己去寻找吧。”



这是张天贺在内蒙古留下的纪念照片。长得五大三粗、一脸黑须的张天贺耸立在蒙古包前,更显出旁边牧童的弱小。

出走

董倩

采访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我仍然挂念着片子里的主人公，那个只有二十三岁的瘦弱的农村姑娘吉开桃，她现在怎么样了？村子里的人能不能再接纳她？她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上的人？她下一步准备怎么做？走了吗？

故事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莲塘村，一个很少与外界联系的清静、偏僻、有些破败的小村庄。多少年下来，这里还不兴自由恋爱，年轻人要经媒人撮合，双方看了以后要是都觉得没有什么说不上口的不满，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接着便是明媒正娶组成一个家庭，也不用去领什么结婚证，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喝了喜酒吃了喜宴，谁能不承认这已经是一对夫妻了呢？

偏偏这个吉开桃就不认。

她的舅妈做媒人，把当时二十一岁的吉开桃许给了舅妈的远房亲戚——邻村一个看上去有些窝窝囊囊、不善言辞、但也不失秀气的小伙子李本武。双方的家长同意，李本武没什么意见，可问题出在了吉开桃这里，她不愿意。于是，这个农家的少女简单地想，如果我走了不就没这么多烦心事了吗？想都没想要跟这个小村子告个别，她麻利地去了南京，在航天学院的一家小铺子里帮人家卖卖东西。羞涩而快乐的五个月，流光溢彩的大城市生活，泉水一般欢快地向前淌去。她





都快把村子忘记了，更想不起来那里还有属于她的一门亲事。直到有一天，她父亲站在了面前，要带她回家成亲。当时走出来的决心好像不是她下的一样，她穿着南京流行式样的裙子跟着满身柴火灶味儿的爹回家了。也不晓得她在路上都想了一些什么，也没话，没表情，甚至都没回头再看一眼繁华的南京。

走上这条回家的路就意味着再不能回头。她就默认了，不愿意改变了？

“怎么不想呢？他们家的人三番五次地催，我们家里的人都在做我的工作，我当时的思想也很不稳定，也不知道这种婚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但我怎么改变呢？”

很简单，如果她硬留在南京不回来，事情不就会成另一个样了吗？

“如果我果断一点儿，我想就不会有一系列的麻烦和挫折



吉开桃——一个心比天高的小姑娘。



双机拍摄,是《新闻调查》的优势,现场发生的一切一般都逃不脱摄像的镜头。当镜头打开时,剩下的就看董倩的了。

了。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回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该回来,为什么回来?我问自己很长时间,为什么回来?

可是生活是禁不起假设的。见她回来了,两家人都放了心。小伙子家已经倾家荡产花了一万多块钱布置新房、送彩礼、给要过门儿的新媳妇置办新家什,他们最怕的莫过于人财两空。吉开桃仍是没话,但是也没好脸色。如果说近在眼前的婚姻是个敞口的大布袋,那么吉开桃就是义无反顾地往里走,旁人连犹豫都没看出来。

那么她在准备结婚、等待结婚的这段日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对未来的生活抱没抱希望呢?

“我说不清。我自己说服自己,农村人嘛,不要太幻想了,总要面对现实,找一个男人,只要能干活儿、挣口饭吃就行





了。我爸我妈,我姥姥,我的小姐妹,不都是这么过的?”

应该说,吉开桃这个姑娘长的是很拿得出手的,身材小巧,皮肤细腻,五官周正,人也很大方,没有一般农村姑娘见了生人的那种局促和慌张。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她始终直视我的眼睛,有一股子泼辣和怨恨隐藏在她的目光里。无论我提出怎样尖锐甚至令她下不来台的问题,她都能一套一套地回答我。事后,连我们摄制组早已成家立业的男同事都不停地啧啧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但是,这样一个敢作敢当的人,面对这种命运的生死关头,怎么会表现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沧桑与无奈呢?当初出走的那股利落劲儿怎么一下子不见踪影了呢?

腊月的一个良辰吉日摆了喜酒,两个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按老规矩,两个人就算结婚了。但不知吉开桃那颗刚刚贴了封条的年轻躁动、不服命运的心脏,又按照什么规律猛动了几下,此时的吉开桃又成了半年前出走的那个毅然决然的姑娘。不从,不能跟他同床,我不是你的女人,你我又没领结婚证,凭什么说我是你的女人?她犯起了倔,一僵就是六天。

“可是你觉得这么拖下去就能解决问题吗?”我问。显然,吉开桃还沉浸在叙事的激动情绪里。“我没想那么多,反正我看不上他,就不能跟他同床。”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自己有理不亏人。

小伙子的父母看出了异样,忙拿出村子里的老理儿教育儿子。李本武虽说文弱,但多少是条汉子。什么结婚证,村里这么多年的规矩,你不懂吗?年轻人一急,就动了武,吉开桃万般不从的情况下,成了“他的女人”。

吉开桃跑了出来,直奔当地公安局,告她的“丈夫”李本武

强奸。

她怎么会想到用这个名义告他呢？

“我平时看杂志嘛，知道婚姻是要由结婚证来保证的。我们没打结婚证，所以不受法律的保护。”

分析得丝丝入扣。可既然她这么明白，早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还是走进了洞房呢？她到底是有思想还是一团糟呢？

后来的事情很曲折，光立案就周折了一年的时间。案立了，李本武被抓起来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犯了强奸罪，要蹲三年的牢。

小伙子家失去了这个唯一的壮年劳动力，早该收获的麦子现在还疯长在地里。家里的老父老母木呆呆地守着儿子那



采访中虽是以方便面充饥，董倩依然快乐如常。



间与这个破家极不协调的崭新的新房，为了小伙子结婚而搬到茅棚里住的大嫂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农活儿都担在她的身上。本来应该欣欣向荣的一个家就这么破落了。

吉开桃同情他们家吗？

“不光是他们家的麦子没收，我们家也没收。我妈妈也有病，我爸爸身体也不好，谁的家里都不好过。”

可能吉开桃在当初出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接下来她该怎么办。她的出走更准确地讲，是逃避。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要摆布她的命运，所以走了，但是她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去承担、去承认事情以后的发生发展。遇到小坎儿，她一狠心迈过了，可遇到再高点儿的障碍，她又退缩了顺从



过后《倍感寒冷。

屋外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让董倩在内蒙古拍摄《暴风雪

了。她在摇摆，可有多少人在为她的这种飘忽不定在付出代价。这她又没想过。

“你不坚定，所以今天的结果你也不应把责任全都推卸到别人身上。”我给她下了个定义。

“是不坚定，现在我倒坚定了，可惜已经晚了。当时我是真的不坚定，我们家人都说你不回去，我们没法交代，再加上父母也催，他们那边也催，我就拿不定主意了。现在我坚定了，可惜太晚、太晚了。”

吉开桃的脸上灰突突的，有一大缕刘海漫无目的地散在额上，把半边脸都挡住了，身上穿的也已经是农村常见的郑重其事但又不合时宜的色彩。只是她的脚上穿了一双绛红色的皮鞋，提醒着周围，关键是提醒着她自己，曾经与南京，与大城市有过那么一段关联。

想过将来吗？

“我还想去闯，出去了心里就会减少一点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也许会有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选择未来。”

但愿，这一次的出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毕竟女人没有那么大把大把的青春可以重来。

我遥远地祝福她——这个心比天高的小姑娘。





不仅仅同情弱者

谭 芸 庄永志

我想用《左肾未探及》来勾勒一下《新闻调查》栏目区别于其他电视栏目甚至其他传媒的伦理立场。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一贯以追求理性、深刻、公正自勉。《左肾未探及》是本栏目 2000 年 3 月 24 日首播的一期常规节目，正因为不是“特别节目”，所以选了它。

以节目来透视栏目的伦理立场，可以从节目素材以及节目制作人员的价格标准、伦理原则、道德选择等方面展开；由于《新闻调查》具体节目运作实行编导负责制，所以对节目制作人员的分析以对编导的分析为主。

节目素材：节目素材既是栏目向观众展示的基本情节，也是制作人员体现其价值标准、伦理原则和进行道德选择的具体情景。

经过初步调查，本片编导认为，杨易、杨选国夫妇、医院及其工作人员、卫生厅及其工作人员、法院及其工作人员身处不同的困境：

杨易——面临着病情进一步恶化；

杨选国夫妇——无力继续为儿子治病，想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确认“左肾未探及”是医疗事故所致而获赔的愿望受阻；





医院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杨选国的威胁和上级主管部门——省卫生厅的督促,传媒介入后,面临医术和医德受公众质疑的危险;

卫生厅工作人员——不断受到杨选国的“纠缠”,陷入依法定程序而为却被公众指为冷漠和办事拖沓、被法院判为行政不作为的矛盾之中,同时面临公众对系统内组织鉴定是“父亲管儿子”模式的质疑。

编导的价值标准:从关注这一题材的初衷,可以分析本片编导深藏内心的价值标准。

本片编导在接触前述素材之前,一直在关注观众来信、来电,以及其他传媒所反映的各种医疗纠纷。鉴定难、诉讼难,是患者一方的抱怨,草菅人命、医德沦丧,是患者对医院及其工

八岁的杨易无疑是在《左肾未探及》一片的主角。





作人员的指责,上下其手、“医官相护”是患者对卫生厅、局与医院关系的描述;医务工作者则强调医务工作的高风险性及不被理解的苦恼,甚至有这样的顺口溜传出:“要想富,告大夫。”以此指责患者及其家属的“纠缠”;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指出了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之间关系的不超脱,以及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带来的弊病,国家有关部门也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数易其稿。

恰逢其时,制片人向本片编导提供了杨易的素材。

一对外来的个体户,一个生命垂危的幼童,一家权威的医院,一个未解的谜团,一场长达数月的纠纷,有行政机构、有司法机关……一个理想的调查题材。

面对各方冲突和种种说法,编导试图通过深入调查,展现现行医疗管理体制下各方的困境,探讨更加人道、更有效率的医院管理体制,建立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

在编导心中,生命至上、制度第一、着眼未来、立足公众,就是关注这一纠纷的基本价值。

对杨选国夫妇来讲,杨易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四年前儿子手术成功,使他们对二院感恩戴德,如今儿子“左肾未探及”,又使他们忧心忡忡的同时对二院心存疑虑。关注杨易,就是关注所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给医院的患者及其家庭。

杨易的左肾是否还在?如果不在,是萎缩还是切除?如果是被切除,是误切还是故意?无论是误切还是故意,是否应告知并征得杨易父母的同意?如果杨易父母和医院的看法不一致,他们应该如何顺利地解决纠纷?要顺利地打开这一系列问号,还有很多的制度障碍。患者的信任与医院的受托,不能仅仅靠双方的道德担保。编导的眼光已经从杨易的左肾追寻到未来的制度建设。



编导的伦理原则:在调查当中,本片编导严格按这样的原则进行操作:尊重采访对象,话语均衡,不以情感代替理性。

1. 尊重采访对象:《新闻调查》一般不进行暗访,进行的做法是在充分征得被采访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公开、平和、平等地进行访谈与拍摄。

本片编导初次接触当事各方时,只有杨易的父母一方愿意接受采访,他们认为:又多了一份帮弱者讨回公道的力量。

二院一方和卫生厅之所以拒绝采访,是因为他们认为此前的传媒“炒作”或明或暗地告诉公众:杨易的左肾被医院切了,医院在推卸责任,卫生厅在袒护医院。

经本片编导的一再劝说,且基于收看《新闻调查》栏目以往节目所获得的“客观中立”的印象,其他各方表示愿意接受采访:说出真相,以正视听。

本片编导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另有一层含义:首先相信被采访对象面对镜头的叙述都是真话,然后在继续采访调查中进行求证、进行质疑,以掌握的事实、自己的阅历和价值观进行判断。

2. 话语均衡:让各方意见充分表达。

编导到杨易家中、二院、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省卫生厅、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进行调查,采访了杨易及其父母、二院的主刀医生和院长、河北省人民医院为杨易复查的医生、卫生厅副厅长和政策法规处处长、法院副院长,既听到了杨选国怀疑医院把杨易的左肾悄悄割下卖掉的猜测和“要把医院炸掉”的激愤之词,也听到了主刀医生“他那得了痛的破肾谁要”的抱怨,还听到了二院院长关于建立保险制度分担医疗风险,卫生厅副厅长关于成立医疗法庭和增强医疗事故鉴定权威的具体设想。



3. 不以情感代替理性：尽量不让个人好恶干扰对事件和人物的判断。调查之前，本片编导根据其他传媒对杨易事件及其他医疗纠纷的报道，“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编导原话）杨易的左肾可能被切了，原因可能是治疗需要，但是手术记录可能没有记录，医生也没有事先告知杨易父母。在与杨选国的接触中，编导感受到了杨选国个性中一些令人不快之处，还写了一篇不无揶揄的手记《杨选国这个人》。但是，编导又始终提醒自己：探询左肾的下落，需要专业技术和大量的检查证据，不可充当技术和道德的双重法官妄下断语；对杨选国个性的褒贬，不应影响到对其所述情况的判断，胡搅蛮缠也好，逆来顺受也罢，杨选国的表现不能改变“左肾未探及”的事实，也不能改变他身陷医疗纠纷漩涡的处境。

编导的道德选择：面对当事各方所面临的困境，有的传媒选择了“煽情”与“谴责”。调查结束，本片编导也面临选择：如何以电视调查文体表现当事各方所面临的制度难题。

1. 关于片名：编导选择了颇具医学术语色彩的“左肾未探及”作为片名，比《左肾风波》、《医生，我的肾呢？》等标题显得审慎、冷静、客观。

2. 关于叙事：编导觉得杨选国为儿子寻找左肾的经历已经充满了戏剧性，以此为主线平铺直叙、不事渲染，就能使观众对当前医患纠纷的典型状况一览无余。于是，《左肾未探及》这样开始：“杨易，今年八岁，河北省石家庄郊区东简良学校一年级学生……”

3. 关于评价：对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具体思考，由当事人一方的医院院长、卫生厅副厅长和处长向观众陈述：（卫生

厅副厅长的话)“社会认为你是卫生行政部门,是医院的总院长,既要办卫生,又要管卫生,必然群众不太理解。……应该成立医疗法庭,交由司法部门来组织(事故鉴定)。”(二院院长的话)“我跟保险公司就探讨过,医务人员可不可以入保险?”

编导不主张在节目中直接地发表节目制作者的意见,但主张将制作者思考的角度与基点向观众传达,在演播室借主持人之口进行立场的交代:“七个多月已经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杨家还是医院,是医疗主管部门还是我们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呢?请关注今天的《新闻调查》。”



医生张道荣(右):“我敢用我的人格,用我的党籍来保证,没切就是没切!”



4. 关于结尾:编导曾想以这样的内容结尾:

“记者问杨易:人有几个肾?”

杨 易:“两个。”

记 者:“你有几个肾?”

杨 易:“一个。”

记 者:“另外一个呢?”

杨 易:“不知道。”

这样的结尾,更多的只能再一次激起观众对小杨易的同情。

最后,片子以这样的内容结尾:

杨选国一口咬定:“(孩子的肾)没有了,而且肯定是没有了!”

主刀医生信誓旦旦:“我敢用我的人格,用我的党籍来保证,没切就是没切!”

杨选国的执拗,成了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医疗事故鉴定体制改革的活生生的促媒;主刀医生面对镜头的“保证”,更使人们对现行医疗质量保证体系的可靠性产生深深的怀疑与忧虑,因为这位医生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在程序上也和杨选国父子面临的程序一样繁复。

向关注社会整体进步与制度建设的公众负责,提供真实的事实信息,这就是《新闻调查》的选择;《左肾未探及》,不仅仅是同情弱者。

观众的读解:节目播出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卫生部迅速召开会议,有关专家的咨询意见认为:杨易的左肾很可能是术后萎缩。

杨选国指责编导没有帮他,反复念叨:“我是弱者呀!”

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来电来信颇多。大多数观念首先对杨易及其父母的遭遇表示同情,一封寄自山东苍山署名“一个热心观众”的来信表述的情绪很有代表性:“我看完本周五《新闻调查》之后,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下来,差一点把我憋死。开刀后小孩儿的左肾没有了,上诉无门,河北省卫生厅让肇事医院出证明,并要逐级上报;法院让受害人取证才能立案。这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物质不灭,一个肾能萎缩到一点儿踪影都没有了吗?请中央卫生部给个公道,对涉案人员应有个说法,请你们继续报道,澄清事实,给个结果。”

但少数观众认同了编导制作节目的初衷,发出改革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呼吁。一封寄自浙江绍兴署名江摩海的来信写道:“……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已经形成僵局,加上患者身体情况,必定拒绝做剖腹探查,将来也会拒绝尸体解剖;如果家属被说服做尸检,肾萎缩的概率是很大的,你们的追踪报道将以‘肾脏萎缩’而告终,对医学虽有所帮助,但这起医疗纠纷的背后可能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仅以‘肾脏萎缩’告终就有些不足了。……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在这起医疗纠纷中的医生、医院和病人家属都没有错。错在医疗体制。”



第三部分

有话直说







暗访时代已经到来

曲长缨

现在《焦点访谈》节目运用暗访越来越多了，近期一系列成功的节目无不是运用暗访的结果。

《违法收缴违民心》、《触目惊心注水肉》、《谁给私盐开绿灯》、《电线屡被盗 销赃有市场》、《专卖还是专横》、《明目张胆私建墓地》等节目之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暗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的情况下，搞一个“出彩”的批评报道，不采用暗访是比较困难的。早期的《焦点访谈》，如“《罚》要依法”、《算命竟然有公司》、《咸宁工商 生财有道》等节目采用暗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时用暗访的手法所做《焦点访谈》节目的数量并不很多，而今天“暗访”类的《焦点访谈》已是遍地开花了。热衷于暗访的编导也越来越多的，尽管不能说是无“暗”不出彩，但有“秘”易出彩，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那么，为什么大家对“暗访”如此热衷？为什么原来很少有人问津的暗访机成了“香饽饽”，甚至没有暗访机就出不了差呢？这不能不归于暗访的几大好处：

一是节目现场感强，鲜活生动，真实可信，能发挥电视的优势。也就是说，它真实地记录了事情的发生、发展和过程，能使观众产生直接的参与感，同记者一起去探究、了解焦点的方方面面，仿佛自己也参加了《焦点访谈》的报道，能随着





《焦点访谈》节目的深化而爱恨交加，经历一次次思想和情感的震荡。

二是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暗中取胜，记者的人身安全有保障。由于没有直接接触和正面冲突，危险性不大，记者不用过于担惊受怕，可以免遭明访时常常遇到的被抢机器、堵境头、挨打受骂、关小黑屋的特殊待遇。同时，也不乏《焦点访谈》节目所需的刺激性。

三是易于出彩，只需略施小计，就可掌握对手于股掌之中。记者既是观众也是“导演”，巧妙地追随着情节的进展，偶尔还可以客串一把“演员”，帮助要拍摄的对象提高演技。而这些成为“演员”的被采访对象，在无拘束、不知情的情况下，尽情地、放松地进行着各种本色的表演。一觉醒来之后，红遍大江南北，搞不好，国际知名。

四是可以避免明拍的缺陷和难处，化被动为主动，使采访比较顺利。记者不用绞尽脑汁去应付那难缠的一套套“官话”，不必面临被拒绝采访的尴尬，不会为抓到一个不愿接受采访的人而求爷爷告奶奶，使采访的难度大大减小。

五是减少了节目“被毙”的概率，抗说情，保播出。记者们最头疼的就是说情，使节目不能播出。暗访的使用，使被拍者往往蒙在鼓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上一当”，被“黑”一把。可令人叫绝的是，你黑了他，他自我感觉还良好，根本不知道他演的好戏早已被你收入镜头，成为经典。当然，他更不会千里赴京，来给你添堵了。

六是领导、观众都爱看，满足人们正常的窥秘心理，大大提高了收视率。《焦点访谈》既要伸张正义也要揭秘，让观众看到生活背后的各种隐秘，以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不看到车匪路霸的表演就不知行路难；不看到掺工业油的饼干，就不知道



《食品卫生法》的重要；不知道乡镇干部搞严打的劲头，就不会体会农民负担的沉重……凡此种种，不暗访是不能让人明了的。

七是拓展了节目的领域，许多明访不能拍、拍不好、最好不拍的节目，都被暗访搞掂。肥肥的注水猪，用大机器拍——别想；交警乱罚款，用大机器拍——没门；算命公司，用大机器拍——歇菜……小的是美好的，没有“小秘”帮忙，如此眼花缭乱的好戏，又从何而来，又如何让观众大饱眼福呢？！

八是摄像大显神通，有了发挥才华的机会。编辑减轻了压力，收入有“保障”，大小奖项，尽收囊中，更不在话下。暗访节目《“罚”要依法》获中国新闻奖；《咸宁工商 生财有道》获中国广播电视一等奖；《目击嘉禾高考舞弊案》、《豆粉掺石粉 黑心赚黑钱》、《触目惊心注水肉》、《谁为私盐开绿灯》获评论



曲长缨(中)在小雪过后的街头采访现场的群众。



部金奖；《天鹅之死》、《跑了题的研讨会》、《工商忙收费 粮贩忙收粮》获评论部银奖；《追踪假棉》、《追缴摇头丸》、《麻将声声 赌风阵阵》获评论部铜奖……“暗访”节目大有要包揽全部大小奖项的趋势。

暗访的好处如此多，以至于黄洁连用此招连获大奖；姚宇军偶露峥嵘，“猪腿”一蹬便成经典；刘涛老兄嚼了把私盐，奖金到手；白河山瞎白话了个“四十”、“六十”，竟成了电视大腕；一心想吃天鹅肉的宋薇虽说天鹅没吃到，可实实在在地吃了个银奖；就连初来乍到的刘庆生暗访了摇头丸和走私肉，也忍不住大喊一声：“爽！”难怪记者们趋之若鹜，暗访机供不应求。

缺了暗访，在目前的情况下，《焦点访谈》不但难上层次，而且连保住现有的地位都困难。

缺了暗访，采访难搞，节目难做，不易通过。

缺了暗访，节目难生动，不精彩。领导着急，制片人心急，记者着急，观众气急。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经过七年的历程，《焦点访谈》名声在外，各种宣传已将其拍摄思路和手法公之于众，被批评者大都有所耳闻，再用传统的明访方式，往往不是被对方设置障碍、躲避拒绝，就是问非所答、顾左右而言它。像早年那种公开与《焦点访谈》叫板、口出狂言、十分精彩的场面已不多见。采访中靠提问设套，让对方堕入套中的手法，也往往被人识破。长此以往焦点难聚焦，访谈无法访。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敢问路在何方呢？《焦点访谈》地位从何而来呢？

应该说，被访者也大多是机灵人，智商并不比记者低，要想拿到所需的东西，靠常规手段难以奏效。即使得手，也很难保证不被说情拿下。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领导和观众对节目有较高期待,希望天天有“好戏”;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记者的能力很难得到更大的发挥,节目也很难精彩再精彩。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暗访的出现就为节目保持稳定的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手段。靠“高科技”来出彩就成为了记者费力小、收获大的必然选择,其他也管不了那许多了。以前《焦点访谈》的一些节目之所以不能“上市”,只明访,不暗访,被对方采取了对策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一些“上市”的节目不够精彩,也是因为缺少暗访,仅靠明访,无法让观众看到“官话”背后的真实情景。所以,现在作为一个《焦点访谈》的记者要学会暗访,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已被一系列成功的节目所证实。

可以说,时下善于用暗访的记者就是成功的记者,就是一个聪明的记者。当然,这并不是说记者的其他素质就不重要,高素质加上暗访,做《焦点访谈》节目就如虎添翼,游刃有余。都说“勤奋、不怕苦是成功之母”,现在恐怕还要加上“暗访是成功之父”,父母结合才能生出好孩子。过去是能明拍,不暗访;现在是能暗访,不明拍。不但批评报道用暗访,而且正面报道也有用暗访的。暗访的方式已经无处不用了,除了暗访时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之外,眼下还没有什么法规来限制暗访,暗访也还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记者的自我把握和制片人、审片人的双重把关,使得《焦点访谈》的暗访仍然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暗访时代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在暗访时代的大潮中,记者们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用暗访了吗?暗访机还够用吗?

向往一种生活

法 展

从来认为从事新闻采访的人,有几种生活方式:一是显贵型,因跟随领导人出访、接见,出入华堂而渐渐自身不凡;二是屈尊型的,整日忙些有偿新闻,或干脆如狗仔队,靠别人隐私生活的;还有就是依然过着游侠般生活的一类,《焦点访谈》的记者本应是这一类的记者。

游侠记者行于山水之间,倚风为骑,仗文为剑,世间不平之处,自有他们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无论什么样的恶人跳出叫板,总能在谈笑间,制敌三五回合之内,然后在掌声与喝彩中,拂袖飘然而去。这样儒侠的形象,这样潇洒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召唤。这样的召唤如此强烈,以致评论部《焦点访谈》编辑部,多少像个梁山泊的聚义厅,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下,汇聚了五湖四海多少英雄好汉。

好汉们大都是抛家舍业义无反顾自愿而来的。对他们来说,那种伫立在猎猎的旗帜下油然而生的万丈豪情胜过一切。在这种荣誉体验面前,数年如一日的高强度劳动不算什么;酷暑寒冬的摧残不算什么;风餐露宿、车马劳顿不算什么;失去的优越物质环境,再也没有了体制内的保障都不算什么。只要有酒有肉,有一种行侠仗义的生活,也就足够了。这种生活方式很重要,以至于今天,我仍然不愿意做正面报道的选





题,这实在有悖于当初来这里的内心选择。做完正面的选题,总有一种怅然的感觉,不如做批评报道,自始至终,总有一种豪气在胸。

少读《水浒》、《三国》时,最佩服的是那些于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头颅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的英雄。时代不同,如今已无战场可供厮杀,但是,做批评报道的过程,同样能找到一种比武的感觉:恶人正做坏事,此时你出现,报上姓字名谁后,双方各亮出兵刃,拉开了架式,话不投机后,往往战成一团。《焦点访谈》节目中可以看到的最精彩的格斗场面应该如下:恶人恶狠狠地上前挥动板斧,我方轻挪闪过。三招过后,我方凭深厚的功力,把对方逼到角落,爬出擂台,拱手认输。

自己因为武功不强,让对方赶出擂台,或三百个回合不分胜负,只得回京城找高手求助,甚至场面上眼看支,只得突发暗器,这样的情形都让人窝心。只有在交手三五个回合之后,将对手一击下马,于是场下掌声雷动,这样才够爽!

最不能容忍的是全场暗器狂飞,自始至终就是飞刀、飞石、铁链子打个不停,暗器停时,对方倒是死了,但死得太难看,连个全尸都没有。1998年刚到《焦点访谈》时,我自己使过一回暗器(暗访),那是在让狡猾的对方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用的,但是,那个著名的镜头(行贿四万元)至今让我汗颜。为了这个镜头,如果有一天我被人拍了板儿砖,我决不喊冤。现在,我在采访中能不用暗访就坚持不用,让对方输个明明白白。就这样结识了不少常来常往的熟人。

老侠曲长缨惊呼《暗访时代已经到来》,在我听来,如同丧钟敲响一般。倘若如此,游侠的时候要过去,因为暗访即为文化擂台上的暗器。若我等今后要以暗器取胜,暗器甚至成为制敌的唯一法宝,生活中就无“侠”可言了。

《三国》、《水浒》之所以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关键是书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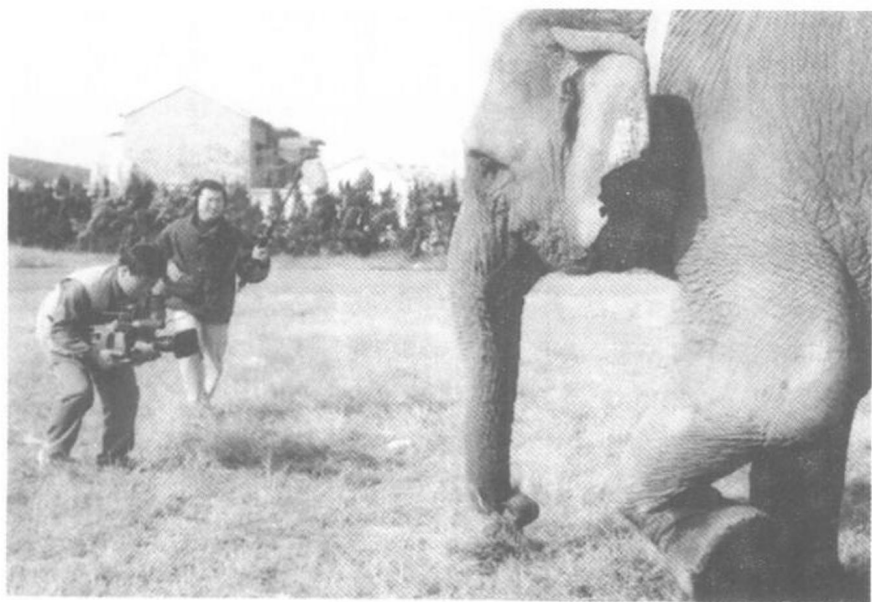
在工作中老侠曲长缨(左)和大侠法展虽各有各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那愉快的合作。

物鲜明的侠义性格让人难以忘怀。对手怎么样暂且不说,但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死法——死得明白。死得最不明不白的就是孙二娘手下的强人,都被做成人肉包子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还是让被访谈的恶人们死在各种英雄手里吧,被林冲的枪挑,被武松的刀砍,被鲁智深的禅杖抡死,被李逵的板斧劈死,否则,没有武松、林冲,少了“黑旋风”、“花和尚”,梁山泊只剩下一〇八个孙二娘,即使将天下的恶人都给宰了做成人肉包子,也总让人遗憾缺少点什么。那是一种豪情和侠义,正义本应该胜得堂堂正正,大大方方。

我仍然执著于那种游侠生活,纵然现实已发生巨变,既非

《春秋》亦非《三国》，单挑已不是时尚，但依然在每次采访的时候，愿意划出场地，纵马前行，叫出对手，报上姓名，战他个昏天黑地，分出个左右高下，胜也胜得个过瘾，这才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真可谓：胜之不武，不如回家卖红薯。



与大象共舞。



暗访 ABC

姚宇军

在《焦点访谈》，暗访的经历人人都有，但暗访的感触可能各有不同。

A. 去年在桂林一家医院采访医务人员拿提成、回扣，这种题材采访难度非常大。暗访之后总觉得分量不够，于是跟“线人”商量采访“线人”，但同时又怕“线人”担心，就想出了以暗访的方式采访。一来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二来可以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三来采访活动的双方在心理上都可以接受，起码对“线人”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后来证实，播出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线人”的处境却大大地不如以前。实际上，无论采取类似剪影、背影，还是马赛克等等手法（或是暗访），对于在一个小单位的“线人”来说，都等于是自欺欺人。结果是节目播出了，自己的工分拿到了，可“线人”穿小鞋的处理却渐渐被淡忘掉了。当时，由于心中憋闷，还曾以《如何面对“线人”》一文表示歉意。

B. 被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时，如果是摄像机一架，话筒一伸，灯光一打，就连一些常做报告的领导也会紧张的。往往灯一关，话筒一收，他的状态倒来了，这时你会说这多好，来来来，再来一遍。可当话筒再一伸，灯光再一打，摄像机再一开，他也就像回放一样再现紧张，弄得你哭笑不得。于是“明访”时每早开机，晚关机，一头一尾的小零碎往往能派上大用场。



接住，这是咱的武器，千万别掉进水里！

这一头一尾，我们可以称其为“准暗访”了。这种方法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好像都适用。

C. 最近，在江苏兴化市戴南镇采访时，因为是在两会期间，考虑到批评报道的成功率，决定前期采访全都采用暗访的方式。以往在做这类选题时，政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一些职能部门会在暗访中被曝光，这也往往是节目中最出彩的地方。而这次江苏之行，我们暗访的两个部门，一个是镇上的工商所，一个是市级技术监督局的许可证管理办公室。那里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好得让我们吃惊。一进门，笑脸相迎，一杯热茶，有问必答，还一再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们一定尽力使你们满意……其实，我们正面报道的时候也未必总是能遇到这样好的态度，仅从他们工作的态度上看，这两家单位就一定是他

们系统的先进。如果涉及到什么问题,那问题也不应该出在他们身上而应该出在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地方政府的身上。由此想到,假如我们这次江苏之行是在为那个工商所或是技术监督局做正面报道的话,那我们的暗访应该也是成功的。这样的正面报道至少在形式上会有别于以往。

总之,“准暗访”可以用做备份,有时还可以出彩。正面报道如果采用暗访,没准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做批评报道遇到困难万不得已时,就去做“线人”的工作,去暗访“线人”吧。于心不忍吗?正如忠孝不能两全一样,谁让你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呢!

☺ 《焦点访谈》的两位记者杨明泽和法展去陕西杨陵考察 2000 年直播考古挖掘活动,只顾工作,一天没吃饭,饿得眼前发黑。杨明泽四处寻味,忽见一老汉手提一袋白馍,立马扑上去:“大爷,这馍卖给我吧,我饿。”老汉一边连连摆手,一边把馍藏于身后:“不行,不行啊,不能给你吃。”杨明泽不解:“为啥不卖给我?”老汉嘿嘿一笑:“不是不卖给你,你看见门口的两只大黄狗了吗?这是给它们吃的。”法展一旁叹道:“评论部的记者连狗都不如了。”

☺ 直播新世纪时,为防万一,制片主任白河山找了两个灭火器让摄像姬雨带到演播室备用。一忙,姬雨忘了,走到地铁口才突然想起,赶紧返回。之后,姬雨兴高采烈地说:“老白,我终于办了,我实在不敢不办呀!要是出了事,还不把我开了?”白河山嘿嘿一笑:“开了?我们开不了你,有人会判了你。”



“两会”的记者证

吕少波

来到评论部八年，正式参加“两会”报道是五次，参与“两会”报道（即在会外配合“两会”报道）二次，可以说与“两会”还是很有缘的。

“两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带有国徽的“两会”记者证，而这些记者证是我每次必须保留的“两会”物品。“两会”的记者证是在不断变化的，以前只是一个普通的证件，有国徽和本人一寸照片。但从近两年起，记者证中加入了科技手段，有了磁条，每次进入大会堂都要进行刷证。它可以记录什么人、什么单位的、证号多少、几时进入的大会堂等等数据。它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并且证件上的照片也从原来一寸的换成两寸的了。颜色每年也不同，2001年人大的记者证是黄色的，所以经常可以在大会堂门口看见一群群“黄记”们。说来说去今年记者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一个“公安部警卫局”的证件监制章，而且，如果遗失了一个证件，所有同样的证件都要更换。由此，可以看出2001年的“两会”是很严格的。

现在再说说我们评论部“两会”专题报道的记者证。我记得1997年“两会”上，我们摄像的证件属于二等，也就是说除了大会主席台上你上不去，其他地方你随便去。那时我们还是很“牛”的，因为一等记者只有两个左右，而二等证也不过只有



摄像吕少波与制片人、主持人翟树杰在人大九届四次会议上的合影。尽管吕少波收藏了历届他参加的“两会”报道的记者采访证,但留下的现场照片却屈指可数。

我和《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几个摄像的才有。那时,总理在台上做报告,我在总理前面一米多远处拍摄,这也是我一生中距离总理最近的时候(那时还是李鹏总理)。当时,大会规定会议开始前十五分钟,带三等记者证的记者可以在主席台前拍摄,时间到了就开始赶人了。看见大部分人都被赶走了,只留下我们几个人在那里随便拍摄,你们说那是一个什么感觉!

可谁想第二年我们也列入了被赶走的队伍,因为,我们的证件也变成了三等。这还不算,近两年,我们又降了一等,现在的证件是可以进一楼大厅的(也就是说可以去主席台前),但摄像机没有发流动证。机器不能进,我进去干吗?这清楚地表明我们也不能去主席台前拍摄了。从此,专摄们(“两会”专题摄像)在“两会”电视直播里的身影消失了。现在只能上二楼记



者区和港、澳、台、外等一些“黄记”混在一起、挤在一起了。站在二楼再看一楼直播兄弟旁边的空位（那是我们曾经站过的地方），眼睛怎么啦？红了吗？不会吗？你想这二楼的位置也是有限的，因为还有许多“黄记”在三楼、四楼和会外呢！但为了工作，希望明年不要再降了，最好升一升。

参加“两会”报道与平时工作是有不同的。一是采访的记者多，而且都是“好事之记”。你这里采访还没有进行一分钟，马上会从四面八方跑来许多“黄记”，你一个话筒我一个录音机，一会儿画面里全都是手了，想要一个干净的画面是很难的；二是约见采访者地点不同，不是“你在第几个台阶等我”就是“在第几个柱子下等我”，不是“从左数”就是“从右数”，有时你约他在左边第三个柱子，他反而会到右边第三个柱子等你，让你近在咫尺，却心急似火；三是采访的时间都是课外的。不是在开会前就是在开会后，不是在吃饭前就是在吃饭后，午睡时采访时间是最长的，但却是最难约的。采访人胆小可不行，有时逼急了不得已也会从会场上拉人出来；四是采访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连代表都感到惊讶，经常说，你们变得真快，跟得真紧，我们都还没有转过来，对你们采访的问题不知说什么；五是采访“两会”代表的机位是固定的。不管代表换了谁，但开会的地点、讨论的地方、代表住的宾馆和房间，以及大厅和花园都是一致的，每次都想选最佳位置，但每次都一样。今年采访的机位，就是去年和以前的机位，甚至有时还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角落拍摄同一个代表。

有人问参加“两会”报道怎么样，有人说好，有人说累。但“两会”报道感觉到底如何呢，只有你亲身参加才会知道——明年的“两会”等着您！

“退居”二线

白河山

工作正式变动之前，部领导先把我从二组抽出来试用了一段时间。期间，我相继完成了一些具体工作，还算顺利，心情也蛮愉快，只是觉得有些尴尬。

一是工作时间难以控制。来早了，没钥匙进不了门；来晚了，又怕周围同志说，来帮忙就这么懒；二是电梯上下，办公室周围，不知如何对有疑问的同事解释。常有人问：“河山，你整天在部里干什么？”我说：“帮个忙。”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当时，没有及时向主持二组全面工作的叶老解释清楚这件事，虽属无奈，可真觉得对不起他；三是在办公室说话多少难把握。说多了，怕惹是非，讨人嫌；说少了，别人会说：刚来的，装蒜！

尴尬虽有些，并没怎么影响工作。那段时间七七八八的事算来真不少，上午给中南海送材料，中午为做节目的工作人员端盒饭，一会儿闲不住。尽管暂时弄不清今后的工作定位，但我心里明白，不管干什么，还是应积极工作，热情服务，严于律己。

感谢袁正明主任在例会上宣布我的工作时，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殷切希望。他说，制片主任就是为大家服务，并且是全方位服务，请大家需要时找小白吧！激动中，我一时琢磨不透该怎么样全方位服务。那天，刚一散例会，一组的两位漂亮小





姐携手走到我身旁，羞答答地说：“小白，我们需要服务。”我小声问：“要什么服务请明说吧！”她俩见旁边有人，没马上直说，只在一旁大笑。事后，我才知道这两位小姐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玉强和余伟利，她们找我，是想让我帮忙修理组里的传真机。

为了尽职尽责为大家搞好服务，我曾暗中为自己设计了一系列工作形象：走路像皮包公司的；说话像公关公司的；干活儿像搬家公司的；开车像出租公司的；谈生意像贸易公司的；点菜像饮食公司的……在新岗位工作了几个月，我一直按这样的形象标准要求自己，实话说，不容易。

康老、姚大姐等一批老同志经常关心地问我，离开原来的业务部门，来搞行政工作是否适应？我说，还行。说实话，我感觉到没什么不适应，只体会两类工作，累法不同。

以前外出拍片子，多数是别人求我们，别人主动说好话、请客、解释原因，有关材料也主动送到我们手中，时间、地点都同我们商量，只不过为赶节目经常日夜兼程，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负重”后还要“忍辱”，挺累的。现在忙行政工作，正好相反，多数情况需我们求别人，说好话，磕响头，虽然不用外出奔波，可常为一件事要驾车上百里，在台内也要步行几公里。回家后老婆经常有意见，一是嫌我话太少，我解释白天在单位话都说尽了；二是嫌我太懒，总是不愿出去溜达，我说，饶了我吧，在单位已溜达够了，还是容我躺会儿吧。

工作变动后，大家对我的称呼有点小变化。过去在二组，大家看我平时表情过于严肃，一致认为我像共产党的干部，于是由赵微带头，长期称我白书记。我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默认了。2000年1月，党小组委派林风安、刘涛介绍我入党，他们突然感到，原来我的党内职务是个骗局。现在，有不

少人叫我白主任，其实，我最怕这样的称呼，尤其是当着评论部三位真主任的面，我就更觉得尴尬。有一次客人在饭桌上问我：“制片主任是不是专管制片人？”我犹豫了一下，笑着回答：“别这么说，他们有时也不听我的话。”其实，咱内心知道，这些人从来就没听过我的。

我总结了一下，发现一条规律：原来的老哥儿们还是称我河山，或小白；一些多少对我有意见的好朋友，现在叫我“白主任”，且意见越大，嗓门越高；另一类朋友，当要求我提供服务时，一般都亲切地称：“白主任”，声音越嗲，提出的服务要求就越特殊。

新工作，新岗位，人离开了节目组，可心里还是经常想着过去。一段段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在评论部的两千个



瞧，白河山这小伙儿多帅！可惜现“退居”二线了。



日日夜夜,走过不知多少个春夏秋冬,精心制作了一百六十期节目,一期节目一首歌,一期节目一段情。

五年来,我在外拍节目所经历的一件件往事,今天即使不说,也总忘不了。

最感动的一次——1996年于南京采访春运,在街头小馆吃晚饭时,一位随行的朋友无意中说了句话,透出了我们的身份,餐馆经理的爹马上令厨师赶制一道冷菜送给我们,盘中文字是:“焦点访谈访人生,东方巨龙舞时空。”我们一见就惊呆了,可见群众对我们栏目和记者多么尊重和信任。

最窝火的一次——2000年到长春采访,片子没做成,反而被某党委宣传部写材料告了一状,小记者哪能不冒汗?

最棘手的一次——1996年在海南,被采访单位为使节目“流产”,竟动用绝招,请来我父亲到场“斡旋”。

最后怕的一次——1999年在厦门,我和再军深入到走私分子窝点中,隐性采访,当时如果露了馅,可能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白书记了。

最得意的一次——2000年为《实话实说》节目帮忙,专程赶到云南拍一头牛。到那儿我才发现,拍牛比拍节目中的人舒服多了。一头在山坡上吃草的牛,正拍、反拍都漂亮自然。后来,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真牛,比人并不牛。

过去的事,只能写在日记中;今天的事,需要我打起精神认真去做。一天,我考虑到工作的需要换了件新衣服,办公室邹利小姐讽刺我,说我老土。她说,你皮肤那么黑,还穿件黑衬衣,人显得更黑。我解释说,人长得黑,就是穿上金子衣服也好看不了。我想,为了弥补先天不足,还是靠后天努力吧。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另类心情

张 洁

“你总算熬出来了。”

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听得我是心惊肉跳。我什么时候把当制片人作为人生奋斗目标了？一年多以前，我获奖时也不止一次听到有人感叹“上帝总是公平的”。说者皆是善意，而我听完心中却有点发凉和悲哀：这是对我几次累病住院的补偿，还是对我屡败屡战坚守理想的回报？获这个奖真的很重要吗？当制片人真的很成功吗？如果还是这个片子而没有获奖，如果还是做编导的我而不是做制片人的我，我的事业、我的一生就未曾圆满，未成正果吗？

我想说的是，这些标签和符号不是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比如说我，最重要的是我想当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人性的、自由的、敏感的、才华横溢的、辨得清黑白分得出高下的人；一个充满智慧、不媚权贵并对弱者和人间苦难充满同情与悲悯的人。

我还想说的是，人在某些时候真的会被一些符号所替代，符号就是你而不是你的肉身。比如，我在任何场合被介绍时，都要加上“获××大奖”，介绍多了，我的脸上便有些挂不住。令我尴尬的是，如果我不创造更骄人的业绩来填补的话，这个评价会伴随我的一生，而且会成为我的墓志铭。想想这多么可怕！其实，我更喜欢被介绍为——一个优秀的电视编

导。因为，一个优秀的编导会有很多高贵的追求。而我对自己作品评价最高的是没有公开播出的《西古县村记事》。在这个片子中，流动着我和同伴们的热血，拍这个片子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最神圣的群体，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今天，回味加盟评论部的誓言，偶尔还会热血沸腾：我自愿加入新闻评论部，在这里，我们追求平等、前卫、求实、公正。这是一些多么美丽的字眼儿。

现在，我从编导的工作间搬进制片人办公室，我的感受很复杂：既有被上司赏识的兴奋，也有面对新岗位的担忧——在这个位置上能否干得像编导那样出色？还有左邻右舍间关系的微妙变化——笑容多了、尊重多了，但一些坦诚、一些热情、一些无所顾忌的交流却少了……



《生命》荣获“第三十九届亚广联特别奖”的奖杯。

“你现在是领导了！”

这话说得虚荣，听得寒心。夜晚面对镜子，常会浮起一些冷飕飕的自问：

——如果在编导的岗位上退休，你算成功男人吗？你是否能平衡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次提拔的不是你，你是否会心底泛酸并借此另谋他路？

以“官”为本的我们啊！

以“仕”为荣的中国啊！

怎样才能在这世俗的空气中更超脱、更自然、更平淡、更本色一点呢？因为，我们是如此优秀的一群人呐！



赵一工，揪住你的小辫子

孙金岭

看小平同志揪住外孙女辫子的照片，感觉挺好。那张照片的名字就叫《揪住你的小辫子》。小平同志那天真可爱的举动背后是一段沉重的历史。

第一次见到《实话实说》的赵一工，就是被他那飘逸的小辫子所吸引，屡屡回头望上好几眼。在国家级大台，一个敢于梳小山羊撮撮辫的男人，很是让人惊羨不已。但这仅仅是惊羨，我丝毫不敢上前揪他的小辫子看一看是真是假，怕他反手给我一记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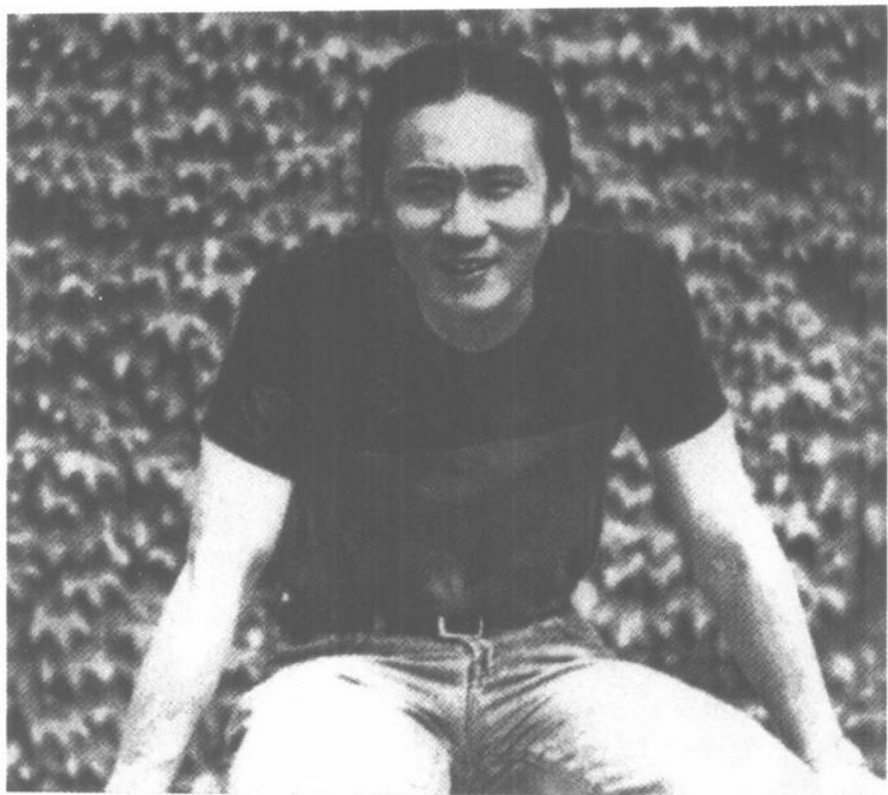
有关赵一工的小辫子，说来背后也有一段历史。小时候，每次理发，一工就极不自在，总觉得有很多人在围着看他被按着小脑袋剪发的窘态。这让他从心里涌出一阵莫名的痛苦，满头的毛发就像是针根根刺进皮肉，不管换了多少地点与理发员，都无济于事，为此，他很是苦恼了整个青春期。大了，有了思想，觉得干吗这么为难自己。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蓄起了长发。那黑黝黝的头发一飘起来，像风像雨又像云，真的招来了更多人的注目，而此时的赵一工反倒没有事啦！足蹬一双臭烘烘的旅游鞋，腿吊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吹着口哨、抽着烟，特立独行于人们异样的目光里，简直是心旷神怡，器宇轩昂！



于是，赵一工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甭认为这头发另类，我可实实在在是给《实话实说》和整个评论部增加了莫大的荣誉呢！”这话虽有些许夸张，但细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儿。连男人穿大花裤衩，台里都规定不准进二门，而一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却能在评论部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指责与非难，反而生活得像天天吃蜜一般甜美，你说那证明了什么？咱评论部环境宽松呗！咱这里看重的是个人的能力与品行，而不仅仅是装扮。“如果做节目也像对待我留头发这般宽松，我保证部里的每个栏目会办得更棒！”没想到，他还会由头发的功能引发出一个如此深奥的哲理。

装束上标新立意的一工，在其他方面也不同凡响。问他哪个学校毕业的，他会告诉你：北京市右安门第一小学，现在他侄子正沿着他当年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问他喜欢什么，他会告诉你：喜欢闲着，在来《实话实说》之前，就已是社会无业闲散人员了；问他擅长什么，他会告诉你：只要有人帮着把摄像机打开，一定能拍得不错；问他有无女朋友，他还会告诉你：尽管三张了，但尚未婚配；之后还特别郑重地补充说一句：评论部的女生，活得太累，他怕将来对不起她们，所以不在考虑范围……

不知一工打过架没有，大凡打过架的人都知道，揪住对方的头发就可致人于被动，那根根头发，一旦被人狠拽一把可是连心般地疼啊！但工作中的一工，却从来没有被人揪住过“小辫子”。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门口溜达了好几年的——工，奔涌着满腔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热血，一头扑进了崔永元的怀抱，在《实话实说》当起了策划，于是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就像他的头发般疯长起来。鞍前马后被伺候得乐不可支的崔永元，逢人便夸：“你瞧，你瞧，这样的小伙儿去哪儿找？”后来，组里的乌



我赵一工的小辫子是我的专利品，就不让你照，怎么着？

尔汗回家生孩子去了，且态度坚决地要走母乳喂养的道路，于是这统筹的工作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一工的肩上。他二话没说“呼啦”就上了手，组里大事小事全统了起来，干活儿倍儿利落，喜得《实话实说》一帮男女逢人便讲：“有事找一工去！”甚至部里开制片人会，小崔不在，也打发一工去旁听，他回来传达的精神比睡眠严重不足的崔永元自己亲自去还清楚。

你说这样的人，再揪人家“小辫子”，谁下得去手呢？何况“打棍子”、“揪小辫”的时代，早离我们远去！



还是叫我虎子吧

魏驱虎

这些天的日子不太好过。

像往常那样嘻嘻哈哈的时候,众同仁看见了会说,你看虎子当上领导都高兴得笑成一朵花了;考虑事情若有所思的时候,又会有人讲,你看虎子马上就变得深沉了。其实,我真的和大家一样还是一个编导,就如本人曾经说过的:编导、编导,就是“编来编去一直到倒”。我现在就恨不得一头倒下去睡个好觉。可是,虽然我昨天发着烧熬夜编辑了“三个代表”的节目,虽然我已经忙碌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唱完了颂歌,可我明天一早还要到台里准备为缺席的培训补考,下午还要去开人大的新闻吹风会……

闲话少说,为了早点入睡我不得不向大家敞开我的心扉。

我是属猴的,1968年生人,三十三岁的生日即将到来。在我三十余年的人生中,最大胆、最关键,同时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离开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挤进去的那家专业报纸,投身于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么苦的电视,但我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能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与评论部诸位同仁共事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喜欢这里的氛围,我曾经多次说过:评论部是一个充满“生物多样性”的地方。在这里,我从各位个性丰富的同事身上获益良多。我也希望能够被大多数人视为有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访问南非舰队，经过惊涛骇浪的考验，顺利抵达南非。魏驱虎作为随军记者采访了舰队司令员。

益的一个“物种”。

转眼之间，我来评论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如果说，我今天能够有一点可供自我欣赏的特点或风格，完全得益于评论部领导干部的宽大——在体制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允许记者个性的存在。在今后，我也愿意按照这似乎只能在内部讲讲的优良传统对待那些恶毒地叫我“老师”的小鬼。

五年多的时光，我和记者一组的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个集体让我留恋的地方太多了。在一组大多数人叫我虎子，我对这称呼是很乐意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它说明我的人缘还可以。这次，组织上把我调到记者二组当副制片人，我也随“缘”。二组以前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还记得很长一段时间



里，二组的门口都贴着“火红的年代杂志社”，并不觉得有什么陌生。所以，我对从进门左转再右拐到左转直行再左拐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

在此，恳请诸位同仁们日后看见我嘻嘻哈哈或低头沉思，都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我还是原来的我，还是叫我虎子吧！



☺ 中心组制片人孙杰欲去希腊出差，行前很真诚地对大家说：“大家需要捎点什么？”摄像夏永伟说：“给我带回个女神吧！”孙杰听罢，连忙摆摆手：“不行，女神归我了，别的你随便挑。”

☺ 《焦点访谈》编导刘宁要做有关纳米技术的片子，于是成天口中念叨着纳米、纳米。司机牛保忠疑惑不解，常做沉思状。一日，牛保忠开车带刘宁、摄像刘文去清华大学采访专家，路上实在忍不住了，问：“纳米究竟是什么？”刘文说：“我也搞不清，咱采访完专家就明白了。”几经周折，采访结束。返回路上，牛保忠一脸的满足：“敢情这‘纳米’是一种尺度，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见无人应答，又喃喃自语不止：“你们说我要是买一斤肉剁它一百年，它是不是就会变成纳米肉了？”一旁的刘文闻言，嘿嘿冷笑，接着答道：“如果真剁一百年，这肉是不是成了纳米肉咱不知道，但这刀肯定会成了纳米刀！”



站直了 别趴下

翟树杰

从小的时候就倚仗自己身体好，可以做许多孩子做不到的事情。比如，上房顶、扒墙头、打冲锋，当然，有时也可以欺负一下力气小的同学。所以，母亲最怕我生病，说我只要一倒下就是大病。刚当兵的那会儿，山沟里居住和饮食条件都相当艰苦，训练时摸爬滚打又相当辛苦，但自己从未真正倒下过（喝酒醉倒了不算在内）。

到了评论部才真正体会到身体好的重要。

从1996年正式加盟评论部到2000年，除去参加香港、澳门回归直播的特别节目之外，自己每年的工作量最少做十六个访谈节目，大多年份接近二十个。这样大的体力劳动，没有一个好身体行么！不管几天没睡觉，不管几点钟爬上床，只要一到早上七点整自己准醒过来，这一方面是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工作实在太忙。不是吹牛，几年的时间也证明了咱的身子骨“扛造”。做“三讲”节目时，曾经连续三十多天半夜睡觉，三天两夜不合眼，照样编片采访；去重庆深山采访，头顶烈日，冒着四十多度的高温，连续爬山六个小时都能顶得住。当时和我同去的小伙子白河山连续在山路上摔了七个跟头，咱一个指标都没有用上。这些年真是没有因病请过假。

幸亏有个好身体，要不那些天准得放倒了。





春节后,部里成立了机动组,编制八人,指派我负责。机动组顾名思义就是要加强《焦点访谈》栏目的新闻性。梁建增主任几次会上都提出要求:如果说过去由于一、二组制作日常节目疏漏了一些大的选题和某些重大新闻事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今后再出现此类问题就拿机动组试问。不过,梁主任宽大为怀,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2001年3月1日前后播出第一个节目,暂时不规定工作量;还有一个要求:不能从一组、二组抽调人员,以免影响主力部队原有的战斗力。

就这样,2月1日机动组挂牌成立,紧急调集人马,2月8日人员大部分调齐,2月15日开始制作第一个节目《揭开生命的奥秘》。2月20日第一个节目播出,到3月1日,申宇红制作的法轮功节目播出。至此,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两个播出节目、两个内参片。正在制作的还有两个播出节目和一个内参



站直了 别趴下,是军人出身的翟树杰血液里涌动的秉性,就连吃饭时也要情不自禁地亮出胜利的姿态。



还说没有累倒,这种姿式难道是站着拍的?

片,提前并超额实现了部领导提出的3月1日前后产出的要求。

这么少的工作量,和老大哥的一组、二组比起来实在不足挂齿。况且,距离评论部提出的快速、高效、准确等要求还有巨大的差距,可是要看到这是在怎样一个状态下的起步。

目前,机动组到位七人,除一组支援的大腕摄像张予北、王天骐以外,加上本人算是三个“老记”,其他四个人都是1971年、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出生,且以前从未干过电视,加上建组之初几乎是从零起步,再加上办公室装修、设备采购等等杂事,真是“日理万机”。好在我组同志士气高涨、年轻(除我之外)体壮、敬业精神奇强。在“边建设边生产”的自我要求指导下干起来了。除了前面制作的节目之外,办公条件也初步具备,而这一切都是本着一个勤俭节约的原则进



行的。诸如购买电器要货比三家；计算机采用兼容机，配置高质量也不错，价钱只有品牌机的一半；办公桌椅和柜子也是选择质量不错、价钱不高的，还要采取多人一起围攻家具商的办法往死里砍价，为此组里的同志几乎都成了家具专家。搞得一组的王守成和刘宁天天拉着柏杨到我们办公室取经，照葫芦画瓢，克隆我们购买的办公用品。

就这样，组里面几个编辑白天搞建设，晚上做节目，忙忙叨叨到今天。我这个唯一上了四十岁的人也仗着身体好，硬顶下来没有累倒。至此我也知道了当个制片人还真不容易。

当然，辅导“新记”做一个节目比自己干活儿还费时费力，但世界上哪个事情不是“先投入后产出”？好在我们组的几个新手悟性都不错，稍加点拨很快就上了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独立制作节目了。

按照部里的要求，我们设想机动组大约要经过两至三个月的磨合期，预计从6月份开始步入常态，正常运作。着眼点立在一个“快”字上，制作上大多采取集体作战的方式，尽可能把制作周期缩短。考虑到目前大家的熟练程度，争取尽快实现在五至七天之内制作一个节目，以后力争实现两天左右能够完成一个应急节目。虽然制作周期短，可节目还要尽全力做好。至于获奖，我组同事目前不大敢奢望。

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还需我组的同仁付出艰巨的努力，我也准备再让自己目前还算是良好的老机器拼上半年。希望自己在发挥余热的这段时间不要累趴下。

明年我们还会领先吗？

宣明栋

2001年，评论部主任宣称部内的三个栏目都继续在各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确评论部值得骄傲：这三个栏目在各自所在的同类节目当中，收视率、观众满意度、专家满意度都是最高的。而且，评论部更是一个好的领先公司。例如，它积极研发新技术（试验新栏目、评奖时进行业务研讨），认真倾听用户意见（制度性地刊登收视率分析和观众意见摘要），加强内部管理（改版《实话周刊》、例会举行发奖仪式），具有一种长期观点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争取接手大型直播节目），等等。但是，有一个讨厌的美国人（唤做克雷顿·克里斯腾森，哈佛商学院一位博士，专门研究好公司为什么会失败），写了一本书，跳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好的管理正是领先公司无法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有力原因。

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商业话题，是我把评论部看成了类似IBM、微软这样的行业领先公司，只不过提供的是媒介产品或者是宣传产品。如果你马上争辩说这两者不能等同，那就是认为我是在写论文而不是写书评。

回到老克，看完这个论断，我确实感到震惊和焦虑。你我都指望评论部一直领先，如果那些常见的药方不顶事儿了，那……

老克解释说，应当把技术分成持久性技术和突破性技术



两种。而好的公司只会管理前一种技术，所以一旦面对突破性技术的攻击，就会遭遇突然失败。

什么是持久性技术？看看评委们给《焦点访谈》出的招儿就明白了——那些意见只能使栏目变得更好。

这难道不对吗？老克不这么想。他叫嚣道，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够并且经常超过市场所需。用我们的话说，观众并没有消化提供给他们的拥有许多高级性能的节目。另一方面，无论评委还是我们自己，都为制作好节目形成了一套价值体系，比如人文关怀、社会责任、用事实说话、更快的节奏、更大信息量、更加电视化、关注制度建设等等。按照老克的说法，



有神；二、衣服乱穿，却很酷；三、年纪还轻，可肚子起来了。看了这张宣明株的照片，给人有如下感觉：一、眼睛不大，但



本能地向高端市场移动。与之相适应，评论部的资源分配倾向于维护现有观众、实现看得见的利益。明显的证明是，当部内资源发生冲突时，《焦点访谈》总是被优先考虑的。

这样一来，阻碍了我们关注看起来简单、甚至是漏洞百出的新节目形态（突破性的节目制作技术），我们更不屑于制作《幸运 52》、《荧屏连着我和你》这样的低端市场的节目。

现在得赶紧谈谈什么是突破性技术了。那是指至少在近期使产品性能变得更差的技术。然而老克得意地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本书所研究的每个案例中，正是突破性的技术导致了领先公司的突然失败。”

老克举例子说，本田小型摩托车相对于宝马公司制作的可以上高速公路的摩托车来说，是突破性技术；晶体管与真空管相比，保健组织对于常规的医疗保险，都是突破性技术。没有更多的时间咬文嚼字，所以我们简单地理解突破性技术是近期看起来差，但是即将赢得主流市场的技术。老克当然认定，管理突破性技术应当用新的方法，而不是现在常见的。

听说部里在投资《子夜》，我没有看过样片，不能评价那是不是突破性技术。这样写似乎暗示我看过了就能知道，这当然是胡话。是不是突破性技术应当由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看原著或者请教老克本人。这里提到《子夜》希望它是。万一它不是，《实话实说》组还有几个看着像的，可以凑过去一同讨论。

这里的论点是，如果我们相信老克，那就是赞同这样的说法：试验新节目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当然，新节目应当具备突破性的电视节目制作技术。





缺氧的故事

林风安

有
话
直
说

一天，方宏进到记者二组看两个节目，准备过一会儿录播。节目刚一看完，突然觉得有点晕，老方说：“你们这屋子是不是缺氧？”在屋里的二组的人都笑了。再加上老方刚才犯晕时还拉了拉女同事刘宁的手，于是有人说：你可别做出什么不合体统的事，虽然是在缺氧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也是要负责的。于是老方匆匆话别屋里的各位同事。

二组的办公室缺氧，是因为密闭不通风。展览大厅隔成的房间，围在里面的屋子没有窗户，整日靠灯光照明，看似“阳光”灿烂，空气中的含氧量却极低。草木在里面不长，人在里面也不怎么长进。于是缺氧加干燥的环境也就有了不寻常的现象。人家送来鲜花，没几天就变成了干花，不腐不败。人也是，在里面呆久了，傻傻的，看似又精又灵，其实就像脱了水的花儿，绽放开来的笑脸也有一点不那么对劲儿——冒傻气。

于是，缺氧的办公室就不断出现缺氧的故事。

一日，林风安和吕少波去湖南出差，小吕住在东二环建国门附近，去机场前要先把车送回家，于是告诉林风安，出租车已经叫好了，就在院里，摄像机我就不拿了，一会儿你走时拎上车就行了。一小时以后，林风安带上出差的东西坐上出租车赶到海关大楼路边，小吕已在此等候。上了车一路聊着大天儿，高高兴兴地奔机场而去。聊着聊着小吕一回头，问：摄



2
9
3



在缺氧的办公室里,人会昏昏欲睡。而出门采访,林凤安(右)则精神焕发,意气昂扬,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图为林凤安与摄像康锐(左)采访完我海军某先进舰队后的留影。

像机呢?林凤安顿时冒了冷汗,压根儿就忘了这个碴儿。现在要想回去取,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了。一出汗,脑筋也转了转,可能供氧充足了,想出了个主意:打电话找人把摄像机送到机场。好在那天三环路不堵车,办公室派人赶在飞机起飞前把机器送到了机场。

小吕说:老林,这事儿可别对外讲,太丢人了。林凤安说:不讲,给咱们发工钱的人,怎么能知道咱们在这种严重缺氧的地方,还这样傻傻地干活儿呢?

像林凤安、吕少波这样的人出这样现眼的事,可能不太奇怪,也许和缺氧没什么联系。可奇怪的是,二组一些高智商的人,却也连连出现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就不免让人把这些同事同缺氧联系起来了。



一天夜里，法展在二组办公室编节目，编着编着就趴在编辑机上睡着了。醒来后觉得状态不好，就决定把编辑机带回家去编。他开车走后很长时间，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还在办公室的范本吉接起电话一听，原来是开车正走在路上的法展打回来的：“老范，你看没看到我刚才编节目的地方有一袋子录像带？”老范过去一看，果然刚才法展编节目用的录像带还放在那里，就问：“你走到哪儿了？”法展说：“我拉着空机都走到马甸桥了。”

一天中午，刘涛同叶老等人一起走出呆了一上午的办公室，准备去食堂吃饭。

刚走到大门口，突然刘涛口出狂言：“我也就有个三百多万(元)吧，我就是不花，我就存着！”听到这话，与他同行的人立马傻了眼，该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吧？倒是听说刘涛最近装修房子了，不过有人去看过，也不算很豪华；另外，刘涛还有以步代车的习惯，生活得很俭朴，怎么看也不像有三百万的人。席间，人们边吃边打量刘涛，有人还是端量出有钱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感叹道：“你看人家有钱人，肤色都跟咱不一样。咱哥儿几个多苍白，你看人家刘涛，又黑又亮。”刘涛也略有不自然地说：“这无非是休假时，经常去海边来一点日光浴。”

不过，有了解底细的人说：“刘涛刚来二组时，肤色也就是这样。”他的肤色是有了钱以后才变成这样的，还是与生俱来的，还难下结论。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刘涛称自己有三百万，是不是和这人大脑一时缺氧有关系？

又一日，杨明泽到上海，这次赴沪，他要了却一桩心事。六年前，他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上海女孩子，一直难以忘怀，可没成想却把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忘记了。这也是搬进现在的办



公室以后发生的事,他自己也怀疑是不是因为大脑缺氧。

可是,杨明泽真是有运气。他愣是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上海,把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给找到了。虽然见面时明泽才发现心仪已久的女孩子,已是身怀六甲,但是,找那个女孩子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过程,却不失为小说的极好素材。先留着,别让我给写糟蹋了。我惊讶的是,一个人呆在缺氧的地方是那么弱智,而一旦换了个地方,竟然会如此足智多谋,判若两人。

是人傻还是人缺氧?说了这么多事儿,原因好像还不是人傻,好像还真跟缺氧有一定关系。





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杨继红

有
话
直
说

1995年8月的一个早上，日本人又干了一件让中国人义愤填膺的事情：他们偷偷摸摸设计了一个叫做《提督决断》的游戏软件，对五十年前的历史动了手脚，妄图借此毒害我们数以万计的热爱电子游戏的中国儿童。这个阴谋让一个中国女新闻人义愤填膺了，她做完了自己在电台的节目，然后拨通了中国媒体最有影响的栏目：《焦点访谈》的热线电话，那头占线——可能是上午太忙；中午她又打，没有人接——可能是人家吃饭去了；晚上她又打，还是占线——人家这么晚了还在忙。

第二天她通过自己的部主任找到了《焦点访谈》梁某的电话，又通过电台的新闻中心副主任、一个认识梁某的女人的介绍，终于和梁某说上了话：“梁先生您好，我是电台的记者，叫杨继红，有这样一个选题……”

梁某听完，非常干练地说了两句话：“你把这个游戏先弄来给我看看。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和《焦点访谈》的人说话，这可是《焦点访谈》的人在让我干活儿！于是我马上打通了广西长途，于是我当警察的弟弟马上抄了两家电子游戏厅，于是一封夹带光盘的特快专递很快寄到了复外大街2号。

1995年8月的又一个早上，我站在电视台东门口，等着看一眼那位说话特别利落的人。半个时辰之后，盈盈走来一



2
9
7

个女人，瞟了一圈围在大门口的人：“谁是来送盘的？”接过大信封，她特别利落地说一句：“谢谢。”——后来从屏幕上我认识了这个女孩儿，她叫傅雪松。

这就是我对新闻评论部的第一印象，期间建立起我对评论部人的无尽的仰慕：瞧瞧，这就是人家“电视人”！人家的热线哪儿像我们电台的热线，老是一副惟恐别人挂电话的口吻：“您好，我是‘青春年华’”，“您好，我是‘午间半’”，“您好，我是‘新闻纵横’”……热情得让人觉得没面子；人家的领导，哪儿像我们电台的领导？五湖四海来一个观众都得自己到广电部传达室去听情况；人家忙得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人家的选题多得很，要不是紧锣密鼓地赶着给送，人家肯定忙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去了——要不是这样的工作作风，人家怎么能做出那么惊世骇俗的节目来？要不是这个地方有着难以抗拒的魅



生活中的杨继红（左一）大声说话，大声开怀，一副快乐无比的样子，常常感染着别人。



力,我的那些师兄,诸如张恒、崔永元、白岩松等等同仁,为什么会议无反顾一头接一头扎了进去,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成名成家,然后就连呼个呼机都得留全名还要说出“机主贵姓”——人物啊!

当时我替他们自豪,心情难以言说。

就是从8月的这个早上开始,我萌生了一种好奇:进去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每天都在干什么?

后来有一位让人敬重的评论部人,送给我几本《空谈》,他说:“看完这几本杂志,你就会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人,每天在想什么”——“反道行之,座右为铭”什么意思?是不是“反行其道”的另一种缩略法?深奥得让人有点饶不过来。但是,我预感到了:这几本油印的东西将会给我带来一种冲击。

我反复看了那几本《空谈》,几乎可以背下来。我记住了一些奇怪得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名字:“华拉”、“陈虻”、“黑子”、“喜子”、“呼和”、“赛纳”、“蔺蔓”、“樊馨蔓”(“樊馨蔓”这个名字让我敬佩的主要原因是:她的主人在童年时代要无错漏地写完这样三个字多么不容易!)……那些文章让人看到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地带、一群在阳光下奔忙流汗的人,他们因为心里装满了希望而忘记艰难忘记处境忘记现实,他们很多人没有户口没有稳定的工作甚至没有稳定的住所,但是,他们都一样地有着可圈可点的过去,有着在原来的地方很值得一提的经历,他们的枕头底下多半都有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除了老婆孩子的照片就是一摞摞的获奖证书——然而,他们认为这些都不值一提。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而这样的不一样让我觉得被遗忘。因为向往着他们,我觉得我身边的一切变得不值一提。我要走近他们。



新闻评论部是这样一个人人景仰的地方。我决心：换个活法，不能再荒废时间！我的精彩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经过一番伤筋动骨的折腾，我终于又一次站在了电视台的东门口。

那是1996年7月8日的早上，评论部有人给传达室打了电话，我自己进去了。站在二楼女厕所旁边的那个办公室，我问：“谁是袁正明？”一个阳光灿烂的人站了起来。我跟着这个人到了军博，他介绍：“这是张不老，这是尖平。”——多么另类的人们啊，我已经和你们站在一起了！我由衷地问候那两个笑如春花之灿烂的制片人：“不老师好，尖老师好！”（后来知道，“张不老”——应该是张步老，是对张步兵的尊称；“尖平”的正确名字是王坚平。）

四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来人往，无数人进进出出，我留意着每一个兴冲冲来往的人们，心里都有深深的祝福。

两年前某著名作家问我：“呆在评论部什么感觉？”我说：“踏实。”他不是“电视人”，不知道我们“电视人”的追求。他说：“评论部给你们什么了，就踏实？”我给他打了个比方：刚买车的时候，第一次把心爱的车子送到汽修厂去修，把钥匙交给师傅时，一万个不放心。师傅说：“没事儿，该捶就得捶，别说欧宝，奔驰、宝马都是这么捶出来的。”走到厂区，真的看见一辆辆气派的奔驰、宝马……心里踏实了。这个地方让人放心，人家那么好的车都这么扔在这儿了，我的算个什么呢？

这么想着，抬头看见了叶老、王卓、范本吉，心里想起了赛纳、张洁、陈新红……立时觉得踏实。



感动自己

孙金岭

一个极普通的周末，没有任何特别，只是有点热，春风刮来的暖意。

在普通的日子，朋友来了，点名要看《实话实说》，想见一见心仪已久的崔永元：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丑腕儿”。

《实话实说》的赵一工很豪爽地找来了票，千叮咛万嘱咐：“如果不去，下次别来——一双豆眼斜刺里露出点滴的威胁。”

朋友在一旁欢呼雀跃：“我已来了，还有什么如果？”只是可惜晚上要值班接热线，无法一起同去分享朋友那追星般的快乐。

当日送朋友进入演播厅，消失在熙熙攘攘同样兴奋的人群里时，心中涌出的是一份会意：“啊，这年头！”

当晚刚过八点，朋友就回来了。

下意识看一下表，疑惑地问：“你没去？”

朋友平静地回答：“节目取消了。”

“什么——？”面对朋友的平静，我的惊讶显得有些矫情。

“今晚是一个演小品的‘大腕’和他的模仿秀之间对话的节目，但是那大腕临时决定死活不上场。”朋友像是在讲述自己的一段故事，幽幽地，好在让人看不到埋怨的神情。

“但是，崔永元给每一位到场的观众赠送了一本他们出的

书,并且全部满足现场观众签名、照相的要求——这一幕比看一场真正的《实话实说》还过瘾呢!”平静中朋友开始泛出激动。

我听着,渐趋平静,不再矫情。

朋友打开了滔滔不绝的话匣子,追星族般的灿烂写在了脸上:“说实话,崔永元为什么这样呢?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独特的歉意。你知道吗?大家给他鼓掌呢!”

我真正地平静了。

4月16日星期一下午,在去台里的路上遇见了崔永元。

于是说起了那晚上,崔永元淡淡一笑,长得有些特点的脸上露出的是让人不算陌生的愧疚:“没办法,只能这样做,否则



痕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
不再青春的心里港湾停泊了过多的船帆,但是额头上的印
孙金岭:「也许岁月的印痕不知不觉已刻在了额头,



会让观众更加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

于是说起了那位“大腕”，崔永元还是一笑，眯缝着的小眼睛里流出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诚恳：“不能怨谁，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做事的原则，这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更要做得仔细一些。”

说完，挥挥手，崔永元走了。

那天的气温更热，真像是春天过后的季节提前到来。

晚上，朋友又打来电话，说这两天还没有从莫名的兴奋中摆脱出来。

“没想到那大腕，连《实话实说》都不放在眼里，真牛！”电话的那端肯定是一脸的愤懑不平。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做事的原则，这很正常的。”

“真没想到崔永元竟然那样谦和，让我更敬佩他了！”电话里传来的是唏嘘的感叹。

“——让观众更加地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不是我们的风范。你以为你是谁？”

“那错不在崔永元呀，他没必要这样做的。”电话中对方的情绪显然有些激动了。

“——没办法，只能这样做。”

“为什么？究竟是谁没办法？是崔永元还是那个人？”电话那端的语气依旧不依不饶。

“——哦——这样说吧——感谢别人，才能感谢自己；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说些什么呀，跟绕口令一样！”话虽如此，但电话里面接下来却是些许的沉默，最后挂断了。

今晚没有月亮，但风却很柔。



你说越累越出汗才越是真正的生活

杨树鹏

我在南方那个巨大的岛屿上讨生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常常被一个朋友用电话骚扰。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我骚扰到酒吧听他讲自己的艳遇。为了躲他，我用我天才的声音练就了一套功夫，电话铃响，我抓起电话听出是他，立刻用一种奇怪的声音答曰：

“这是杨树鹏家，现在没有人，请在听到‘嘀’的一声后留下您的声音，他会在第一时间复电给您。”

然后，我就会“嘀——”怪叫一声。

那年那月那日，电话爆响，我料定是我的那个朋友，抄起电话准备“嘀”他一家伙，结果那端巨深沉地问我：

“请问是杨树鹏先生吗？我是《实话实说》的海啸。”

第一印象很重要。我给海啸的第一印象是个语言流畅、礼貌周到的干练小伙子。结果几天以后，他看到的却是个期期艾艾、目光游移的家伙，他肯定失望透了。两个多月以后的某一天，我跟海啸在办公室说话——那段时间是载入本人史册的“失语症时期”。若干年后，我的研究者在撰写我的历史时会写上“南方时期”、“失语症时期”、“乱语症时期”什么的——海啸突然说，你说得很好啊，很流畅啊，你明明可以说得好嘛。

他一直不知道他的话给了我多么大的鼓舞和认同，要不是俺意志刚强，说不定当场洒下两行英雄泪来也未可知。人在



齐含笑（海啸）操作手提电脑的架势，就跟当年在部队操作大炮的英姿一样。

他乡，就是这么脆弱。

但看海啸，身長丈二，膀阔腰圆，短发无髭，戴一副铜丝镶嵌西洋水晶透亮近视镜，身穿五六式（或七九式）小水牛皮半新不旧空军夹克，肩上背的是个似方还圆棕黄相间硕大无比居家旅行两两相宜的手工牛皮包，猛一看去，煞是威风；定睛一看，还是威风。正是：

威赫赫疑似武将，文绉绉却是书生。

“要有语流。”海啸站在办公室的中间，右手放在肾的位置，左手在空气中划了一个圈。“谈话实际上是一次语言的流动，经过主持人的引导，看似无序的谈话实际上是顺着一个脉络流动的。”我当时正在为节目里怎么把握谈话节奏的事情苦恼，正好海啸在，便趋前就教，果然获益匪浅。



我一直觉得海啸和虎哥（张虎迪）搭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组合。也许是年龄、阅历等等的关系，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有些非常值得看的场面。比如通电话，通常是虎哥主谈，海啸戴着小耳机在旁边听，偶尔插话提问，很像美国商业电影里干练的侦探。更多的时候，是海啸等一群人正在暴侃，虎哥突然在海啸身后大喊：“干活儿啦，唠得嘞起来就没完！”海啸并不回答——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回答过——他笑嘻嘻地看着虎哥，虎哥气呼呼地走过来：“一天到晚唠唠得嘞——你们聊什么呢？”结果多半是他也跟着我们聊了起来。

海啸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是训诂学，所谓辨形辨意的学问。当然，他的专业也和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专业一样，照例地丢了。你现在去问他一个字的出处，他多半会笑嘻嘻地说：“我只能告诉你哪里可以查到——《辞海》上总会有吧？”但这并不说明海啸的功夫就此废了。

“我有一个梦想。”

海啸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正在看一本叫《六十年代》的书，那书的附录上有六十年代的大事记，1963年一栏写着：

马丁·路德·金发表《一封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向华盛顿的民权大进军：《我有一个梦想》

他说这样的话不把我吓一跳把谁吓一跳？我以为跟着的是一番慷慨激昂，不料他说：

“挣一大笔钱游历世界，那得多惬意！”正应了我老奶奶的那句话，没什么就想什么。海啸的关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机关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梦想也就是嘴上说说过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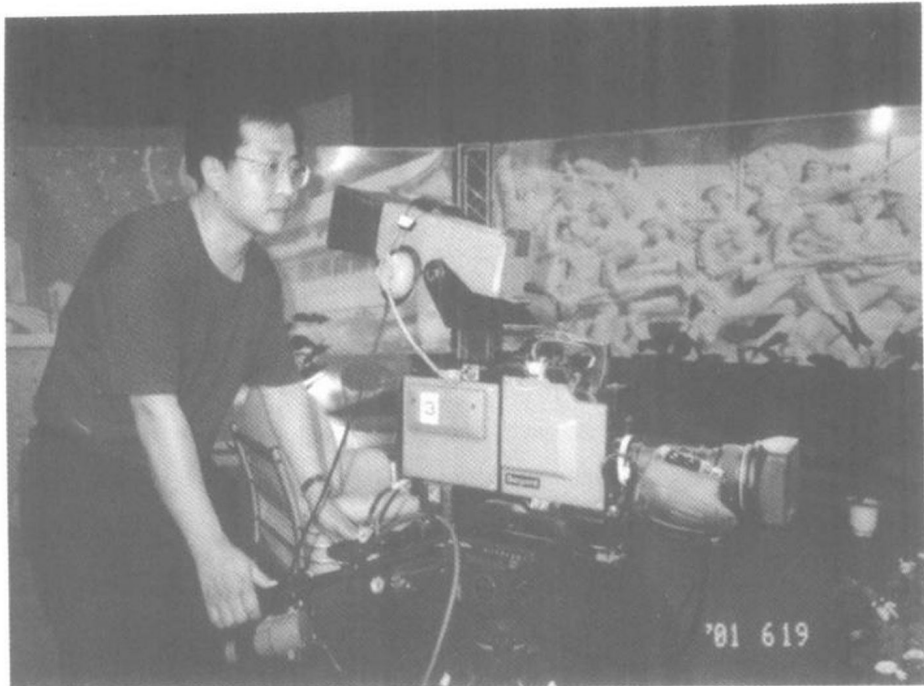


法律,悬在电视记者头上的利剑

崔立新

美国是一个法治(当然是资产阶级性质)健全的国家,但它却没有一部新闻法。新闻从业者最根本的法律依据是《联邦宪法》。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一样是国家的基本文件和最高法律。美国宪法很怪,它的正文 1789 年通过后,从未删改过。如果有新东西要加,就成为修正案附后,至今已经有了二十六条修正案,这其中最早增加的十条被称为“人权法案”,而“人权法案”的第一条就是“保证公民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在美国的新闻界,都把宪法第一修正案视为主臬。美国的传媒机构是按这样一条思路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宪法规定了每位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时宪法又隐含规定了每位公民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他个人利益活动的知情权利,因此,“我”可以,并且应该告诉公众“他”应该获知的一切。

一般人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度很大,这其实是针对政治新闻而言。因为,面对美国公民的“知情权”,政府官员们不敢自毁长城,对于记者还是敬畏有加的。但对于一般的社会新闻,美国记者遇到的麻烦,要比我们多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宪法第一修正案其实是柄双刃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伯格在 1978 年曾认定:“在法律范围内,以任何手段从任何来源采集新闻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重操旧业,摆弄一下摄像机,白河山说:“我一见摄像机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媳妇!”

不能作为强迫他人(个人、团体或政府)提供新闻信息的依据。”不难看出,对于美国记者来说,第一修正案只能起到防卫性的作用,用于抵御外界的压力和干扰;但当用它来袭击采访新闻的大门时,却毫无攻击力。那些试图把该条款用做进攻性武器的记者,多因“失手走火”,最后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

美国的电视记者最容易被卷入诉讼的官司是“非法侵入”;即电视记者未经允许闯入一处他人合法拥有的私人产业,或者经过允许,但却从事违背拥有者意志的活动。在美国,只有警察或其他急救人员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有权进入私有领地,但这并不隐含着对电视记者的允诺。即使是警察同意记者随他们一起进入一处私人拥有的新闻现场,如果所有权人要求记者离开,记者必须遵守,否则便是非法侵入;相反,如果所



有权人允许电视记者拍摄,那么警察也无权干涉。

在美国,不仅私人住宅不可侵犯,就是对公众开放的其他私有财产,如餐馆、商铺或诊所等等,也存在非法侵入问题。美国电视记者违犯这种规定的案例极多。法院一般认定:“公众进入私人产业机构的许可,仅限于从事与业务直接相关的活动,而不得延伸到与业务无关的活动,比如采集新闻。”就是说,一名电视记者在规定的营业时间内进入一家餐馆,这不是非法侵入。因为,法律认定餐馆的使用性质,已暗含有允许公众进入的承诺。但是,这种隐含的允诺不能延伸到别有目的的进入。如果记者逛进餐馆拍摄,管理人员要求你离开,那么原来隐含的允诺便已结束。如果记者还拖延,则非法侵入行为就发生了。但是,电视记者仍可以使用在对方提出要求之前所拍摄的内容,因为,这部分的所有权不在对方,他同样无权侵犯。

非法侵入是民事的侵权行为,是一种在法律上推断出来的错误行为。按照美国法律,如果没有企图做“实际上的伤害或破坏”,对于非法侵入的处罚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如果非法侵入是恶意的,那么,它不仅会被认为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而且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犯罪。美国各州对于构成犯罪的非法侵入的条件都有不同的规定,如电视记者在一处明显标志出不许拍摄的私产内采访,并且在主人拒绝后滞留不走,等等。

美国电视记者最容易引起法律官司的第二种类型是涉及公民的“隐私权”的官司。美国人特别爱讲隐私权,但美国宪法却并没有简单、明确地赋予其公民这项权利。美国的法学专家与新闻界同行也认为根本就没有法定的隐私权,只有正在逐渐完善的一些共识原则。在美国,关于非法侵入的法律界定早在殖民地时期便已确立,但侵犯隐私权的概念直到



1890 年才开始出现。美国法院及立法机关在本世纪初才着手确立这一法规,且迄今仍未完善。

一般说来,如果一条信息具有新闻价值,并且又能引起受众的兴趣,传媒是可以拍摄并利用这一事实的。美国法律把“公众兴趣”解释为能够吸引人们的任何事情。这几乎是一句废话。在美国,几乎没有不使某些人感兴趣的事情。

尽管公众享有获知或目睹某一事件真相的权利,但如果与此同时又涉及到一位公民的私密,美国法律还是要对这一权利加以某种限制的。即使是在公开场合下的拍摄,其内容也不能冒犯本分的公民,这同样是美国记者的职业道德。

但是,美国的电视记者可以从公共场所拍摄私人财产内的情况。比如,只要摄像人员看得到, he 可以从街道上拍摄某人在院子中、阳台上,甚至房间里的活动,而不必征得主人的同意。我所接触的美国同行都认为,这样做一般都不会引起法律纠纷。美国法律把一个人在阳台上闲坐、在草坪中散步,或在卧室里眺望,视为是处于“公开视野”(Public view),拍摄这些内容受法律保护。当然也有限制,即拍摄内容的视野不能超过任何一位正常过路者的目力所及。比如,不能把被摄体推到特写画面;也不能借助任何附加手段,诸如登高、爬树等。

一般说来,侵犯隐私权的报道应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内容是真实的(否则便触犯了更为严重的诽谤罪);第二,披露了公民需要隐秘的信息;第三,画面内容令被摄者难堪或尴尬;第四,报道不具备新闻价值。第四点是最重要的,但新闻价值恰恰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美国各州对新闻价值的解释均不相同。各州法院有意避免用简单方式对其严格定义,而是请陪审团判断某一电视报道是否超越了新闻媒介通常的反映内容。如果仅仅是因为信息自身的耸人听闻或令人难堪而造成了“轰动效应”,对受众没有任何启迪,则被认为是不具新闻

价值。据我了解的信息,在非法侵入和侵犯隐私两种诉讼中,前者电视记者败诉的多,后者则胜诉的多。

电视记者爱惹的令一种麻烦叫“报道失实”(false light)。我们知道,电视画面往往要与解说配合使用,而画面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它表现的所有客体都是既定的,不能增减,不容曲解。在美国,一旦电视画面使用不当,轻者会面临民事过失的报道失实,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诽谤罪(libel)。

美国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诉讼案。夏威夷电视台想拍摄一期有关“中年夏威夷人”的电视报道,一位农场主接受了采访,并签署一份合同,同意使用其采访作为节目的一部分。但



摄像吕少波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亲手触摸第27届奥运会陶露娜所得的第一块金牌。



电视台播出时,节目标题却换成了《忧虑的夏威夷人》,解说词内容也偏离了原来采访的主题。于是,农场主向州法院起诉,并获得了赔偿。

很显然,电视画面的内涵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受到解说的影响。尽管在拍摄时,并不存在违法问题,但若有意混淆电视画面,或为画面撰写了虚假的说明词语,便会造成侵权行为。

美国的传媒机构都特别强调要求自己的记者警惕“从属的法治危险”,即合法获得的新闻素材必须合法地使用。美国的法律尚未完善到明确划出电视记者免受报道失实指控的范围。但对于合法拍摄的内容,只要不配以歪曲、虚构性的说明,不给那些无名氏肆意加上特定的、不光彩的性格特征,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例如,把某位男子冲百货商场橱窗张望的画面,加到顾客节日购货习惯的节目中,是美国电视常用的手法;但是,同样的内容却不能用在商场内窃取物品的节目中。



走进新世纪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孙 杰:又减肥了。

徐 涛:盼啊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年。

刘 涛:伤愈归队。

吕少波:安全第一。

徐 慨:找到了工作。

张达俊:能同大家在一起,为大家服务,并获得了好收成。

杨继红:做了几个节目。

曲长缨:有了一个小女儿。

王琦冰:来到了评论部。

王 猛:比去年多了那一点点。

杨 红:买了一张“纳斯达克”的船票,找了间二等舱刚躺下,就发现这条船漏水了,于是在它成为泰坦尼克之前,下船溜回了陆地上。

张虎迪:太累!

罗芳华:重获自由。

赵一工:忙。

叶小林:《焦点访谈》卖了个好价钱。

邹 利:有房子。





姚宇军:失败中,得到了自信。

耿志民:月进斗金,美女如车。

陈 虻:当选“沉默”的人。

陈新红:累。

翟树杰:没有收获。

白岩松:出了一本书挣了一些钱,终于踏实了一点。

刘 宁:回到了《焦点访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已成为历史十几天了。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的岁月,早已无情地刻在了每个人的额头,不由感慨无限,相信这是评论部兄弟姐妹们此时此刻共同的体会。岁月无情,但生命之树常青。

正因如此,盘点收获,大家才更加豪情满怀。纵观上述同志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个人都有收获且实实在在。瘦人“减肥”,女人“有房”,名人“出书挣钱”,自不必多说;新人来到评论部找到了理想归宿,老同志在工作中拾起“自信”,大难当头却能“伤愈归队”,也无需多谈;这些真是实在得让人无法评说。幸福感觉都是一样的。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孙 杰:没胖起来。

徐 涛:与过去的每一年没什么不同。

刘 涛:又老了一岁。

吕少波:留给下世纪的事情太多了。

徐 慨:失去了没有工作时的自由。

张达俊:服务水平有限。



杨继红:在《新闻调查》做的最后一个片子终于没有播,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大嫂,对不起很多人。今后也不知还有没有做节目的机会了。想起上个世纪最后一年发生的许多事情,心比头疼。

曲长缨:该播的片子没能播出。

王琦冰:儿子的成绩下降。

王 猛:醒着的时间比睡着的时间长。

杨 红:仍住在租来的公寓里,误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张虎迪:还没累歇菜。

罗芳华:因为“二奶”,没去新疆和西藏。

赵一工:多。

叶小林:周围有些很聪明的人走了。

邹 利:没中彩票。

姚宇军:付出后,失去了健康。

耿志民:没有遗憾。

陈 虹:是“沉默”的人。

陈新红:干了也白干。

翟树杰:没有遗憾。

白岩松:成了无业“忧”民。

刘 宁:依然形单影只。

这世界就是这样,幸福和痛苦一样多,收获和遗憾相伴生。如果只看上个问题的回答,会让人感到世界真美好,评论部的人就是幸福。而看完诸位对这个问题不同表述,才觉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付出后,失去了健康”这可不是小事,碰谁都是遗憾,一位老人四十多年前就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兄弟以后悠着点吧,累坏了身子骨,最倒霉的还不是咱媳



在评论部 2001 年年会上,作为“先进集体”代表的中心组制片人孙杰上台发言时,发言稿竟然是写在了一卷卫生纸上!

妇咱孩子?“该播的片子没能播”、“干了也白干”等等遗憾,其实想开了去,不算啥,在评论部打工,谁没点这经历呢?何况“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依然形单影只”的刘宁的遗憾,说起别人还真着急使不上劲,关键看自己了。只是以后别光看自己的影子,要多看别人的影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自己的影子吧!至于孙杰的遗憾,那也叫遗憾吗?!没看见无数胖人为了减去几斤赘肉痛苦得愁眉苦脸,大把大把地烧钱,依旧胖胖如也?真是瘦人不知胖人苦,瞎掺和什么!对这样的遗憾诉求,不予支持。“没中彩票”,虽然也是遗憾,但相信领导们对此会





最高兴，否则你中彩票成了富翁，谁来替他们当牛做马地干活儿啊？而且如果真那样了，那还不得头儿们为你干活儿？啊，你给头儿们发工资，头儿们来当牛做马，像个小丫头一样让你使唤来糟蹋去，就凭这一点，他们干吗？就凭这一点，他们不让你遗憾让谁遗憾呢？

迈向新世纪，你心情如何？

孙 杰：心宽体不胖。

徐 涛：心如止水。

刘 涛：期望明天。

吕少波：感觉良好。

徐 慨：没心情。

张达俊：心情特爽……

杨继红：复杂。希望我祝福过的人一切都好。

曲长缨：精神振奋，一切向“钱”看。

王琦冰：与往年没有什么不一样。

王 猛：不知道用哪只脚先迈！

杨 红：豪迈得一塌糊涂。

张虎迪：真幸运，千年一回让我们给摊上了。

罗芳华：百感交集。

赵一工：中。

叶小林：有弟兄们在，咱怕谁。

邹 利：复杂。

姚宇军：世纪的新旧是人为划分的，忘掉了这一点，一切如常。

耿志民：心乱如麻。



陈 虹：一路阳光。

陈新红：心如止水。

翟树杰：和去年元旦时心情一样。

白岩松：不好也得说好。

刘 宁：憧憬——像孩子一样。

姚宇军说得没错，“世纪的新旧是人为划分的，忘掉了这一点，一切如常”。但问题是忘掉这一点，做到“心如止水”容易吗？正因为如此，大家“心乱如麻”、“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就显得十分的自然。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谁又知道将来不怎么样呢？不过话又说回来，管他会是怎么样，这日子还不得咱自己过？有没有“钱”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兄弟们在，咱怕谁”？咱怕过谁？咱还能怕谁？身外的世界“一路阳光”，既然千年一回的幸运，让我们摊上了，那么就让我们“憧憬——像孩子一样”吧，“振奋精神”好好地活着，再摊他个千年之交那岂不更牛！至于“用哪只脚先迈”，姑且不必管他，就像天底下没有人会用鼻子吃饭一样，自然也不会有人会给自己的左右腿凡事都分个先后，反正横竖是自己在走，只要不是别人的腿子就行。当然，“不好也得说好”则大可不必，因为人们对此的理解是：既然“不好也得说好”，那肯定也会“好也得说不好”，这不成了说假话了吗？当然，如果这的确是岩松的真话，那么，对于未来，一个最有资格说灿烂的人却是“不好也得说好”，莫非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假如岩松真的不想当这名人了，那么按照此消彼长的规律，一路坎坷、过一天算一天的我等凡夫俗人是不是即将迎来“皇帝轮流做，今天轮到我”的出头日子？如此说来，我们就更应该对未来的新世纪充满信心，相信吧，那出人头地的时刻一定不再遥远。



迈向新世纪,你对走马上任的新领导人寄何厚望?

孙 杰:为群众办实事,可以急躁一些。

徐 涛:要让马儿跑得好,多给马儿吃嫩草。

刘 涛:梁、陈、关多发票子,少发脾气,在评论部攀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涨船高。

吕少波:工作、钱包都上一个台阶。

徐 慨:领导也是人嘛!

张达俊:带领大伙儿奔小康。

杨继红:希望他们运气好,身体好,心眼好。

曲长缨:再创辉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代”。

王琦冰:带领我们共同致富。

王 猛:比上一任领导更看重钱的重要性。

杨 红:不熟悉新领导们的肠胃,不敢论说。

张虎迪:领着百十号男女老少奔“钱”方。

罗芳华:让我们干活儿少少的,赚钱多多的。

赵一工:薄。

叶小林:为弟兄们开创新河山。

邹 利:更有人情味。

姚宇军:走马上任的新领导到底是谁们?上任后多为弟兄们捂着点。

耿志民:让评论部上市。

陈 虻:肝胆相照。

陈新红:多厚爱大家伙儿。

翟树杰:对老一把手说,常回家看看;对新一把手说,把车

拉得快点。

白岩松：把舞台搭大。

刘 宁：使每位评论部的从业人员有成就感，钱包鼓起来。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凸显了评论部人老实憨厚的禀性——无论过去受多大的委屈，也不管自己真的干得多捞得少，反正是自己从不在非正式场合向领导提意见，只把满腔的看法化作厚望，在类如本次正规场合上才含蓄地寄语领导，其中不乏铮铮直言，如“为群众办实事，可以急躁一些”等。而“肝胆相照”，“更有人情味”，“把舞台搭大”，“多厚爱大家伙儿”等，则属语重心长，情深意切，充分表现了对新领导人“听其言、观其行”的殷切希望。除非新领导不是人，否则看了这些不掉眼泪才怪呢！当然光掉眼泪不见实的，大伙儿还是不会答应的。那么，怎么干呢？咱评论部人就是这么好这么实诚，连这问题也给详细地指出了——“让我们干活儿少少的，赚钱多多的”，“钱包也上一个台阶”，而新领导人自己去“把车拉得快点”，且“少发脾气”。对此，新领导有必要大大地窃喜一番，有如此披肝沥胆的下属，有这等生死与共的人马，岂不是当官的最大的幸事和筹码？莫等闲，白了中年头，空悲切！

新的一年，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孙 杰：给我几斤肉吧！

徐 涛：日进万金。

刘 涛：忘掉旧的世纪，重新年轻起来。

吕少波：公民不分等级。

徐 慨：生儿子。





张达俊：多种地，多打粮。

杨继红：不犯错误，曾经犯过的错误不伤害别人。

曲长缨：人人家庭幸福，评论部兴旺发达。

王琦冰：努力工作，挣更多的钱。

王 猛：不用再填这样的表！

杨 红：《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子夜》播出火爆节目之后的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在线形式，让记者与网友交流，提升我们在第四媒体的知名度，占领互联网阵地。

张虎迪：新闻频道开播，评论部每人捞个一官半职的。

罗芳华：想什么有什么。

赵一工：闲。

叶小林：平安。

邹 利：中彩票。

姚宇军：忘记那是新的一年。

耿志民：日进斗金，美女如云。

陈 虻：穿大鞋，放响屁。

陈新红：大家都舒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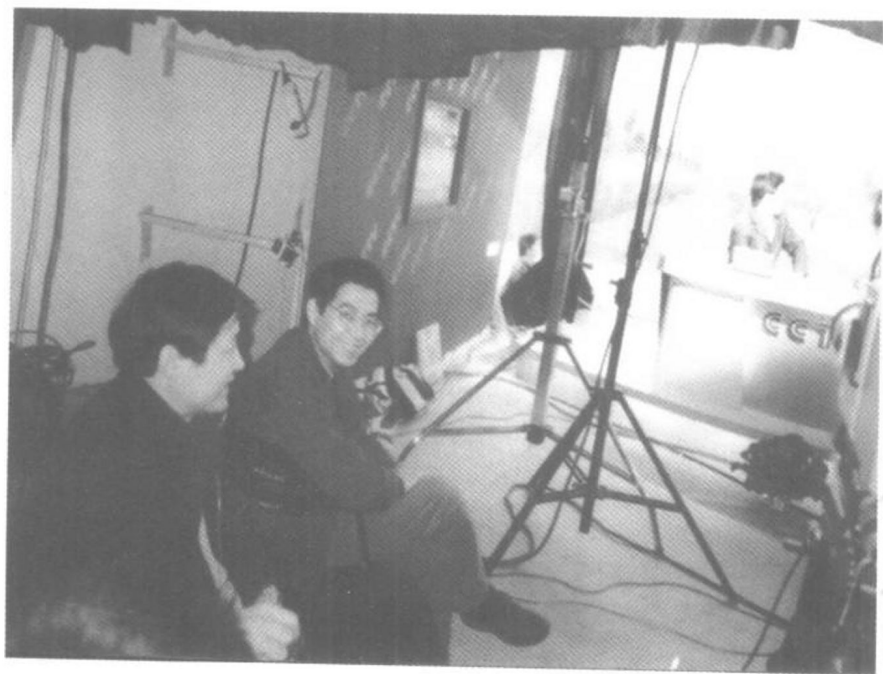
翟树杰：提高好看节目的比例。

白岩松：《子夜》顺利开播，自己与家人健康快乐。

刘 宁：工作顺利，找到如意郎君。我爱的人娶我。抬头见喜，低头见钱，心想事成！

在世纪之交，许个最如意的祝愿，为自己，也为家人，讲究的是个真诚。“穿大鞋，放响屁”，只要是那股气无异味，放他一屁又如何？屁壮山河，荡屁回肠，咱要得是股屁势！“生儿子”、“中彩票”，倒不妨一试，但这等事强求不得，“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该咋咋吧！孙杰的“给我几斤肉吧”的呐喊，决不是《狂

人日记》中的独语，罗芳华的“想什么有什么”的祈祷，也不是教堂里少女唱诗中的飘渺，这些愿望真的有实现的可能：前者只吃不干活儿，后者闭眼不睁开，准行。当然“日进斗金，美女如云”的愿望，比起“月进斗金，美女如车”来更高、更快、更强，显然是又一场更牛的风花雪月了。而刘宁的心愿无疑是一朵温馨。她第一次许的愿是“工作顺利，找到如意郎君”。大家以为此乃刘宁内心最真切的渴望，成家立业难道不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吗？何况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呢？许久，刘宁打来电话，告知：“改一改，把‘找到如意郎君’，改成‘我爱的人娶我’。”琢磨良久，才发现刘宁不愧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摄像机对准的是主持人们，而这张照片拍摄的则是躲在摄像机背后的人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微笑总是写在脸上。



这一改整个让人拍案叫绝!“找到”有些主动句式,一个女孩子干吗要主动?而改成“娶”就大不一样了,是他非要娶嘛,我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娶”字,且涵盖了一年之内从谈恋爱到组合的全过程,而“找到”,在只争朝夕的二十一世纪就显得慢了许多,当然了,这厮还必须是“我爱的”,不爱的来娶那是没门的!许久,刘宁又打电话来,说要全删,改成上文最后三句话。大家实在觉得这是个极好而独特的祝福,不忍删除,于是斗胆将三次所写全部保留于上。但愿天下有君能撞桃花运,一不小心被飞来的绣球砸个趔趄;但愿刘宁千里能婵娟,洞房花烛夜掀起红盖头时,再把郎君乐个大趔趄!

新的一年,你预计评论部将发生的大事是什么?

孙 杰:让我去算一卦。

徐 涛:未卜。

刘 宁:新人层出,许多老人下岗。

吕少波:评论部将改变为评论中心。

徐 慨:预计评论部每人买一幢房子。

张达俊:开辟新天地。

杨继红:两至三个新主持人出名,二十至三十个老人离开,二百至三百个新人进来。

曲长缨:新闻频道的冲击,人员的大变动。

王琦冰:有更多的人走上领导岗位。

王 猛:这事儿现在还不能说——保密。

杨 红:随着新闻频道的创办,更多的同志将会被置于与他们能力相称的海拔高度上,在那里他们办公桌的占地面积将比现今有较大的增长。



张虎迪：新闻评论部将变成新闻频道。

罗芳华：人人住花房，个个开宝马。

赵一工：变。

叶小林：这个问题深了。

邹利：更多的领导、更多的新人出现。

姚宇军：保有“干部”摇篮的美誉，年终前欢送会必不可少；记者处境进一步艰难，吃官司、受调查，类似事件只升不降。

耿志民：该走的走了，该留的留下。

陈虻：添人进口。

陈新红：每人发一辆车，发一套房，去太空旅游。

翟树杰：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待遇。

白岩松：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和其他部门发生强有力的冲突。

刘宁：火得一塌糊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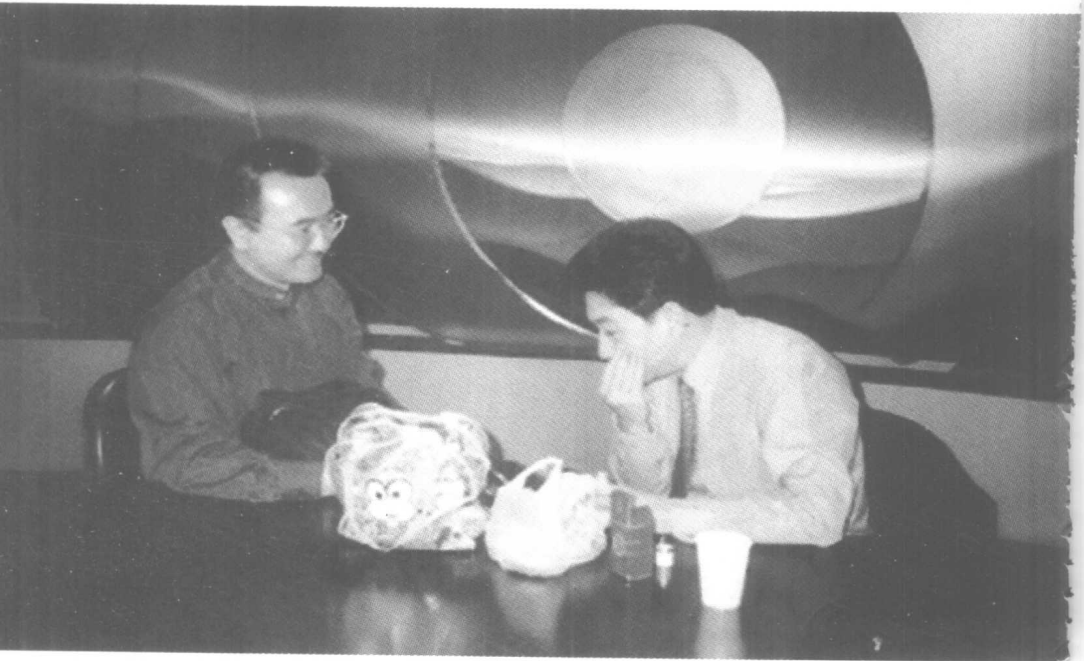
新的一年，你预计评论部将发生的大事是什么？对此，叶老说得极是：“这个问题深了。”想想也是，这本该是新领导人思考的事，提前想得周全，未雨绸缪，大伙儿酒足饭饱了，届时举拳头拥护就行了；想不到或装傻充愣，那么让大伙儿受罪之时，相信也就是他们吹灯拔蜡之日。但是，评论部的一帮男女，就这德行，“咸吃萝卜淡操心”，本来自己都有点烦，却还要替掌握自己生杀大权的新领导人考虑，真是可叹又可爱。这不“新闻频道的冲击，人员的大变动”，“评论部将改变为评论中心”，“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和其他部门发生强有力的冲突”等等预见，一针见血，足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论题之科学性。事业有变化，人员必有升降，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对此大家无疑心知肚明，只是希望新领导人为大

伙儿该出手时就出手，能争取时就争取，绝对君子不得。姚宇军的预见，更为我们提了个醒儿，“记者处境进一步艰难，吃官司、受调查，类似事件只升不降”，这是我们所极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不愿看到不等于不会发生，那么发生了谁来为我们做主则更是大伙儿极其关注的焦点。我们极愿看到且乐见发生的是“人人住花房，个个开宝马”，甚至“去太空旅游”。至于还有什么“未卜”之事，就姑且不去管它，爱谁谁吧！亲爱的伊万诺维奇·瓦西里同志，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有的。





我想追求的是那种平实的、棉里藏针、话中有话的表达方式。我从上镜第一天起就不化妆，灯光师说不化妆脸上会反光，那我也不化妆。



出镜前的化妆，是主持人们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看着水均益认真的样子，周墨乐呵呵地默想：我要是也化化，是不是也很俊？



本书赠送光盘中的《情怀》节目里，被采访者是当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冲顶未果的英雄刘连满老人，片中详细叙说的内容催人泪下。